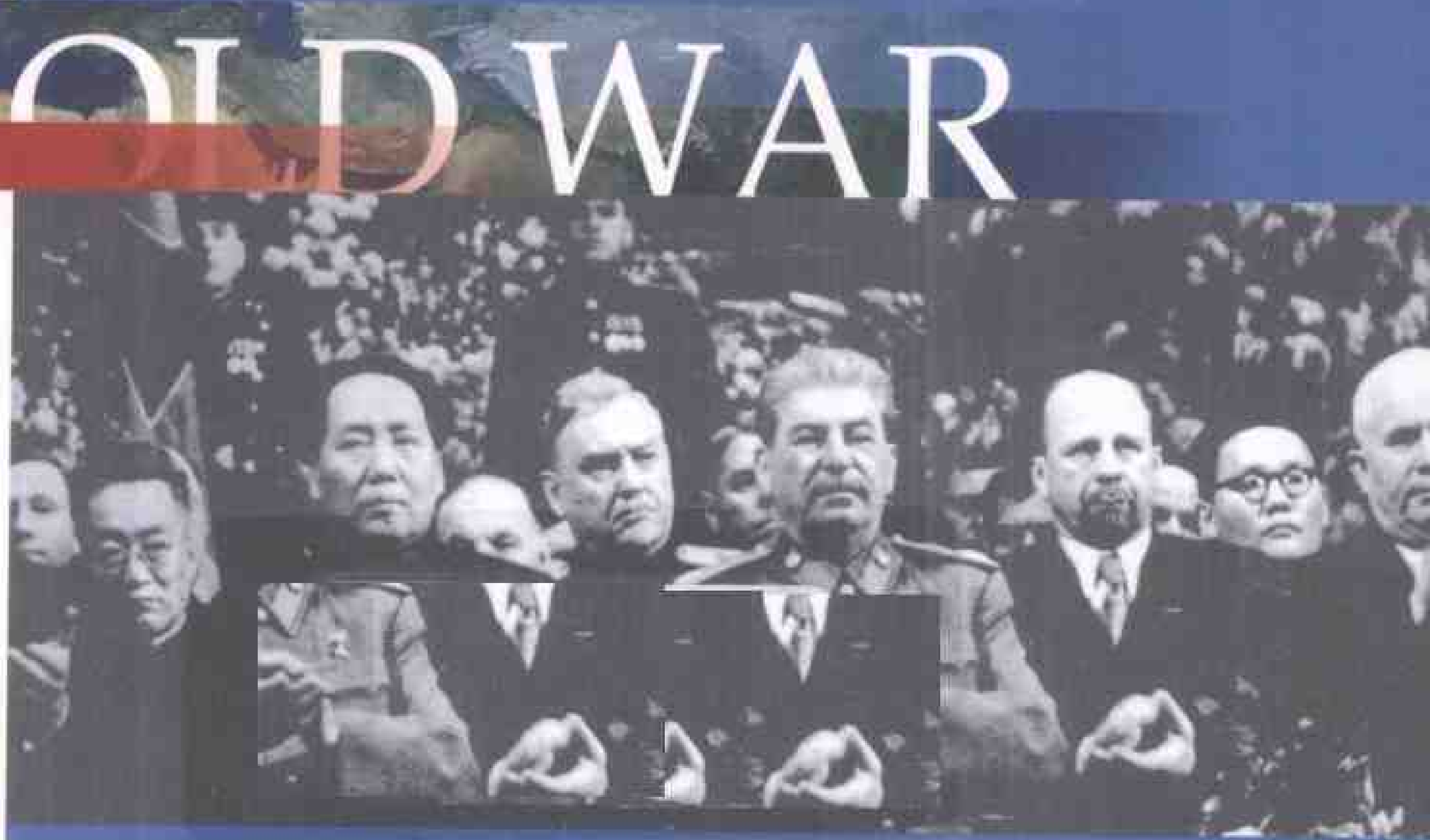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这部书对冷战前期大国关系变化的具体剖析与阐述，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中国如何利用复杂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利益、承担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借鉴。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

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

COLD WAR



徐天新　沈志华／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國冷戰研究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

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

(1945—1972)

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但其遗产尚在，各国仍在继续承受冷战遗留下来的众多后果，一些大国政治家们甚至不时以冷战思维分析处理问题。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防止大国之间再度陷入相互敌对和威胁的局面，如何维护和平、安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目前中国和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总结冷战时期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提供借鉴，已成为当前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更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此而言，由徐天新、沈志华主编的《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一书，可以说是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这部书从不同侧面多个角度探讨大国在某个时段或某个事件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和影响，着重剖析亚洲大国同美苏关系的变化；对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做了具体、透彻的分析，极大地丰富了大国关系的内容。

全书探讨了“战”和“冷”之间的关系，进而将这一时期大国关系归纳为四个特点：1.“战”与“冷”这一相互矛盾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又彼此制约。2.“战”是基本的，但“冷”也是不可或缺的，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3.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的实力是不对称的，这极大地影响了大国关系的走向。4.美苏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决定着冷战的走向，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其他大国间的关系，但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也反过来影响美苏关系，甚至起到关键性影响。

ISBN 978-7-5012-4025-8

9 787501 240258 >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本书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赞助出版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

——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

（1945—1972）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徐天新，沈志华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012-4025-8

Ⅰ．冷…　Ⅱ．①徐…②沈…　Ⅲ．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Ⅳ．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1177 号

书　　名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
——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
Lengzhan Qianqi De Daguo Guanxi
——Meisu Zhengba Yu Yazhou Daguo De Waijiao Quxiang（1945—1972）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校对　陈可望
责任出版　刘　喆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680 毫米　1/16　32½印张
字　　数　5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4 月第一版　201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025-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领域表现出来的一种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

美苏冷战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冷战是由美苏之间的矛盾斗争引发的。冷战格局的产生、延续和变化，反映并体现了美苏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现实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同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征。冷战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占据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冷战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和深远。

冷战是人类历史中特殊的一页。它对于从第二次大战过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来说，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冷战时期，斗争的双方严重对立，激烈竞争包括军备竞赛及核竞赛。地区性冲突连绵不断，世界处于核恐怖核威胁之中，并一度陷入核大战的危险边缘。有历史学家称冷战是“近代历史上的荒谬插曲”，是“漫长的、代价高昂的、黑暗阴郁的、危险的事件”，是“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①] 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纷纷谴责冷战，批评冷战的发动者和加剧冷战对峙的大国领导人。不过也需要看到，美苏在冷战对峙的同时，不断寻求对话与缓和，寻求一种自我控制机制。美苏之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世界和平至今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冷战本身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

今天，冷战虽已结束，但一些大国政治家们仍不时以冷战思维分析处理问题，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给我们的某些教训》，《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8期，第2、5页。

大国战略互动关系依旧复杂多变，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人类社会至今仍在承受着冷战遗留下来的众多后果。所以，冷战至今仍是人们关注和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冷战史的研究早在冷战刚出现不久就开始了，至今不衰。苏联对冷战史的研究大多限于对事件的叙述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指责，认为冷战完全是美国一手挑起的。美国的对苏冷战政策是其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美国不仅敌视社会主义苏联，而且妄图消灭后者以独霸全世界。它所奉行的“实力政策”和“扩张政策”引发了冷战，苏联的反应只是防御性的。苏联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见德波林、库塔科夫、叶戈罗娃等人的著作。[①] 官方还出版了各种外交政策文件集。[②] 西方国家也十分重视冷战问题的研究。美国国家档案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总统的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部等处保藏有大批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档案。美英等国定期出版外交政策文件集。西方有关冷战的论文专著多不可数，观点见解各不相同。概括地说，40 年代出现“正统学派”，代表人物有威廉·麦克尼尔、赫伯特·菲斯、贝利、西顿—沃森、诺曼·格里布纳等。[③] 他们从其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产生冷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苏联的扩张。认为冷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及其专制制度，斯大林把革命的狂热和领土的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惊，于是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最初来自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和当政者。60 年代，“修正学派”的观

---

① *Деборин Г. А.*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ее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Москва, 1960; *Кутаков Л. Н.*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1917 – 1972, Москва, 1975; *Егорова Н. И.*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буржуаз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США, Москва, 1981.

② 如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61 – 1980,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1962 – 1981;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за 50 лет, Сб. Докуметов, Москва, 1967; Сборник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договоров、соглашений и конвенций，заключенных СССР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с 36 вып. – Сбор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СССР），Вып. 1 – 38, 1920 – 1982 гг, Москва, 1924 – 1984.

③ 他们的代表作见 W. H. Mcneil,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 – 1946*, New York, 1953; 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1957; T. A. Bailey, *America Face Russia*, New York, 1950; H. Seton-Watson, *Neither War nor Peace: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1959; Norman A. Graebner, *Cold War Diplom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 – 1975*, New York, 1977。

点逐步流行起来，代表人物有：威廉·威廉斯、唐娜·弗莱明、科尔科兄弟、劳埃德·加德纳、戴维·霍罗威茨、托马斯·佩特森等。[①] 他们认为冷战的主要责任不在苏联而在美国。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而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一个世界体系，而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苏联和其周围的共产党国家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互隔绝，因此对苏联发动了冷战。苏联主要是自卫的，如果美国不疏远苏联，冷战或许可以避免。苏联的安全需要不应该受到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强硬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这一派的代表主要是学者，其观点虽出现于60年代前半期，但主要阐述于70年代初，到90年代冷战结束后仍然有学者持这种观点。70年代又兴起"后修正学派"，代表人物有：约翰·加迪斯、林恩·戴维斯、丹尼尔·叶尔金等。[②] 他们认为冷战是一系列的失误和误解引起的，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90年代，美国又出现了"新后修正学派"，他们认为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③] 另外，"后修正学派"有一个重要分支，有人称其为"非极化派"。他们抛弃美苏两极论观点，把研究视野投向别的国家，重视英国以及北欧国家在冷战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费雷泽·哈伯特、艾伦·布洛克等。[④]

90年代初，俄国大批历史档案解密。有关冷战问题的档案资料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РГАНИ）、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等处。俄国学者在《文献资料》（ Источник ）、《苏共中

---

① 他们的代表作见 William A. Williams, *Tragedy of America Diplomacy* , New York , 1962; D. 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 New York, 1961; J. Kolko & G.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 1972; Lloyd C. Gardner, *Architects of Illusions: Men and Idea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1 – 1949*, Chicago, 1970; David Horowitz, *The Free World Colossus: A Critiqu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 1965; Thomas G. Paterson, *Soviet-American Confrontatio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 Baltimore-London, 1973.

② 他们的代表作见 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 – 1947*, New York, 1972; Lynn E. Davis, *The Cold War Begins: Soviet-America Conflict over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4;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1977.

③ 关于该派的主要看法，可参见：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他们的代表作见 Fraser J. Harbutt, The Iron Curtain: Churchill,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 1986;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 – 1951*, New York , 1983.

央通报》（Вестник ЦК КПСС）、《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近现代历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 й ш а я история）、《祖国历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等杂志上公布了大量的专题性档案文献，俄国档案部门与研究机构合作，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文献集。此外，很多前国家领导人（如 Н. С. 赫鲁晓夫、А. И. 米高扬、А. А. 葛罗米柯等）和外交官员（О. А. 特罗扬诺夫斯基、А. М. 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А. Ф. 多勃雷宁、Г. М. 科尔尼延柯等）还相继发表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回忆录。在这一基础上，俄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或专著。[①] 他们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认为美国和苏联对于冷战的起源和发展都负有责任。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冷战史研究也有迅猛发展。他们花费重金购入大量俄国档案，并在近十几年推出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使冷战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亮点和热点。[②]

作为当前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界的一门显学，冷战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冷战史研究日益形成规模化、组织化。各国都出现冷战史研究中心，学者们经常会聚一堂，交流、研讨专业问题。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不定期出版《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享誉国际学界，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国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

---

① 比较突出的著作有：Лельчук В. С.，Пивовар Е. И.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род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архивов，1995；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1998；Гайдук И. В.，Егорова Н. И.，Чубарьян А. 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Москва，1999；Быстрова И. 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40-х-начало 60-х годов，Москва，2000；Валковский Н. Л. гла. ред.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1950－1953，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Егорова Н. И.，Чубарьян А. О.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45－1963，Москва，2003。涉及各个领域具体问题的专门论著不胜枚举。还可参见 Gobriel Gorodetsky ed.，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A Retrospective. London，Frank Cass，1994.

② 其中在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Melvyn P. Leffler，*The Specter of Communis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17－1953*，New York，1994；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1996；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1996；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1997；Zhai Qiang，*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Chapel Hill，2000；Zhang Shu Gu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2001；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2001；Whitney Stueck，*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Princeton，2002；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2003；Odd Arne 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50*，Stanford，2003；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New York，2005，等等。

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和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也是冷战史研究者必读的专业刊物。在这些杂志周围，聚集了相当一批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在俄国，A. O. 丘巴里扬、M. M. 纳林斯基等俄国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学者在1995年组成了冷战史研究组，后来，斯拉夫学研究所（B. K. 沃尔科夫、Л. Я. 吉比安斯基等）、俄国史研究所（H. E. 贝斯特罗娃、B. C. 列利丘克等）、远东研究所（A. M. 列多夫斯基、C. Л. 齐赫文斯基等）、圣彼得堡的历史研究所（A. A. 富尔先科）、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A. B. 托尔库诺夫 、B. O. 佩恰特诺夫等）的学者们也进入这个团体。到20世纪末，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各国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

第二，东西方学者频繁举行国际会议，研讨冷战中的各种问题。1993年1月在莫斯科，1994年6月在埃森和波茨坦，1996年1月在香港，1996年11月在波茨坦，1997年10月在北京，1997年10月和1998年4月在莫斯科，1999年9月在纽黑文，2000年3月在华盛顿，2002年6月在莫斯科先后举行了不同专题的国际会议。原冷战两大阵营的各国学者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聚在一起，相互交流档案资料和学术观点，共同探讨冷战的起源、过程、教训和遗产，极大地推动了冷战史的学术研究。

第三，随着各国历史档案不断解密和冷战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利用原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冷战史领域的必然要求，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很多研究者不仅仅是使用单边材料，而是使用多边档案从事自己的研究。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解剖一个专题，正在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个新特点。

中国学者对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冷战史研究也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主要观点有：（1）“美国霸权论”，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2）“美苏共振论”，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行为的结果，是一个双向的过程。（3）“综合作用论”，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①]

当前，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在国际事务中，在防止大国再度陷入相互敌对和

---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威胁局面，维护和平、安定和有利于发展国际环境的斗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结冷战的丰富经验教训特别是美苏之间大国关系的变迁，为中国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提供借鉴，已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更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加快对这一问题的研究。90 年代中期，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最先倡导以冷战史为课题组织国内学者进行研究和交流，并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起学术联系。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分别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领域自然形成的两个研究基地。他们注意查阅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档案资料，赴美、俄、英等国搜集资料，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各国学者对话交流；他们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中国在冷战中的实际作用和政策变动，力图纠正一些文章书籍中的不准确甚至错误的阐述。由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牵头，他们先后在北京（1997、1998 年）、桂林（1999 年）、成都（2000 年）、武夷山（2002 年）举办专门学术会议，与国内外学者互通信息、交流成果、研讨问题。2004 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冷战史专业杂志《冷战国际史研究》和第一个专业网站（www. coldwarchina. net），并开始招收冷战史专业的博士生。在此期间，中国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为国际冷战史领域增添了令人注目的色彩。[①]

本书是活跃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的几位中国学者集体创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冷战的历史十分丰富。本书没有全面探讨这一问题，而是着重剖析大国关系，即美苏之间的关系，揭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和争夺是如何决定着冷战的内容及其走向的。其他大国同美苏不在一个等级上，不能与之并列。

---

①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 年）》，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2 年；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 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冷战格局的出现，从根本上讲并非人们的主观预想和设计，而是美苏及各主要大国根据彼此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并表现为一种互相影响、同步前进的趋势。冷战所触及的问题，比一场真正的战争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本书论及冷战起源问题时，没有简单地去寻找和追究这场政治斗争的责任者，没有把重点放在评论各国的责任大小问题上。而是着重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揭示它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哪些条件；进而剖析美苏两国在国家大战略、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激烈碰撞，展示美苏关系是如何从战时合作走到冷战对峙的。

冷战格局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局势大不相同。它包含有“冷”和“战”的不同层面，即大国不仅在各个领域相互敌视对抗，争夺霸权，而且注意防止热战特别是热核战争，加深彼此间的沟通、了解和信任，寻求共同利益和维护这一利益的游戏规则。基于这一认识，本书着重探讨永不会消失的大国间矛盾斗争是如何从不断扩大加强转为被限定在某一范围内的，而不断受到限制的大国间矛盾斗争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从中展示美苏关系的复杂多变，冷战历史发展的艰难曲折。

评述美苏冷战关系的演变时，必然涉及美苏同其他大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亚洲大国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的外交取向对美苏关系、对冷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影响。

亚洲是欧洲及核竞赛之外另一个美苏争斗的重要领域，它与欧洲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欧洲呈现出两大阵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典型的两极格局，且具有成熟的政治、安全、防务协商机制。亚太地区则呈现为多元结构、多种军事力量并存的状态，在相当一个时期，难以形成欧洲式的对话机制。在亚太地区，双边关系，包括双边对话机制、防务联合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此，亚太地区往往受到本地区主要国家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形势多变。这里有激烈的武装冲突：美国直接参与、苏联暗中和间接参与的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有影响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巨大事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苏分裂及中美和解。这些情况，再加上苏、美、中、日、印大国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和互动，不仅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冷战格局，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冷战的态势及其演变。

国外学者对冷战历史的评论和著述虽然很多，但带有明显的美英或俄国色彩，对中国等亚洲大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作用评述不多。即使讲到，谈论的也多是美苏冷战如何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局势，较少论及亚洲大国的外交政治取向如何反过来影响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关系，有些评述还带有攻击贬低之词。这不能不说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不足和问题。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和深化冷战史研究，本书特别关注中国、日本、印度与美苏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关注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对美苏关系和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系统提出中国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冷战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从全球角度观察，整个冷战历史大体可以7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分裂和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如果说冷战前期是纯粹的美苏争霸和两个阵营的对抗，那么在冷战后期，由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退出两大阵营之间的抗争，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国际政治格局则出现了重大结构性变化，从而导致冷战态势的根本改变。本书采用这一分期，意在突出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冷战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探讨的大国关系则限于冷战的前期。

本书各章虽然出于不同作者之手，但大家都尊崇一个原则，即实事求是地对冷战历史的进程进行客观描述；都运用一种方法，即辩证唯物史观和实证史学、比较史学的基本方法，对各国档案文件等原始资料进行观察和梳理。目前美国的冷战史研究有一种趋向，一些学者似乎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冷战胜利者的心态和架势回顾并评判过去的历史，把一切“责任”和“罪过”都推到失败者头上。[①] 本书作者认为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是错误的。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应尊重客观，尊重史实。

本书是集体作品，各位作者在不同的研究侧面又都各具独到见解，独特风格，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观点和提法不尽相同的情况，在所难免。这次合作本身，也是一个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本课题涉及的领域比较广阔，研究的问题比较复杂，而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不少疏漏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

① 美国冷战史大家约翰·盖迪斯的名著《现在我们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目　录

序　　言 …… 3

第 一 章　美苏大战略与冷战格局的演变（1945—1972） …… 1
第 二 章　美苏从同盟到全面冷战的转变 …… 52
第 三 章　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和两国关系的新变化 …… 84
第 四 章　中苏同盟的兴起与衰亡 …… 118
第 五 章　1956 年波匈事件中的苏中关系 …… 163
第 六 章　中美苏在印度支那的角逐及相互关系的变化（1961—1973） …… 210
第 七 章　中苏同盟的破裂及其原因 …… 270
第 八 章　台湾问题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美中关系 …… 285
第 九 章　战后初期美日关系的再选择与再定位 …… 354
第 十 章　美日与苏中在东亚冷战对峙格局的形成 …… 415
第十一章　冷战初期的印度外交政策与印美苏中之间的互动关系 …… 439
结 束 语 …… 498

第一章　美苏大战略与冷战格局的演变（1945—1972）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另外，冷战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同时，又具有使美苏两国之间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①]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这一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时，至少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美苏在国家大战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处于和平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的最高国家利益。[②]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国家的大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

---

① 关于冷战中的双方自我控制机制的分析，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5－245。这种自我控制机制，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运用得最为突出。

② 关于“大战略”的论述，可参见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7; Henry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1974, p. 322. 另外，这里所说的大战略，也是对各国政府在具体贯彻这一大战略中所制定的军事、外交等各种战略和策略的一种区分。

一、雅尔塔体系与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而成为雄踞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在经济上，它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的国家。当战争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已达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它的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在军事上，在欧战结束时，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高达1200多万，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它的陆军仅次于苏联，海军已在全球居于远超英国皇家海军的至高地位，制空权更为优越，可以向世界各地快速输送兵员。到1946年，美国军队已经在遍布世界的56个国家驻扎，到1947年，它已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它还在战后初期垄断着原子武器。[①] 在政治上，美国已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保护与控制之下，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成了它的手下败将。美国所具有的这种巨大优势，不仅使它有了一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而且认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②]

另一方面，在战争中以经受严峻考验而令盟国刮目相看的苏联，虽然在经济上逊于美国，但军事、政治亦十分强大，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它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还兼并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领土，从而改善了西部的战略环境；它进一步使整个东欧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西方相对而立；再加上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它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于是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就从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并支配世界的时代逐渐过渡到美苏对峙的时代。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打败德、日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主要包括：（1）具体制定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战术；（2）在

---

①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译本），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39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页；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4页；乔治·马立昂：《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第16—17页。

②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39—440页。

打败德、日法西斯以后，盟国对德国（包括对柏林）的分区占领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以及对德国赔偿的原则规定和对战犯的审判决定。

2. 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主要包括：（1）在欧洲：盟国（美、英、苏、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关于波兰的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议；英、苏关于东南欧的百分比协议。[①]（2）在亚洲：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以后独立（战后美苏分区占领朝鲜，以北纬38°线为界）。

3. 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

4. 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现托管计划，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雅尔塔体系是对大战结束后世界的和平安排，但是它具体运作的结果，它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后果，却是美、苏对峙下的冷战。它持续了40多年，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中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二战结束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1945年在任）确信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他对战后世界的考虑是以美国为首的“四警察”思想，即希望把美英苏中的战时同盟关系发展为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大国合作关系，以维持世界和平。这在1942年1月1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就表现得很明显，第一步是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第二天再交由其他22个国家签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特别是反对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为确定

---

① 这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在1944年10月于莫斯科会谈时的决定。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上部第二分册第336—339页有关于这次谈判的生动记述。当时它们在半张纸上写明：在罗马尼亚俄国势力占90%，在希腊英国（与美国一致）势力占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各占50%，在保加利亚俄国势力占75%。

世界上的每条边界和解决每个地区的政治争端花费时间"，因为这将会放松对共同敌人的作战。[1] 然而在雅尔塔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正是苏联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威望处于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顶峰期，战争打出了一个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苏联，而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连成一片的前景也已十分明显。因此罗斯福在设计战后的世界蓝图时就决不能无视这一他并不愿意看到的严酷事实。由于他把战后的美苏合作看成是落实战后世界安排的关键，于是他愿意作出一些让步，当然主要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做交易，以换取苏联的合作。苏联要求的最关键部分就是要在它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东欧建立它的"安全带"，也就是要明确地划分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苏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在西方，它从卢卑克到的里亚斯特；在南方，到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在东方，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的38°线，直到中国的旅大港。这样，双方也就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尽管罗斯福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讲话中仍然反对划分势力范围，但是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并认为在当时"这一类的发展实际上是几乎难以避免的"。[2] 这种形势恰恰就是以后美苏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的、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国际温床，而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便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

① Samuel I.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Vols. 13, New York, 1938 - 1950, Vol. 12, p. 333.

②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4—515页。

二、战后美苏国家大战略的碰撞

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 年 10 月 21 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①]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1945—1953 年在任）则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②] 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相联系，美国不仅认为能够根据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起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在战后欧洲经济普遍拮据，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空前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更将追求海外市场视为保持国内的繁荣与稳定，避免危机甚至战争爆发的重要手段。曾任战时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写道：“无障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而高关税、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的商业战争则意味着战争”，“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加自由的贸易，即较少歧视、较少障碍的贸易，从而使一国不会极端嫉妒另一国，使所有国家的经济水平都能够得到提高，并因此而消除在经济上滋生战争的不满，我们就能够拥有合理的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了。”[③] 于是，美国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打开全球门户，使世界经济自由化，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由中、法、苏、英、美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即五个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确保了大国的利益并突出了大国的责任，使和平解决争端和制裁侵略都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量。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包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

---

① 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1945—1980），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67—68 页。

②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601 页；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1955 p. 166.

③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1, New York, 1948, p. 81.

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并实行加权投票制，即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同样由于美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因此，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需求不仅是它主动向全球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

不仅如此，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还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以及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战后的和平与稳定必须建立在不侵略、民族自决、平等享有原料的机会和非歧视性贸易的基础之上；而且那些违反这些原则的国家将会运用军事力量和经济闭关等手段使国际经济失调，并因此而危及美国的安全。[①] 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

另外，美国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反共意识，而这种反共意识又和美国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结合起来，正如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所说，美国认为，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向"美国的梦想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美国人往往"把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件几乎毫无例外地视为一种危机，视为一种对其基本价值观的可怕而根本性的威胁"，[②] 因此，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符合美国特性和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与根深蒂固于美国传统中的一系列因素相一致"。[③] 所以，美国的反共意识和其天定使命观便成为其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

还必须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美国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视为专制政体并具有侵略性，认为它们都在海外搞敌对扩张，因此必须受到

---

①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② George McGovern, *A Time of War-A Time of Peace*, New York, 1968, pp. 179 – 180.

③ Cecil V. Crabb, Jr., *Policy-Makers and Critics: Conflic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86, p. 158.

约束。[1]

上述这一切，便形成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与苏联的大战略相遭遇。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

战后的苏联，以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其西部边界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鉴于苏联西部边界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其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的入侵又都来自西部，因此，苏联在坚决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复活的同时，将其西部边界的安全视为关系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曾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波兰问题时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明确地说："波兰问题对于俄国人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因为苏维埃国家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相关……波兰问题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2] 这不仅是斯大林在三巨头的一系列会晤中对波兰问题始终寸步不让的原因，也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东欧的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从而把东欧这条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所以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于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尽量少受损失并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安全带"就格外重要。

但是，在苏联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当中，也包含着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成分。这不仅表现在它将本国西部边界的大大向西推移以及在东欧建立的"安全带"是在其军事压力下强迫那里的国家和人民接受的，而且表现在它对巴尔干和远东的势力范围的寻求与控制，以及企图进一步向中近东的扩张方面。

与保证国家的边界安全相联系的是保证苏联的经济安全。苏联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百废待兴，重建工作庞大而艰巨。因此，苏联要求从战

---

①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②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亚·菲舍尔注释：《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81页。

败国索取巨额赔偿，以利于自己的重建。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的、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又是与不断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从而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较长时间的和平共处，以及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

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正如斯大林在 1945 年 4 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①]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帮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以及在帮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在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力度，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等方面，都是可以看到的。不过，这种世界革命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附属物，即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用南斯拉夫历史学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话来说，斯大林"总是把苏联直接的国家利益和策略上的利益放在首位"。[②]

上述这一切，便形成了战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但是，美国作为比苏联强大得多的国家，对苏联行动的反应却相当过度。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苏联以欧亚大陆为依托，已经把周界突伸开去，形成巨大的战略威胁"，因此，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一个自由世界保存希望"。于是冷战政策便得以形成，"并由此产生了该项政策最重要的表述语——遏制理论"。不仅如此，以"遏制理论"为核心的美国的冷战政策还进一步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正如迈克

① 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85 页。

②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 1948—1953》（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7 年，第 72 页。我们还可以在苏联不支持希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不支持法共拥有武装，以及在很长时间里未给中国共产党以应有的支持等方面看到这一点。

尔·H·亨特所说："意识形态解释了采取遏制政策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因此，杜鲁门政府的咄咄逼人，以及总是想以压力迫使他人就范的外交作风，既是美国国际地位的反映，也是因其意识形态所使然。

就苏联方面来说，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中，"毕竟是力量要弱得多的一方"，① 而斯大林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避免同美英等西方大国对抗，甚至不惜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出于对本国利益的绝对考虑，苏联在处置战败国和处理东欧等国家的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而且在此过程中，苏联也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尽管斯大林的"最高指导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②

综上所述，在上述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在美苏的国家大战略相互对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美苏关系从战时的合作走向战后的对抗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当然，另外一些因素也不能忽视。

首先，在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苏俄建国之初美国不仅不承认而且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进行武装干涉，20 年代当其他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苏联存在的既成事实并与苏联建交而美国却仍然坚持不承认苏联，以及尽管 1933 年面对法西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美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在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问题上仍然缺乏合作，就可以理解这种相互不信任的深度。一位美国学者对美苏双方关系的描写十分形象："每一方都像在镜子里看人一样，看到的是反像，即把对方看成是世界上的恶霸。每一方都指责对方表现出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姿态。" ③

---

① 〔美〕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100—101 页。
②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年，第 353 页。
③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 604 页。

其次，战争期间双方出现的尖锐矛盾大大加深了苏联一直存在的对西方的怀疑、反感与敌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困难、障碍和顾虑，美国未能按照罗斯福的承诺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以及未能在二战中苏联最困难的1941年末至1943年中期及时兑现它对苏联许诺的租借援助物资的数量，并在战争刚刚结束就将对苏联的租借援助突然停止，都使斯大林极为愤怒与失望，并使双方的关系在战时就受到了极大损害，毫无疑问地“助长了正在形成中的冲突，并象征着双方从联盟走向敌对”。[①]

第三，美苏各自的国内政治的牵制和影响。就美国来说，1946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取得了对众、参两院的控制权，民主党在国会中16年的统治地位就此终结。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感到在政治上受到约束，为获得两党一致的支持，也为了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胜，杜鲁门便在对外政策中求助于民主制度对抗共产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说法。对杜鲁门政府来说，举起“反共”的旗帜，可以获得国内各个方面对其全球扩张政策的支持，“反共就像是骑兵的冲锋号，唤起美国还要去完成另一项外交使命，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把世界划分为罪恶与美德两个极端的传统……反共一直是决策者们要达到的目的，遏制政策也得到了公众的和国会中民主与共和两党的长期而广泛的支持。”[②] 对苏联来说，战前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的斯大林体制在战后的进一步强化并由此出现的社会危机，东欧国家对苏联的一些做法的不满，也使苏联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以增强凝聚力，终于使冷战在双方国内都获得了增长的势头。

第四，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当英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满身创伤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二等国。于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通过争取美国的帮助来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保持英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及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就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早在1941年9月，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对他刚刚与罗斯福达成的《大西洋宪章》中的第三条作出了完全不同于罗斯福的解释。罗斯福认为这一条的规定适用于全世界，以此类推，就包括在欧洲各帝国统治下生活的亚洲各民族，而丘吉尔

---

① George C. Herring, Jr., *Aid to Russia, 1941－1946*, New York, 1973, xiv.

② 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2页。

则在下院发表声明，声称“联合宣言决没有限制以前历次发表的关于在印度、缅甸或英帝国的其他属地发展立宪政府的各项政策声明。……在大西洋会议上，我们心里想的主要是恢复目前处于纳粹奴役之下的欧洲国家和民族的主权、自治和民族生活，……这个问题同效忠英王的那些地区和民族的自治机构向前发展的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①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也表明了英国工党政府所坚持的关乎国家利益的五大问题：“英联邦和英帝国；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国际安全体系，特别是对核武器发展的控制；战后对地中海和中东的安排；欧洲的和平安排，特别是有关德国的安排。”② 因此，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怀疑和对苏联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担忧和恐惧，不仅是丘吉尔在战争尚未结束就急不可待地与斯大林达成关于东南欧地区的百分比协定的重要原因，也是战后英国与美国在遏制苏联势力扩张方面立场和行动基本一致的重要原因。只是由于战后的英国经济十分困难而力不从心，所以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并促使美国承担责任，英国在冷战的起源中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正是在国家大战略的对立以及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双方在具体实施雅尔塔体系各项协定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产生重大的分歧与对抗。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的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

三、走向冷战（1945—1947 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随着美苏在东欧的敌对日益严重，在对德、日战败国的政策上尖锐对立，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激烈争斗，双方的冷战政策也相继出台。于是冷战就由于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对立的加剧而迅速爆发。

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作为苏联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因此，从 1944 年至 1947 年，苏联采取一切手段，实际拒绝执行《被解放的欧洲宣言》，而是按照苏联的意图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一系列对苏友好的政府，使这些国

---

①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 1941—1946 年》（中译本）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65—66 页。

②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 - 19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12.

家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苏联的做法使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影响的打算落了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罗斯福在去世前曾指责斯大林在波兰的行动，认为“我们不能和斯大林共事”，并说斯大林“违背了他在雅尔塔作出的每一项诺言”；杜鲁门则在接见莫洛托夫时直截了当地严厉指出苏联破坏了雅尔塔协议，并企图以经济手段迫使苏联就范。[①] 但是，面对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存在以及受到苏联影响的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既定事实，美国无能为力。

在对待德国和日本等战败国的政策上，美国与苏联的分歧和争斗同样严重。战胜纳粹德国是大同盟成立的基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也就成为苏联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问题。由于在雅尔塔体系下被分区占领的德国和柏林市处于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最前沿，因此战后初期，苏联的基本考虑是：在对德国社会进行全面根本改造的基础上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上的重要一环，同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和未来对苏联的安全威胁，并从德国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因此这是一个首先削弱德国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与美国的考虑完全相反。德国战败后，美国已认定战后的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所以它的对德政策开始从肢解和限制转向扶植与恢复。于是，双方不仅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发生了无穷争吵，而且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更是意见相左。苏联主张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所谓“政治统一”为先；[②] 美国则谋求先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先要“经济统一”，强调恢复德国经济的重要性。[③] 由于双方无法取得一致，美英便于1946年12月在经济上将它们的占领区合并，这成为美英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致使美苏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使德国成为冷战的激烈战场。

在日本问题上，杜鲁门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

---

①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493页；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69—74页。

② 〔苏〕A·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中译本）第五卷上册，第95页；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1974, p. 443.

③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235页。

利那样行动"。[1] 美国这种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同样引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怒与反对。美苏在东欧和德国、日本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成为冷战爆发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另外，1946 年 7 月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旨在维持美国的核垄断、蓄意排除与苏联合作对原子能进行国际控制的"巴鲁克计划"，无疑是进一步毒化两国关系的举动。根据这个计划，世界上的原子能发展和使用要由一个国际原子发展机构来控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发展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只有在该机构的核控制建立起来之后，才考虑终止制造原子武器，并销毁现存的所有储备。由于当时只有美国一家拥有原子武器，因此苏联理所当然地认为该计划只有利于美国垄断核技术。因此，作为回应，苏联不仅反对实地核查，而且要求在核控制机制就位之前就销毁现有的核武库。于是关于国际核控制的谈判陷入僵局，美苏两国开始竞相发展核武器。

美苏在中近东也展开争夺。双方在伊朗争夺的核心是石油资源，而形式则是二战后的撤军问题。苏联为获得伊朗的石油租让权和确保其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而拒绝在美英军队已经陆续撤出的情况下按期从伊朗撤出驻军，并参与伊朗阿塞拜疆省的自治运动，使苏伊关系十分紧张，并给美英的干预提供了机会。1946 年 1 月，伊朗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苏伊争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立后首次会议审议的第一个问题，使苏联外交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在 6 月将苏军全部撤出。[2] 双方在土耳其争夺的核心是控制黑海海峡问题。从 1945 年 6 月到 1946 年 9 月，苏联多次向土耳其提出修改 1936 年签署的有关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3]，在海峡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以使其参与黑海海峡的防御等要求，导致苏、土关系紧张，并招致了美英的强烈反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为，显然超过了维护本国安全需要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并加深了西方国

---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371 页。

② 作为苏军撤出伊朗的交换条件，伊朗政府同意苏联关于给予阿塞拜疆自治地位和建立苏联占多数股份的苏伊联合公司开采伊朗北部油田的要求。但是在苏军撤出后不久，伊朗议会就否决了建立苏伊联合公司的协议，并派兵铲除了阿塞拜疆自治政府。

③ 1936 年 7 月 20 日，苏联、土耳其、英国、法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日本代表在瑞士的蒙特勒签署公约，规定：各国商船可以自由通过黑海海峡；在和平时期，除黑海沿岸的国家外，各国军舰只能在友好访问时进入海峡，其总吨位不得超过 3 万吨；在战时，如果土耳其保持中立，交战国军舰不得通过，如果土耳其参战，由土耳其政府决定是否准许军舰通过。

家对苏联企图的大大疑虑和敌视。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就认为，苏联的要求实际在于控制土耳其，而一旦苏联控制了土耳其，美国就极难阻止它去控制希腊和整个中近东，因此美国必须表现出在必要时准备以武力回击侵略的决心才能遏制苏联的扩张。①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认为："俄国正用它的一只爪子顺着土耳其的脊背抓住〔卡尔斯—阿尔达罕〕省和阿塞拜疆省，用另一只爪子穿过两海峡以便控制土耳其，而土耳其将在事实上变成俄国控制其外交政策的俄国的卫星国。"②因此，正如布鲁斯·R·库尼霍尔姆所说："特别是鉴于苏联在东欧和远东的扩张，因此即便苏联在欧亚大陆有其合法的安全利益，他们对其南部侧翼（中东的北部）的邻国的政策也是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所不能接受的。"③ 苏联在中近东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直接酝酿了冷战。

伴随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争夺以填补战后留下的所谓"权力真空地带"的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苏联决心放弃大国合作并与美国进行强硬对抗的政策，相继出台，致使冷战的爆发成为必然的趋势。

1946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当面向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做法极度不满，并指责他对苏联不够"强硬"，表明美国要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他声称"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④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在 1946 年 2 月 9 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⑤ 由于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还不到半年，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而美苏之间尽管发生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但关系尚未破裂，许多问题正在或即将进行谈判，因此斯大林的公开讲演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不仅无助于苏联和西方加强合作和加深理解，而且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

---

①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FR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GPO*), *Washington D. C.* 1946, Vol. 7, pp. 840 – 842.

②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 – 1951*, p. 214.

③ Bruce R.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a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1991*, A retrospective, pp. 135 – 145.

④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 519 页。

⑤ 全文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488—500 页。

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时代》杂志则认为是“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①]不仅如此，它对其后的凯南八千字长电报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斯大林的演说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务院的官员讨论了这篇讲演，认为这是战后苏联政策的权威指南，是“全世界共产主义信徒的圣经”，即斯大林正在号召各国共产党颠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政府。因此他们希望了解当时被认为是“苏联事务首席评论员”的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对该讲演的看法。[②]于是凯南便在1946年2月22日向华盛顿发回了有名的8000字长电报，全面论述苏联的理论、政策、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③]凯南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张，美国不能依靠外交谈判和苏联打交道，而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因此美国只需“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④]尽管在该电报中凯南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实力威慑与压力，无需热战那种极端的方式。这份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了异常热烈的欢迎，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一年以后，凯南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了“遏制”一词，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遏制思想与遏制战略，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⑤]

---

①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页；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②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7, p. 167. 但是凯南本人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是，他写作此文本是应国务院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原因。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67, pp. 192 - 193.

③ *FRUS*, *1946*, Vol. 6, pp. 696 - 709。

④ 关于对这份长电报的内容分析以及对英文power一词的译文说明，参见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0—15页。

⑤ 乔治·凯南：《美国外交》，第85—101页。

就在凯南逐渐形成他的遏制思想的同时，在英国方面也存在着与凯南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的长电报，这就是当年英国驻苏联的代办弗兰克·罗伯茨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长电报。罗伯茨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形成的对国家安全的追求，斯大林热衷于推行扩张政策，以使苏联获得“自然边界”；苏联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入其扩张行动之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削弱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英苏矛盾是两国利益冲突的结果，而英美结盟则是遏制苏联的唯一办法。①

就在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高度重视凯南和罗伯茨的“长电报”的同时，访问美国的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密苏里州的小镇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这篇演说以“铁幕”一词而闻名：“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号召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运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对付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尽管丘吉尔的演说既不能代表美国也不能代表英国政府，但是该讲演是杜鲁门亲自主持并在他的家乡发表的，讲演的内容是丘吉尔与杜鲁门在事前商量过的，而且杜鲁门在去富尔敦的列车上还阅读了演说的定稿。② 从内容来看，该讲演的精神实质与凯南的长电报一脉相承，符合美国在战后要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而且因其用词更为尖锐而更富煽动性，因此被认为这是美国借丘吉尔之口公开发出的“冷战”信号，冷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3月13日，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和罗伯茨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才解密的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指

---

① Sean Greenwood, *Frank Roberts and the 'Other' Long Telegram: The View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 in Moscow, March 194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5 (1990), pp. 103 – 122.

② Francis Williams, *A prime Minister Remembers: The War and Post-War Memoirs of Rt. Hon. Earl Attlee, London*, 1961, pp. 161 – 162.

示和实际参与下，于1946年9月27日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密报告，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①] 该报告的形成情况大致如下：1946年7—10月，在讨论制定五国（意、罗、保、匈、芬）和约的巴黎会议上，苏联与西方国家争论与分歧严重。9月在对保加利亚的政治和领土辩论最激烈的时候，苏联代表团长莫洛托夫指示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为苏联代表团写一篇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和意图的报告，并限10天必须完成。在诺维科夫撰写报告期间，莫洛托夫询问进程并给予具体的指示，因此该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旨意和指示写的，诺维科夫也认为“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莫洛托夫应当是未署名的共同作者。莫洛托夫在阅读报告时，在上面画了许多重线号并做了眉批。因此该报告的内容基本反映了苏联的官方观点。[②] 这份“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的战争的”。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因此，同凯南和罗伯茨的长电报一样，诺维科夫的长报告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和政策起到了论证与导向作用。不仅如此，我们从这份报告的内容上也可以看出凯南长电报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也就是在9月，杜鲁门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福德向总统提交了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不断强调苏联具有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并认为，为了世界的稳定，美国必须首先采取措施，制止苏联进一步向外扩张。[③]

就这样，伴随美苏在战后贯彻各自的大战略，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

---

① *Silvio Pons, A Challenge Let Drop: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Cominform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1947 - 8. 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 - 53,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 260；该报告的英译文，见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5, No. 4 (1991, fall), PP. 527 - 537.

② 关于该报告形成的详细情况，以及对它的内容的介绍与分析，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186—192页，以及第206页注释〔170〕—〔175〕。

③ *A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 - 1973,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 p. 300.

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四、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1947—1955 年）

1947 年 2 月 21 日，英国使馆紧急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并递交了两份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照会，大意为：英美在过去曾达成共识，由于战略原因，不能让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之手，并曾协议英国主要负责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则提供经济援助。但是现在希腊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外援，希腊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和政治动乱，而希腊的军队也急需装备，但英国没有足够的援助可以提供，因此希望美国从 4 月 1 日起接过这个负担。土耳其的情况虽然不像希腊那样紧迫，但英国也建议与美国共同研究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以及应当采取的援助措施。

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这是英国拱手将“世界领导权”交给美国，美国应该当仁不让地把这个任务接过来。另外，希腊和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也不能坐视它们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东欧连成一片。在美国的遏制政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终于形成了杜鲁门主义的决策。

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首先详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说明美国给予希、土援助以及监督这些援助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然后他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这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营垒，并明确提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他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权”，并宣布，美国将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表明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选择“自由制度”抵抗“极权统治”的力量的明确态度；为此他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 4 亿美元的援助；最后杜鲁门再次表明了美国要领导和支持“世界各地自由民族”抵制“极权政权”的决心。这便是人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①]

---

① 杜鲁门主义的全文见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45—1949）》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 260—295 页。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表明，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因为“杜鲁门主义”实际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第二，正如杜鲁门本人后来所说，它“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志，并使其意识形态味道十分浓烈；[①] 第三，它明确提出了两种制度之争，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并为美国的决策者在冷战的框架内审视所有全球性的问题和冲突开了先河。

对苏联来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②]

从此，美苏关系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冲突也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

杜鲁门主义虽语言强硬，但它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美苏矛盾日益尖锐，但是美国最担心的并不是苏联入侵西欧，而是战后西欧经济的凋敝与社会的分崩离析将会给共产主义的思想提供乘虚而入的机会，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实力的不断增长，是对西欧各国是否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重建的严重怀疑，是对共产党的力量在东欧的稳固发展的日益沮丧，以及对欧洲一旦崩溃将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的直接的灾难性影响，因此“美国必须出面总揽全局”。[③] 面对这样一个既是经济性又是政治性的双重难题，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1947 年 6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仅仅 1500 字的演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其要点是：（1）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使世界特别是欧洲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以保持稳定与和平，并使“自由制度”得以

---

① 引文见《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 年，第 120、121 页。

② Mikhail Narinsky,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Ga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1991*, A Retrospective, pp. 105 - 110.

③ *FRUS, 1947*, Vol. 3, Washington, D. C. 1972, pp. 225 - 227, 230 - 232.

存续；（2）强调美国的政策不反对任何国家和主义，只反对饥饿贫穷和混乱；（3）欧洲的复兴是欧洲人的事，所以援助倡议和具体方案应该首先来自欧洲，美国则视其需要和自己的能力所及给以援助；（4）美国的援助不能零敲碎打，而是要求欧洲国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联合提出一个总体方案，作为美国援助考虑的基础。①

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的是，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凯南等人认为，如果苏联拒绝美国的提议（实际上许多美国官员希望共产党国家不接受援助），美国"正好就把分裂欧洲的责任推到苏联头上"，如果苏联接受，那么美国就以援助为手段迫使东欧国家"放弃其经济生活中的几乎是排他性的苏联取向"；② 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通过美援进一步加强西欧"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倾向"以抵制苏联的影响。③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苏联来说，这个美国政府已经预料到欧洲可能分裂的计划，恰恰是在以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刚刚出世不到 3 个月就提出的，因此苏联对它充满疑虑，并认为该计划具有反苏性质。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并认为在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就事先预料到苏联不会参加这个计划，因此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的。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苏联最终断定：美国计划是要强化西方国家造成的德国的分裂状态，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分裂成两个国家集团，为了某些谋求霸权的强国的利益，利用一些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些欧洲国家。因此它最后还是拒绝接受援助，理由是一项联合计划和共同事业对主权是一种侵犯。⑤ 另一方面，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曾非常想参加这个计划，也使苏联担心东欧国家对苏离心力的增长。于是，为建立西方集团而奠定经济基础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最终迫使苏联

---

① 全文参见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45—1949）》上册，第 269—271 页。

② John Lem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6.

③ *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P. 253.

④ Mikhail Narinsky,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Ga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1991, A Retrospective*, pp. 105 - 110.

⑤ A. C. 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 307、308 页。

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其东欧安全带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控制，从而导致了莫洛托夫计划的产生，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以及东欧政权的苏联模式化。

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在 1947 年 7 月到 8 月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迅速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随着 1949 年 1 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1952 年 2 月斯大林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

紧接上述经济措施而来的是 1947 年 9 月，在苏联的主持下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同时提出战后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即“两大阵营”理论，并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的路线和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于是，苏联对世界政治的两极看法也正式确立。①

随后，苏联开始以驻扎在东欧的几十万红军作为威慑力量，彻底改变斯大林原本对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采取的较为宽松灵活的政策，取消了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权，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移植过去。与此同时，苏联把不愿俯首帖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

上述这些行动，作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直接反应，成为苏联在强化冷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至此，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基本确立。

马歇尔计划对西方的影响极为深远，而对冷战的激化和欧洲的分裂以及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则有其更为直接的责任。

由于苏联和东欧以及一些不愿与苏联对立的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从“欧洲复兴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从 1948 年 2 月开始实行，到

---

① Silvio Pons 认为，这是苏联外交在二战后转向以两极观点看世界的第二步，第一步则是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参见 Silvio Pons, *A Challenge Let Drop: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Cominform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1947-8*, 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pp. 246-263.

1952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总额为132亿美元的援助。[①] 马歇尔计划的实行，解救了西欧各国的燃眉之急，使其经济很快得以复兴，使欧洲人恢复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它进一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经济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它以西欧集体制定复兴计划并互相协调生产与流通作为援助的条件和指导原则，使西欧各国包括后来的西德国家的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政治联合的先声。[②]

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是将西占区的德国完全纳入西方的轨道。美国的政策设计者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复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实际已经确认德国不可能统一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占领区应该制定各项政策使这些占领区能对西欧经济建设作出贡献；而且美国应该提出并鼓励某种形式的“西欧国家区域性政治联合”。[③] 只有用这种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将一个复兴的德国融入欧洲的方法，才能彻底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对德国的束缚，解决困扰欧洲和世界多年的“德国问题”。因此，在苏联退出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谈之后，美国正式启动了建立西德国家的工作，并依次采取了将德国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区正式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之内，将美英双占区和法占区合并，决定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准备建立西德联邦国家，直至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的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分裂德国的行动。

美国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对德国西占区所实行的上述政策，使苏联认为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分裂出去以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德国西部国家的判断得到了证实。[④] 于是，以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日益不安的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行动，从而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

---

① 其中英国及其自治领等获得32亿美元，法国获得27亿，意大利获得15亿，德国的西占区及后来的西德获得14亿。William R. Keylor,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63－264.

② 关于马歇尔计划与欧洲联合之间的关系，可参见 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 1: Searching for a "creative peace":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arshall Plan.*

③ 参见〔美〕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04—205、211页。

④ William R. Keylor,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 270.

机"。1948 年 6 月，苏联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停止苏占区对西柏林的牛奶、蔬菜和其他食品以及煤、电供应，开始了长达 11 个月的封锁。美国也不示弱，认为西方要留在柏林的决心无需讨论，便决定对西柏林进行空运。据统计，在封锁期间，以美国为主的空运部队总计飞行 19.5 万余架次，空运货物 140 余万吨，花费 2.5 亿美元，从而满足了西柏林 200 多万居民的需要。当大批飞机（这些飞机被西柏林人称为"葡萄干运输机"）以每 3 分钟一架的频率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了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潮。

但是，正是在冷战的第一次高潮中，人们也看到了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发挥了作用。由于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始终只限于水、陆交通，而开放着空中的通道，才使美国的大规模空运得以实施；美国除了进行空运和进一步加强对西欧军事力量的控制之外，也只是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禁止任何物资从西占区运往苏占区，并没有采取武力手段强迫苏联解除对水、陆交通的封锁。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方面的退却得以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过程已完全不可逆转。以 1949 年 9 月和 10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

不仅如此，伴随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于是，以 1948 年 3 月英、法、比、荷、卢西欧五国的布鲁塞尔条约为基础，到 1949 年 8 月正式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英、法、比、荷、卢、挪、加、冰、葡、意、丹 12 国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规定，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北约的建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基本划定。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北约强调的是安全和防务，是一个军事条约，但是就其实际作用来说，政治上的意义显然更占主导地位，正如该公约在一开始就申

明的，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原则的各该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也就是说，北约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军事集团，它更是要自觉维护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此，北约的成立，是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的，是杜鲁门主义在军事上的贯彻。

与此同时，苏联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东欧的军事合作，在苏联与波、罗、匈、保等国缔结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都规定：一旦德国或与德国结盟的其他国家发动侵略，缔约双方相互支援。不仅如此，苏联还从 1949 年开始重新扩充其武装力量，在向东欧提供军火装备的同时，将大批军事顾问派往东欧，以帮助它们整顿、改组和建设武装力量。于是苏联和东欧军事上的一体化也由此开始。

因此，首先在经济上实行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对加强美苏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东西方集团之间的冷战对峙，以及对双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的影响都相当深远。

另外，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 1949 年下半年发生的苏联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者使美国和其盟国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后者则因其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使杜鲁门政府认定它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整个“自由世界”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这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促使杜鲁门政府正式签署“共同防御援助法”，即“军援法”，该法案提供的为期一年的 13.14 亿美元中，有 10 亿美元用于援助北约国家。因此该法案作为向西欧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补充，[①] 将“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使北约有了实际意义。[②] 第二，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完全以“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两极对立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而美国为了使苏联相信其维护自由观念的决心，美国就必须具备与其意图相匹配的能力，因为如果现有的和随时能够动员的总体军事实力不高出一筹，那么遏制政策，

---

① 参见〔美〕罗杰·西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韦次曼：《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420 页。

② 杜鲁门总统于 1949 年 10 月 6 日签署“军援法”，关于该法案的提出与通过，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13—116 页。

即实际上是有计划的渐进式的强制政策就不过是一项虚张声势的政策而已。[①] 这份决定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的文件与杜鲁门主义的讲话具有同等意义，不仅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而且成为美国军事干预其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承担"保卫朝鲜的义务"的重要依据。第三，认真考虑重新武装西德，并将其纳入统一的西欧军事力量之中。[②]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判断得到证实。[③] 于是，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为开端，冷战进入了最高潮，即使是斯大林逝世这一堪称国际事务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未能立即将其扭转。这一最高潮的重要标志和影响是：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的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是美国采用军事手段以所谓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来实施遏制政策的开始。它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④] 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美国的出兵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长达 20 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加紧迅速扶植日本的同时，逐步在亚太地区签订了一系列军事防御条约以构建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随后北约两度扩大，在先吸收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后，终于在 1955 年使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于是，到 1955 年，美国终于建立了一个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平洋的军事条约网，以实施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

作为对西德加入北约的即时而公开的反应，5 月 11 日到 14 日，苏联建立了包

---

① 该文件于 1950 年 4 月出台，编号为 NSC68，全文见 FRUS，1950，Vol. Ⅰ，pp. 235－292.

②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pp. 383－390.

③ 一些中国学者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对苏联的意图进行了研究，认为斯大林改变初衷而支持朝鲜北方通过军事行动统一朝鲜的目的是要保住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张盛发在其《斯大林与冷战》中也谈到这一看法，参见该书第 418—419 页。

④ 参见〔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中译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93、197 页。

括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该条约规定：缔约国准备参加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行动，任何一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时，其他缔约国应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给予援助。于是，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在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方面，则出现了美国的极为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和苏联与东欧继续进行的“党内清洗”运动。它们作为美苏之间近于病态的极端的相互仇视的反应，同样成为冷战最高潮的象征。

综上所述，美苏双方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50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

但是，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两极格局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

首先，在两极格局中，以美苏为首的相互对立竞争的两极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称的。美国和它的伙伴国实际上要比苏联集团强大。例如，在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3倍，北约联盟加上日本的财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4—5倍。[①] 苏联仅在军事能力上与美国相当，但是在整个冷战期间都有能力摧毁美国的西欧盟国。因此，尽管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整体军事能力上优于苏联，但是这种优势从没有大到使美国领导人觉得足以直接向苏联挑战的程度，于是便导致了双方的军事威慑和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持续攀升进行。[②] 鉴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远逊于美国，因此在两国对立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冷战对苏联的伤害程度远远甚于苏联对美国的伤害程度。

其次，即使在冷战最高潮的年代里，两极格局也未能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一些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加入两个竞争的集团，或被开除出其中的某一集团，还有主要处于亚非地区的尚未获得独立的广大旧殖民地区。[③] 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对立的两个联盟集团之外，使两极格局多多少少受到了牵制与限制。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进行，亚非地区的独立运动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

---

① 〔美〕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1996年第5版）（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② 关于美、苏在1955年和1987—1988年的军事开支比较，参见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93页表5.1。

③ 1949年1月美国提出的“第四点计划”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与苏联争夺这些不发达地区。

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苏之间最初的对抗，而且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多极的力量。

就在北约正式吸收西德和华约成立之前，1955 年 4 月一个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隆重召开，它以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以及增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为主要目的。会议创造了亚非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万隆精神”。万隆会议的持久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标志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增加了一支“第三势力”，“表现为对西方统治的抛弃”，“标志了亚洲和非洲为反抗欧洲而建立起新的团结”，是第三世界形成的起点。[①] 从此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崭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第二，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并阐述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此不仅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开始重新铸造国际事务的整个结构。

五、美苏的战略调整与冷战态势的演变（1955—1969 年）

概括地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总统的历届美国政府，并未改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向全球扩张的国家大战略，因此，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其基本特征都是杜鲁门主义定下的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和冷战战略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但是，苏联政局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的变化，特别是以核力量和空间力量为代表的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西欧联合趋势的发展和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倾向的增长，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非殖民化的加速进行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苏联向第三世界伸展势力，加上美国在与苏联展开核军备竞赛中军事开支的巨大增长，这一切既是美国所始料不及的，又导致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下降，并迫使每位新当选的总统在其任期内对该政府的具体的外交政策和策略进行有限的调整。

于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1961 年在任），便出现了所谓“新面

---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中译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 155 页；参见保罗·约翰逊：《现代：从 1919 到 2000 年的世界》（中译本）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84 页。

貌”战略。该战略在政治上要主动采取“一切和平手段”和必要的行动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所谓“解放政策”，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取胜”战略；与此相配合的是在军事上依靠战略空军以核手段对苏联进行核威慑来遏制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所谓“战争边缘政策”，以及主张美国援助法国打赢印度支那战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以对付“共产主义侵略”的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在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就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怀疑“新面貌”战略的核心——“大规模报复”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战略，因为核武器在阻止任何有限战争的爆发或防止有限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美国也不会为了任何原因就向苏联发动核打击从而遭受后者核报复的风险。[①] 约翰·肯尼迪则更为尖锐地指出，“大规模报复战略”是“马其诺防线心理”，该战略“把美国赶进了一个死胡同，在那里，唯一的抉择就是要么毁灭世界，要么低头屈服”。[②] 因此，美国国内要求加强常规军事力量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军事战略中得到了体现。

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前者1961—1963年在任，后者1963—1969年在任），在政治上的主张，是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逐渐演变”的“和平战略”；与此相配合的在军事上的主张，即在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常规兵力，以前者为“盾”后者为“剑”，随时准备打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各种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和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③]，还有向亚非拉地区派遣和平队的做法，要绝对控制拉丁美洲的所谓“约翰逊主义”，以及不断使越南战争美国化的政策，等等。

上述这些政策与策略的贯彻实施，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呈现出两种情况：第一，主张东西方之间展开对话与接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直接与苏联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二，过高估计美国的实力，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坚持遏制与对抗，继续进行冷战，并在局部地区扩大军事干预。

---

① John Lem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p. 128、174.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238页。

③ 根据“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的部队，应当能够为保卫北约而进行三个月的前沿防御战争，并为保卫韩国和东南亚抵抗中国发动的全面进攻，同时对付一场规模不大的紧急事态。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国家大战略核心并未发生变化，但是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从马林科夫到赫鲁晓夫的新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对斯大林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提出了重大修正，从而也开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例如，1953 年 7 月 30 日，为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50 周年，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马恩列斯学院发表专文，其中引人注目地提出：苏联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遵循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有可能长期共处和进行和平竞赛的原则。[①]这种调整在苏联高层领导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在理论上被系统化，并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得到了确认。

概括地说，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僵化和冷战对抗的日益加剧，斯大林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错误政策，致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战后国际局势出现的新因素，诸如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使核战争变成了现实威胁，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紧密等，要求新的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现实；再加上国内对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需要，这一切成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基本原因。

这一调整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第一，承认近年来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拥护和平的运动将可能防止战争，而且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第二，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是客观现实，相信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因此强调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第三，根据上述判断，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要和平共处，改善关系，加强互相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之间要展开和平竞赛；认为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得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

① 《新华月报》1953 年第 8 期，第 80 页。

在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同时，强调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①] 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康多莉扎·赖斯（她在第二届小布什政府中任国务卿）所指出的：〔苏联的〕和平共处不仅是从实际打败资本主义的后退，而且资本主义也不能再指望依靠武力或其他“反革命”手段去战胜社会主义。因此和平共处在放弃选择战争作为一种工具的同时，其内核仍然是要将两种天生敌对体系之间的争斗进行到底。[②] 第四，与上述判断相联系，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建设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一调整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认为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主要就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尽管开始改变原来咄咄逼人的大国主义态度和损害他国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态度，但常常不讲和平共处，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将“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完全建立在“核威慑”之上，过于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因此而要求苏联的核力量强大到迫使西方不敢发动战争的程度，以发展核武器来制约核武器，其结果是把和平的经济竞赛变成了核军备竞赛。

1964 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曾继承赫鲁晓夫关于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观点，认为核战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总体上仍然奉行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基本维持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政策。直到 70 年代，勃列日涅夫才逐步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外交政策。

在上述理论与精神的指导下，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第一，缓和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缓解极其尖锐的冷战对峙状态；第二，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力求争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实现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并为此而积极发展核力量；第三，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将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和扩大，与美国进行新的争夺。

---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0 页。

② *Condoleezza Rice*,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pp. 145 – 164.

在美苏双方的外交政策都进行了上述有限调整的情况下，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走向是：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由于双方仍然坚持基本的冷战政策，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的冷战对抗。

在此期间，东西方关系有着明显的缓和。主要标志是：

其一，双方共同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遗留问题。

1955 年，苏联主动放弃了原来坚持的“奥地利问题与德国问题不能分开考虑”，对奥地利的和约必须在德国问题解决后签订的立场，从而排除了解决奥地利问题的主要障碍。在奥地利保证其中立化的前提下，苏联同美、英、法一道与奥地利签署了建立一个独立和中立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从而结束了他们对奥地利的 10 年的联合占领。

在 1955 年 5 月联邦德国正式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之后，苏联深知德国已经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统一，遂转向承认两个德国的立场。在华约成立后，苏联政府于 6 月向联邦德国发出照会，表示希望和联邦德国直接实现关系正常化，并邀请阿登纳总理访苏。当年 9 月，阿登纳访问苏联并与苏联领导人签署了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换文。随后，苏联与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签订了《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至此，苏联外交基本达到了目的：证实了苏联的和平共处愿望，造成了两个德国的既成事实，使西方国家难以回避东德的存在。

1956 年苏联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

其二，实现了美苏首脑会谈。

1955 年，在苏联人提出建议、英国和法国的推动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愿意参加的情况下，杜勒斯顺从了举行四大国首脑会议的意见，[①] 战后第一次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于 7 月在日内瓦举行。1959 年 9 月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艾森豪威尔邀请他访问美国，并在戴维营举行的战后美苏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1961 年 6 月，在赫鲁晓夫再次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必须避免，两种制度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主张，而肯尼迪也强调不论意识形态有何分歧，双方合作

---

① 〔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471 页。

制止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两国在维也纳举行了首脑会谈。尽管这些会谈都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突破，但其本身便表明了国际间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并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以仿效的方式，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得以逐渐展开。我们可以用肯尼迪对维也纳会谈的评价来评价上述这些首脑会谈，这些会谈“没有获得，也不假装获得任何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至少对话的渠道已经打开”，其决定对和平举足轻重的两个人都同意保持联系。[①]

其三，适度限制军备竞赛。

这便是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英苏终于在1963年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作为美苏在核时代签署的第一个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尽管其目的之一在于限制其他国家，但仍可视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积极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和解精神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它是“继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达成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②]

另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长达15年，历经136次会议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使两国在尚未相互承认且对立的情况下，有了一个保持某种接触和联系的渠道。

但是，由于美苏双方的基本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冷战之上，因此与局部关系缓和相伴随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冷战对抗。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借其在核武器特别是运载系统方面的暂时领先地位，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美国和西方认为最易受伤害却又最为关键的地区——柏林和古巴，相继于1958年和1962年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久，造成了苏联以战争相威胁、东德建立柏林墙，美国和苏联各派出10辆坦克在查理检查站正面武装对峙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状态；后者则因苏联在古巴秘密建造导弹基地，致使美国陆海空三军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海军以180多艘舰艇封锁加勒比海海面以拦截苏联运送导弹的船只，空军以载有核弹头的B-52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上空，从而导致了一场前

---

① Theodore C. Sorensen, *Kenned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66, pp. 579、620.

②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1] 在这两次危机期间，美苏之间的对抗虽然不如冷战最高潮时期那样全面并达到了局部热战的程度，但是就其所带来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风险而言，却可以说是空前严重的。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两次危机都是以苏联的首先退却而得以缓和，但实际上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下列原则：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例如，在这次柏林危机期间，苏联和美国的坦克在对峙不到 24 小时就先后撤走，并不是苏联领导人决定退却，而是肯尼迪总统通过一条非正式渠道（由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联系一名隐蔽于苏联驻美大使馆内的军事情报官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向赫鲁晓夫提出要求后，双方商定的一种精心安排。[2]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从 1962 年 10 月 22 日到 12 月 14 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就达 25 封，其中近一半信件在冷战结束后才得以解密。在这些信件中，双方虽然相互指责，但都表明了避免因这场危机而使世界陷入核大战，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3] 正如赫鲁晓夫所说，“尽管我们的阶级对抗是不可调和的，肯尼迪和我在防止军事冲突的问题上，却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4] 因此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次美苏之间直接军事对峙的危机期间，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发展和表现得相当充分。

这两场异常激烈的冷战对抗的重要后果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使美

---

① 有关苏联挑起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其他原因主要包括：关闭西德这个吸引大量东德人特别是技术人员脱离东德的通道；关闭西方对苏东国家进行间谍和颠覆活动的渠道；对西德核武装感到忧虑，等等。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改善苏联的战略地位和保卫古巴免遭美国入侵。可参见下列著作中的有关部分：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12th editi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Washington D. C., 1991, p. 122;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on the Berlin Crisis, August 196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4, Fall 1994, pp. 35–59;《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译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译本）（下），北京，三联书店，1977 年；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1 年。

②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并存备忘录》（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 125 页。

③ 参见韩兵等译：《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二十五封通信》，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2—4 期。

④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765 页。

苏两个超级大国实实在在地认识到核时代两国直接对抗的危险，并因此而在双方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以防止意外冲突的出现，而此后也确实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严重冲突，同时促成了部分限制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导致了双方更加激烈的相互攀升的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军备竞赛。

在此期间，除了美苏之间面对面的冷战对峙之外，双方还在台海地区和中东地区间接地卷入冲突，而美国则越来越深地直接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这些冲突和战争都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冷战的制约，因此便成为冷战的另一些特殊形式。

50年代发生的两次中美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紧张对峙的台海危机，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美国对中国为完成国家统一而解决台湾问题的阻挠和干涉，还在于通过遏制中国而遏制苏联，正如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所说，“假如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利害关系很小的情况下也要保卫自由，那么就不会鼓励苏联人在利害关系较大的情况下威胁自由”，“那就是为什么两个小岛（指金门和马祖）……在世界政治的牌戏中会如此重要”。[①] 台海危机虽然以双方的克制而趋于缓和，但是它使中美关系仍然势不两立，并使中苏分歧与矛盾继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决心。

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以反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为由而进行的侵略埃及的战争所引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背后也有美苏之间的明争暗斗，为此而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及英、法、以的失败，给美苏势力进一步向该地区渗透与伸展提供了机会。艾森豪威尔认为：“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并为此而提出了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中东国家确保美国的经济特别是石油利益，并遏制苏联向中东推进的艾森豪威尔主义。[②] 苏联则把中东阿拉伯地区看作与苏联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邻近地区”，强调“不能对直接接近苏联边境的中近东地区所发生的事情置之不理”，[③] 并同样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手段扩大苏联的影响。于是，中东地区也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战场。

---

① 转引自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684页。

② 参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第200—205页。

③ 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62—163页。

1954—1968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边缘地区所进行的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最漫长的战争"的越南战争，[1] 是整个冷战过程中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另一场极其重要的局部热战。它以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为指导，将越南视为"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认为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因此便以支持南越政权来遏制中国和苏联为主要目标，[2] 并企图通过越来越深的军事卷入来维持美国的威望和证明美国的实力。肯尼迪曾经对《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3] 从而使战争逐步升级。但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大量人力物力的耗费导致美国的实力地位急剧下降，最终迫使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并对其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而苏联则借机迅速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进一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冷战将呈现新的态势。

但是，就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进行冷战的同时，整个世界也正在发生着一些极为深刻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逐渐分化，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分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以及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成长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这一切导致了两极格局的动摇。

战后形成的西方联盟，是以美欧联合对抗苏联为目标，以美国向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为基础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马歇尔计划而在经济上迅速复兴的西欧，其政治自信心也不断增长，越来越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西欧对美国离心倾向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

其一，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法、德两个宿敌的和解为基础，从欧洲煤钢联营开始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将欧洲联合的理念逐步转为具体的现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使历史上战乱迭起的欧洲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较长时期

---

① 美国历史学家乔治·赫林的一本关于越南战争的著作的标题就是《美国最漫长的战争：美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New York, 1979.

② 〔美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那马拉：《回顾：越南的悲剧与教训》（中译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3—36页。

③ 转引自基辛格：《大外交》，第595页。

的稳定与和平发展局面，而且随着西欧在经济上不断摆脱对美国的全面依赖，欧洲的政治联合步伐也逐渐加快，欧洲正在重新成为另一个世界力量的中心。

其二，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的出台。以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主地位，独立发展法国的核力量，主张与中、苏对话解决国际事务并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等为主要特征的法国戴高乐主义，以及联邦德国逐渐放弃依附于美国和其西方盟国的外交政策，突破美国的战略限制，逐渐形成既扎根于西方，又能够自主地缓和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与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并以一个民族为基点改善与东德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东方政策，不仅是法、德两国，而且是西欧国家谋求独立发展和推行不同于美国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

另外，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而导致的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不仅是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强的证明，也是日本将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的明显表露。

这一切已经清楚地表明，在经历了20多年的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正在分化，并迫使美国的政策作出调整。

二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抗衡西方的孤立、封锁和颠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是苏联在向集团内部各国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同时，表现出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对外政策等方面全面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服务于苏联的利益，这就严重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并引起了不断的反对苏联控制的斗争，致使东方集团逐渐分化，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其一，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反对苏联控制和干涉的斗争。40年代末，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共产党人都曾提出过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符合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反对照搬苏联模式，而苏南冲突则成为当时这场反控制反干涉斗争的突出表现。1953年以斯大林逝世为国际大背景而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机关的比尔森事件，以及东德发生的罢工浪潮而苏联出动坦克进行镇压并造成几百人伤亡的东柏林事件，可视为东欧国家反苏民族情绪的极度宣泄。1956年以

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国际大背景而在波兰发生的大规模罢工和社会骚乱，最终政府出动军队才得以平息并造成数百人伤亡的波兹南事件，以及在匈牙利发生的历时13天、苏联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并造成4000多人死亡几万人受伤和巨大经济损失的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东欧国家对苏联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干涉别国内政的怀疑和拒绝。60年代东欧各国开始进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东欧国家要求摆脱苏联模式，走符合各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而1968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大国责任论"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专政论"为基本内容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旗号下，纠集波、匈、保、东德等国家出动25万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行武装干涉的事件，不仅是其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而且是"苏联在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去维持其势力范围"的举动，冷战将继续拖延下去。[①] 而这一时期苏东关系的变化，亦成为20年后苏东剧变的先声。

其二，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度实行的"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路线，是新中国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所作出的唯一外交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它"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②] 尽管就经济建设来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但是从当时世界政治的格局来说，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支持却是相互的，并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的问题。因此"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③] 不过，在中苏关系上也存在一些阴影，其原因不仅在于当中国共产党进行其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斗争时苏共对中共的斗争持怀疑态度，支持力度不够，还在于二战结束之前苏联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主权的部分侵犯。

但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两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却日益发展。前者主要集中在中共对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特别是对和平过渡的看法分歧，以及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批评方面；后者则是中国通过对苏联提出的要求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

---

① 基辛格：《大外交》，第502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79页。

队的拒绝，反对苏联方面借扩大合作为名觊觎中国主权并要求中国服从苏联利益的企图。另外，赫鲁晓夫为了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外交政策，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做法指手画脚，为了苏联向南亚扩张势力的需要而不分是非曲直地公然袒护并支持印度的扩张主义行径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及苏联在中国拒绝其各种要求后便单方面撕毁双方的合同，企图用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屈服的恶劣做法，均导致了中苏之间的正常关系难以为继。于是从1963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大论战开始，到1969年中苏两国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珍宝岛流血事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与分裂，尽管两国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

中苏关系的分裂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给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相当深刻的政治影响。在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迈出了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实步伐，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相继于1964年和1967年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1970年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北方的现实军事威胁，中国开始考虑构筑新的外交框架，逐渐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对苏联来说，尽管与中国关系的恶化使其进一步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苏联不断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则导致了东西方关系在缓和的同时再度出现了紧张与尖锐对抗。

对美国来说，它不但未能通过遏制和孤立阻止新中国的发展和逐渐强大以及国际影响的日益增加，更未能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因此美国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不争事实。对苏联的全球扩张的担忧和深陷越南战争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使美国的舆论界发出了变“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要求承认大陆中国，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并与之建立和保持联系的强烈呼声。[①] 中苏关系的分裂无疑也使美国看到了以中国牵制苏联的可

① 1966年3月8—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举行的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尤其表达了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参见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pp. 305－308.

能。美国的对华政策必将作出调整。

新中国的崛起与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同步进行。在万隆会议之后产生的力图置身于冷战之外，以奉行非集团不结盟原则、赞成和平共处中立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其宗旨的不结盟运动的形成，以及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77 国集团”的应运而生，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发展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而鲜明的标志，他们将以联合国作为讲坛和斗争的场所，对两极格局造成冲击。

六、美苏战略的再调整与冷战的新态势（1969—1972 年）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战后形成的那种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间的冲突和对抗控制国际政治舞台的局面已经结束。在美苏两极之外，世界出现了西欧、中国和日本等新的力量中心，再加上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增长和发生的各种动荡所造成的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使美苏两国再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世界了。尽管冷战仍然是美苏关心的主要问题，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卡特所指出的：“双方的长期经历所产生的直觉提醒他们要注意另一方可能利用新的力量对比所提供的机会谋求优势，结果，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奉行一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如果可能就实行缓和，如果必要就进行冷战。”① 美苏的国家大战略与对外政策都将进行重要的调整，缓和的继续与紧张的重新加剧将成为 70 年代以后冷战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

对美国来说，它与苏联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很大变化。美国保持了 20 多年的对苏联的军事优势特别是核力量方面的优势已经发生严重动摇，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利用美国深陷越战之机大力发展战略武器，终于使其核武器在数量上超过美国，并在 60 年代末开始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感到它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就美国与其欧洲盟国的关系而言，戴高乐主义和新东方政策的实行，以及欧共体的蓬勃发展，使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遭遇挑战。在对华关系方面，中国力量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分裂以及国内舆论的压力，使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中国在正在形成的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并改变以往历届政府的几乎近于

---

① 理查德·克罗卡特：《50 年战争》，第 323 页。

僵硬的对华政策。另外，西欧和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战后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以及为了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冷战和对外扩张的需要而承担大量的海外军事义务，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还有使美国付出了3000多亿美元、几万人的生命代价却无法打赢的越南战争更是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使美国在心理上陷入瘫痪”。① 面对上述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日益复杂多变的外交课题，美国必须对其坚持了20多年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并据此制定新的对外政策，以保持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战略调整的标志便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尼克松政府（尼克松总统1969—1974年在任）对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进行了重大的重新评估之后，逐渐形成的美国新的全球政策——“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项原则”和“三根支柱”。“三项原则”是：第一，美国将恪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第二，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美国认为它的生存对美国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援助；第三，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为其本身的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三根支柱”是：第一，伙伴关系，即美国要与其盟国建立较为均衡的伙伴关系，以此鼓励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二，实力，即无论是对盟国还是对敌手，美国的政策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第三，谈判，即美国对其敌手要采取灵活态度，进行对话或谈判，以此实现力量平衡。②

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以往的全球扩张的总态势进行了修改，这种变化主

---

① 理查德·尼克松：《不再有越战》（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② 关于尼克松主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是指从1969年7月尼克松的关岛演说及其延伸而来的“三项原则”，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主要涉及美国的力量收缩；广义的尼克松主义还包括1970年尼克松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中提出的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这不仅涉及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也涉及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基本方针。本文所论述的是后者。有关尼克松主义的资料，可参见 Richard Stebbins and Elaine Adam, eds.,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8－1969*, New York, 1972, pp. 333、282－283;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Government Printing Ofice (GPO), Washington D. C. 1972, pp. 116－19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1*, Government Printing Ofice (GPO), Washington D. C., 1972, p. 221. 由于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对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因此有人也把尼克松主义称为尼克松—基辛格主义。

要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

在军事上，尼克松政府提出了新的国防战略，即“现实威慑战略”，以摆脱由于军事伸展过度而导致的负担过重的困境。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承认美苏核武器已经呈现势均力敌的现实，提出以“充足”论取代原来的优势论，以确保美国在核力量方面的质量第一的地位；在常规力量方面，提出以“一个半战争”的战略取代60年代的“两个半战争”的战略，[①] 开始转变把中国当作“最大威胁”的方针，并将苏联确定为主要对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方面；在海外驻军方面，推行总兵力的“分担负担”原则，即按照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战区常规战争和地方性常规战争，与其盟国实行分级负责制，以此收缩美国的海外驻军，并基本排除美军在地区常规战争的军事介入，为结束越南战争打下基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尼克松主义所实行的军事上的收缩，并不是要取消美国的海外军事义务，而是调整原来的义务和军事力量部署的力不从心状态，试图使美国能够更长久更稳固地维护其重大利益，同时与苏联展开更有效地争夺。

在外交上，尼克松政府在承认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的前提下，[②] 有意识地推行均势政策，以“实力”相威慑，以“谈判”为手段，从通过对抗遏制苏联走向通过谈判遏制苏联，以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与此同时，改变蓄意“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对华政策，开始重建中美正常关系，并利用中苏矛盾和分歧挟制苏联，达到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势力均衡，以维护美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在对待西欧和日本等盟友方面，尼克松政府采取联盟外交，在新的形势下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对待第三世界的态度上，一方面承认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的重要特点，但民族主义的运动一般并不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从而改变了以往的

---

① 根据“一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一般任务的部队，将足以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的大规模的进攻，同时援助美国的亚洲盟国抵御并非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对付其他地区的一场紧急事态。参见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p. 177.

② 尼克松在1971年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同年夏天，他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是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五大权力中心。参见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1*, pp. 220、803 – 806.

“多米诺骨牌”理论，为美国最终从越南脱身奠定了理论基础；[①] 另一方面，鉴于苏联在中东影响的不断扩大，尼克松政府开始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力图通过谈判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寻求某种和平解决的办法，并以此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

在上述现实威慑战略和均势政策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的外交出现了以下一些重要变化：第一，逐步结束越南战争，改变海外驻军重点在远东的布局，加强“欧洲第一”的方针。第二，继续在东西方之间展开对话与接触，对苏联推行缓和外交，特别是力图从实力出发，用军控协议限制苏联的军备，并用满足苏联某些要求的经济协议，换取苏联克制扩张行动，但是对苏联触及美国认为是其重大利益所在的行动则作出强硬反应。第三，主动采取行动，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大门，谋求同中国对话，并利用同中国接近来对付苏联。第四，调整对欧、对日政策，强调美欧之间的同盟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加强彼此的协商和对话，支持欧洲统一，重申美国对北约盟国承担的安全义务，并以归还冲绳改善美日关系，通过强调西方联盟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巩固美国在其盟国中的领导地位。第五，注重扩大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以确保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

尼克松主义作为力图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能力相适应，在海外实行部分收缩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政策，不仅是对美国以往的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由于长期的全球扩张而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而且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当然，正如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所写道的：“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②]

在尼克松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而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之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巩固了他在苏联的领导地位。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苏联国内政治相对

---

① 参见亨利·欧文主编：《70 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5 年，第 77 页。

②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224 页。

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其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既有相当的继承，也有重要的区别。对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尽管苏共中央承认科技进步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资本主义的注定灭亡是越来越明显的了。这一看法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第二，与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总危机相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增长，正如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的讲话中所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如果今天有谁企图证明，没有苏联也可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怪人。"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更是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曾继承赫鲁晓夫关于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观点，认为核战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他后来逐渐淡化了"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观点，到70年代中期他的看法是：现代战争的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他重申核战争和历来的战争一样，"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①]

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出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大战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首先，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的以防御为主发展为以先发制人为主。勃列日涅夫认为，国家对战争的真正准备，是使国家避免战争的先决条件，只有全面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将苏联的军事力量达到并保持在与美国平等的地位，随时保持警惕并采取进攻态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坚不可摧，并利用日益衰弱的资本主义使苏联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影响。正如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所说："谁也不要试图用最后通牒和武力的语言和我们谈话……我们拥有所需要的每一种东西——真诚的和平政策，军事能

---

① 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分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76—177、196—197、199、204页；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新1版，第788—789页。

力和苏联人民的团结——去确保我们的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并保卫社会主义的果实。"[1] 这一国家大战略的变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具体的外交战略基点从赫鲁晓夫时期的以缓和为主、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逐渐发展为在全球展开战略攻势、积极介入、主动对抗、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进攻战略的基础。这种进攻性外交战略在勃列日涅夫于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苏共中央主管国际问题的书记波诺马廖夫也声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2]

其次，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勃列日涅夫坚持赫鲁晓夫时期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原则。他在二十四大上表示："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的原则性方针是，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完全地实行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互利的关系，而同那些愿意在加强和平方面进行合作的国家进行这种合作，并使同他们的相互关系具有最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和平共处原则，作为苏联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西方推行缓和战略的基础。但是勃列日涅夫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3] 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战略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谋略，是为主动对抗这一积极进攻战略服务的工具，在他看来，缓和并不妨碍同美国的争夺，也不影响苏联在世界上以推行"苏联模式"和进行世界革命为借口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积极进攻战略和缓和战略的双重指导下，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及其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

---

① 转引自 Condoleezza Rice,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p. 159.

②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分册，第201页。

③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91页。

第一，必须保持已经达到的与美国的战略均势，[①] 因此要争取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以缓和由于持续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给苏联经济造成的巨大压力，并争取时间以便在战略武器的质量上赶超美国。第二，继续与美国及其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促使久拖不决的欧洲问题得到解决，争取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第三，进一步在全球特别是在亚非拉扩张苏联的势力，与美国争夺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第四，强化对东欧的控制，继续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遏制和孤立中国。

在美苏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都进行了上述调整的情况下，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关系既出现了缓和的高潮，又有着冷战对抗的加剧。

在此期间，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高潮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1972 年 5 月尼克松终于在成为总统之后第一次访问苏联，两国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和“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要求相互保持克制，避免危机，并在利用空间、进行科技、医药及公众卫生合作、关于防止海上突发事故、环境保护等领域签署了一些双边协议。该文件的签署为两国关系营造了缓和的氛围，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国之间对话多于对抗，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全面解冻。

第二，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即从前一阶段的以限制其他国家为主的部分核军备控制阶段发展为限制美苏自身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其标志是在经历了 3 年多的艰苦谈判之后，两国终于在 1972 年 5 月 26 日尼克松访苏期间正式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即反导条约，英文缩写为 ABM）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英文缩写为 SALT Ⅰ）。前者将双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限制为两处，1974 年又将其修改为一处；后者是一个为期五年的协定，将双方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总限额分别规定为美国 1054 枚、苏联 1618 枚，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分别规定为美国 710

① 60 年代末美苏战略均势的基本情况是：美国拥有陆基洲际导弹 1054 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 656 枚，战略轰炸机 560 架；苏联拥有陆基洲际导弹 1050 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约 160 枚，战略轰炸机 150 架，并拥有一处由 64 枚导弹组成的用于保卫莫斯科地区免遭外来导弹袭击的名为“橡皮套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1967 年美国部署了名为“哨兵”的反导弹系统。但是总体说来，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在质量方面优于苏联。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第 647—648 页；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0 页。

枚、苏联850枚；[①] 并于1972年开始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②] 这些条约的签订，是美苏在核军备控制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表明两国都认识到没有节制的战略武器竞赛有害无益，确认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承认了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的战略均势现状，为两国的军备竞赛制定了游戏规则和竞争框架，因此不仅有助于战略的稳定，而且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缓和高潮的重要象征。但是这些条约主要是对双方战略武器的数量限制而不是质量限制，因此又为美苏在更高质量层面上的战略核武器竞赛留下相当大的余地。[③]

第三，在美苏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曾经作为东西方冷战主要战场的欧洲在缓和关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970年，苏联正式邀请美、英、法三国谈判柏林问题，1971年9月四国签订了柏林协定，确认四国“互相尊重各自的和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已形成的局面不得单方面加以改变”；苏联保证西柏林到联邦德国的过境交通将畅行无阻并享受“优惠待遇”；西方国家则承认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但可以“维持和发展柏林西区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④] 1972年11月，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在波恩签署了两国关系基础条约，双方承认彼此为主权国家并发展平等睦邻关系。至此，东西方关系中围绕德国特别是围绕柏林的争端基本结束。随着1973年5月勃列日涅夫成功访问西德和同年9月联合国同时接纳东德和西德为正式会员国，以及西德先后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东西方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缓和。[⑤] 以此为基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终于在1975年7月—8月在赫尔辛基正式召开，35国首脑（包括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的33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出席了会议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亦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确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边界和政治现状，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原

---

①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第327页注释；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第653页。

② 1979年6月18日美苏正式签署《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Ⅱ。但是由于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和国会推迟了对SALT Ⅱ的最后表决，1981年里根执政后，更是反对批准该条约，直到1982年双方才重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便是SALT Ⅲ，但无果而终。

③ 另外，从1973年10月正式开始谈判的中欧裁军会议到1983年共谈判31轮355次，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④ 国家安全部编：《苏联对外关系手册》，北京，国家安全部，1982年，第1119—1120页。

⑤ 1972年10月联邦德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则，为加强欧洲的合作以及东西方之间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多边协商的渠道与机制。因此，欧安会的召开不仅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而且标志着东西方的关系从对立到对话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东西方的冷战对抗关系并没有因为缓和而改变。在缓和达到高潮的同时，苏联出于其全球进攻战略并乘美国局部收缩之机，却在缓和的掩盖下采取了一系列对外扩张行动，其中主要包括：在1971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与战争中，苏联以积极支持其盟友印度的方式与巴基斯坦的支持者美国相抗衡，以利于苏联向南亚的渗透与扩张；70年代苏联以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斗争为借口，加紧对非洲事务的干预特别是通过军事援助来加强苏联在南部非洲的影响和通过古巴来介入安哥拉内战，与美国展开争夺以加强苏联在非洲的存在和影响。此后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继续发展，最终导致苏联军队在1979年12月27日突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从而使缓和的热度急剧下降并引发了新一轮的东西方对抗，致使一些人认为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和重新进行军备竞赛的时期，而“缓和”已经死亡。[①] 到70年代末，苏联的军事力量和霸权主义发展到顶峰，但与此同时，它所追求的全球进攻和与西方关系缓和的大战略却已经搁浅。勃列日涅夫留给戈尔巴乔夫的将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和极其失败的外交局面。

但是，就在东西方关系既有缓和的发展又有冷战的重新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表现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现在中美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方面。

自50年代中期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到60年代末，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基础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美国长期深陷无法取胜的越南战争，表明美国并不打算，也没有能力进攻中国，当尼克松上台后决心使美国退出越南并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竞争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在消退；另一方面，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分歧的不断表面化，特别是1969年3月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则使中苏关系陷入了全面紧张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为中美双方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打开中美关系提供

---

① 参见 T. E. *Vadney*, *The World Since1945*, *A Complete History of Global Change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87, P. 424；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了一种可能性，而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和中共中央从中国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出发而作出的争取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决定，[①] 则最终带来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终于越过大洋，开始了他对中国的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并于2月28日在上海签署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公报采取现实主义态度，阐述了两国的共同点和原则分歧。公报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同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同时公报也坦率承认，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另外，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在中美敌对20多年以后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3年双方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具有外交特权的联络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渠道。1979年，两国终于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中、美、苏三国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达到基本均势，从而带来国际格局方面的重大变动。美国通过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其战略有限收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美国的全球利益，而苏联则在这个战略大三角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美苏冷战的阴影，而且表明中国已经把

---

① 197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台湾问题、印度支那等问题上中国方面应当掌握和坚持的8项原则，可视为中国新的对美政策的全面而正式的确立。这些原则，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见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0—287页。

自己的外交活动的舞台从东方扩展到整个世界。

伴随着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这一调整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第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第二，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第三，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依赖；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也可以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也要反对霸权主义。从此，这些基本精神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①

在此期间，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西欧联合进程尽管十分曲折，但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的突出表现是：英国在提出申请12年之后终于在1973年1月1日被欧共体接纳而成为其正式成员国。与英国一同加入欧共体的还有丹麦和爱尔兰，欧共体实现了第一次扩大。英国加入欧共体所经历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以及欧共体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英国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方法，成为欧洲联合过程中的可贵先例。这种使参加国在让渡部分主权的同时保留自己的特性和必要的利益并给予它反复考虑的机会的做法，为欧共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使其包括了西欧最重要的4个工业大国，不仅大大提高了欧共体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而且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从此欧共体被国际上认定是西欧的代言人，并成为实现西欧联合的主体。扩大后的欧共体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不仅实现了完全统一的外贸政策，而且在70年代后期创建了欧洲货币体系，欧洲的经济联合向深层次发展。

西欧经济的复兴和内部一体化的发展所带来的西欧政治独立自主倾向的加强，必然导致西欧与美国的关系发生变化。1974年欧共体8国（除爱尔兰）和美国在

---

① 关于中国外交的这次调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章。

内的北约15国首脑签订的《大西洋关系宣言》，作为双方妥协的产物，在实际承认西欧与美国的平等地位的同时，强调大西洋两岸在经济、政治与防务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相互依赖仍然是其关系的主要方面。在对待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方面欧共体的政策则有别于美国，更强调应当通过西欧的技术和资金优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交往维持和平局面，减少战争危险，并促进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

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于70年代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以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日本逐步将过去的"对美一边倒"的"被动外交"转变为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多边自主外交"。以此为依据，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此后日本进一步推行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自主外交"，在国际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

在此时期，东欧各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它们并没有彻底改造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外部又受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控制和经互会的"一体化"体制的限制，再加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因此不仅造成了东欧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使它们与其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导致了东欧各国的政局不稳，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反苏民族情绪持续高涨。这一切，为东欧最终的剧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背景条件。

概括地说，第三世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两种状况。一方面，非殖民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越来越多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进入联合国，它们在联合国中积极发挥作用，并继续进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第三世界的支持，以及以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而开始的阿拉伯产油国发动的，以提高石油价格和控制开采权为主要内容的石油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给各产油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而且对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打击了以它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从而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对话的过程，并推动了以区域性合作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诸如中亚、中东、印度支那、非洲之角以及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等第三世界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

题上，人们都能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和影响，以及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斗。这些因素加重了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力量。

总之，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国家大战略的调整与实施，冷战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会呈现对话与缓和、对抗与争夺交互进行的发展态势。但是，国际政治力量中已经出现的多个力量中心的不断发展已经清楚地表明：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世界已经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它孕育了两极解体的力量，孕育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宽容态度，孕育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章　美苏从同盟到全面冷战的转变

一、有关冷战发生原因的探讨

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但是大战结束才几年，两国就反目为仇，冷战对峙。出现这一情况，不能仅仅看成是美国或是苏联的问题，甚至只是从美苏两国当时的政策出发来探讨其根源，也有些过于简单化。美国梅尔文·莱夫勒教授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走向冷战的历史背景。

第一、国际体系及与之相关的大国间均势问题的发展变化。

第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这又主要表现为：在如何管理社会，如何驾驭现代化的经济，如何达到工业化、城市化这些问题上，民主资本主义和统制性共产主义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两套观念形态，互相敌对，并展开竞争。

第三、原子能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国对于“权力”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使得技术性因素获得了对于国际关系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第四、全球范围内非殖民化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革命民族主义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在这方面，中国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值得特别研究）。

第五、作为国际行为“机制”构成因素之一的领导人的个人作用问题。[①]

其实，如果具体地来讨论莱夫勒教授的看法，也还是不无可商榷之处的。比如，大国间的均势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冷战，但是，它显然不是美苏冷战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的两大对立集团如果仅仅从实力的角度来观察的话，都称得上势均力敌，却并没有能

---

① 梅尔文·莱夫勒：《冷战是如何开始的?》，转见《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

够阻止战争的爆发。[①] 而意识形态的对立，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最大障碍，但无论是苏联在力量对比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还是当苏联具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它也都没有能够促成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局面。核武器固然可以算得上是对美苏两国走向战争的一种重要制约手段，但它对于解释两国何以会从战时同盟转向全球对抗，却并无帮助。至于非殖民地化和革命民族主义的挑战，更多的只是削弱或牵制了西方阵营，它究竟是刺激了苏联向美国挑战的欲望，还是美国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进而殃及苏联，也颇难说得明白。

美苏冷战的起因何在，根本的问题在于"战"，而不在于"冷"。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在两国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美苏不热战只冷战，关键的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在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两次动辄卷入数十个国家，死亡数千万人的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再度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集团，但是无论美苏，都深知大战爆发的可怕，故不能不极力避免之。其二是双方都拥有了核武器，且都清楚核武器的使用，无论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将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再加上都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战后历届美苏领导人都不能不小心谨慎，极力遏制双方间的冲突升级成为可怕的战争。

但是，相对于战后的各国研究者而言，研究冷战的起源，更重要的显然不是研究其何以会"冷"，而是要了解在经历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出现了极其危险，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核武器之后，美苏两国政府何以仍会各自纠集自己的集团，在全球范围开"战"。特别是战后人们大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两国在同一条战壕里抗击法西斯的情况，印象深刻；对美、英、苏三国领导人战时密切的合作关系和通过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共同协商安排战后世界命运的情况，记忆犹新。战后世人几乎无不对世界走向和平、民主及其民族解放的前景，抱以强烈的期望。因此，美苏之间再度爆发冲突，进而形成两大对立集团，迅速走向冷战局面，自然让世界上一切盼望大国间能够实现和平与妥协的人民倍感遗憾与失望。人们之所以会长时间反复研究和争论究

① 事实上，如果从综合国力来看，像二战爆发时德国、意大利两国的实力，即使不算苏联，也还远不如英、美、法等国的力量强。

竟谁是冷战爆发的责任者，其原因即在于此。

任何一种对抗或是战争的爆发，都毫无疑问与对抗或战争双方难以解决的利益冲突是分不开的。那么，美苏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又是什么呢？在考察国家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相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作为这种考察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在通常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国家利益趋于一致或比较接近的时候，国家关系就会较好；而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相互抵触，甚至冲突时，国家关系就会较差。从美苏长期没有外交关系，到法西斯主义兴起，两国逐渐从建交到结为战时同盟，一同肩起反法西斯战争的责任，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战后世界各国需要和平发展的时候，美苏两国却迅速走向全面冷战对峙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要回过头去了解美苏关系的历史。这既包括美苏战时关系的历史，更包括美苏战前关系的历史。如果我们不能历史地认识问题，不了解美苏两国关系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历史状况，以及在作为战时同盟期间两国间依旧存在的矛盾，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厘清问题。

二、美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对峙。这里首先产生的问题是，何以冷战会在美苏两国之间发生，而不是在英苏之间或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与苏联之间发生？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战后美国不可一世的地位和国力所决定的。比如其在经济上仅黄金储备就几乎占到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各种产品占到世界总量的1/3；其船舶总吨位占到世界的一半。而军事上其武装部队的人数高达1200多万，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其陆军数量仅次于苏联，海军和空军则在全球无人匹敌。它不仅在海外遍布军事基地，还是战后初期唯一掌握着核武器的国家。[①]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设想一下，如果战后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如此强大，它是否也会像美国一样，与苏联爆发全面对抗呢？显然，无论任何人要想对此轻易地得出完全肯定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无论如何不能回避战后客观存在的英国政治的现实。即战后在英国执政的不是以

---

①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39页。

丘吉尔为代表的反共的保守党，而是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英国工党。以工党所代表的英国社会群体和它与欧洲各国社会党大同小异的政策主张，要指望它自主地采取和美国完全一样的全面对抗苏联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苏联在战后的全面扩张就不会对英国构成严重威胁从而导致英国也像美国一样转向强硬吗呢？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历史上英国历届政府对苏联态度的摇摆不定，我们也就大致能够了解英国政府会不会像美国那样行事了。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刚一夺取政权，就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它之积极参与欧洲列强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不过两三年之后，眼见共产党政权在俄国已经占据了稳固的地位，这个最反对共产主义的老牌殖民主义帝国，也是最先承认苏联，并与之建交的欧洲列强国家。要知道，在整个193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共产党及其主导下的共产国际，远较战后的苏联党更显得激进和暴力。因为，那个时候它们几乎是公开主张世界革命，号召推翻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为此，英国与苏联间难免时常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英国政府对苏联的戒备与敌视自然也一以贯之。但是，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对苏政策依旧时左时右。当双方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暂时过去之后，它还是会在一些场合下，主动推动苏联融入国际社会，并希望苏联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了解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战后英国的政策也并没有两样。它在一些情况下支持美国采取对抗的政策，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并不按照美国的愿望行事。这不仅说明英国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政策着眼点，而且说明，英国的对外政策是与其国内政治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只要英国国内政治的分野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在对苏问题上的做法也难有本质的不同。

由英国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美国之所以会和苏联爆发冷战，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其国力的强大，也不能仅仅看成是由于苏联在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扩张行动所促成。美国战后转向强硬的对苏政策，是有其强有力的国内政治的支持为其根源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就是在美国从不存在一个对资本主义弊端持强烈批判态度，因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心态的强大的社会政治群体。因此，美国对苏联，亦即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会受到国内其他力量的牵制。换言之，美国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是与其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当美国人发现自己强大到可以影响全世界的时

候，它会毫不犹豫地想要把整个西欧，乃至于把世界所有地区都置于它的保护和控制之下，并渴望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而苏联的存在，特别是苏联的扩张，之所以会被美国看成是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以至不惜在二战后迅速采取与之全面对抗的极端政策，也正是因为它相信，苏联不仅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各国按照美国所希望的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进，而且是可能根本毁灭整个自由民主社会的最可怕的敌人。

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之间的对立，远超过英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典型的例证，就表现在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承认问题上。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欧洲列强各国政府虽然都一度采取了敌视和孤立苏俄（1922年底以后改称苏联）政府的政策，但是，随着苏联政府的日渐巩固，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各国政府都逐渐采取了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行动。然而，作为对欧洲事务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美国政府，却始终拒不承认苏联。他们公开宣称："今日世界上有两大害正在作祟，一是专制主义，其力量正在衰落；一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力量正在上升。我们已经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统治在俄国的骇人后果，我们也知道这一主义正在往西方传播。想到在中欧实行无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可能性，就令人害怕。"[①] 而美国战后对苏冷战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乔治·凯南，当时就明确告诫政府："无论布尔什维克做什么，无论他们对我们的最后态度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毫不迟疑地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②] 威尔逊总统除了鼓励、赞同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以外，还在国内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以压制同情苏联的倾向的抬头，同时公开宣布要扶助中欧地区的民主力量，以抵制布尔什维克的传播。

从威尔逊开始，美国历任总统基本上都沿袭了对苏联政府的不承认政策。尽管美国政府并不反对美国商人在苏联投资，以及保持与苏联的贸易往来，但所有这些商业行动，却也都被赋予了某种政治目的。这也即是说，美国政府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投资和贸易，能使苏联人接触到美国的政治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从而有助于最终瓦解苏联的共产党政权。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受到孤立

---

① 转见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55页。

② 同上，第356页．

主义的思想支配的。其对外政策，更多地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某种中立的色彩，以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为基本前提。美国的国会几乎在所有可能促使美国卷入到境外事务的政治军事的决策中，总是强有力地制约着政府的行动。不仅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如此，就是对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扩张，也同样抱以一种近乎绥靖主义的态度。但即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从国会到政府，依旧从思想上强烈地抵制和反对共产党的政权及其制度。在众多美国人看来，任何一种不合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制度和统治形式，都是不道德的。而像苏联共产党政权那样，打着阶级的名义，剥夺私人财产、压制言论自由、废除民主选举、奉行一党独裁和暴力统治，更是一种罪恶。美国之所以一直拖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以后才最终放弃了不承认主义，在西方国家中几乎最后一个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并不是在思想上认可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而是因为大势所趋和当时法西斯主义猖獗造成的一种利益上的需要。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包括战时与苏联结盟，严格说来并不是美国政府改变了敌视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一贯立场，而仅仅是因为它们当时面对着更加危险的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换言之，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一般的美国人，即使在与苏联人处在同一战线的时候，其在意识形态上也依旧保持着对苏联的反感和高度的警惕。其战后所以会迅速转向与苏联的全面对抗，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实际上正是与威尔逊的对苏政策一脉相承的。“冷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威尔逊的术语所解释和描述的。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是旨在‘遏制’的反共国际联盟的领袖。”①

三、美苏在欧洲的对立

美国人基于意识形态防范和戒备苏联战后扩张的心态，在二战期间，甚至在欧洲战场上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了。这里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势力扩展。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只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但这已经足以让美英两国领导人强烈不满和高度戒备的了。

① Irving Kristol, “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in Harries, ed., American’s Purpose, p. 58.

早在1942—1943年，也就是距离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三年时间的时候，美英和苏联之间就已经围绕着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产生重要的分歧了。莫斯科怀疑美英有意坐山观虎斗，部分美国将领也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制度的苏联两败俱伤。[①] 出于对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孤立和战争威胁的担忧，斯大林一心希望利用这场战争把苏联的安全疆界推到尽可能远的地区。为此，苏联在战争期间就开始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1943年底和1944年初相继开始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军并利用反击德军的机会，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亚等国，也极力扶持共产党成为统治的力量。而面对东欧以及巴尔干等国共产党的崛起，英美政府更是十分紧张和不安。它们明确强调："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下流的无名之辈的一时高涨的欲望"而抛弃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因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化一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他们决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建立民主政治。[②] 在这里，人们事实上已很难区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双方政治和战略考虑中究竟有什么不同。无论美英还是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显而易见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说到底其实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而不是主要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势力范围，正是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对欧洲战略地位重要的一些国家的争夺，最先触发了美英和苏联之间一度被战争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对立。1944年2月，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注意到其强烈的反苏态度，并获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有鉴于此，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着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告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

---

① 时任东南亚盟军副参谋长的艾伯特·魏德迈就清楚地表示过这种态度。转见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② 见温斯顿·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825—827，838页。

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①]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乘苏军进抵华沙城外但尚未占领首都之机抢先于8—9月间在华沙发动起义，这很自然地被斯大林视为是波兰流亡政府企图排斥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②]的重大阴谋。有关波兰流亡政府反苏反共的敌对态度，只要从他们当时散发的传单中，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其在传单中宣称：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作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

德国人在仓皇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

自由波兰万岁。”[③]

面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可想而知苏联方面会采取怎样的做法。于是，美英和苏联之间围绕着应否援助华沙起义问题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立即向华沙波兰爱国者空投物资和军火”，“不然你是否同意火速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进行此事？”斯大林对此断然回绝。他得到的情报使他有理由宣称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完全是“一小撮权欲熏心的罪犯”，这个时候发动起义是别有用心，因此他不仅坚决拒绝“同华沙冒险发生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帮助英美空军实施空投行动。可想而知，苏联的态度不能不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指责苏联“基于残酷无情的政治考

---

① 参见叶戈罗夫主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8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46页；苏联外交部编，潘益柯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95—197，201—204，207—208，243，246—247，251—252，292—293页；苏联外交部编，宗伊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128—129，153—156，178—179，181—183，184—185页。

②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设在卢布林而得名。

③ 转见吴伟编辑《苏联与1944年华沙起义》中№07925号文件：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1944年9月19日）。

虑”置抵抗战士于死地，丘吉尔则主张通过舆论揭露俄国人的这种“古怪而阴险的行径”。①

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导火索。只不过，这个时候不仅盟军在欧洲作战离不开苏联人，就是美国在远东战场上也还要指望苏联人帮忙，再加上盟军进展缓慢，苏军已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眼看就要染指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又都出现了共产党同流亡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整个形势对英美明显不利。因此，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能不一面要求盟军指挥官尽可能抢占欧洲地盘，一面对斯大林做出某些妥协。华沙的起义者刚刚放下武器，丘吉尔就压抑住强烈的愤慨，与外相艾登急匆匆飞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讨论希腊的命运问题了。

丘吉尔之所以如此重视希腊问题，是因为希腊卡在英国通过地中海接通其东方殖民地的咽喉处，对英国极具战略意义。而强大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却突然间否认流亡政府，准备独立掌权，这等于说将来地中海的通道很可能会处于俄国人的炮口之下，丘吉尔当然要坐卧不安了。他这时在考虑用武力来对付希腊共产党了。他一面要求英军总参谋长准备紧急调动10000或12000军队进入雅典，呼吁美军协助英军行动，一面强硬地表示，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英美必须准备鼓动和援助希腊人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②

要对希腊共产党动武，丘吉尔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反应。因为，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谅解，英军即使能够占领首都雅典，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取得对整个希腊半岛的控制权。早就熟悉了殖民主义那一套强强交易的丘吉尔，于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主动提议苏联战后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主要的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反正苏军已经大举进入罗马尼亚，并逼近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边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势力强大，英美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最多也

①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98，201，205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78—379，381—382，385，386页。

②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67—168，171—172页。

只能争取到如此程度。考虑到苏联在经济上和军备上还不得不依靠美国，在波兰以及以后占领德国等问题上也还必须设法取得英美的合作，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的提议。据此，双方于10月9日商定，苏联在罗马尼亚占90%，英美在希腊占90%，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50%，苏联在保加利亚占75%，英美占25%。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①]

不论后人对"百分比协定"有何种批评，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美英与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希腊共产党从此成为英军干涉的牺牲品，但美英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党人的囊中物。甚至不只是罗马尼亚，就连75%的保加利亚、50%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当希腊共产党的反抗遭到英军镇压时，斯大林显然并不感到内疚。[②] 相反，当时，特别是英美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变强以后，对与苏联的这一交易始终有些耿耿于怀的，却是始作俑的丘吉尔本人。很明显，如果说斯大林从来都是拿阶级划线，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共产党专政的话，丘吉尔则从来都是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黑白的政治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主张深恶痛绝。还在华沙起义过程中，丘吉尔就曾与罗马教皇大谈"共产主义的危险"，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苏联人把他们的那一套推行到这么多国家中来呢？他这时曾公开发表文告，不指名地告诫欧洲人民不要接受苏联向欧洲推行的苏维埃制度。他宣称：在当今世界，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选择。如何检验各国人民究竟是否享有自由与民主，就是："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不屈从于暴民威胁？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

---

①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337—339页；哈里曼前引书，第399页。根据苏方的档案记载，当时经过莫洛托夫和艾登修改后的百分比协定对苏联更加有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三国苏联80%，英美20%，南斯拉夫各占50%。见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576页。

② 由于英军开进雅典，支持保皇派的希腊军队和流亡政府回国，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度在苏联的要求下与流亡政府妥协，参加了联合政府。但随后英军司令斯科比下令民族解放阵线交出武器，后者举行抗议遭到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起义。起义从1944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由于民族解放阵线起义之初采取了扣压人质等一些丧失人心的做法，再加上希腊面积有限，军事上回旋余地过小，又得不到苏联的赞同，因此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归于失败。

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做到一视同仁呢？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①

毫无疑问，这决不仅仅是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它同时也是欧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家，尤其是美国人的看法。因此，丘吉尔的讲话当时就得到不少美国官员的支持。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甚至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把它在东欧的这一套照搬到远东去了。他为此曾接连提醒华盛顿说：苏联正在通过暴力手段向东欧国家推行其"秘密警察（这就取消了个人自由）、新闻检查、奴化教育等"的做法，"当他们能够向中国和太平洋方向觊觎时，这种政策就会伸展到那里。"美国决不应该让苏联为所欲为。②

四、二战期间的美国对中共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③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谢

①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77—178，192—193页。

② 哈里曼前引书，第385，387—389页。

③ 除了60年代 Anthong Kubek 所著《远东是怎样失去的》从相反的角度探讨美国丢掉中国的教训以外，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一书大概是最早从论证美国与新中国早应友好这个角度谈问题的书了。埃谢里克书，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伟思、约翰·P·戴维斯和约翰·C·文森特等人。[①] 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第三，所以建议这样做，因为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②]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由此不难看出，这些看起来相当开明的年轻外交官们，在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戒备和敌视苏联的心理。与其说他们关于国共优劣的看法是在关心中国战后的前途，不如说他们是在考虑战后美苏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如何更好地遏制苏联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甚至，还在1942、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③] 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

---

① 伊利·雅克·卡恩给这群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美国年轻职业外交官起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中国通”。在他所列举的名单上，比较有名的还有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等。参见伊·卡顿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谢伟思的有关报告，主要部分已经收录在埃谢里克前引书中；戴维斯的有关报告，除了可以在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看到相当部分摘要以外，还可以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2，China，pp. 226－228；FRUS，1943，China，pp. 258－266，397－399；FRUS，1944，Vol. 6，p. 308，667－671.

③ FRUS，1943，China，pp. 193－199.

联的冲突当中去。[①] 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落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于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作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苏联的怀抱之中。[②] 正是注意到苏联战后可能染指亚洲事务，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人俄国人的怀抱”。[③]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作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罗斯福 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④] 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⑤]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4—595 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587—588，592—593，595 页。

③ 埃谢里克前引书，第 249—269，271—274，304—307，317，326—332 页。

④ 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 1980 年版，第 542—545 页。

⑤ FRUS，1943，China，pp. 258－266.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①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②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这一判断准确与否，已无须讨论。但由此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美国总统到美国普通的外交官们，

---

① 见埃谢里克前引书，第221—225页。

② FRUS，1944，Vol. 6，pp. 667－671.

在内心里对作为盟友的苏联抱着怎样一种态度，他们又是如何严守着那条划分美苏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的。由此不难看出，美英与苏联在战时的欧洲所发生的龃龉与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在亚洲，仅仅是因为苏联尚未介入到战争当中来。即便如此，在亚洲的美国人就已经在未雨绸缪了。一旦苏联向东对日作战，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毫无疑问地会迅速凸显出来。抵制苏联的东扩，以至选择一切反共的亚洲国家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盟友，将是战后美国亚洲政策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五、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妥协

到了1944年底和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置疑了，但是，越是接近胜利，美国人就越是关心这最后胜利的代价问题。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绝对优势，减少美国人的牺牲，罗斯福也不得不采取丘吉尔“百分比协定”的办法，通过与苏联交换某些利益，来取得苏联的合作。[①] 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达成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划定了战后美苏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国，长城以外归苏联，长城以内归美国。但是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签过字的秘密协定条文中可以看出，美苏两国并没有就此达成明确的协议。从斯大林再三提到其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沙俄因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明确要求租借大连、旅顺两港和中东及南满铁路的要求，可知斯大林是有把中国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的某种打算的，但罗斯福并没有全盘接受。双方最后达成的条文规定：“1. 维持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 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在这里，一个“大连商港国际化”，一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

① 有关美国当时需要采取这一妥协的原因，哈里曼的解释是有根据的。参见哈里曼前引书，第442—443页。

合营，再加上“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同意把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和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的态度。[①]

很难认为斯大林不清楚美国人的这种态度。问题仅仅在于，雅尔塔协定签字之日，欧洲战争尚未结束，莫斯科与英美间在欧洲还有许多麻烦要解决，况且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无建树，只凭一纸出兵许诺，就得到沙俄当年丢掉的在中国东北的主要优惠权益，不仅被美国拉入大国行列的中国因此无法就外蒙归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在太平洋得到对自己极具战略意义的不冻港，可以取得逼近日本列岛的千岛群岛，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提出更多的要求，斯大林这时还缺少足够的筹码。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苏联在东欧诸国扶植共产党上台的步步成功，斯大林已经形成了一种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他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那就是：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②] 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深受英美抗议的行动。包括逼迫罗马尼亚国王解散联合政府，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新政府；不允许英美派观察员或代表团访问波兰，不允许其代表前往波兰处理苏军在波兰解救的英美战俘问题，等等。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此提出交涉时，斯大林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③]

既然凭实力讲话，[④⑤] 斯大林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可能界限自然也看得十分清楚。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于英美盟军占领下的国家和地区，则明显地采取了旁观的姿态。斯大林对“百分比协定”的严格遵守，就连丘吉尔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对处于英美占领区内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其在民众中是否占据优势，都一概要求其与英美支持的当局合作。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

---

① 萨纳柯耶、崔布列夫斯基编，北京外国语学院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8页；哈里曼前引书，第443—447页。

② 吉拉斯著：《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③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618页；前引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首相的通信，第309—310，316—317页；前引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195—198页。

④ 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只懂得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师”？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519页。

⑤ 转见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产党领导下的抵抗力量最终解除武装，党的领导人加入政府，走上议会道路，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在雅尔塔及其以后明白承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再三表态支持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是这一政策在远东的延伸。[①]希腊共产党的遭遇，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斯大林的观点，即二战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只能而且应该由苏联或者英美的军队来决定。共产党发动的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革命，都必然会遭到英美军队的武装干涉，最终归于失败。

熟悉列宁著作的读者都会了解，斯大林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出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列宁的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也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②] 为此，列宁当时不仅坚决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还采取了积极推动欧洲革命的方针。不过，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道理，而且依据斯大林的逻辑，也并非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上述立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在回答有关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就曾清楚地表达过他的看法。他当时写道："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保证来摆脱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企图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特别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其一是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其二是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③]

---

① 转见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4 页。

② 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80—82 页。

③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8—169 页。

不难看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和通过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保护苏联的目的，始终是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强大军队和在几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并突出强调其意义，更多的只是因为历史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而这与列宁通过推动欧洲革命来巩固本国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显然，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给红军提供了大举进入东欧各国的机会，依照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条件，要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尚不知何年何月。因此，斯大林非常看重这一机会，也生怕任何无序的革命会毁坏了共产党人盼望了20多年才得来的这一系列胜利成果。更何况，要医治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创伤，使苏联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国，以追求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化，在完全有可能利用战时与英美达成的谅解，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下，他也绝不愿意把苏联拖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当中去。[①]

相信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不仅要求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而且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无条件服从它的一切需要，这是生活在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念之中的斯大林认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斯大林多少遍地把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也不论斯大林多少次地把自己说成是俄罗斯（或者说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我们都很难把他简单地等同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者，很难简单地说他这时只是在谋求俄国的民族利益。必须看到，斯大林维护的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苏联。所谓苏联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首先是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俄国民族的利益是在其次的。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和决定政策；从来没有忘记苏联根本上不同于现在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

① 根据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可知即使在战争期间苏联领导人也从未真正改变过对美英等国帝国主义性质的本质认识，但他们并不主张因此在战后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1944年1月11日苏联副外长迈斯基提交给莫洛托夫的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明确主张：为了争取战后能够保持30—50年的和平局面使苏联治愈战争创伤，推进欧洲的社会主义化，苏联有必要在通过军队向周边国家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同时，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合作关系，为此应避免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因为这会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过于尖锐。报告相信，尽管美国是最具进攻性的帝国主义堡垒，但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需要扩张的地区十分广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可能与苏联妥协的。

从来没有忘记他和大大小小的丘吉尔、罗斯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二战后苏联的走向，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鼓励其他国家革命，它都不可避免会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特别是与一心想要在全世界充当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陷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之中。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摩擦可谓层出不穷。这边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难平息，那边苏联又向土耳其提出了领土和海军基地的要求，力图控制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拥有黑海的出海口；向伊朗提出了获得其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以确保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达到目的，苏联甚至不惜在沿土耳其边境的伊朗和保加利亚一侧调兵遣将对土耳其示以武力威胁，在伊朗则采取拖延撤军和扶植亲苏的分裂政权的办法以相要挟。[①]

不仅如此，苏联在远东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5月8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大批苏军如约开始向苏联远东地区集结，准备投入对日作战之后，斯大林对占领中国东北较前也更加充满了信心。既然苏军将要占领中国东北，依照“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逻辑，苏联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从苏联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斯大林不会为此去违反与英美达成的协议。毕竟，雅尔塔协定涉及到不少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美国政府遵守协定才可能落实的有关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等领土的重新归属等问题，苏联方面对协定的任何变更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但是，轻易地根据协定中的主权规定就把东北交还给国民党，斯大林也心有不甘。因为国民党过于亲美，而美国一旦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进入东北，对苏联的安全不能不是一种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7月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措辞不严密的空子，提出了许多大大超出协定规定的具体条款的要求，并且以中共即将进入东北相威胁。[②] 斯大林新要求的实质，说到底，其实就是想要逼迫国民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中国东北主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

① 参见张盛发：《苏联与战后初期的中近东危机：缘起与结果》，1999年3月20日首都师范大学“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散发论文。

② 有关斯大林过分要求的细节可详见邹谠的解说。邹谠前引书，第240—241页；并见FRUS，1945，Vol.7，pp.967－969.

围绕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公开出面加以干预[①]，这使中苏谈判多少有些起伏。但斯大林最终还是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斯大林很清楚，一旦百万苏军跨过中苏边界，到时候苏联还可以有所作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当然，基于雅尔塔协定的约定，斯大林也做出了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承诺。[②] 并且在签订了条约之后，斯大林还专门致电毛泽东，要求后者立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③] 斯大林这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很清楚，只要东北能够基本控制在苏联的手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与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一样，都不应该爆发革命，因为这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可能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影响苏联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此，毛泽东完全可以向法国共产党学习，而没有必要像希腊共产党那样自讨苦吃。当然，斯大林没有想到，美国人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行事，好在毛泽东也是自行其是。结果，斯大林不能不感谢毛泽东，因为他纯粹是意外地获得了牵制美国的重要筹码。

六、美苏在日本和中国问题上的冲突

还在德国刚刚投降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明确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定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不仅外蒙、满洲、朝鲜都将逐渐纳入其轨道，整个中国，甚至日本，最终也将受其控制。[④] 随后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坚持要控制东北铁路和大连主要行政权，并且要依照沙俄的旧例划定军事区的种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敌意进一步加强。正在莫斯科的戴维斯和已经调赴华盛顿担任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的文森特，都明显地改变了过去

① 参见 FRUS，1945，Vol. 7，pp. 960 – 965，965 – 966.

② 综合蒋介石给宋子文的指示，可以看出蒋对苏联的中心要求即在中共问题上。前引战时外交（二），第 593—594，596，621 页。而美国的态度虽一度强硬，但苏军进入满洲后，也明显软了下来。可对照美国政府 8 月 5 日和 11 日给哈里曼的指示电。FRUS，1945，Vol. 7，pp. 955 – 956，969 – 970.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8 页。

④ FRUS，1945，Vol. 7，pp. 869 – 870.

的观点。戴维斯多少有些悲观地预言：中共看来必定会在苏联的轨道上运行。而有了中共的支持，苏联无疑会在远东，特别是会对满洲、华北和朝鲜采取行动。而文森特则提议，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反对蒋介石对苏联做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最终在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也会处于比现在更有力的地位。① 此前始终主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方，这时的态度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命令麦克阿瑟务必独占日本和朝鲜南部，以闪电动作阻止苏军进入，而且主动制定了一个帮助蒋介石占领包括上海、烟台、秦皇岛在内的几个重要港口的计划。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甚至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大连和旅顺港之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更是声称：原子弹的其实炸给苏联人看的，为的就是可以使民主国家在外交上获得一种急需的均势，以对抗共产国家战后的庞大势力。②

1945 年 8 月 9 日，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总共 150 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向满洲日军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美英中三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但要求不损害天皇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眼见俄国人已经大举攻入满洲，一直没有就此松过口的杜鲁门这时改了口，说是由于俄国人正在深入满洲，有可能乘势占据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共，因此批准就此做出妥协，以限制苏军南进。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紧急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发出指示，要求美军除了要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以外，还应该迅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关键地区。强调美军占领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而为了避免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赶不及调运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要麦克阿瑟转告日本人，威胁说，任何向中共交

---

① 戴维斯前引书，第 405—406 页；邹谠前引书，第 247—248 页。

②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 页；James V. Forrestal,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by Walter Millis, New York 1951, pp. 202 - 203; Current Richard,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37.

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1]

美国对苏态度转为强硬，还进一步直接反映在9月11日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莫洛托夫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而最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削弱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9月24、25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结果，二战刚刚结束，几大国外长会就开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2]

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或多或少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战后参加占领和管制日本对苏联未来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单独占据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想不到如今美国却必欲排斥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开始调整了其对中国东北的政策。[3]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

还在8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就急于派兵进入东北，但始终无法与苏联取得协商，不清楚苏方态度，因此只能派临近东北的地方部队就近与苏军接触。苏军当时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因无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虽一般表示友好，并明显同情中共而厌恶国民党，但碍于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条约，尚不敢公开承认和帮助

---

① 邹谠前引书，第270页。

②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172—188页；Sumner Welles, Where are We Heading? New York, 1946, p. 380.

③ James Matray, Captive of the Cold War, The Decision to divide Korea at the 38th Parallel,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0, no. 2, May 1981, pp. 145 - 168.

中共武装。9 月中旬，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军开始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部分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苏军代表并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考虑到苏联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取放任态度。[①] 而这时进入到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苏军，更是主动派出代表与八路军接洽，要求八路军准备接防苏军即将撤出的地区，并全力加以控制，战略中心千万不要南移，以免国民党占领这些地区后再度割断双方联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援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也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②] 很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虽然未必愿意让中共大举开入东北，但至少是希望中共军队能够沿着苏联自认为的东北势力范围之外的长城一线，构筑起一道防波堤，从而便利苏联，牵制国民党。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中共中央才得以在9 月中旬提出和制定了对中共此后军事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占据东北[③]。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

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美军在既无条约做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 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其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了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迅速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更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不能不进一步刺激了斯大林，其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

---

①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4 日。

②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7 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 年 9 月 20 日。

③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8—279 页；《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8 日。

势力占据东北的意图更加明确。

10 月 3 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多名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刚刚到达东北不久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他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东北局鉴于对控制全东北把握不大，强调要做背靠苏蒙朝三国边界的军事部署。苏方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 15 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部署 10 万部队，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他声称："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①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4 日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这次会谈后不过两周时间，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足够装备将近一支十几万人的部队。其中步枪约 10 万支，轻重机枪约 3400 挺，掷弹筒约 500 个，大炮 100 余门，各种弹药将近 2000 万发。②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刚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当机立断，决定依目前部队调动情况确保山海关一线虽暂时做不到，但仍可按照苏方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③

为协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这时可以说也是尽其所能。它先是不顾美蒋方面的外交交涉，拒绝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然后把美舰可能登陆的东北营口和葫芦岛两地转交中共军队接收，宣称苏军对两处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将概不负责；同时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

---

①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 年 10 月 3 日。

②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4 页；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 2 集，第 228 页；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44 页。

③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364 页。

交给中共；还将中共武装引入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布防，要其严防国民党军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苏军代表10月25日甚至通知中共东北局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手干。"如果国民党军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敢于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关内作战的军事形势也明显对中共有利，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这一十分强硬的政治主张，主张公开宣布："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①]

但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料到国民党会以退为进，发动外交攻势。11月17日，眼看大批中共军队开入东北，苏军处处掣肘，接收东北已成泡影，国民党派往长春与苏军接洽接收行动的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蒋介石并将苏方违反条约的行为告到了杜鲁门那里，美国海军因此也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弄得15日刚刚开始的苏军撤退行动不得不中途停止不说，还被迫紧急向大连空投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先前已放弃的营口重新布防。

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波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在确保苏联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对苏联才是有利的。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势将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两军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改变。苏军代表很快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②] 结果，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改变了刚刚确定了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它明白告诉东北局：现在方针必须顾及苏联国际信用，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据此，中共中央

①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条件致周恩来等电》，1945年11月3日。
②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8日。

放弃了独霸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①] 不论这种改变与变动的内容中共是否都那么喜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苏美关系变动而造成的莫斯科对国民党的严重不信任，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强大的实力支持（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相当部分地区）和重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共获得了渴望已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

尽管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变化，苏美关系并未因此好转而是渐趋恶化。

1945 年 11 月 17 日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当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苏军公然支援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严重情况，并且声称：“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②] 魏德迈对这种情况也有着更加清楚的说明与估计。他报告称：目前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十分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而苏联明确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形势，为此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层层障碍。事实上，中国已经变成“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大陆。但是，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就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势必要动用大量的美国军队，而这无论从美国国内民众的愿望来看，还是从美苏关系的全局来看，事实上又是办不到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除非蒋介石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否则他不仅不可能得到东北，

---

①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19 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线开展东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电》，1945 年 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429—432 页。

② 电报称：“当日军投降时，东北诸省原无中共军队，此一事实即斯大林元帅亦曾予以证实。彼于八月下旬与哈利曼大使谈话中曾经如此申说（该谈话经赫尔利将军告余）。最近东北诸省境内有大部中共军队存在，自系由于苏军之支援。”苏军并且“使中共军队人占营口、葫芦岛等港口，以阻挠中国军队在该各地登陆。”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一），台北 1981 年版，第 149页。

就连控制华北也难。[1]

显然，美国政府并非不了解苏联已经在支持中共。[2] 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即使是其中最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也没有人主张像英国在希腊那样，直接派军队投入到打击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为什么？邹谠的分析有三："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以及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3] 但第一个因素这个时候其实已不复存在，因为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都已看出，中共已经与苏联走到一起去了，不管其性质或意图如何，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对美蒋有利。第二个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时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以及此后美国支持的某些反共政府，情况未必比国民党政府好多少，它们不是照样为之出兵？说到底，第三个因素才最重要的，这就是，美国这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涉及到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近东，中国远在其次。因此，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有可能要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何况美国是个不得不注重民意的国家，二战后的美国民意是渴望和平，美国的政客们都极力在要求政府裁军问题上做文章，以争取选民的好感。这也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4]

美国不能采取军事的方式阻止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进行扩张，又始终幻想可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牵制苏联，结果就出现了马歇尔出使中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调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根本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解决苏联

---

① FRUS, 1945, Vol. 7, pp. 627－628, 681－684.；《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 1959 年版，第 309 页，转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4—165 页。

② 美国政府始终声称他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证明苏军向中共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但严格说来，这多半只是其避免公开与苏联冲突的一种借口罢了。

③ 邹谠前引书，第 310 页。

④ 根据邹谠披露的资料，美陆军在德国投降时约有 829 万人，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的强烈要求，到 1945 年 12 月，其陆军已削减了将近一半，只剩下将近 423 万人，半年后又削减了一半多，只剩下不足 190 万人。一年之后，即到 1947 年 6 月，美国海陆空三军全部加起来也只剩下了不到 100 万人。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即使在对苏联的恶感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很少有人赞成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邹谠前引书，第 317—318 页。

最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独占日本后苏联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问题。不仅如此，就在马歇尔使华的几乎同时，苏联为了能够既不违背其外交承诺，又能有效地阻止美国插足东北，别出心裁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苏在中国东北实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对此，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抵制，有意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把谈判代表张嘉敖派到华盛顿去走一圈，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自然更是从中作梗，声称："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坚持"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表明了必欲插足东北的决心。[①] 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不仅正式向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扬言"中苏政府就满洲的工业进行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歧视了美国人，而且与英国一起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致使苏联遭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抨击，把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严重受挫。[②]

斯大林这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逼着国民政府摊牌："你们要么和我们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在美苏之间必须做出选择。而要倒向苏联，仅仅不许美国人沾指东北还不够，还不能让美军驻在中国。他明确告诉这时到莫斯科去的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③] 这话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即苏军此前之所以联合中共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了。只要驻华美军不走，苏联就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痴迷不误，跟定了美国，这自然也就使苏联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与国民政府在东北合作的希望。

马歇尔使华的头两个月，正值苏联寄希望与国民党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过程中。因此，苏联政府虽拒绝参加调处，对马歇尔使命倒也没有表现出反感。美英苏三国 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反而比 9 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显得气氛融洽，会议公报中美国甚至和苏联一起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双方都要尽早从中国撤军。[④]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利用美苏这种暂时的并且是表面的"合作"，左右开弓，一时间也成功地促使国共两党互相有所妥协，达成了一

---

① 《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五）》，《传记文学》，第 36 卷第 4 期。

② 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卷，第 617 页。

③ 哈里曼前引书，第 600 页；FRUS，1945，Vol. 7，pp. 848 – 859；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 1973 年版，第 15 页。

④ 在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曾反复就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质疑，坚持要美国说出撤军时间。FRUS，1945，Vol. 7，pp. 841 – 844，845 – 846；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22—323 页。

纸停火令和几个政协文件。但从1946年2月份美苏因中苏经济合作谈判而引发一系列冲突之后，美苏间敌对气氛明显加剧，国共妥协的趋势自然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2月间美苏关系恶化的最典型的反映，是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力主全面遏制苏联的著名长电，和苏军再度鼓动中共在东北抵抗国民党。凯南22日的这封电报对华盛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致成为一年后美国对苏冷战政策的基本依据。凯南在电报中断言，苏联领导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绝不相信苏联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从苏联正在遭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观点出发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切方法，包括参与国际活动和暗地里搞颠覆与离间，来削弱西方和加强自己。美国政府和人民绝不应再对苏联抱有任何幻想，应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坚定自己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信仰，并用以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不使共产主义有可乘之机。[①]

就在凯南发出这封电报的当天，苏军代表再度找到中共东北局，一面说明苏军主要负责人希望与东北局负责人见面，一面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说：苏方正全力争取在除大连、旅顺外的整个东北插足，与国民政府谈判经济合作，就是为了迫使其承认苏方在东北的地位。但苏方努力必遭美蒋阻挠，为此中共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中共在武器方面有任何要求，苏军都将尽可能给予满足。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和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做进一步研究和磋商。在第二天双方负责人的会见当中，苏方更进一步表示：过去苏军因顾虑与美国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较软，如今态度已变。苏方不论与国民党的谈判成功与否，支持中共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的目标将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②]

---

① 转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2页。

②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2月23日。

美苏之间的冲突在1946年2月以后已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这时也开始发生争吵。在中近东，双方更是剑拔弩张。在土耳其，因为怀疑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竟采取了强硬的炮舰政策，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开抵土耳其以访问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苏联撤军，苏联心有未甘，坚持要成立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但美英态度强硬，苏联极感被动。

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十分明显地促使国共两党的态度都迅速强硬起来。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军队国家化方案实际采取抵制态度。国民党也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蒋介石甚至还乘机公开煽风点火，告诉美国记者说，美国应当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①] 面对这种情况，苏联终于开始不顾外交条约，还美蒋以颜色。

3月8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交接，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苏方行动似乎并未引起美蒋的恐慌，蒋介石由于已经有5个军左右开入东北，因此态度倨傲，十分强硬，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同关内一样的停战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三方意见发生分歧。东北局力主夺取全部苏撤区，不怕与国民党大打；负责与马歇尔谈判的周恩来等强调长春路及其沿线存在接收问题，主张让出以实现停战；毛泽东意识到东北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愿意和平，但只同意将已占领的部分苏撤区让给国民党。苏方明显对中共方面的这种态度不满，苏军领导人在会见高岗时特别问：你们为什么答应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听说你们中央对美国人很客气，为什么？[②] 据此，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按照苏军愿望，争取控制自四平、本溪以北的大半个东北。他因此提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③]

4月初，苏方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

---

① 前引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26—427页；FRUS, 1946, Vol. 10, p. 166.

②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0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3月1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3日；《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

③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

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并且说明，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①] 而为了帮助中共作战，苏军还进一步向东北局转交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以上，各种炮也有上千门之多。根据苏军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开始在东北做出全面部署，拦截国民党军北上的阻击战迅速在四平和本溪打响。14 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9 日，得知部队完全占领长春后，毛泽东十分兴奋，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要准备以长春做我们的首都，首先成立东北自治政府。[②]

1946 年 4—5 月间，国共之间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战。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的"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的四平守卫战历时一月有余，最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推进，但苏方对此次作战评价甚高。在长春得而复失后，苏联政府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甚至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不管。此举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与此不无关系。[③]

这时，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苏方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并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 5—6 月里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 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 100 多车皮。1947 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矛盾变成对抗冲突。两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即在全球的主要地区展开激烈争斗。

就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美苏还在中近东进行着激烈地较量。欧洲的

---

①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 年 4 月 3 日。

②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 年 4 月 19 日。

③ FRUS，1946，Vol. 10，pp. 1046 - 1047；Vol. 9，pp. 1042 - 1044，1082 - 1083.

战略地位，中近东的石油，所有这些都更直接地牵动着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开始全盘接受凯南的“遏制”理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秘密拟定了“对于一旦爆发对苏战争的计划”。问题是以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苏军兵力上在欧洲明显占据绝对优势，在远东更是大大强于美英。军方估计，届时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①] 这种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只能是极其有限的，而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在与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中日渐陷于被动。当然，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就越是容易感觉到苏联威胁之可怕，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所共有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神经就会绷得越紧。美国全面对抗和遏制苏联的政策的出台，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总之，美苏从战时同盟转变为冷战对峙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既是两国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也是二战以来两国在欧洲亚洲的战略利益对撞的结果，其中，两国在中国问题上从妥协转为对抗更造成相互关系的全面恶化，最终导致冷战的爆发。

---

① 华庆昭前引书，第 97—98 页；《新华日报》，1946 年 9 月 12 日。

第三章　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和两国关系的新变化

一

1950年代，美苏关系出现新变化。两国从不断加剧冷战对抗开始走向对话，寻求缓和。这一转变同赫鲁晓夫调整对美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一方面，苏联空前强大。它直接与美国冷战对峙，并领导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全面对抗。它的影响更扩及世界各地，众多亚非国家争相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与声誉，达到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另一方面，苏联重又陷入帝国主义孤立包围的困境之中。它同美国的冷战对抗关系不断恶化。在欧洲，苏联最担心的德国复起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日趋严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更使它备感威胁。在亚洲，东西方的正面冲突——朝鲜战争长期停不下来。苏联没能在联合国中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而对日和约却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出席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无力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行径更引发诸多矛盾和不满。在科技和经济方面，苏联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它没有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遭西方经济封锁和禁运。1946年，苏联从美国进口机器设备18190万卢布；50年代则完全中断两国间的官方贸易。另外，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大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国家发展困难重重，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人均粮食和肉类产量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还达不到1913年沙皇时代的540公斤和31.4公斤。总的看，僵硬的外交政策使苏联受到比西方更大的损失。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耀眼光环日益减退，处境不断恶化。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被削弱。

赫鲁晓夫上台后，继承了斯大林创建的世界一流强国地位。他要维持它，还要发扬光大。但斯大林逝世后，内在的矛盾和危机日渐凸显出来，赫鲁晓夫既无力把存在的问题压制下去，也感到完全按照原样走，付出的代价太大，并不明智。另一方面，苏美冷战给两国都造成巨大伤害，苏美不愿再沿加剧对抗的路线走下去，出现了调整彼此关系的机会。正是在这一错综复杂情况下，赫鲁晓夫开始反思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对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是关于新的世界大战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斯大林在1946年的选民大会上明确提出，“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避免战祸……这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①] 认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②] 因此“斯大林把美国的计划和行动看成是为进行一场全面的侵苏战争做准备。正如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回忆的那样，苏联领导层当时认为，拥有核武器优势的美国最终将同苏联进行一场战争”。[③] 斯大林不仅确认战争是必然的，而且认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因为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忠实维护斯大林观点的莫洛托夫，迟至1957年6月还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我们都懂得并且认为，必须奉行、坚持和加强那些有助于减少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这是我们巩固和平、推迟和防止新战争工作的基础”。[④] 莫洛托夫这里所谓的“推迟”实际是说，世界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只是确定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取得不可避免的“最后胜利”的恰当时机问题。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苏联把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定为准备同它进行一次无法避免的生死战争，认定冷战只不过是走向热战的短期过渡阶段，冷战的僵持和加剧是必然的、可取的。

赫鲁晓夫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进一步说：

---

①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489页。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6页。

③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④ 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事情的趋向是，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①] 赫鲁晓夫认为，以前的战争所以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有两条，一是“资本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资本世界内部的政治经济规律毫无阻碍的作用，使战争会不可避免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如此。二是“不愿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组织得不好的，因而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苏联是采取积极和平政策的唯一的国家，其他大国实际上都在鼓励侵略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又被右翼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搞得四分五裂”。[②] 赫鲁晓夫认为，这两个因素在50年代已不复存在，帝国主义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体系，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有一大批国家和工人运动在积极反对战争。此外，赫鲁晓夫还特别注意到核武器这个全新因素。在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他还说，“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 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③] 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毁灭力量改变了战争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在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④] 因而它对战争发动者是一个巨大威慑。由此，赫鲁晓夫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观点，并认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调整同美国的关系是可能的，必要的。

在否定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观点后，苏美之间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能否和

---

① 《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页。

② 《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40页。

③ 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3年1月16日）。（苏）《真理报》，1963年1月17日。

④ 《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第25页。

平共处便成为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斯大林也曾讲过，“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①] 但他把苏美间的对立矛盾绝对化，认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共同利益，说“资产阶级国家……包围苏联，等待时机来进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实力和削弱它……要知道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②] 1945 年莫洛托夫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充当莫洛托夫和杜勒斯翻译的多勃雷宁谈到当时情况时说，“我感觉到这几乎是一场聋子和瞎子的对话”，“他们根本不想摸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也不想用传统的秘密方式讨论细节问题。莫洛托夫和杜勒斯根本不愿采用传统的外交方式、平等地相互交换意见”。[③] 斯大林实际不承认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最多是把和平共处视为策略安排、暂时的休战，视为揭露美国好战本质的手段，麻痹帝国主义、推迟战争的工具。他以非赢即输的心理判断处理国际事务，使苏美两大国间的冷战对峙不断加剧。赫鲁晓夫力图改变这一现状，专门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问题，并特别强调它的必要性。他说：两大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发展，“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④] 和平共处是除了毁灭性战争以外的唯一选择。其次，赫鲁晓夫认为实行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因为它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全人类利益的需要。他说，“我们拥护和平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全世界全人类”。[⑤] 从经济角度看，“东西方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存在于世界各个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如能在正常条件下得到发展，它可以使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国际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优越性”。“对外贸易是顺利发展和巩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健康的和牢固的基础”。[⑥] “我们主张在生产方面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⑦] 从政治角度看，赫鲁晓夫认为，不应该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处理国家间关系混为一谈。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

---

① 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苏)《真理报》，1952 年 4 月 2 日。

② 《斯大林文集》，第 140 页。

③ 多勃雷宁：《信赖》，第 30 页。

④ 《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第 38—39 页。

⑤ 《赫鲁晓夫言论》，第七集，第 302 页。

⑥ 《赫鲁晓夫言论》，第八集，第 292，286—287 页。

⑦ 赫鲁晓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迫切问题》，《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 年第 9 期。

的分歧和阶级分歧过去存在，今天存在，将来还会存在……让我们不要用发动战争的办法，而用和平竞赛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分歧”。[①]“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我们一向断定说，而且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事情”。[②] 第三，赫鲁晓夫认定，苏美间的和平共处将是长期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他说：“谈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国际关系，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矛盾排除在外（这是社会发展的矛盾，因此在这里我把它们排除在外），那么老实说，我们没有产生严重争执的理由。我们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直接冲突。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经济方面。况且苏联和美国——这是在自然资源方面有良好保证的两个国家，它们拥有众多的居民，发达的工业和科学。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共处”。[③]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乐观地宣布，“在当前条件下，已经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争取到一个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④] 第四，赫鲁晓夫指出，“两种体系和平共处——这本身也是一种妥协，是一种相互的让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中的社会经济体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直接对抗的体系。因此，我们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按照列宁关于共存的原则去做。也就是说，要妥协。其中也包括他们不得不容忍和承认我们的体系，我们也不得不容忍和承认他们的体系，这是相互的让步”。[⑤] 他为和平共处规定了特定内涵，指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筑在双方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⑥]“不干涉彼此的内政、承认主权、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这就是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的涵义”。[⑦] 不仅如此，和平共处还要求发展经济和

---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十集，第 215 页。

② 《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第 38 页。

③ 赫鲁晓夫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尔斯的谈话，（苏）《真理报》，1962 年 4 月 21 日。

④ 《苏联共产党第 22 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69 页。

⑤ 《赫鲁晓夫致卡斯特罗的信（1962 年 10 月 31 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9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59 页。

⑥ 《赫鲁晓夫言论》，第十三集，第 20 页。

⑦ 赫鲁晓夫答美国评论员苏兹贝格问。（苏）《真理报》，1961 年 9 月 10 日。

文化合作。他说，共处“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用一堵高墙把彼此隔开并相互承担义务不把石头扔过墙去，也不互相泼污水。不，和平共处——这不是仅仅在没有战争但经常保持战争威胁的情况下的平平常常的并肩共处。和平共处可以而且应当发展成为在最好的满足人的一切需要方面的和平竞赛”。[①]“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②]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和平共处。他说：“既然正在进行着阶级斗争，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谁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和平共处，他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背叛社会主义，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道路”。[③] 总之，赫鲁晓夫特别推崇和平共处，说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不仅是休战而且是合作与竞赛。它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唯一正确选择，是“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④] 是“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⑤] 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成为他改变过去的僵硬外交政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调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的理论依据。

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是对斯大林外交理论的重大突破，但也仅此而已。赫鲁晓夫不是理论家，没有创造出新的完整理论体系。他主要靠直觉，靠经验主义的观察，提出自己的大胆想法和观点。另一方面，他又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政治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斯大林一伙”中的忠实活动家。[⑥] 因此赫鲁晓夫在很多重要方面依然是继承了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即认为资本主义是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它很快就会灭亡，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促使这一进程迅速实现。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陷入总危机中，“很像快要淹死的人”。赫鲁晓夫则因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特别是人造地球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而更加对前景乐观。1961 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

---

① 赫鲁晓夫：《论和平共处》，(美)《外交季刊》，1959 年秋季号。

② 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苏)《真理报》，1962 年 1 月 3 日。

③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 1963 年 6 月全会上的讲话，(苏)《真理报》，1963 年 6 月 29 日。

④ 赫鲁晓夫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1961 年 7 月 5 日），(苏)《消息报》，1961 年 7 月 6 日。

⑤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1960 年 9 月 23 日）。(苏)《消息报》，1960 年 9 月 24 日。

⑥ 转引自：罗伊·梅德韦杰夫著，述韬译：《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 页。

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资本主义开始发生总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及亚洲一系列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展开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这一危机的一个新阶段，即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帝国主义进入了没落和灭亡的时期。资本主义已从根基到顶峰，包括它的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瓦解过程中”。① 从战胜美帝国主义这一立场出发，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定位基本仍是承袭斯大林时期的。第一，苏美关系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尽管赫鲁晓夫认为苏美有某种共同利益，并提出同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但从本质上讲，他并未把和平共处视为寻求苏美利益均衡的政策。他的目标仍是要打败美国，只是在斗争策略上做了改变，或者说他比较清醒地看到苏美力量的差距，在斗争手段上采用更灵活多样的方式，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对话谈判，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让步和友好表示。但当形势发生他认为对苏联有利的变化时，又会毫不犹疑地发动进攻甚至是冒险的进攻。第二，军事实力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尽管赫鲁晓夫认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否定用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的办法埋葬帝国主义，但他迷信核武器，认为核竞赛、核威胁是对付美国的最有力的武器。第三，国际事务是由大国决定的，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基地，理应主宰世界潮流，管理全球秩序。赫鲁晓夫虽然承认过去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不平等之处，但强调世界重大事务都只能由美苏两家决定，根本无视其他现实存在的力量。赫鲁晓夫说，“如果把国际紧张局势这件事说得确切一点，那么显然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件事也可以形象地来说明，就好像一棵甘蓝一样，必须一层层地剥掉它的叶，才能剥出它的心，在我们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个剥去各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最后也会发现问题的心，这就是我们两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② “两国的态度，对国际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③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说的更具体，“没有美苏之间的相互谅解，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国际冲突，不能就任何一个重要国际问题达成协议……即使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没有在这一或那一地区发生直接冲突的

---

① 《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82页。

② 《赫鲁晓夫言论》，第六集，第305页。

③ 《赫鲁晓夫言论》，第七集，第182页。

情况下，那里的事态发展也不会不受苏美关系状况的影响”。[①] 赫鲁晓夫特别看重苏美首脑的直接会谈，说“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问题。只有他们才能扫清国际关系中多年来由于‘冷战’而造成的障碍和不正常的现象”。[②] 赫鲁晓夫依然是用斯大林的大国霸权主义思想来分析处理苏美关系问题。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外交思想既有否定又有继承，这就需要把二者协调起来，但是赫鲁晓夫没能做到这点。苏联虽然在冷战中处于劣势，受到的损害也较大，可是它的半军事封闭体制比较适应冷战环境，领导人也习惯于和善于在对抗中处理外交事务，维护自身利益。赫鲁晓夫正确否定加剧美苏冷战对峙的做法，提出缓和国际局势的思想，但他要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中战胜帝国主义，而且要在近期内战胜。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是一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缓和从长远看是对苏联有利的，但也将使苏联面临新的困难和潜在的危险。苏联要想通过缓和改变其劣势地位，就要调整它那适应冷战的体制和领导方法，就不能只发展军事力量而要提高综合国力。赫鲁晓夫虽然进行了一些经济和内政方面的改革，但远不能适应外交的需要。他经常被那些沿旧体制发展而获得的军事成果所陶醉，更加忽视外交与内政配套的问题。总之，赫鲁晓夫的外交思想对斯大林的旧框框有重大突破，有引人注目的创新，有转折性变化，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维持传统的观点，新旧混杂，相互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其思想体系不成熟、不完整，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苏美关系错综复杂，不断出现反复倒退，但终于迈出了调整苏美关系的一大步，开启了冷战走向缓和的新篇章。

二

赫鲁晓夫由于其外交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其个人性格的特性，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总的趋势是走向对话妥协，但不时出现反复曲折。其

① 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12 月 13 日）。（苏）《消息报》，1962 年 12 月 14 日。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届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 10 月 31 日）。（苏）《消息报》，1959 年 11 月 1 日。

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3—1956年。

斯大林逝世时后，苏联外交开始进行调整。最初，赫鲁晓夫分工管理党务，很少干预外交事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可夫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负责主持政府工作。他们着手缓解东西方对抗，推进国际局势缓和。1953年5月30日，苏联政府宣布放弃对土耳其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地的领土要求，主动改善两国关系。7月20日，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7月27日，促成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1954年1—2月，多年未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重又举行。正是在这一系列缓和措施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开展了进一步的外交调整。

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开始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1954年1月，他在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上致开幕词，说“列宁首先指出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我们的党和苏维埃国家始终不渝遵循着列宁的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①] 这一年9月29日，他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的庆祝活动，并同中国签订了众多协定。这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领导外事活动。他把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都排斥在政府代表团之外。赫鲁晓夫还用外事问题打击竞争对手。1954年3月12日，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竞选演说中称“考虑到现代战争的手段”，苏美之间的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终结”。[②] 赫鲁晓夫马上做出反应。在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同莫洛托夫一起对马林科夫进行了尖锐批评，迫使马林科夫发表声明，称任何西方发动的原子侵略都将被“同样的武器摧毁”，并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垮台”。[③] 1955年1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又对马林科夫进一步进行斥责，称马林科夫暗示热核战争可能毁灭世界文明，是“理论上错误，政治上有害的原理”。[④] 2月，联合莫洛托夫把马林科夫从政府首脑的职位上驱赶下来。赫鲁晓夫日益成为苏联对外关系的决策人。此后，赫鲁晓夫又不断打击观点传统陈旧的莫洛托夫，逐渐把他排除在外交事务决策圈之外。赫鲁晓夫在反对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过程中观点左右摇摆，这主要

---

① 《人民日报》，1954年1月22日。

② 《真理报》，1954年3月13日。

③ 《消息报》，1954年4月27日。

④ 转引自：安德烈·马林科夫：《我的父亲马林科夫》，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掌握外交大权后，便加快了东西方对话缓和进程。1955年5月15日同美英法一起签订对奥和约。7月18—23日，大国首脑会议在中断十年之后重又在日内瓦举行。9月13日，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总之，这一时期是赫鲁晓夫了解熟悉外交事务，逐步掌管对美政策的时期。他的外交思想路线主要是继承马林科夫等人的，他的言行因其本身的局限和政治斗争的影响也有摇摆，但基本走向是清楚的，那就是由对美的全面对抗转向对话，进而寻求某种妥协。他为此做出了努力，并在苏美关系中的次要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为下一阶段的方向性变化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是1956—1962年。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和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观点，从理论上突破斯大林的外交传统，开始全面推行自己的外交路线。

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特别注意调整对美关系，把改善对美关系视为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他提高苏联国际威望、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地位的有力手段。1958年1月27日，苏美两国签订了文化、技术和教育协定，并公布了一项联合公报。这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交流和理解的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这年4月，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准备同他进行最高级首脑会谈。1959年9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25—27日，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三天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对这次首脑会晤寄予极高的希望，说"苏美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很好地并肩作战反对共同敌人，击溃敌人。在和平的环境中，我们两国人民更有理由、更有可能友好和合作"。[①] 苏美应合作努力，"我们应当达到主要的目标是为地球上所有的人保障和平的生活条件"。[②] 同时，说艾森豪威尔是"大人物"，"也是希望找到共同的语言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的"。[③] 会晤中，双方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但各自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互不让步也互不相信，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事后，苏联却对这次会晤大加赞扬，称"戴维营精神"标志"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是国际关系

① 《人民日报》，1959年9月17日。

② 同上，1959年9月16日。

③ 同上，1959年9月17日。

的“新纪元”。上述言论，一方面是赫鲁晓夫在有意宣扬和平共处政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赫鲁晓夫对苏美对立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美国总统和戴维营会晤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盼。但这次出访终究是苏联政府首脑自建国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是打破外交僵局的尝试。它增加了相互了解，改善了苏联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揭开了战后苏美最高领导人频频接触、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序幕。

赫鲁晓夫访美期间，艾森豪威尔正式接受访苏邀请，安排在来年进行。苏美首脑还就举行四大国最高级会晤达成了协议。经过来往信件协商，最终决定于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赫鲁晓夫非常得意，说访美“打碎了使我们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①] 苏美关系将会不断改善。但U-2飞机事件把这一期盼打碎了。1960年5月1日，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拍照，被苏军击落。赫鲁晓夫严厉谴责了这一侵略性挑衅行为，并警告美国军国主义分子，“对一切企图用压力取得有利于侵略者的解决办法的人，苏联是有能力进行回击的”。[②]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极力把艾森豪威尔和这次U-2飞机入侵事件区别开来，表示“愿意相信总统对派遣这样的飞机入侵苏联的事情一无所知”，企图把“戴维营精神”继续下去。不想，艾森豪威尔却狡辩说，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对苏联这样一个封闭社会进行侦察飞行。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态度十分气愤，但仍于5月14日飞往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主意，将原定对U-2飞机事件进行严厉谴责变为要求美国就此事件正式道歉，否则就抵制巴黎会议。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会议流产。苏联随之撤销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赫鲁晓夫从此不再同艾森豪威尔打任何交道。1961年美国新总统肯尼迪上台。赫鲁晓夫重又燃起通过最高级会晤缓解两国关系的希望。6月3—4日，同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会谈。双方意见针锋相对，赫鲁晓夫缺乏足够的耐心去寻求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总之，赫鲁晓夫在苏美冷战对峙形势下，开创了两国首脑直接会谈的先例，这是他推行对美和平共处政策的一项积极成果。但具体进展十分有限，赫鲁晓夫

---

① 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页。

② 《人民日报》，1960年5月7日。

在 U-2 飞机事件后认为，美国总统“不单单是一个希望在地球上活下去的人，而是一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背信弃义、不共戴天的敌人”。① 只是在古巴危机后，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的看法才有所改变。苏美两国首脑彼此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和某种信任。首脑会谈日益成为苏美两国解决双边关系和国际争端问题、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途径。

赫鲁晓夫在推行对美和平共处政策时特别关注德国以及核武器问题，力图在这两大核心问题上取得进展。他提出各种倡议，时而让步时而进攻，时而会谈时而冒险行动，引发了历史上最危险的冷战事件——1958—1961 年的柏林危机和 1962 年的古巴危机。

赫鲁晓夫在 1958 年提出柏林问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担心东德经济会因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逃往西柏林西德以及西方的经济封锁而崩溃。其次，担心西德军国主义再起。1957 年春天，西德总理阿登纳和国务秘书布伦塔诺同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会谈时，宣布联邦德国有权成为核国家。1958 年 3 月，西德议会又通过了以原子武器武装本国军队的决议。苏联对此十分不安。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更不断警告说联邦德国有向东方首先是向东德采取大规模经济行动甚至军事行动的可能性。② 赫鲁晓夫担心，不在柏林问题上采取行动，将会失去东德，危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认为西柏林处于东德包围之中，是美国的弱点。他说，“美国插在欧洲的那只脚有一个发痛的水泡，这就是西柏林。随便什么时候我们想要踩一下美国人的脚，叫他感到疼痛，我们只要切断西方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同这个城市的交通就行了”。③ 美国不会为柏林问题同苏联开战。同时柏林是苏美严密控制地区，也不会因偶然事件引发大战。赫鲁晓夫认为可以在柏林问题上对美国施加压力，谋求利益。但他并不想像 1948—1949 年柏林危机时那样，用封锁扼杀的办法以武力夺取这座城市。他试图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解

① （俄）谢·赫鲁晓夫著，郭家申等译：《导弹与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88 页。

② （俄）ЦХСД（现代文献研究保管中心），ф. 5，оп. 50，д. 70，л. 233、引自：Зубок，В.、Водопьянова，З.：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8 – 1962（苏联外交和柏林危机，1958—1962），载于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М. 1995. с. 262。

③ （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 746 页。

决问题。认为“奥地利模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鲜明榜样。可以保留西柏林的“特殊”地位，逐步把它的经济纳入东方市场，使其加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体系，进而使西方承认民主德国和战后欧洲边界，缓和和消除欧洲大陆军事对抗。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赫鲁晓夫对解决西柏林问题的信心陡增。莫洛托夫等人曾指责赫鲁晓夫不关心苏联的威信，破坏了所有使苏联成为伟大国家的东西。1958年夏天起就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外事助理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根据他的印象，“莫洛托夫的阴影”和责备声一直追随着赫鲁晓夫。后者要通过柏林问题推翻这一指责。赫鲁晓夫在1958年8月初会见了毛泽东，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领导人不同意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赫鲁晓夫离去不久，中国军队炮轰金门、马祖，掀起台海危机。这些事件对赫鲁晓夫的情绪产生影响。而民主德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引申说：如果中国敢于在它阵地薄弱的地点向“美帝国主义”挑战，那么拥有核武器和弹道洲际导弹的苏联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10月2日，乌布利希在会见苏联驻德大使别尔乌辛时说，“应该注意到，一旦中国岛屿问题降温，就轮到德国了”。为了回答联邦德国的武力压迫，“我们也应该从武装力量立场出发”，并呼吁“展开对西德的进攻”。[①] 正是以上各种因素最终使赫鲁晓夫在一种矛盾心理中挑起柏林危机，他既想同美国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妥协以解救东德危机、缓和欧洲形势；又要摆出强硬架势，谋求超过苏美已往相关协定的好处。既想推进和平共处，又加大威胁对抗，力争压过美国一头。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应结束大柏林的占领制度，苏联将管理东柏林的权力交给民主德国，西方三国也应就西柏林的归属问题与民主德国谈判，放弃对西柏林的占领。13日，美国代表西方三国表示他们无意撤出西柏林。苏联考虑到西方不会接受将西柏林并入东柏林，于11月27日，向美英法三国发出照会，建议“把西柏林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照会宣称，西方三国来往于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现行军事运输制度可在半年之内保持不变，但西方如果不利用上述期限就西柏林地位达成相应协议，苏联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将把西柏林和西德之间交通线的管理权交给东德。这就是说，西方如想继续把军队留在西柏林，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

---

① （俄）ЦХСД，ф. 5，оп. 49，д. 82，л. 200－204. 引自：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 263。

是承认东德，接受它对交通线的管制，或者是诉诸武力，与苏联对抗。美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表示“美国决不会默认苏联单方面拒绝履行其与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式商定的关于柏林的义务和责任。它也不会与苏联签署将最终导致使西柏林人民处于敌对统治下的任何协议”。

赫鲁晓夫相信美国会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提出6个月期限的最后通牒，更能推动这一进程。但专家们对前景的估计则是非常谨慎的。1958年11月，总参情报部向苏共中央报告：如果民主德国侵犯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不排除同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①] 12月底，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两个和平条约的草案——与西方一起同两个德国的条约和单独同民主德国的条约。说西方“自然”不会同意共同的条约，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北约的解散。部长的这一报告实际是对赫鲁晓夫的谨慎告诫：如果同西方国家的谈判进入死胡同，苏联将不得不履行自己给乌布利希的承诺，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②] 赫鲁晓夫开始对事态发展焦急不安。史学家哈里森通过分析东德驻苏大使柯尼希1958年12月4日给政府的报告，认为“赫鲁晓夫宣布将苏联在柏林控制的职能移交给民主德国的意图更多的是威胁西方大国走到谈判桌上来而不是一个认真的打算。虽然作为一种威胁，证明这是非常有用的，但赫鲁晓夫知道实际这样做意味着苏联将把一些对柏林形势的控制权让给民主德国。随着危机的加剧，赫鲁晓夫得出结论，他并不想这样做。这无疑主要基于乌布利希明显企图从他手中抢夺控制权及柏林形势的进一步恶化”。[③]

1959年1月，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出访华盛顿，就消除柏林冲突进行谈判。米高扬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相信，赫鲁晓夫不想破坏西方国家的威信，不想让它们“丢面子”。米高扬说，“我们不想为柏林打仗，我们希望你们也这样”。他建议承认两个德国和西柏林的存在，认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建立联邦是统一的最现实

---

① ЦХСД，ф.5，оп.51，д.2，л.49－52. 引自：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264。

② （俄）АВПРФ（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东德备忘录（0742），оп.3，папка，21，д.33，л.16－19，20. 引自：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264。

③ 参见：Harrison，Hope M. Tra. and Comm：The New Evidence on Khrushchev's 1958 Berlin Ultimatum（赫鲁晓夫1958年对柏林最后通牒的新证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以下为CWIHP Bulletin，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4 No.4。

的道路。然而美国领导人没有把苏联对西柏林的承认看成妥协，而看成是失去阵地。米高扬之行一无所获。[①]

1959年2月，乌布利希给莫斯科寄去了自己关于未来建设西柏林草案的意见。他说："原则上应把西柏林领土看成民主德国领土的一部分"，"西柏林自由城市铁路和水路将成为民主德国的财产"。[②] 这实际否定了赫鲁晓夫的西柏林"自由城市"的方案。

赫鲁晓夫继续对谈判解决危机寄予希望。当半年限期即将届满时，他没有提及同民主德国签署单方面和平条约问题，更没有计划针对西德采取军事政治行动。1959年3月，他表示6个月的期限"是一个大概的日期"。5月11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讨论德国问题，没有取得成果。但东西德代表被允许作为观察员参加外长会议。赫鲁晓夫认为，这是美国承认东德的第一步。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艾森豪威尔承认，不能认为柏林形势是"正常"的，必须进行高级谈判。赫鲁晓夫对谈判满怀希望，表示愿意取消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美国则同意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欧洲的紧张形势趋于缓和。

戴维营会晤之后，赫鲁晓夫对谈判解决问题更有信心，他改变了柏林问题的重点——从"狭隘计划"转向"广阔计划"，即从稳定民主德国形势扩展为解决全德问题。但民主德国领导人对此表示质疑。1960年1月当赫鲁晓夫宣布单方面裁减苏军三分之一员额时，乌布利希对苏驻德大使别尔乌辛声明说，联邦德国可能进行军事挑衅，轰炸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作为回答，除了"轰炸波恩"，我们别无选择。[③]

1960年5月，巴黎会议流产。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完全失望，不再同他打交道。苏联国内更是充满对美敌视情绪。"一切都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报纸大声疾呼，要人们提高警惕，准备反击侵略者"。[④] 德国领导人进一步主张采取行动。统一社会党主席团成员诺伊曼说，"至少有70%的党的积极分子满怀战斗情绪，准

---

① （俄）ЦХСД，ф. 5，оп. 30，д. 300，л. 5－8. 引自：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 265。

② （俄）ЦХСД，ф. 5，оп. 49，д. 82，л. 184－185；д. 174，л. 27－28. 引自：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 264。

③ （俄）ЦХСД，ф. 5，оп. 50，д. 226，л. 25，34，35. 引自：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 266。

④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389页。

备明天就攻击西柏林。当然苏联部队应该冲在前面"。[①] 民主德国工作人员公开谈论即将"清洗"西柏林。说他们只等苏联和中国批准了。

赫鲁晓夫对自己的和平共处政策仍坚信不疑，希望能同未来的美国总统继续谈判。他非常担心自己的政策会被东德领导人打乱。1960 年 11 月 30 日，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同乌布利希会谈，共同确认单独和平条约问题还不成熟。赫鲁晓夫还同乌布利希商定了一个过渡性质的决定：如果西方同意谈判，但要求在西柏林保留象征性的驻军，那么这对苏联和民主德国来说在以后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内是一个可接受的折衷方案。乌布利希被迫答应不单方面对西柏林"首先是柏林占领区通行监督制度"采取行动，承认签订单独媾和条约将"严重触及西方三国在西柏林的利益"。[②]

1961 年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对年轻而无经验的新总统施加压力的机会。6 月 3—4 日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要"毫不拖延地缔结对德和约"，以"肯定欧洲战后形成的局面"并"在合理考虑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也就是使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其地位由四大国或联合国予以保证。赫鲁晓夫在次要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说如果美国不准备同两个德国签订单一和约，可以签订两个和约。但赫鲁晓夫对年轻的新总统再次提出 6 个月的期限。在此之后，苏联将"只同那些愿意签订的国家签订"和约，并规定"西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它与西德的交通问题，"应当根据与民主德国签订的相应协议来解决"。[③] 赫鲁晓夫对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翰·麦克洛伊说，如果西方国家拒绝与民主德国签订条约，那么"你们将没有出入（西柏林）的通道。如果你们的飞机侵犯（民主德国的领空），我们就击落你们的飞机。你们必须知道这点"。赫鲁晓夫还"告诉麦克洛伊，如果他们在德国部署一个师，我们就部署两个师；如果他们宣布动员，我们也同样做，如果他们动员如

---

① （俄）ЦХСД，ф. 5，оп. 50，д. 226，л. 122. 引自：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 266。

② 赫鲁晓夫与乌布利希的会谈记录（1960 年 11 月 30 日），参见 Hope M. Harrison：Ulbricht and Concrete "Rose"：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 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1.（乌布利希和水泥"玫瑰"：关于苏联东德关系和 1958—1961 年柏林危机原动力的新档案证据），Working Paper No5. CWIHP Bulletin，May，1993。

③ 参见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65（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文件汇编 1960 年），Москва，1962，с. 137－140。

此这般数量的师，我们就拿出150—200师，需要多少拿多少。我们现在正考虑沿着整个边界（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布置防御性坦克”。① 肯尼迪不惧赫鲁晓夫的威胁，断然拒绝苏联的建议，并说否定西方按协议在柏林取得的权利，就是一种交战行动。赫鲁晓夫回击说“我要的是和平，但是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问题。苏联除了接受挑战，别无他法。战争灾难是共同分担的。12月份签订和约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肯尼迪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严寒的冬季”。② 维也纳会议后，苏美双方加强恫吓和备战活动。7月8日，赫鲁晓夫宣布暂停执行1960年宣布的裁减武装部队计划，并增加31亿卢布的军费。他还以核战争威胁西欧。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赫鲁晓夫问英国驻苏大使罗伯茨，毁灭英国需要多少枚原子弹？后者回答6颗原子弹。赫鲁晓夫说，“我告诉你一个总参谋部的秘密：我们更看重大不列颠，我们准备了数十枚原子弹去打击大不列颠，并且真能毁灭大不列颠”③。

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这一系列言行反应强烈。美国军方制定了军事应急计划，提出派几个师打通连接西柏林的公路，炸毁东德、波兰等国的机场，必要时发射显示力量的核武器。7月25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重申“我们不能，也不允许苏联通过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他还要求追加国防预算，扩大军队人员。说“我们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对我们有益的话。但我们也必须准备抵抗武力，如果武力用在我们头上”。④ 第二天，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说，肯尼迪的讲话提出最后通牒，明显是想挑起战端。如果西方用武力响应柏林危机，苏联将不惜打一场热核战争。在会见麦克洛伊时，赫鲁晓夫更进一步威胁说，“如果你们硬要打，我们也不后退。我们将用战争来回答你们的战争”。如果爆发战争，肯尼迪“将是美国的最后一位总统，因为战后未必还有各族人民”。⑤

---

① 《赫鲁晓夫关于柏林危机的讲话摘录（1961年8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645，647页。

② 黄甫生等：《核危机秘闻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③ 参见：《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结国共产党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4日）记录稿》，（俄）《近现代历史》杂志，1999年第2期，第66页。

④ Schlesinger, A. M.: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世界强国的动态，美国外交历史文献），New York, 1973, V.1, p.658.

⑤ 参见：《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结国共产党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4日）记录稿》，（俄）《近现代历史》杂志，1999年第2期，第64页。

赫鲁晓夫表面气势汹汹，实际处境尴尬。他如果采取行动，无论是封锁通往柏林的交通线还是与东德单独签订和约都会因西方武力保证交通而引发军事冲突。而这又是赫鲁晓夫极力想避免的。因此他在8月3—5日的华沙条约成员国领导人秘密会议上，一方面表白他忠于反帝斗争方针，说“我们必须向他们显示我们的意志和决心”，同时强调形势复杂，说“杜勒斯活着时（美国）更稳定一些”，因为杜勒斯是那种“决心要我们屈服的（敌人），但他害怕战争。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也可能走到边缘，但他从来不会越过边缘，这仍使他获得信赖。如果肯尼迪那么说，他将被称为懦夫”。肯尼迪“只是一个轻量级选手。这个国家太大了，太强了，因此它有某些危险”。“在美国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战争也是可能的。他们可能发动战争”。[①] 赫鲁晓夫暗示，有同肯尼迪政府达成协议的机遇，他的所有行动旨在制约西方，而不是挑起可能的冲突。他劝说自己的盟友相信，苏联的坚定性已起作用：“聪明”的欧洲政治家和“接近肯尼迪的人们”已从深渊的边缘走开；西方这就要开始谈判。[②]

这时，赫鲁晓夫不能不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因为如果再次简单撤销6个月期限的规定就会使苏联的国际威望扫地。其次，为了挽救东德的经济也需要对西柏林进行某种限制。最后，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数与日俱增，仅8月初的12天内就多达4.8万人。[③] 单靠警察监视已无法控制这股逃亡潮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决定采取他原本不愿意采取的强硬措施。1961年8月5日，他接受东德领导人提出的办法，[④] 围绕西柏林的四周构筑只留一些固定通道的屏障，以便监控人员往来，阻止东德人外逃。

1961年8月13日，东德在苏联的支持下，沿东西柏林分界线建起“柏林墙”。这一措施并未改变西柏林的地位，也未封锁通往西柏林的交通线，只是严格了交通管制。但它是苏联未与西方协商而在柏林采取的行为，是固定柏林分裂现状的

---

① 《赫鲁晓夫关于柏林危机的讲话摘录（1961年8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645—646页。

② 参见 Zubok, V.: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on the Berlin Crisis, August 1961（赫鲁晓夫关于柏林危机的秘密讲话），CWIHP Bulletin, 1995, No.3, p.58－61。

③ Б. Бонвеч: Как Принималось Решение О Возведении Берлинской Стены（关于修建柏林墙的决定是怎样被接受的），（俄）《近现代历史》杂志，1999年第2期，第53页。

④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冷战：参与者的见证）М. 1995. с. 70。

措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肯尼迪警告赫鲁晓夫说，为了维护西柏林的利益，美国将不惜一战。他认为发生核交锋的可能性已达1/5。美国增派驻柏林和欧洲的军队，举行军事演习。8月30日，肯尼迪将第一次柏林危机时的柏林美占区司令克莱将军派到西柏林，显示必要时将采取最强硬的措施。苏联则任命前华约组织的部队司令科涅夫元帅为苏驻德部队司令，并宣称苏已研制出一系列超级核弹，其当量分别达到3000万、5000万和1亿吨TNT炸药，还有“能把这些核弹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强有力的火箭”。接着就试爆了5700万吨级的核弹。美国谴责苏联增加了“热核屠杀的危机”，同时进行地下核试验。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他是否会因柏林危机而使用核武器时说，“是的，我肯定会的。我们将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核武器以保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的核武库比苏联的要大好几倍”。10月28日，美军派出推土机和十辆坦克试图拆除柏林一个哨卡的护栏。苏军也派出坦克与之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了整整一夜。军事冲突随时可能爆发。最后，苏联坦克率先撤离现场，美国坦克也随之而退，危机得以缓解。

9月15日，乌布利希写信给赫鲁晓夫，强调关闭同西柏林边界的必要性。接着，又寄去苏联民主德国和约草案，希望苏联尽快履行其许诺。但赫鲁晓夫并不想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同欧美再度关系紧张。他更关心的是维持甚至是改善东西方的关系，其次才是满足乌布利希的需要和愿望。赫鲁晓夫给德国领导人的回信中说，“在现今条件下，当顺利实施保障安全和监督东德和西柏林边界措施的时候，当西方国家开始谈判的时候（在纽约，苏联代表和美国代表正在接触），应避免可以加剧形势尤其是柏林形势的步骤。所以放弃民主德国政府制定的旨在改变同西柏林边界检查制度的所有新措施具有特别的意义”。①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如果西方国家表示愿意解决德国问题，那么日期问题就不会有多大意义了”，苏联方面“不坚持一定要在1961

---

① 引自：Харрисон，Х：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Восточной Германии в период берл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1958 - 1961г. 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Москвы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лина（1958—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苏联和东德的政策：来自莫斯科和东柏林的新档案资料），载于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 289。

年12月31日以前缔结对德和约”。[1] 这以后，赫鲁晓夫继续与肯尼迪相互交流秘密信件，商讨德国问题，重申双方不允许柏林紧张形势升级。[2] 但柏林墙的修建已使两国关系恶化，通过谈判解决对德和约和西柏林问题实际被无限期推迟了。

总之，柏林危机不应简单看成是赫鲁晓夫的冒险进攻，它也是苏联用和平共处政策解决重大问题的一次尝试。赫鲁晓夫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担心东德面临的经济崩溃前景，同时相信核时代苏美都不要大战，两国有可能妥协。因此他顶住国内外激进势力的压力，没有采取单方面武力行动，始终把它作为一个谈判议题处理。但结果是，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激烈冲突，甚至一度陷入战争的边缘。这表明苏美相互极不信任，也不愿让步，一有机会就要压过对方，甚至要吃掉对方。赫鲁晓夫虽多次展示友好姿态，做出细小让步，但也多次进行口头的和行动的恐吓威胁，从提出最后通牒到构筑柏林墙。苏美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总的讲没有进步，甚至有倒退。赫鲁晓夫推动的和平共处政策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遭遇了挫折。

赫鲁晓夫还着意把对美和平共处政策运用在另一项重大问题——裁军特别是核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知道裁军是世界人民关心的问题，他从一开始就高喊裁军，不断与美国进行有关核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谈判，甚至还提出要全面彻底裁军，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当然，他也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他曾对苏联驻联合国官员说，他“预料西方不会完全裁军，苏联也不想这么做”，还说倡议全面裁军是必要的，“不能认为宣传和真正的谈判是矛盾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3] 看来，赫鲁晓夫提出的“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攻势，当然，他也确实想借裁军来限制对方，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他并没有把裁军谈判视为纯粹的策略行为，而是对裁军寄予希望，认为苏美之间存在某些共同利益，可以达成一定协议。他想通过军控和裁军，降低军备竞赛水平，减少军费开支，建立和维持双方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和稳定，加强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缓和冷战紧张形势。

---

① 《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63页。

② 参见：赫鲁晓夫1961年11月9日信件：АВПРФ，ф. 东德备忘录1961年，оп. 57，папка. 388，д. 193/3，т. 3，л. 117. 引自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с. 271。

③ 阿·舍甫琴科著，王观声等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1953年12月在苏美关系出现某些缓和迹象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裁军委员会下设一个由苏、美、英、法和加拿大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讨论核裁军问题。1954年5月13日，小组委员会在伦敦举行第一轮会谈。苏联试图以自己的强大地面常规武装力量抵消美国的核优势，提出应首先禁止至少“原则”禁止核武器，再减少常规武装力量，再实行控制。美国的立场正好相反，它鉴于此时尚未形成有效的核威慑力量，又特别担心苏联的强大陆军，因此要求先裁减常规军备再销毁核武器。双方多次协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讨论了各种方案，但达不成任何协议。1955年5月10日，苏联看到西德即将进入北约集团并会重新武装，于是决定同意先裁减常规部队和停止核试验，以减轻苏联防务压力，核武器则留待裁军第二阶段再销毁。美国原来基本接受苏联的建议，但6月又改变了态度，因为英、法、德、加四国政府首脑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抗议，他们担心一旦达成协议，将无法通过核试验发展本国的核武器，甚至要被迫放弃用核武器自卫的权利。这以后，美国在核停试问题上立场倒退，谈判也再无进展。

赫鲁晓夫为了推动裁军，当然也是鉴于苏联常规部队过于庞大，于1955年8月12日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64万。1956年5月14日又宣布在此后一年内再裁军120万。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和地球卫星，自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在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一些外国领导人呼吁苏联对西方采取更坚决的态度，建议在西方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之前，不要同西方进行裁军谈判。赫鲁晓夫拒绝了这种“束缚”，因为他对前一阶段关门政策使苏联外交陷于国际孤立的情况仍记忆犹新。[①]

1957年苏联进行了18次核爆炸，1958年初又进行了多次核试验。[②] 这时苏美两国的核武库“即使不是势均力敌、那也是差距最小的状态”。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停止（核试验）的最佳时间”。“我们没有赶上美国，但如果他们不进一步往前冲、扩大差距，倒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已试验了火箭的热核弹头……已有的东西足以保证安全”。[③] 苏联遂采取主动，于1958

---

① 70ЦХСД，ф. 5，оп. 49，д. 17，л. 139，177－178.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冷战：新观点和新资料）c. 261。

② 《国外核武器动态》，1996年第4期，第19页。

③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70页。

年1月6日宣布，除了1955—1956年已经裁减184万武装人员外，再裁减30万人。3月31日又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赫鲁晓夫分别在4月4日、4月22日、5月9日、5月30日、6月11日和7月2日致信艾森豪威尔，探讨有关禁止核试验和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的问题。但是美国没有给予积极回应，继续进行核试验，同时提出核试验的监督问题。赫鲁晓夫做出让步，同意就此问题召开专家会议。1958年7月，苏美英法等8国专家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公报宣布："从技术方面来看，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有效可行的监督制度，来探测那些违反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达成的停止核试验协议的行动"。[①] 但赫鲁晓夫坚持，"只要美国还比我们占很大的优势，我们就不能接受国际性的裁军监督"。[②]

禁止核试验因国际检查问题长时期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为此受到很大压力。苏联军方强烈要求恢复核试验，说核武器的爆炸烈度必须不断提高，而重量和体积则要逐步减小。不进行试验就等于把新的设计方案扔进纸篓或束之高阁，就会更加落后于美国。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埋怨说："我们要想建立现代化军队，就得有相应的武器，不搞试验哪来的武器？"[③] 赫鲁晓夫则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在核战争中取胜，苏联现有的核武器已足以制止侵略者，同美国达成核禁试协议对苏联和世界的安全有利。但到7月底美国利用苏联停止核试验之机进行了30次核爆炸。赫鲁晓夫挺不住了。10月2日，他宣布苏联宣布恢复核试验。联合国大会则于当年通过决议，敦促苏美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暂停核试验并及早达成协议。这以后，苏美都暂停了核试验，10月31日，苏美英三国就停止核试验在日内瓦进行谈判。从此，苏美正式采用了就专门军控问题进行专门谈判的方法，它与以前那种"一揽子"谈判方法截然不同。为了推进裁军谈判，苏联于1960年1月15日宣布，裁减武装部队三分之一，即120万人。2月和3月，美苏先后提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水下和地下进行核试验的建议。双方观点十分接近，但在监督问题上意见分歧。苏联认为美国鼓吹的国际监督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土上建立一套情报网，将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安全利益。而美国认为苏联在用自身的视察取

---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著，廖绿胜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718页。

②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616—617页。

③ 转引自（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90页。

代国际监督，根本不可取。1961 年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后，苏美英于 3 月 21 日重又开始核谈判，但依然达不成妥协。1961 年 8 月 31 日，苏联发表声明，说面对西方侵略性的日益增长，为了加强自身安全，决定恢复核试验。在其后的 60 天中进行了 30 次大气层核试验。9 月，美国恢复了地下核试验。

裁军谈判历经十多年而无法达成协议。赫鲁晓夫虽然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发展核武器，但仍痛感苏联落后于美国。据苏联新公布的资料，1955 年美国拥有 3037 枚核弹头，苏联为 200 枚；1956 年的相应数字是 4618 和 426；1957 年是 6444 和 660；1958 年是 9822 和 869；1959 年是 15468 和 1060；1960 年是 20434 和 1605。[①] 运载工具方面，苏美更是相差悬殊。据美国史学家加迪斯的资料，苏联在 60 年代初只有 4 枚能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而美国有 3000 多枚能打击苏联领土的核弹和核导弹。[②] 谢·赫鲁晓夫认为，算上供试验用的导弹，苏联在 1961 年也只有 6 枚洲际导弹。[③] 赫鲁晓夫一直为两国核力量的差距担忧，积极寻求缩小差距的机会。

1959 年 1 月，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美国不能容忍，于 1961 年 4 月 15 日组织古巴流亡分子入侵古巴，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被击败。这一事件促使卡斯特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于 5 月 8 日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密切起来。1962 年 5 月，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黑海岸边散步。马利诺夫斯基指着大海方向对赫鲁晓夫说，在对岸的土耳其有美国一个火箭一核基地。从这个基地发射出来的火箭，可以在 6—7 分钟之内摧毁位于苏联南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大中城市，包括基辅、哈尔科夫，更不要说塞瓦斯托波尔这一苏联重要的海军基地了。赫鲁晓夫问马利诺夫斯基，为什么苏联无权做美国做的事情呢？为什么不能，比方说，把我们的火箭部署到古巴去？[④] 赫鲁晓夫决心利用古巴面临美国再次入侵威胁的情况，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来克服自己在核武器方面的劣势，达到同美国在战略上的平衡，同时争取在核裁军谈判中处于有

---

① Под ред. Минаева А. В. : Советсквя военная мощь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军事实力），M. 1995 C. 167。

② Gaddis J. : We Know Now.（我们现在知道了），New York，1997，p. 240。

③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 428 页。

④ 参见（苏）布尔拉茨基著，赵敏善等译：《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70 页。

利地位。他认为，尽管运进古巴的核导弹力量“不能够有效摧毁美国”对苏联“严厉的、预防性的、报复性的，具有毁灭性的战略打击能力”，但可以打击从苏联领土无法达到的目标——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和控制机关。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可以有效地阻止或回击美国的第一次核打击。其次，较量的地点在美国自认为是其势力范围的美洲。苏联将中程核导弹设置在距美国只有90海里的古巴，把美国东海岸地区都置于导弹的射程之内，将形成对美国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威胁。

赫鲁晓夫的打算是，“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导弹，如果导弹已经装好可供发射之后才为美国发现，美国人在试图用军事手段摧毁我们的设备之前就得仔细考虑考虑。我们知道美国能够毁掉我们的某些装置，但不是全部。如果有四分之一，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导弹能够留下来——即使只留下一两个大的导弹——我们仍旧能够击中纽约，而纽约势将所剩无几”。[①] 因此赫鲁晓夫认定美国不会对他的这次冒险行动采用军事手段回击。

赫鲁晓夫的计划显然是不周全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苏联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怎么能不被发现。实际也正是这样。从1962年7月起，苏联开始秘密向古巴运送导弹。8月31日，美国从空中拍摄到到古巴新添防空导弹的照片。9月初，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表达对正运往古巴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地对空导弹的深刻关切，说美国肯定不会让古巴政府来决定美国的安全。9月4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苏联在古巴设置了防空导弹，美国绝不能容忍把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或其他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赫鲁晓夫本应从美国的警告中看到秘密运送导弹计划已不可能，本可就此停止原定安排，因为这时中程导弹和核弹头都尚未运进古巴。但赫鲁晓夫没有这样做。9月11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不需要为了击退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打击，而把它的核武器转移到别的国家，例如古巴……苏联有可能从它自己的国土上支援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是古巴”。18日，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把两国关系恶化首先归咎于柏林的非正常局势，允诺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就这样，赫鲁晓夫采用了一系列欺骗手段最终将42枚中程导弹，162枚核弹头，42架伊尔—

① 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页。

28 型轰炸机，还有大批防空导弹及 43000 名苏联官兵布置在古巴境内。

苏联运往古巴的导弹尚未装置好，就被美国发现。更让赫鲁晓夫始料不及的是，美国做出极其强烈的反应，决定不惜同苏联一战以消除这一威胁。10 月 22 日，肯尼迪发表广播电视演说，称苏联将导弹运进古巴“构成了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最明显的威胁”，要求撤走这些进攻性武器，并宣布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在同日致赫鲁晓夫的信中威胁说，“正在采取的行动”只是“最低限度的反应”，“不应被当成是贵国任何错误判断的根据”。[①] 接着，由 90 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在 68 个空军中队和 8 艘航空母舰护卫下驶往加勒比海。800 架 B-47 型轰炸机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B-52 轰炸机奉命装载核武器在空中值勤，一架着陆，立即由另一架飞上去顶替。100 枚“阿特拉斯”、50 枚“大力神”和 12 枚“民兵”洲际导弹在发射台上听候指令。还进行了空中打击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和两栖登陆行动的准备工作。据麦克纳马拉回忆：“根据这项紧急行动计划，第一天将出动 1080 架次战斗机进行空中攻击，并且，一个总数为 18 万人的登陆部队也被集结在美国东北部港口”。[②]

赫鲁晓夫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回信肯尼迪，谴责美国的封锁行为“是一种把人类推向世界性热核战争深渊的侵略行径”，[③] 表示不会给开往古巴的苏联船长下令，要他们按美国海军吩咐行事；另一方面命令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同时加紧古巴导弹基地的建设，企图用核导弹镇住美国。苏美两国都摆出准备大战一场的姿态。赫鲁晓夫说，“只要美国限于采取威胁姿态而不真碰我们，我们也就可以佯作不理会”。[④] 但他这次又错了。美国已下令阻拦试图通过封锁线的苏联船只，对任何拒绝停航和不接受检查的船只予以炮击。10 月 24 日上午封锁生效后，有 20 多艘苏联商船继续驶往古巴，其中 2 艘离封锁线只几海里，且有潜艇护航。军事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退让了，下令船只停在封锁线外。形势暂时有所缓和，但危机依旧。美国积极准备进攻古巴。10 月 26 日，肯尼迪更命令国务院制定一项应急计划，以备在军事占领古巴后及时建立一个文官政府。

---

① 《肯尼迪致赫鲁晓夫的信（1962 年 10 月 22 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9 卷，第 51 页。

② （美）麦克纳马拉著，陈丕西译：《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作家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48 页。

③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1962 年 10 月 24 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9 卷，第 80 页。

④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702 页。

这一天，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明确表白苏联不要战争，说“战争是我们的敌人”，战争将带来巨大灾难，必须避免。“总统先生……不会丧失对现代战争的性质的理解和正确评价极其所带来的后果”，“世界上现存的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必须和平共处”。他向肯尼迪呼吁，“让我们都表现出治国的雄才大略。我提议：我们，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可以声明，我们驶往古巴的船只没有运任何武器。您也要声明，合众国不派自己的军队人侵古巴，并且不支持任何蓄意对古巴进行干涉的其他势力，那时我国军事专家留在古巴的必要性也就丧失了”。[①] 同一天，苏联大使馆的一位负责情报的官员富明向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斯卡利提出一个建议，说苏联将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核查下撤走导弹，美国则解除封锁并保证不人侵古巴。富明要求斯卡利把这个口信转达给美国政府。

赫鲁晓夫的信表明，他采取这一冒险行动，不是为了挑起战争。他了解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不愿也不会允许苏美之间开战，希望美国总统也“表现出治国的雄才大略”，遵守这条基本游戏规则。赫鲁晓夫感到在古巴设置导弹并不能吓住美国，反而造成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形势。他决定进一步退让，在信件中，含糊表示“那时我国军事专家留在古巴的必要性也就丧失了”。他还通过秘密渠道告诉美国，苏联可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设在古巴的导弹。

赫鲁晓夫的退让是在国内外一些人要求反击美国的声浪中做出的。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曾建议，为报复美国海军封锁古巴，应针对西柏林采取相应措施。对此赫鲁晓夫提高嗓门宣布，他不需要“再一次冒险”。[②] 10 月 26 日，卡斯特罗写信给赫鲁晓夫，说“此后 24—72 小时内侵略几乎是必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入侵古巴，“苏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允许造成帝国主义首先向苏联进行原子突击的条件”，即苏联应利用这个“最合适的时机”先发制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摧毁美国的核基地，“消除可能发生的此类危险”。[③] 赫鲁晓夫没有接受卡斯特罗的形势分析和对策建议，继续寻求妥协之路。

---

①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1962 年 10 月 26 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9 卷，第 110、111、113、115 页。

② （俄）特罗扬诺夫斯基（О. А. Трояновский）：加勒比海危机——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观点。（俄）《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2，№3－4，С. 172。

③ 《卡斯特罗致赫鲁晓夫的信（1962 年 10 月 26 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9 卷，第 124—125 页。

赫鲁晓夫虽然主张妥协，但也要争取最大利益。赫鲁晓夫不等美国回复他26日的信件，就又写了一封致肯尼迪的新信件，并通过莫斯科电台在27日播发出去。他在信中提出新的要求，说“我们同意从古巴撤走您认为是进攻性的那些武器”，但美国“也要从土耳其运走类似的武器”。[①] 赫鲁晓夫突然增加妥协条件，其原因至今不清楚。一种说法是，赫鲁晓夫得到补充情报，说美国可以作更大的让步，他决定利用这一可能性；另一种说法是，赫鲁晓夫在某些同僚的逼迫下，经过重新考虑后做出孤注一掷。不管哪一种说法更确切，赫鲁晓夫的轻率和莽撞作风在这里清晰可见。

赫鲁晓夫提出新的要价在美国引起困惑甚至恐慌。一些人提出，“难道赫鲁晓夫已被那些由于认为他甘愿同肯尼迪合作而恼火的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军国主义者推翻了吗？难道我们现在正在同苏联的另外一些领导人打交道了吗？”[②] 更多的人担心赫鲁晓夫会采取新的冒险。当情报证实苏联继续在加紧古巴导弹基地建设，当传来消息说美国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绝大多数美国领导人认为，冲突已不可避免，必须在第二天一早就派飞机摧毁古巴的导弹基地。麦可纳马拉还提出了空中打击和入侵的时间表。美国实际已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罗伯特·肯尼迪称27日是“导弹危机最艰难的24小时”。肯尼迪对形势的发展十分担忧。决定继续寻求妥协办法。他不理会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仅对26日来信做出回应。在27日致赫鲁晓夫的信中，一再强调“首要问题，就是在有效的国际保证的条件下停止在古巴修筑导弹基地的活动，并采取措施 使得此类武器不能运作”。同时，将赫鲁晓夫的建议明确归纳为：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走这些武器系统”，并“不再将此类武器运往古巴”；美国则“立即取消现在实行的隔离检查措施”，并“保证不入侵古巴”。关于拆除土耳其导弹基地问题，肯尼迪暗示可以在以后解决。他说，“这种消除世界紧张的局势的解决办法，其结果将使得我们能够朝着一个更普遍的有关‘其他裁军’计划的方向努力，正如您公之于众的第二封信中所提议的一样”。[③] 肯尼迪还派他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于当天晚上7点45分会见苏联驻

---

①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1962年10月27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第130页。

② 罗伯特·肯尼迪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十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3页。

③ 《肯尼迪致赫鲁晓夫的信（1962年10月27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第133—134页。

美大使多勃雷宁。罗·肯尼迪警告说，古巴导弹基地“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要消除这些基地，直至万不得已时不惜进行轰炸”。现在美国的“将领中有许多人头脑不理智，而且还不止在将领中，这些人一心想要‘干一架’”。如果美国进行火力攻击，“必将迅速出现连锁反应”，“一场真正的战争就会爆发，而其间首先死去的是千百万美国人和俄国人。我们希望千方百计避免这一切。我相信，苏联政府也有同样的愿望”。多勃雷宁问美国的具体建议。罗·肯尼迪说，肯尼迪总统刚给赫鲁晓夫写了信，这封信和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信“可以成为调整整个古巴冲突的合适基础”。多勃雷宁又问关于土耳其导弹基地的问题。罗·肯尼迪说，“如果这是达成上述调整行动的唯一障碍，那么总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要同北约协商，目前总统也不能公开谈论它。罗·肯尼迪一再强调，“当前的严重局面只给解决问题留下极少的时间”，总统请求“赫鲁晓夫在明天（星期日）之内对以上意见给予回答，并且希望是切实而明确的回答，而不要卷入文字上的讨论，以免耽误整个事情”。①

27日这一天，克里姆林宫一直笼罩在“巨大忧虑”之中。当天发生的两个事件（苏军在古巴打下美国的一架U-2飞机，一架美国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北部的楚科奇半岛）都可能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线。人们不知将会发生什么。接到多勃雷宁发来的有关他同罗·肯尼迪谈话内容的电报后，赫鲁晓夫意识到，已经到了当机立断的关键时刻，拖延寻找出路会使局势失控，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他当即接受肯尼迪的建议，并同其他领导人一起连夜讨论起草了给肯尼迪的回信。信中说，“我以尊敬的信任的态度”对待总统所作的声明，“绝不存在对古巴的侵犯，不仅美国方面不入侵古巴，而且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不入侵古巴”。“因此，我们也给我们的军官（而这些武器，正如我对您所说的，为苏联军官所掌握）下达了指示，要他们采取相应措施中止对指定工程的建设，将设备拆卸运回苏联”。“我们同意与您进行协商，以便使联合国的代表能够对这些武器的拆卸情况进行查实”。②

---

① 《多勃雷宁致苏联外交部电报摘录（1962年10月27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第136—137页。

②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1962年10月28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第151页。

为了阻止美国轰炸古巴导弹基地，回信的最后一稿还未校阅完，就在28日由莫斯科电台直接用英语播出了。同时急电多勃雷宁，要他立即同罗·肯尼迪联系，告诉他：今天电台将播发对总统来函的答复，此答复态度极为肯定。使总统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即关于拆除古巴导弹基地的问题，并未遭到反对。罗·肯尼迪对这一答复十分满意，感谢“赫鲁晓夫迅速而有效率的答复”，并说“可以大大松一口气”。就这样，古巴危机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赫鲁晓夫还有肯尼迪的努力防止了冒了烟的火药桶发生大爆炸。

赫鲁晓夫的退让引起古巴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卡斯特罗不相信肯尼迪的保证，更对赫鲁晓夫不同他商量就改变立场，同意撤走导弹核武器感到愤怒。他到部队发表演说，提出美国应从关塔那摩军事基地撤走等“古巴人民的五项要求”。赫鲁晓夫写信给卡斯特罗进行解释，并宣扬自己的胜利。他说，美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匈牙利对苏联意味着什么，古巴对美国就意味着什么”。“他们不能容忍革命的古巴存在，就像我们不能容忍反革命的匈牙利存在一样。然而，恰恰就是在现在，我们却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了不再入侵古巴的保证”。其次，危机“所涉及的已远远不是古巴问题。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和平制止战争，还是战争取代和平。’现在，可以这样说，革命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已经赢得了胜利，已经顽强地摆脱了这一危机。而那个最好战的美帝国主义，恰恰是它退却了”。关于美国从关塔那摩基地撤军问题，赫鲁晓夫表示支持这一要求，但又说目前美国“从那里撤军希望不大”，[①] 也没谈它同苏联撤导弹间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还派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到古巴去安抚卡斯特罗。当卡斯特罗提出不同意在古巴领土领海上进行实地检查时，赫鲁晓夫默认了。苏联随后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在公海进行核查。苏联于11月上旬撤走导弹，并于19日答应在一个月内撤走伊尔-28型飞机。11月21日，美国宣布取消封锁。随后，苏联也解除了对武装力量的动员令。美国同北约国家协商后，将设在土耳其的“丘彼特”导弹基地撤除。一度把世界推到核战争边缘的加勒比海危机最终在明智的让步妥协下结束了。

总之，赫鲁晓夫将核武器运往古巴，并非想要进攻美国，而是要在西半球守住古巴这个反美基地，要争取苏美两国的战略平衡。赫鲁晓夫这样做既有冒险的

---

① 《赫鲁晓夫致卡斯特罗的信（1962年10月3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第247、254、252页。

一面，也有被迫的一面——保卫古巴。但他并没有背离自己的和平共处政策思想，他只是想在不引发苏美战争的前提下争取获得最大利益。但这样做触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几次危急关头，赫鲁晓夫都因苏联实力不足而退让了，但他始终把解决安置在古巴的核武器问题牢牢掌握在苏美两国、苏美两国首脑的手里，用谈判的方式化解了危机。前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在古巴安置导弹"不能看成是"无谓的冒险。因为一方面，这一步骤捍卫了古巴革命使之免受外来的侵略；另一方面，使彼此对立的势力趋于平衡，迫使美国开始和苏联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①]

加勒比海危机事件是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赫鲁晓夫虽然认定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已使苏美有了共同利益，但仍认为美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对它极不信任，力求扩展自己，压倒对方。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全力推进对美和平外交，实现了苏联政府首脑首次访美，但在欧洲和核武器问题上，他不仅没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使苏联连连退却，大失脸面；不仅没有使局势得到缓和，反而引发冷战历程中的最大危机。在经历较量和挫折后，赫鲁晓夫较为现实地推行其对美和平共处政策。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苏美"正是在消除了加勒比海危机之后，才开始实际探索共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途径"。[②]

第三阶段是1963—1964年。

加勒比海危机使赫鲁晓夫亲身感受到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一旦战争发生，苏美将是最大受害者。由此，赫鲁晓夫认识到避免核战争，避免苏美战争、避免可能引向公开冲突的每一步是两国的最大共同利益。苏联对美的核威胁核讹诈必须有限度，不能随意向美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不能采取可能导致直接军事冲突的行动，不能把核武器交给第三者。同时，赫鲁晓夫通过柏林和古巴事件看到美国领导人同样也在尽力避免核战争，看到肯尼迪在古巴危机最紧张的时刻能够保持沉着冷静，没有乘机攻击卡斯特罗政权，没有要求苏联做更多的让步，反而答应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因此增加了对美国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赫鲁晓夫意识到超级大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认为有可

① （苏）尤·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② 同上。

能也应该加快调整苏美两国关系。

在欧洲问题上，柏林墙的建立一方面稳定了东德的局势，另一方面使东西柏林和东西德的分裂更加确定。赫鲁晓夫希望在维持欧洲现状的基础上同西方达成妥协，缓和欧洲的对抗。他在1963年初说，由于建立了柏林墙，签订单独对德和约和解决柏林问题已不是紧迫问题了。1964年4月，苏联与民主德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也没有否定西方在柏林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70年代苏美英法四国签署《柏林协定》和东西德相互承认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方面，赫鲁晓夫决定加强同美国总统的沟通，于1963年4月同美国达成协议，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建立"热线"，以便两国领导人能及时了解对方的意图与要求，避免误解和偶然事件引发战争。1963年6月，苏美两国签订了在两国间设立"热线"的协议。同年8月31日，苏美热线接通，供两国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直接联系使用。

古巴危机平息后，赫鲁晓夫担心核扩散的危险，致信肯尼迪，说当前形势有助于达成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第二天，肯尼迪回信，提议对这一问题进行紧急讨论。苏联原想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但美国提出，地下核试验的地震信号容易和众多的小地震所引发的信号相混淆，为了区别两者，有必要进行就地视察。苏联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赫鲁晓夫表现出创新精神，同意每年在核大国内进行2至3次检查。美国没有抓住这次机会达成协议，反而提出更高的条件，要求每年要进行8至10次的检查。赫鲁晓夫的建议本来就不为许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所同意，现在他后退了。他对美英代表说："苏联将不会同意进行检查，即便是建议只进行2次或3次检查也不行，我们准备同意停止一切核试验，但只能使用'黑匣子'这种手段进行监督，但不能进行实地检查。我们将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进行检查，哪怕是一次也不行。至于在那些不需要进行检查便可核实的范围内搞的核试验，我们可以签订这样一个协议"。接着，赫鲁晓夫以其特有的粗鲁的风格讲述他对西方的不信任，他说："关于间谍活动，看来我们对其含义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很难认同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观点。当猫承诺它将只抓老鼠而不碰猪油时，很可能它的确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但毫无

疑问，在没人看着时它也会偷猪油”。[1] 就这样，一次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机会丧失了。

1963 年 1 月 14 日到 31 日，苏美后来还有英国在纽约和华盛顿进行了 10 次会谈。7 月 15 日，苏美英在莫斯科就核禁试问题正式举行会谈。经过谈判，苏美英三国于 1963 年 8 月 5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这是苏美核裁军谈判的第一个成果。其内容和效果有限，两国的核竞赛核威胁仍继续进行，但破天荒地开始了核军控核裁军的实质进程。

总之，加勒比海危机之后，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虽然苏联仍以核武器为后盾同美国较量，但不再采取类似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那样的严重对抗行动；虽然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但两国开始在重大问题上取得某种共识和妥协。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在经历曲折后出现了实质性进展。

三

20 世纪 20 年代，俄美解密了大量外交和军事档案文件。俄国总统档案馆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原党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最重要的文件；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保存了赫鲁晓夫给下级的大部分训令和指示；总参谋部档案馆保存了下级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和情报，包括了柏林危机的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解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和军事领导人出版了众多回忆录。东西方学者还经常举行有关冷战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所有这些都促使对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具体。但仍有不少重要档案资料至今无法看到，许多重要史实难以弄清楚。学者们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更是评价不一。俄国的学者多数都强调，赫鲁晓夫在行动中考虑不周详，对社会主义和亚非拉国家反美斗争前景持理想主义态度，热衷于核讹诈。佩恰特诺夫认为，“赫鲁晓夫经常用自己的政策向美国挑衅。战后世界任何时候都没有像赫鲁晓夫时期那样接近战争”。库德里亚舍夫说，“‘冷战’在赫鲁晓夫时期真正具有了世界性、全球性……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开动了军备竞赛的机器”。[2] 而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特罗扬诺夫斯基则认为，赫鲁

① 转引自多勃雷宁：《信赖》，第 117 页。
② （俄）《祖国》杂志，1998 年第 8 期。

晓夫是通过谈判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推行者。[①] 不同的评价多是从不同侧面分析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产物，这里需要综合考察。

应当说，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同斯大林时期相比较，从总体讲并无根本改变。仍是以战胜美帝国主义为最终目标，仍是以军事实力特别以核武器为后盾同美国争高低，仍带有浓厚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但确有重大转变。在理论方面，不再认为世界大战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强调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和它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把和平共处政策提高到总路线的地位。在具体作法上，赫鲁晓夫积极认识和利用核武器出现后的新形势，比较实际地评估苏美国力间的差距，不断调整对美政策，从全面对抗转到对话协商，“和平共处”；从无限制地进行核威胁核讹诈转到降低对抗烈度，寻求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寻求和维护两国的某些共同利益。

赫鲁晓夫调整对美政策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初期，苏联因深受冷战加剧之害，比较容易地开始了对美政策的微调，并同美国在次要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当赫鲁晓夫掌握了党政领导权后便大力推进对美和平共处政策，着手解决欧洲和核武器等重大问题，力图营造出一个苏美关系的新局面。但却引出了相反的后果——直接的武力对峙与核战边缘的危急形势。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他认为美国既是不共戴天的、必须彻底打败的敌人，也是现实中最危险的对手。尽管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发展已使防止苏美战争成为两国的共同利益，但是他仍十分担心美国会侵害苏联；尽管他力主缓和苏美紧张形势，但仍信奉“零和性质”的规律，要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美国，扩展自己。其次，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制约了赫鲁晓夫的行动。在苏中两党两国矛盾激化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赫鲁晓夫没有足够的才华去同时应对美国和中国。此外，赫鲁晓夫的盲目乐观和鲁莽作风，也是造成苏美关系出现险情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赫鲁晓夫没有让苏美冲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及时止步了、退却了。经过一路跌跌撞撞，他终于在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之后把苏美两国引向共同遵守核游戏规则的“和平共处”，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但赫鲁晓夫尚无重大建树就下台了。

赫鲁晓夫在推行对美和平共处政策过程中存在众多错误和问题。首先是推行

---

① 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А. М.：От 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从柯仑泰到戈尔巴乔夫），М. 1994. 和 Трояновский О. А.：Через годы и расстояния（跨过年代和距离），М. 1997。

大国霸权主义。他不仅继承了俄国的这一传统，而且依仗苏联的核武器优势在某些方面推行更为粗暴的强权政治。他奉行苏美主宰国际事务的理论，忽视甚至损害其他有关国家的利益。当然，也不能把赫鲁晓夫时期的苏美关系完全归结为两大国的相互勾结和争夺霸权。

其次，夸大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赫鲁晓夫正确估计到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明确提出核战争不应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他看到核武器对国际局势的深远影响，充分利用苏联的核优势来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推动缓和的进程。但他夸大甚至迷信核武器，认为依靠核武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他一方面同美国进行核竞赛，企图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调整好两国关系；另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核武器对美进行讹诈冒险，制造出冷战中最危险的对抗局面，把世界引到核大战的边缘。

第三，决策时常主观冲动，欠缺考虑。最为突出的有：1958 年和 1961 年，赫鲁晓夫两次公开宣布签订对德和约的最后期限，又两次自我否定，放弃最后通牒；1960 年，赫鲁晓夫已经坐上飞机去巴黎参加四大国首脑会议，却在途中突然改变主意，提出苏联参加首脑会议的新条件，最后退出了会议；1962 年把核导弹运进古巴又运出。这种左右摇摆可以说是赫鲁晓夫外交的一个特点，反映了赫鲁晓夫的外交水平问题和个人性格方面的缺点，这妨碍了对美政策的调整，但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政策路线是清楚的一贯的，不能把他的对外政策简单归结为杂乱无章，缺乏系统性和战略性。

总之，在科技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在核武器核战争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作用日益减小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调整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变化，使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的苏美关系从全面加剧对抗走向不稳定的缓和。两国的基本国策未变，冷战对抗不仅依旧存在，而且爆发了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核战争危机。不过，两国没有让危机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而是努力寻求谈判和妥协的途径，为调整和改善两国关系奠定基础。

第四章　中苏同盟的兴起与衰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牛　军

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中苏同盟从此诞生。这一事件在当时有相当复杂的含义和影响，它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通过与苏联结盟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终于选择站在苏联阵营一边。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看，中苏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导致了冷战更大规模地向东亚地区蔓延。从1950年末起，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已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经过1965年春夏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彻底决裂，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从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签订针对中国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到1969年春夏两国军队在边界东段和西段发生军事冲突，再到1970年代初中国逐步同美国建立起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系列发展不仅严重影响了中苏关系，而且也改变了1960年代以后的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面貌，甚至影响到国际冷战的进程和结局。

第一节　历史结构

中苏同盟是在中苏关系中已经存在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结构中诞生的，实际上这个同盟是因为能够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同盟的破裂又以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军事冲突作为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所以有必要首先大致揭示这个结构的内容和基本特点，以及其中包含的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性要求。

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终结了2000多年的帝制，同时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国名是中华民国。7年以后（1917年11月），俄罗斯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二月革命”后不久便推翻了临时政府，彻底结束了沙皇的统治，并开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名称

是苏联。中苏关系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发生了，即两个国家都是在经历内部的长期动乱，并先后发生了激进的暴力革命，终于从中产生了新的政权，分别开始了各自新的国家建设。历史表明，这两个国家当时显然都还没有经验、能力和时间来处理它们的前朝为双边关系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基本上都没有积极地探寻解决办法。

中国的清王朝与沙皇俄国有长时间交往的历史，并有漫长的边界线，加之1840年列强开始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纠纷，两国之间有数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中苏的新政府几乎继承了所有这些遗留问题，它们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俄国与中国的边疆地区如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等的关系，实质是如何处理沙皇俄国在中国边疆地区攫取的权益，如在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以及对中国边疆地区事务的干涉，如对中国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的干涉；二，俄国在中国取得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权利，如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在华驻军权等；三，与列强在中国的关系，如先后与英美和日本等处理在华关系；四，两国长达2万多公里边界的划界和部分地段的领土争议，等等。

由于历史和当时现实的原因，苏联新政府在国内的地位大致稳定以后，倾向于继承沙俄从中国攫取的某些利益，并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实际上也在延续沙俄帝国时期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尽管也做了一些调整。苏联政府作为双边关系中的获益者固然占据主动，将维护既得利益作为主要政策，甚至还以支持革命或维护民族自决权的名义，进一步介入中国内部的政争和支持非汉民族的分离活动。中国政府则穷于应付当时国内此起彼伏的政争和内战，基本上无暇处理中苏关系，当然，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也导致北京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控制边疆地区的局势，如新疆、蒙古和东北等地区，从而也就无法有效地解决同苏联的各种纠纷。更为严重的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处于动荡和分裂状态，苏联政府与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关系，包括同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军事集团以及地方势力形成了相当复杂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苏政府曾经两次达成协议，即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包含一系列附属声明书，同时签订了《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这项协议通过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前朝遗留问题确定原则和方向，为当时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包括两国通过

谈判解决沙俄在中国取得的各种侵犯中国主权的权利和两国的边界问题，以及苏联将遵循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原则，等等。[1]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包含一系列照会和附属协议）。条约的目的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稳定的中苏关系奠定基础，其内容仍然主要是解决中苏双边关系中一些遗留问题，如外蒙古地区的前途问题（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与新疆地区的关系（苏联不介入新疆地区事务，不支持新疆独立势力）、苏联在东北地区的权益（旅顺为苏联军港和苏联驻军权、中东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方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等等。[2] 这两个协议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它们的内容大致勾勒了中苏关系的轮廓并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但是协议本身既没有完全涵盖中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也没有为彻底解决那些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协议的一些重要条款并没有被执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动，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中国持续的政局动荡、内战，以及后来的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等等，致使羸弱的中央政府——不论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无能力也无暇应付苏联的压力和处理如此复杂、艰难之双边关系。

历史的过程表明，中苏关系的演变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在动乱和革命中新生的两个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是将这个过程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实际上中苏之间的一些重要而且麻烦的问题在中共革命运动的胜利进程中自动消失了，如苏联同列强在中国的关系、苏联同新疆分裂运动的关系、苏联在中国处于分裂局面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介入，等等。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成为随后出现的中苏同盟的一个基本背景。中国内部的革命性变化的确为中苏解决双边关系中复杂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为中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基础，问题是中苏两国领导人是否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好足够的准备。

---

①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相关的声明书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423—432 页。

②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照会和协定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第 1327—1340。

第二节　中苏同盟的缘起（1945—1950）

美苏冷战爆发、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以及新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当时所采取的政策等，促使中苏两个大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走上了结成战略同盟的道路。1950 年 2 月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双方关系达到了最高潮，为以后 10 余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综观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及新中国领导人与斯大林谈判的全部过程，可以说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

一、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对于理解战后双方关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维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在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指出这一点的必要性在于，导致后来中苏结盟和同盟破裂的种子，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种下的。

首先是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一再发生分歧。从 1937 年 11 月王明自莫斯科飞抵延安起，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分歧便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直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这场斗争才基本结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度拒绝了苏军统帅部关于组织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的要求。[①] 共产国际领导人为此指责了中共中央，但他们已不再能像以往那样，迫使中共中央改变其决定。这一时期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是一概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这并没有改变双方分歧的实质，即中共中央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维护中共党的利益，而苏联和共产国

---

① 《我军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1941 年 7 月 2 日；《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方针》，1941 年 7 月 15 日；《八路军新四军仍立足长期斗争方针》，1941 年 7 月 18 日。

际的出发点则是如何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

其次是维系双方关系的意识形态纽带被削弱。由不同的战略利益引起的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策略分歧，使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不满逐步发展为对中共的性质产生了怀疑。1940 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陈述了对中共的看法，即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①] 中共的整风运动加深了苏联领导人的成见。[②] 1944 年 6 月间，斯大林在与美国官方代表的谈话中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忘掉这种（共产主义）政治倾向”。[③]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中共不过是一个爱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一方面中共领导人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并非常尊重苏联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生搬硬套苏联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思想方面，如不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不能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在组织方面，如不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中共中央与苏联的分歧将会不断引起党内斗争，甚至导致党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毅然发动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心从根本上调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直至 1944 年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相当冷淡。这一时期它们都在根据各自的判断和自己的需要自行其是。1945 年春，由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和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终与美英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它的对华政策基本明朗。在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框架中，与处理对美和对国民政府的关系相比，中共对于苏联领导人实在不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只是在如何保持中国

① 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4 页。

② “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1943 年 12 月 22 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③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 June 22, 1944,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缩写为 FRUS）, 1944, Vol. 6, The Far East, China, pp. 799 – 800.

政局稳定和必要时可以被用来制约国民政府这个层次上才被考虑到。

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从1945年春季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苏联的政策和考虑如何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在苏联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的13天后，毛泽东批转了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指示。这项指示的核心就是将战略发展重心从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逐步转向在华北和东北配合苏军作战。① 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并在大会期间第一次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他经过长期考虑的争取东北的计划。②

不过确切地说，七大期间中共中央至多是确定了、或者说是在重申争取与苏联合作的原则。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已经了解到苏联参战后不会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因此毛泽东在热情赞扬苏联的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对得不到苏联援助有所准备，要靠自力更生。③

七大以后远东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苏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终于确定了有可能与苏联合作的范围——个非常有限的范围。8月3日，一直在重庆负责外事工作的王若飞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指出，苏联将与国民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④ 王若飞的报告基本上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一方面是苏联在制订其对华政策时，将中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处理对苏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中共面临的现

---

① 《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18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③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赫尔利、斯大林谈话情形》，1945年5月7日。

④ 《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6442/1。

实是他们只能在既定的和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苏联的合作。

二、战后初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形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国共间的矛盾。斯大林的电报揭开了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帷幕。中共与苏联的政策最初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很难发现有多少共同点。

苏联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上的条款变成现实的格局以及如何维护它在这个格局中的利益。斯大林给毛泽东打电报就是在履行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中承担的义务，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承认美苏之间的谅解。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考虑党的战略和策略时，主要是依据他们对战后美苏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而非对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的了解。1942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毛泽东一度认为，美英苏的战时合作在战后会维持下去，受其影响国共在战后可能继续合作，中国有可能走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①] 毛泽东当时设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苏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和美苏在战后继续合作；其二是中共的力量获得一定的发展。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在国际上，苏联的军事胜利的确是令人鼓舞的，但在美国加强援蒋时，中共却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在国内，中共的实力尚不足以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在决心利用日本投降之机争取使党获得强大实力地位的同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且他倾向于认为，制止内战的关键还是要有美苏之间的妥协和它们对国民党的压力。[②]

然而国际压力的方向却是对着中共的。先是美国公布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使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受降权。随后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美国方面则以出面担保毛泽东安全的方式给予支持。这时斯大林直截了当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卷，第389页。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34—435页。

②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1989年版，第15册，第228—230页；《毛主席在日本投降时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存，编号：721/7.1。

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要引起毛泽东的愤慨是不可避免的。[1]

中共领导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劝告，他们经分析认为，中国在东方对于美国犹如欧洲的希腊对于英国，为其所必争，“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必不能实现，因此苏联不可能公开援助中共。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2] 据此中共中央决心作出相当大的让步，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中共领导人认真争取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不等于他们认为肯定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更多的是依据对美苏对华政策的分析，而且他很清楚中共面临的困难。这决定了他一方面决心改变七大制订的联合政府的方案，准备在政治上作更多地让步；另一方面对谈判的结局持相当保留的态度。[3] 进一步说，在毛泽东对战后国共妥协的构想中，中共必须将主力向华北和东北集中，造成控制大片根据地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种构想本来就与得到苏联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赴重庆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大致确定了向北收缩力量和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从这种战略布局看，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谈判，很可能也包含着要换取苏联在更大的战略方面的支持。

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4] 战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转机。最初由于尚不了解东北苏军的政策，中共中央当时的设想只是军队抢先进入东北或布署在靠近东北的地区，而且进入东北后部队应部署在东北的东部、西部和北部，控制苏军未驻扎的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大发展的时机是在苏军撤出以后。[5]

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

---

①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著，达州译：《苏南冲突的经历》（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77年版，第98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②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④ 刘少奇：《目前形势与战略部署》，《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371—372页。

⑤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9—301页。

标，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1] 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担心中共的行动会影响苏联与美英的关系。[2]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开入东北，已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3]

然而时隔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苏联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美国的行动引起的。美国由于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4] 加之9月11日开始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而且美军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这些情况导致苏联开始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抽调20万—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党的中心移到此间"。[5]

苏联东北政策的变化对中共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10月下旬，在东北苏军的鼓励下，中共中央终于下决心"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性决战。[6] 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受政权等要求。[7] 苏方尽管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准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

---

① 参阅《程耿关于我军已与苏联红军会师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7日。《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②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

③ 《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

④ FRUS, 1945, Vol. 7, China, pp. 973－974, 979－980, 981.

⑤ 《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8日；《辰兄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年10月25日。

⑥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份作战部署的指示》，1945年11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365、394—396页。

⑦ 《要求苏联红军再留驻热河两个月》，1945年10月25日。《与国民党会谈方针及要求苏军缓撤》，1945年10月26日。

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①] 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后，即协助中共军队占领两地区，至使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在那里登陆。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成为战后双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实力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要实现其争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

三、内战前夕的分歧与合作

中共与苏联的在东北形成的战略关系毕竟是局部性的，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双方面临的外部压力，一旦促使双方合作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它们的关系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1945 年 11 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由于接收东北受阻，蒋介石决定中断与苏军的谈判。此时正值美国特使魏德迈来华视察形势，致使苏联怀疑蒋介石在东北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的指使。苏联方面认为，美国表面上不介入国共斗争，“但内部任务，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侵入东北的企图”。按苏联方面当时的估计，美蒋全力争夺东北尚需两个月时间作准备。[②]

苏联显然不希望在东北与美国形成对抗的局面，它立即采取行动缓和中苏关系。在国民党东北行营宣布撤退第二天，苏联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希望继续谈判解决接收东北。12 月中旬，斯大林向访苏的蒋经国说明，苏联无意介入国共斗争，不过国民党政府必须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并绝不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③]

苏联在缓和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同时，也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 月 20 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 50 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

① 《在彼所知情况》，1945 年 11 月 6 日。

② 《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 年 11 月 12 日。

③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 edited: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Hoover Press, 1989, pp. 126 – 127.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5 年版，第 124 页。

撤出东北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①]

对于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复杂的。在接到苏军通知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东北外交形势的变化，认为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之中”，东北局必须有所准备。[②] 在获悉苏军的要求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东北局，对苏军的决定“只有服从”，同时应争取苏军尽可能推迟国民党政府进入东北的时间，并让中共继续控制锦州至山海关地区。[③] 这时中共中央毕竟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虽然已无法独占东北，但仍有可能在苏方的帮助下，在东北大城市取得一部分政权。东北局也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④]

在如何理解苏联改变政策的动机方面，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这时较多地强调了苏联与美蒋斗争的一面。他们认为，苏联改变政策主要是为了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斗争。随着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恢复和12月下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协议，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苏联限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性的和临时策略行动，中共不仅不能独占东北，也不能再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东北大城市“插足”。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⑤] 从更深层次上考察，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包含着中共领导人在认识对苏关系方面的新发展。苏联一再不顾中共的困难自行其是，使中共中央不能不从极为现实的角度考虑与苏联的关系。

---

① 《满洲不准作战》，1945年11月20日。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② 《在苏军预定方针不变情况下从新部署力量》，1945年11月13日；《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页。

③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1—432页。

④ 《中央关于撤出1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448、434—436页。

⑤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9—1182页。《刘少奇关于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致彭真电》，1945年12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12—513页。

在1946年初的国共谈判中，由于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介入，中共中央多次设想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不过是可以在谈判中用来平衡马歇尔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对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① 2月中旬国共谈判转入讨论东北问题后，中共中央不再认为苏联参与谈判是必要的了，因为苏联为了表示其公平，"可能要我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② 3月间，由于美英和国民党政府掀起反苏浪潮，苏联在东北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又趋强硬，中共中央立即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东北苏军将部分地区交中共接收。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③

1946年春，伴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在东北的斗争也进一步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决不甘心东北由国民党政府一家独占。苏军在即将撤离时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④ 苏联的支持对中共领导人正是求之不得的，但他们也深知东北问题"中外瞩目"，而且国共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在东北夺取大城市，必须考虑其后果和国际上的反应。

4月间，正当国共争夺长春之战白热化之际，毛泽东在一份仅供党内部分领导人传阅的文件中指出，认为美苏妥协仍是一种总的发展趋势，但它们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必须"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更重要的是美苏妥协只能是各国人民对美斗争的结果。⑤ 按照他的看法，各国人民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是合乎逻辑的。8月至11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根本修改了

---

① 《中央关于提议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6年1月3日。

②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下）第77—78页。

③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5日。

④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1页。另见《可把我不占沈阳不断电源作为同国民党谈判资本》，1946年3月18日；《速向苏方交涉力争我接管长，哈，齐》，1946年3月26日；《彭真关于苏军撤退日期致李，黄电》，1946年4月3日。

⑤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1184—1185页。

他以往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处于“中间地带”国家中的人民革命不论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对于保卫苏联，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方针就是“战争的方针”，以战争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①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主要是针对党内不同意见和为党制定政策而提出的，但不能因此低估其当时苏联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在谈话中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运动置于超过苏联的战略地位之上，对以后双方关系的潜在影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重新估计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不再认为美苏关系对中国政治形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共不仅将摆脱美苏格局的束缚，而且将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束缚。

四、走上结盟之路

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最关心的是防止美国的介入。苏联一面利用一切场合，揭露和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面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但是从中共方面看，当中共领导人下决心以战争手段彻底打败国民党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下定决心要为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打破远东以美苏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毛泽东表达了对苏联与美国搞的雅尔塔体系的极度反感，对苏联总是要求中共为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对国民党妥协肯定十分不满。1947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政治小组讨论会的发言中，重申了他在 1946 年 4 月提出的观点，并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还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的协议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毛泽东这时或许并不知道法共和意共的政策与苏联有直接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番评论都构成对苏联的批评和挑战。在 12 月的中央全体会

---

①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93—1194 页；《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 年 11 月 21 日。

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靠外援”。[①]

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导致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1948 年 2 月 10 日，斯大林在会见南共代表时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在判断中国形势方面犯了错误，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共领导人是对的。[②] 同年春季，苏共中央决定接受中共的请求，帮助修复东北的铁路。5 月间，斯大林告诉受命前往援助中共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③] 苏共中央的决定和斯大林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在此之前苏联与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保持贸易联系是地区性的和策略性的行动，那么此后对中共的援助则是带有战略性的考虑了。

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前后，毛泽东显然认为需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了，因此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由于双方的种种考虑在内战期间始终未能实现，但它毕竟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的迫切愿望。[④]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与苏联发展全面关系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于 7 月 10 日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⑤] 11 月 1 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⑥] 刘少奇的文章既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也是在向苏联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

11 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后，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共党内的情况及其各项政策，他开始亲自掌握对华政策。[⑦] 1 月 14 日召开的苏共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访苏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议上决定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⑧]

---

①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系资料室存，编号：6521/2.5。

② 《苏南冲突的经历》，第 98 页。

③ N. B. 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 年第 21 期，第29 页。

④ 可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366 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下册第 675 页；Andrei Ledovsky："Mikoyan, 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No. 2, 1995。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 年 7 月 1 日。

⑥ 1948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⑦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第 9 页。

⑧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p. 77。

1月3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在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米高扬则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斯大林，并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斯大林的指示和意见。从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中共的战略和各项政策；（2）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共中央与王明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以消除苏联的误解；（3）毛泽东在东北、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上婉转地转达了希望苏联改变其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奉行的政策。具体内容不赘述[①]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表明，双方在中共的现行政策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涉及未来双边关系上的分歧并未解决。

米高扬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苏联方面，这种积极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的信任。1949年初是中共领导人开始为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外交蓝图的重要时期。米高扬的访问及随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在3月初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联对中共的帮助和支持，称"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②] 他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宣布了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③]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

五、中苏同盟的诞生

解放军打过长江后，中苏结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5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刘少奇组团访问莫斯科。6月31日，在刘少奇前往苏联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中国将坚决"一边倒"向苏联阵营。[④] 早在4月8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谈话中就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⑤] 他选择在刘少奇访苏前公开予以发表，显然也是为了一步消除斯大林的疑虑。

---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78；"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7、548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4—1435页。

④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1473页。

⑤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第152—155页。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从报告的内容看，中共代表团至少希望在下列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即：（1）使苏联了解并赞成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大政方针；（2）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协调；（3）新中国成立后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快予以承认；（4）在实现中国统一的斗争中得到苏联的帮助，包括解决新疆和台湾问题；（5）争取苏联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6）废除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间的中苏条约，代之以新的中苏同盟条约；（7）确定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原则。①

斯大林对凡是涉及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基本上表示赞成。在处理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强调要平等和互相尊重，并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领袖”，苏联和欧洲共产党人应向中共学习。对于中共希望得到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斯大林也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唯独在外交方面，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的答复相当复杂。他明确表示一俟新中国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但在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问题上，斯大林一方面承认该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另一方面对该条约涉及的有关问题——如苏联在旅顺驻军和中东路等等，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和试探性的。②

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使中共在建国前基本完成了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是否签订新条约了，而这正是双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摧毁了这一地区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且迫使有关各国面对一个在战火中崛起的新型国家。苏联要与新中国建立同盟关系，势必要进行两方面的调整。首先苏联需要理解，中共在中国革命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远东国际格局意味着什么？斯大林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前所未有的热情赞扬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理解力要比美国领导人深刻得多。其次，苏联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处理它从以往的国际格局中获得的好处。与新

---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403页；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7—79页。

②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403页；《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第77—79页；“Stalin Remark to Liu Shaoqi re Creating a Union of Asian Communist Parties”，July，1949，*Uncertain Partners*，pp. 232－233。

中国结盟苏联将得到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联是否情愿放弃它在东北获得的权益。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显然不如向中共领导人赠送“马克思主义领袖”这类头衔那么慷慨痛快。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对于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中共领导人肯定极为不满。[①] 当中共领导人决心与苏联结盟时，他们对苏联在此问题上将持何种态度并无把握。在解放军过江前，中共领导人已经在向党外人士打招呼，告诉他们“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②] 所谓“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只能是中苏条约了。刘少奇访苏期间曾就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向斯大林提出三种解决方案，即一是保持该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二是废除该条约，重订新的中苏条约；三是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该条约的现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新约。刘少奇同时还提到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问题。斯大林除许诺重订新约外，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这使条约问题成为后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焦点。

12月16日，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便与斯大林会谈，讨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称，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牵涉到千岛群岛。他建议就旅顺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即可。在毛泽东坚持要废除中苏条约后，斯大林才表示两年后可对条约作大的修改。[③] 22日，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即（1）周恩来来莫斯科解决中苏条约问题；（2）双方广泛讨论有

---

① 1945年8月17日、8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②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21页。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关问题，不必达成协议。[1] 但在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避而不谈毛泽东的建议。显然斯大林这时根本无意解决中苏条约问题，其原因至少包括不愿改变远东地区（包括外蒙古前途在内的）既定的格局，以及不愿失去苏联从中获得的权益。

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当天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谈时提出三个供苏方选择的方案：一，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简短的公报，说明双方在重要的问题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三，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个方案最好，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毛泽东在会谈后立即电告周恩来准备赴苏谈判，不过他这时对新条约的内容持相当保守的估计，认为与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只是"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2]

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确定了新条约的基本内容。此后谈判进入具体讨论阶段。一些间接的资料表明，双方在新条约的关键问题上，如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等，进行了有时甚至是尖锐的"讨价还价"（毛泽东语）。此外斯大林还以提供军事援助为由，坚持就东北和新疆限制其他国家进入达成一项《补充协定》。[3] 最后达成的协议对于双方肯定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系列协调和让步的结果。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同盟终于诞生。

从中苏条约签订到1957年秋，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其中有三个主要的事件巩固和促进了同盟关系。第一个是时间是两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基于阻止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中苏在中国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合作，停战谈判的重大决策和围绕朝鲜战争展开的外交行动等几乎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积极和密切的合作。这一合作凸显了两国在对抗美国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极大地加强了双方的战略互信，也极大地降低了两

---

[1]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第32页。

[2]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日、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5—96，97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1—25页。《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1956年3月31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21—22页。

国领导人在结盟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不信任和隔阂。

第二是个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开始有意地改变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包括苏军从旅顺完全撤出并移交该军港给中国，向中国移交东北、新疆地区四个股份公司中的全部苏联股份，从而根本解决了苏联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特殊权益。苏联同时还增加了给中国的经济援助。赫鲁晓夫在 1954 年秋访华是苏联方面加强中苏同盟的重大步骤和标志性事件，苏方的努力实际上为最终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气氛。

第三个事件是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苏共同努力克服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中共中央帮助和支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渡过了政治难关，同时中共中央也利用这一机会迫使苏共中央公开声明要改变它以往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和苏联阵营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10 月 30 日，在与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代表团会谈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①] 至少在表面上，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苏联应遵循的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准则。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对保持两国、两党关系发展至关重要的。1957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和苏共共同努力推动会议通过了一项显示国际共运内部团结一致的宣言。总之，这个时期中苏在双边关系、在国际共运内部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共识都在发展。

第三节　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6—1959）

后来的发展表明，中苏结盟显然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的基本结构，即它是相互毗邻的、有着漫长的边界并存在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同盟增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即中苏关系同时又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有着共同的政治体制，以及两国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居于核心或者说是主导地位。中苏结盟时实际上已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37—38，61—62 页；中央文献研究室遍：《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卷，第 630—631 页；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 年 9 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51—262 页。

有三个准则在其中运行，它们包括基于国际法的国家间关系准则、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都认可的领导者（苏共）和被领导者（中共）关系。在如此复杂的关系准则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中共和苏共两党的关系成为国家关系的核心，中苏结盟起始于两党关系的密切和领导与被领导地位的确定，中苏关系恶化首先是两党关系疏远及至分裂。当然两国关系恶化的终极表现则是未能彻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再次突出出来并导致军事冲突。历史的进程表明，中苏最初的分歧就发端于这个“蜜月”时期。

一、如何评价斯大林：分歧的肇端

即使在上述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双方已经在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点燃分歧的导火索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5 日，苏共召开了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在世时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露和谴责，结果是在苏联阵营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震动。

在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苏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似乎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直到西方媒体披露秘密报告的内容以及随后出现的动荡，导致中共中央于 3 月中旬多次召开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问题。从目前间接的资料看，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路线的确有不满或分歧，主要涉及到有关“和平过渡”的论述，以及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包括不赞成苏共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方式。其中如何评价斯大林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毛泽东等最终决定，应表示支持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同时说明中共中央的不同立场。[①] 3 月 31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直接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阐述了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即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即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①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551 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4 页。

但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亲自审改的文章，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与苏共中央的不同看法。[②] 此后，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在党内和在与苏联方面会谈中，多次阐述了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③]

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看法显然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加深了中共与苏共的分歧。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严厉批评了赫鲁晓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不仅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他第一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不仅在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于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④] 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指责苏共“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⑤] 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几次修改的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突出地强调了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性，并明确提出必须重视“反对修正主义”。根据参与起草文章者回忆，毛泽东这时断定所谓“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⑥]

面对中共中央的不满，苏联领导人的确降低了批评斯大林的调门，但赫鲁晓夫显然不接受中共中央针对苏共二十大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批评。在11月莫斯科会议讨论起草共同宣言的过程中，苏共中央在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上顽强坚持其立场，以致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同意将苏共的观点写进宣言。[⑦]

---

① “Record of conversation, Soviet Beijing Ambassador Pavel Iudin and Mao Zedong ”, March 31, 1956, *Brothers in Arms*, pp. 335 – 343.

②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版，第5卷，第286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版，第88页。

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3页。

⑤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⑥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吴冷西：《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66页。

⑦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第67—68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41—142页；《忆毛主席》，第30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页。

实际上莫斯科会议的成功只是暂时掩盖了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的分歧。

二、军事合作领域的分歧

到1958年春夏之交，随着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事件、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技术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事件的发生及其与中国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中苏关系开始全面逆转。

从双边关系的角度看，中苏最初的分歧出现在军事合作领域；在军事合作领域，裂痕最初出现在国防科技领域，具体地说就是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发展一些高技术武器。中国军队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裁军，以便集中财力发展先进武器，包括发展核武器。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

出现这类分歧从中国方面看，同当时中美对抗有直接的关系。自从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和公开的核威胁。第一次发生在朝鲜战争后期，其他两次核威胁分别发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美对抗与美国的核威胁强化了中国领导人迅速获得核武器的愿望。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 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得到苏联的援助。

苏联方面在帮助中国发展高技术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面临着许多复杂问题，这部分地是因为这类技术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涉及到核心的战略利益，故在涉及这类技术扩散时，通常都相当谨慎。另一方面，从冷战的进程看，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当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苏联内部（特别是在一些科学家中）也存在着限制发展这类武器的诉求，而赫鲁晓夫本人的倾向是清楚的，即在这个领域尽可能保持谨慎，不愿铤而走险。当然，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很重要。这种局面决定了在中苏在这方面的合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出现分歧在所难免。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第一次向苏联提出发展核武器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10月3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直接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虽然，他告诉毛泽东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中国不必为此花那么多钱。[①] 1956年间中国向苏联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同样被苏联拒绝。苏联的态度显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应“去掉依赖”苏联的思想，因为苏联会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留一手”。[②]

在中方积极争取之后，1955和1956两年中苏还是在中国发展核工业方面进行了合作，1956年8月苏联还与中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10月15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便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作出这一决定是很可能似乎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面临政治挑战，而中方在谈判中很可能是利用了这种局势以及赫鲁晓夫迫切希望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莫斯科会议的迫切愿望。在中苏双方起草国防新技术协定期间，赫鲁晓夫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联愿意提供有关国防新技术的模型和资料，他同时询问毛泽东是否亲自出席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席莫斯科会议，但直到10月15日签署协定后，他才将出席的决定通知苏联方面。[③]

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表明，中国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苏联同意提供生产原子弹和导弹的部分技术、资料和设备等，但是没有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对于协议涉及的重要项目，苏方当时没有就实施日期做出明确承诺，直到1958年9月29日中苏签订《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才就实施的具体计划做出明确规定。[④] 苏联很可能并没有打算满足中国对生产核武器与导弹的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尽管它派出了专家并提供了2枚短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样品。

---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6页；《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1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91—592页。

③ 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3—804页；《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20—22页。

④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苏联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的犹豫、被动和拖延等等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另外也很可能同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在防止核扩散领域寻求美国进行谈判有关。[①]不过苏联领导人必然要而且还会继续谨慎从事的，毕竟明确以援助生产核武器为目的向一个国家大规模转移核技术，对无论是哪个政府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苏联在世界政治中所处的位置与中国是很不一样的，它面对的问题、承担的责任和要处理的问题等，在当时都比中国要复杂得多。对于远比赫鲁晓夫更相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尽管苏联方面可能并不情愿，它向中国提供的这类援助的程度还是超过美国提供给它的盟友的。

从1958年夏季开始，中苏在一些军事合作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也在增加。1958年4月18日，苏联军队领导人于提出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苏联负担电台建设费用1.1亿卢布中的64%，中国负担36%。[②]中国方面认为这样分担建设费用，将涉及到电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向苏联方面说明，中国将负担全部建设费用，电台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③]苏联军方可能没有重视中国对电台所有权的关注，仍然坚持应由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中方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共同拥有所有权，因此不予接受，并明确提出中国负责建设，所有权属中国，可以双方共同使用。[④]在有关长波电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误解在中国方面看来显然是相当严重的，苏联方面看上去则有些反应迟钝。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苏联希望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反应强烈，提出"共同舰队"将以谁为主的问题。[⑤]

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国主要领导人约见尤金。会谈中毛泽东历数了中苏在斯大林时期和在当前的所有分歧和矛盾，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对中共不信任、赫鲁晓夫执政后限制先进技术转让、和平过渡问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看不起中国人以及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等等。就苏联方面的两项

---

① 可参阅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2—183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12页；《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329页。

③ 毛泽东："关于苏联请求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1958年6月7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6—317页。

④ 参阅《当代中国外交》，第113页。

⑤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322页。

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更带有所谓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泽东表现出特别难以容忍。除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外，苏联在先进武器和生产技术上的政策确实使毛泽东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并声称“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①] 最后他提出举行中苏高层会谈，最好是赫鲁晓夫到中国来。[②]

毛泽东的态度极大地震动了苏联领导层。7 月 31 日，赫鲁晓夫亲自率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海军部长库兹涅佐夫等赶到北京来平息毛泽东的愤怒，但是他百般辩解也是无济于事的。经过三次会谈，苏方同意按照中国的方案建长波电台，中国领导人则明确拒绝建立“共同潜艇舰队”。[③] 实际上苏联领导人既然无意按照毛泽东的愿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抹平已经出现的裂隙。

赫鲁晓夫一行于 8 月 3 日离开北京，23 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美国立即在台湾海峡大规模集结海空军力量。台海紧张局势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严重忧虑，因为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苏联不可能置身事外。9 月 5 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通报了中国炮击金门并不是立刻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并承诺“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④] 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台湾海峡的局势交换了意见。苏联方面在了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后，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了更明确和坚决的支持。[⑤] 但是，苏联领导人实际上并不赞成中国的行动，赫鲁晓夫认为访华时毛泽东未向他通报炮击金门的决定，这是难以容忍的不信任。[⑥] 赫鲁晓夫访华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要大张旗鼓地离开，双方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声明“就目前国际

---

①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22—333 页。

②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 322—333 页。

③ 《外交舞的新台上中国领袖》，第 149—158 页；《当代中国外交》，第 114 页；《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158—159 页。

④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166 页。

⑤ 《当代中国外交》，第 115 页；《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167 页；《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0 日。

⑥ 沈志华、李丹慧编：《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第 3210—3222 页。

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① 这当然很容易造成中苏在协商重大决策的印象。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毛泽东以中苏军事合作出现分歧为理由促使赫鲁晓夫紧急访问北京，本来就是为了使美国认为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的赞成和支持，毕竟这时空战已经开始。客观上给美国人造成中国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支持的印象，这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避免美军直接介入肯定是有利的。这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和更深入的分析来加以证明。

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的处理方式和中国炮击金门等，都严重损害了中苏之间的战略互信与合作，其后果是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矛盾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以致它们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协调政策。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显然是为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苏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国，以"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理由，将暂缓按照协议提供有关的模型和资料，两年后再根据形势作出决定。② 与此同时，苏联的核专家以休假为由全部回国，而且再也没有返回。这些再次间接地证明，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他们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再用8年时间发展成为核国家。③ 10月1日，访美回国途经北京的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苏联不再准备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毛泽东的回答是"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④

三、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

几乎与中苏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矛盾发生在同时，双方的对外政策方面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实际上这两个领域中的矛盾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相互影响，

---

① 见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4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③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6，565页。
④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4页。

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在对外政策领域，首先是双方对世界政治形势的不同判断导致了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就把世界政治形势描述为“东风压倒西风”，“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①] 到1958年夏季，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更为激进，他断言“西方国家怕我们怕的多一些”，“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正是这种思考逻辑促使毛泽东宁愿选择更激进的对外政策，甚至运用“战争边缘”的手段，削弱美国及其盟国，或者迫使其做出让步。[②]

在整个1958年，苏联对外政策从发展趋势上看与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当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国宴上，布置着象征熊熊烈火的电光盆景，上面有“解冻”两个大字。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解冻”就意味着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向“缓和”的方向调整是明确而且坚定的。1959年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召开二十一次非常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宣布将坚持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并提出一个发展经济的7年计划。为了实现赶超美国的经济目标，赫鲁晓夫重申苏共将继续“和平共处”的政策，其中包括“缓和个别地区紧张局势的必要措施，应该和争取这个国际气氛正常化的斗争结合起来”，苏联将致力于缓和与美国的关系。[③] 他在大会闭幕发言中用很大的篇幅谈论苏联的对外政策，包括缓和美苏关系、缓和在两德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呼吁美英共同谈判禁止核试验、发展苏印关系等等。赫鲁晓夫的重点就是缓和美苏关系，他通过对米高扬1月访问美国的积极评价，明显地试探美苏峰会的可能性。[④] 对于刚结束的米高扬对美国的两周访问，美国媒体分析那是在为赫鲁晓夫访美试水温。[⑤] 大会制定的对外政策表明，苏

---

①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16、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1、632页。

②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8—400页。

③ 赫鲁晓夫：《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言论集（1959年1—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102页。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1959年2月5日，《赫鲁晓夫言论集（1959年1—4月）》，第158—160页。

⑤ 美联社1958年12月17日报道，见《参考资料》，1958年12月20日，第20页。

联与中国之间在对外政策领域要避免碰撞是很困难的，因为双方在每一个问题上几乎都存在明显的分歧。这很快就反映到一些敏感的对外政策问题上。

与双方中断核合作中断同时，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1959年3月10日，中国西藏地区发生武装叛乱，印度在3月22日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西藏出现的叛乱“同印度当局有关”，而印度的背后有美国支持，并因此严厉地谴责印度领导人。[①] 苏联显然不赞成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立场将增加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并相信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军事冲突不利于苏联的缓和政策。就在中印关系开始严重恶化时，赫鲁晓夫在会见印度代表时公开声称，苏印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希望将来更好。[②] 8月25日，中印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关注。9月10日，苏联在中国已经表示反对后，仍公开表示不赞成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③]

由于中印关系本身具有的复杂内容，以及中印冲突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特殊影响，中苏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会造成长期的后果，这已经为后来的发展所证明。所以，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④] 这种反应在逻辑上包含着对苏联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的怀疑甚至否定。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赫鲁晓夫执政后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这次会晤是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赫鲁晓夫相信会晤意义重大，是苏联“道义上的巨大胜利”。[⑤] 赫鲁晓夫在会晤中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反对后，赫鲁晓夫只是表

---

①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87页；《忆毛主席》，第120，126—127页；《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

② 赫鲁晓夫：《在招待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邦长尤瓦拉吉·卡兰·辛格及其夫人的宴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30日，《赫鲁晓夫言论（1959年1—4月）》，第十一集，第426页。

③ 《前苏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8页。

④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版，第71页。

⑤ 尼·谢·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版，第622—623页。

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1]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曾经授权赫鲁晓夫调停中美关系，因此在后来的中苏会谈中他们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

可能是为了表明中苏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并说服中国与苏联协调对美政策，赫鲁晓夫访美后不久便访问了北京。在9月30日的中国国庆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在他的公开致辞中阐述了他的重要观点，他说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2] 在随后两天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配合苏联的缓和政策。他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且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不仅没有被中国领导人接受，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在他们在会谈中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所有观点。毛泽东在会后认为，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3]

1959年10月初的中苏峰会失败成为中苏同盟关系走向衰亡的一个转折点，中苏分裂至此无法逆转。10月的中苏首脑会晤以后，重新思考国际问题和中苏关系，一度成为毛泽东关心的重点，而且他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做准备。

在后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系列讨论国际形势、苏联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的会议上，毛泽东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评论。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等观念，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不满，他本人在审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还专门要求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4] 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也证明，当

① 参阅张少华著、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湾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② 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

③ 《前苏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第19—20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0—164页；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

④ 毛泽东：《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956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85页。

时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中共与苏共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调和的，尽管在某些专门的事务上有分歧。但在1959年峰会失败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明，他对1956年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担心也是他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的原因之一。[①] 显然，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同军事领域的合作受挫相互交织在一起，极大地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四、“大跃进”与同盟的危机

如果双方仅仅对1959年发生的纠纷就事论事，中苏同盟的破裂至少会被推迟，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种剧烈冲突的形式结束。可以肯定地说，1957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两国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分道扬镳才是各种纠纷的根源。与上述军事和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相比，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苏联的反应造成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脉络看，1959年10月以后中苏矛盾愈演愈烈毋宁说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不过，如果仅仅对1959年间发生的纠纷就事论事，中苏同盟的结束至少会被推迟，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种剧烈冲突的形式结束。可以肯定地说，1958年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在此判断基础上制定的国内政策及其后果，对中苏同盟的演变影响甚为巨大。

1957年到1959年对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独特的时期，这个时期产生的影响深远的事件是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既定方针的开端；从他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一次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整风”，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中国国内这些重大事件同上述种种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极大地加速并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

①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99—603，604页。

1958年夏季，毛泽东不仅认为国际形势很好，而且国内形势也是少有的一派大好。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①] 有了这样的精神，原定15年超过英国的计划便被提前为两年，而且“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②]毛泽东甚至认为中国有可能比苏联还要早的进入共产主义，这大概是他发动“大跃进”的最高目标。[③] 值得注意的是，是炮击金门后不久，中国驻苏使馆的一些报告声称：苏联对大好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尽管“深度还不足”。报告说赫鲁晓夫几次提到“我们对付战争的正确的态度，即决不害怕战争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评价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并且“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毛泽东对此类报告的反应很可能是非常高兴的，他欣然地强调对苏联要保持“谦虚的态度”。[④]

后来逐步披露出来的情况表明，赫鲁晓夫本人这时对中国的“大跃进”至少也是持怀疑态度的。1958年12月17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访苏期间，赫鲁晓夫曾经向前者表示不赞成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赫鲁晓夫在有中国代表团参加的苏共二十一大闭幕致辞中反驳了这种说法。[⑤] 美国新闻处于第二天即2月6日报道称，汉弗莱坚持赫鲁晓夫的确说过那些话。中国内部供高级领导人阅读的《参考资料》刊载了路透社报道的相关消息。[⑥] 毛泽东没看到这则消息的可能性很低。

“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露出的败相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已经公布的毛泽东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关论述中，至少他本人没有看

① 毛泽东：《对〈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958年3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55页。

②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规划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

③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53页。

④ 毛泽东：《对驻苏大使馆关于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报告的批语》，1958年10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86—487页；毛泽东：《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959年1月15日；《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6、41—42页。

⑤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第171页。

⑥ “赫鲁晓夫驳斥汉弗莱撒谎”，《参考资料》，1959年2月7日（下），第26页。

到“大跃进”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反之他不得不同时应付包括来自中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和挑战。毛泽东从《内部参考》上读到赫鲁晓夫7月18日有关苏联公社问题的批评性讲话后，他很可能认为这证明了赫鲁晓夫的确在就在美国人面前诋毁过大跃进。① 他随后开始部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②

在不久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反对意见看上去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有同样之处，毛泽东便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并逐步从中演绎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1959年夏季是毛泽东这个思考过程的开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怕中国国的共产主义”就是怕中国“大跃进”成功导致苏联失去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力。③ 历史的演变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逻辑决定了从这一时刻起，中苏关系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从这个角度看，围绕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评价所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致命的，这部分原因是那场运动对后来中国政治的影响极为复杂和负面。它也在此证明了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对同盟关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节　中苏同盟的衰亡（1960—1965）

尽管如上所述，中苏关系从1960年春季开始出现缓和，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中苏双方都明显地不希望两国关系继续紧张下去，尤其是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和周边环境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任由中苏关系恶化。从实际发展过程看，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确一度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状态，紧张和缓和两种趋势交互出现。

---

① 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2页。

② 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年8月9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年9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2—463、504页。

③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第601页。

一、短暂的缓和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人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形势、苏联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的会议中，对苏联对外政策发表了尖锐的评论。[①] 当时苏共中央同样表达了将在同中共中央的分歧中坚持自认为是正确的立场。[②] 另一方面，双方都明显地不希望关系继续紧张下去，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尤其是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和周边环境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任由中苏关系恶化。

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确定了一项总原则，即"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③] 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不过毛泽东首先找到的办法是进行意识形态争论，他很可能相信，通过辩明所谓的理论是非可以促使苏共放弃错误的政策，从而推动中苏关系实现和解。将中共解决党内矛盾的所谓经验——"从团结的目的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运用于中苏关系，与苏联展开思想理论的争论，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处理中苏关系的突出的特点，也是他悲剧性的尝试。

1960年4月20、22、23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先后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修改过的两篇文章和一篇报告，系统阐述了他们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发表这些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将中苏在国际事务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归结为赫鲁晓夫背离列宁主义。[④]

苏联方面也为理论争论进行了紧张的准备。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共中央的行

---

①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第599—603，604页。

② 《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288—3324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上），第248页。

④ 《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196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196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动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挑战苏共的地位，因此必须予以反击。6月间，苏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和政策。后来的情况证明，苏联已经为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伐中共进行准备了。①

6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苏论战的战场。在苏共中央的指挥下，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中的多数人指责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对苏联的批评，赫鲁晓夫更是无所顾忌地指责甚至讥讽中国领导人。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也是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从双方争论的内容到争论的方式看，都可以说布加勒斯特会议已经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中苏两党的论战从一开始便波及到国家关系。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便单方面决定停止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以便防止中国利用这些刊物，在苏联进行宣传。7月16日宣布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随后又单方面终止了12个协定和数以百计的合同、合作项目。② 与此同时，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了边界纠纷。

鉴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和全面的影响，中苏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试图控制住急剧恶化的两国关系，因为双方都感到有必要修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遭到破坏的国家关系。而要恢复合作，改善两党的关系是先决条件。

从苏联方面看，缓和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5月间发生了美国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的事件，苏、美、英、法巴黎首脑会晤流产。赫鲁晓夫的对华强硬政策也受到苏共党内和政府一些部门的反对。因此苏联一再向中共中央呼吁，就解决双方的分歧举行两党会谈。

如前所述，中共领导人并不希望中苏关系继续紧张，尤其不希望中苏两党的争论冲击国家关系。毛泽东本人也未必预料到，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会如此迅速和全面地破坏两国的国家关系。苏联撤退专家和终止协定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这无异于给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尽

---

① 参阅 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3, 168 - 169.

② 《当代中国外交》，第117—118页。

管毛泽东善于用辩证的思考将“坏事变好事”，但那并不能解决国民经济当前面临的严重困难。这期间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也强调，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中苏的矛盾是局部性的，斗争的目的还是恢复中苏“团结”。[①]

9月初，中苏两党达成协议，在11月召开81国共产党会议以前，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就解决中苏分歧提出五点建议。[②] 9月17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谈。从此直到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会议闭幕的50多天里，中苏两党代表和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就他们当时认为是无比重要和神圣的共产主义运动理论问题展开激烈和尖锐的争论。尽管如此，从莫斯科会议的最终结果看，双方显然都不愿意彻底决裂并为此做出妥协。

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中苏团结的气氛中闭幕。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一安排象征着两党关系正常后，两国的关系也立刻得到了改善。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和刘少奇对苏联的国事访问，中苏双方都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肯定和赞扬。两国关系从1961年起得到明显的恢复。在经济方面，苏联主动提出向因自然灾害而严重缺乏食品的中国提供90万吨谷物（20万吨小麦和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③] 2月中苏就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新的谈判，4月签订贸易议定书表明两国重新开始正常贸易。在军事安全领域，苏联主动提出愿向中国转让米格—21型军用飞机的全部技术，中国应邀继续参加了华沙条约国的会议，在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与苏联协调的姿态。6月间，苏联向中国通报了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情况，并提出勃烈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和邀请中国领导人访苏。

1961年以来的中苏关系用苏联领导人的话说就是“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④] 中共中央也表示，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具体协商解决。[⑤] 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苏共召

---

① 参阅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第90页。

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104—105页。

③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0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4页。

④ 《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

⑤ 周文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530—531页。

开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二、走向全面破裂

中苏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妥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然而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让步并不等于基本问题的解决。此后中苏关系的改善在双方来说，都是他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使然。实际上在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上，中苏基本上是在各行其是，同时试图谨慎地不使局部的分歧全面破坏当时两国日渐好转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

1961年2月上旬，李先念率中国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莫斯科，与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苏方介绍了苏阿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李先念表示中国希望苏联主动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团结。[①]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进行的情况看，苏阿双方都没有能稳妥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中国却明确地站在了阿尔巴尼亚一边。会议结束时，苏联警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考虑反苏引起的“严重后果”。[②] 在3月和8月的华沙条约国会议上，中国再次面临苏联等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谴责，不得不为阿尔巴尼亚与它们发生分歧。尽管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曾经建议中国政府，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危及中苏关系，但阿尔巴尼亚问题最终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③]

在10月17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苏双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几乎发生了直接的交锋。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科兹洛夫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谴责了阿尔巴尼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④]

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期间即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有分寸但相当明确的反驳。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在激化。11月间，当时

---

① 《出使苏联八年》，第108—109页。

② 参阅D·C·瓦特著、于树生，万紫，周国卿译：《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236页。

③ 《出使苏联八年》，第115—116页。

④ 《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约见刘晓，指责中共中央发表阿尔巴尼亚的反苏材料。[1] 12月苏联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国代表在几次国际会议上都公开批评了苏联的决定，中国的舆论工具则不断地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并报道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各种援助的消息。

从后来的发展看，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争论只不过是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控制因而大加利用的一个矛盾发泄孔。持续激化起来的中苏争论的基本原因是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会议决定将斯大林墓迁出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地，安置在克里姆林宫旁。苏共二十二大还批判了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并决定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必欲置于死地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反对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内外政策了。既然赫鲁晓夫决心利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将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策，清除党内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上可能出现的情况看来是有所准备的。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即提出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并获苏方同意。中共代表团当时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各献花圈一个。在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写上了“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苏联领导人对此必定是极为不满的。周恩来在二十二大上发言后，引起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不断指责。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提前回国，并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彭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继续参加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毛泽东向路过北京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强烈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二大纲领的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批判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是在攻击中国。[2]

尽管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事态已经如此严重，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期间没有立刻向中国发难，而且在二十二大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低姿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缓和政策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响应。就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爆发了又一场的柏林危机，美苏两国的军队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峙。1962年春，苏联在东西德关系、核禁试和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

① 《出使苏联八年》，第112页。

② 《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谈话》，1961年1月7日。

抗的状态。8 月间在柏林再度出现危机和军事对峙。10 月间终于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面临接连不断的严重危机时，当然不会蓄意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以致给自己的外交雪上加霜。

中国自 1960 年确定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政策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赫鲁晓夫已经是深恶痛绝，但党的多数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中苏破裂已经不可挽回。他们认为中苏关系将是“时紧时松”，“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①] 这一时期负责中联部的王稼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甚至提出了更为稳健的建议。[②]

中苏双方试图维持住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冲突仍然发生在最敏感的安全领域。1962 年春，由于中国经济困难和苏联插手，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沿边境地区发生 6 万多中国边民集体越境前往苏联，中苏双方为此再次互相指责。8 月间，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它将接受美国的建议，不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中国对此做出极为强烈的反应，三次敦促苏联不得在与美国等国的谈判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③]

自夏季以来，中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10 月 8 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沃年科，通知苏联方面，如果印度继续挑衅，中国将进行军事反击。[④] 10 月 14 日，赫鲁晓夫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举行欢送宴会。席间他除了声称必须加强中苏团结，还向刘晓表示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理解中国准备军事反击的立场。他还说苏联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制止印度的挑衅，并停止向印度出售米格—21 型战斗机。[⑤] 这时苏联正在应付古巴导弹危机，拉拢中国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很可能是基于以往的教训，中国未对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作出答复。10 月 20 日，就在中国政府就核扩散问题向苏联发出第二份备忘录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展开军事反击。苏联通过舆论给予中国相当有限的声援。

---

① 《出使苏联八年》，第 114，131 页。

② 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 年 3 月 31 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 年 6 月 29 日，《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版，第 444—445，446—458 页。

③ 《当代中国外交》，第 120 页。

④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502 页。

⑤ 《出使苏联八年》，第 119—122 页。

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中苏在此前的短暂合作也随之迅速结束。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从12月中旬起，连续发表了7篇评论文章，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不点名的）全面批判。

这场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1月16日，苏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高级会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契尔年科时，拒绝停止论战，但同意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邀请赫鲁晓夫访问中国。3月9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赞成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提出会谈应该讨论那些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两国的关系。[①]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于5月15日举行会谈，并就中国提出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全面阐述了苏共的主要观点。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②] 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日开始。

6月1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复信，题目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建议》中说，苏共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中共中央有必要就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③] 中共中央公开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和《建议》中的观点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在此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苏共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行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文件，要求苏共中央代表在会谈中必须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6月27日，苏联驱逐了3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中国公民，理由是他们在苏联非法散发中共中央的《建议》。7月1日，

①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1963年3月9日，《学习文件汇编》，三集，第16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52页。
③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学习文件汇编》，三集，第19页。

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是在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1] 在如此炽热的气氛中，于7月5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除了继续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20日，中苏发表了公报，实际上宣布了会谈的失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苏会谈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苏联在中苏会谈的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在5月之前，苏联一直未对美国总统肯尼迪关于重开谈判的建议作出答复。5月下旬，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表示将在莫斯科接待美英特使，谈判签署一项核禁试条约。两天后肯尼迪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与美国关系的迅速进展使赫鲁晓夫在攻击中国时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议开始前一天，赫鲁晓夫在公开讲话中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声称“只有疯子”才会指望用核武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每消灭一个资本家，就会有一百万工人陪着送命”。对那样的人“历史会教训他们的”。7月14日，美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他们受到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真理报》当天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声明，指责中国领导人蓄意要在核战争中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声明称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亿万人尸体上创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2] 这一系列行动表明，赫鲁晓夫已经不再有缓和中苏关系的诚意，他们宁愿与美国携手，也不会对中国作出让步。

25日，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美苏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是表明苏联更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所以中国领导人猛烈地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3] 从9月6日起，中国开始发表批判苏联的系列评论文章，苏联也对中国展开全面反击。中苏两党会谈与几乎同时发生的美苏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等实践表明，中苏同盟的消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1963年7月1日，《学习文件汇编》，三集，第75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宪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644—645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第495页。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立即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尝试改善中苏关系。[①] 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不仅没有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政策的担忧，尽管苏联新领导人很可能怀有相同的意愿。1965年2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借道北京访问越南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乐中苏关系中每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周恩来也在同柯西金举行的专门会谈中，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此后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中承诺，中方愿意履行这6点建议。[②] 中国领导人希望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愿望显然难以实现，两党关系在两国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决定了同盟的最终命运。

3月1日至5日，苏共中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发表了会议公报。推迟召开这次会议是在2月北京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先决条件。苏方的行动导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于3月23日联合发表经过毛泽东本人多次修改的社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通过谴责苏共中央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宣布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不复存在。[③] 6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提出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④] 9月6日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印度，同时指责苏联同美国一样也在"为印度侵略者撑腰"，其目的之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反华浪潮"。[⑤]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两国的对抗开始升级。从中苏同盟角度看，苏联的这一决定是严重的，因为在同盟条约存在的情况下，苏联同另一个国家签署针对中国的军事条约，表明它已经认为中苏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同盟关系则名存实亡。

---

①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辑，第19页。

②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5—447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3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1页。

③ 《十年论战（下）》，第916—918页。

④ 196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5年9月7日，1965年9月8日《人民日报》；《谁在给印度侵略者撑腰》，1965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中国领导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3 月 28 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①] 至此中苏同盟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第五节　同盟消亡及其后果

与中苏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等领域展开大论战的同时，中苏边界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成为中苏关系中一个日益突出的可能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热点。

中苏两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并且曾经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这种情况是由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造成的。在历史上，沙俄以武力、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苏同盟，也是因为考虑到中苏边界问题涉及的历史因素，表示仍然准备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当时的问题在于，沙俄和苏联超越了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有和在地图上划去了 3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从而在中苏边界的东西两段形成了一些有争议地区。

60 年代以前中苏友好相处的时期里，尽管两国在边界部分地带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在边境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安无事，双方的边防人员和边民也能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恶化后，双方开始关注边界问题，它们都加强了在边界地区的武装巡逻，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制造边界纠纷。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边界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苏敌对升级的表现形式和双方斗争的手段，特别是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特殊手段。

从 1960 年 8 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了。据中国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从这时起到 1964 年 10 月，共发生 1000 余起。[②] 在此期间，苏联方面不仅在中苏边界制造纠纷，苏联

---

① Masaru Kojima edited, *The Record of the Talk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okyo, 1980, pp. 206 – 207.

② 《人民日报》1969 年 5 月 25 日。

领导人还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特别是利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谴责中国的对外政策，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①] 针对苏联领导人的指责，《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8日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该社论在列举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也包括了中俄之间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等，指出这些条约从"中国的东西南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文章提出，苏联领导人现在提出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出两国间存在的不平等条约。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最终还是未能达成协议或谅解。很可能是为了向苏联方面施加压力，毛泽东于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时说，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笔账呢"。[③] 毛泽东的谈话被公布以后，引起强烈的震动。苏联方面9月初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可能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澄清他谈话的本意，毛泽东曾经于9月10日利用接见法国客人的机会，说明中国无意要求苏联归还那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只是说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是"采取攻势"让苏联人"紧张一下"。[④] 但是苏联领导人并不肯就此罢手。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⑤] 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

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10月7日和9日分别会见北朝鲜的崔庸健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⑥] 他在考虑部署华北大城市的防御时，特别指出

---

①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534页。

②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

③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中美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第6页。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42页。

④ 《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⑤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第541页。

⑥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发展》，第45页；《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第7页。

“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①] 1965 年 5 月 21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②]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公布的最能够直接说明中国曾经有过应付苏联发动战争的准备的文献。

主要是由于在南面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虽然对苏联可能采取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抱有高度的警惕，但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对边界争论采取了冻结的态度。中国当时的确严厉抨击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仍限于口诛笔伐，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③] 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苏联的威胁与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有根本区别，美国的扩张才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上述认识和反应同迅速增加的中苏边界纠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决定在中苏边界采取强硬行动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从 1964 年 10 月起到 1969 年 3 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 4189 起，比此前增加了三倍。[④] 即使说当时公布的这个数字有所夸张，它所反映的情况也是足够严重的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策层于 1968 年 1 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⑤]

1968 年 8 月 21 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是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8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中国的主要军政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会议讨

---

①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 654 页。

② 周恩来：《我们将赢得进步，赢得和平》，1965 年 5 月 21 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卷，第 520—525 页。

③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 辑，第 287 页。

④ 《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1969 年 5 月 25 日《人民日报》。苏联方面公布的数字更为严重，据 1963 年 9 月 20 日苏联政府的声明，仅 1962 年就发生边界纠纷 5000 多次。R · 迈克法考尔和费正清著、谢亮生，杨品泉，黄沫，张书生，马晓光，胡志宏，思炜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59 页。

⑤ 李可和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8 页。徐焰：《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 5 页。

论了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形势，决定对苏联进行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即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①] 10 月 31 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②]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一再提出，现在需要考虑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而且它们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了。”[③]

1969 年 3 月，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了军事冲突；8 月间；苏联军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袭击中国边防部队，致使军事冲突从东段蔓延到边界全线。中国在进行大规模大战备的同时，进行了安全战略的大调整，即将苏联确定为对中国安全的首要的和最严重的威胁，并据此改变对外政策，积极争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伴随着中苏同盟的破裂而出现的中美关系缓和，最终酿成了冷战大格局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这种新的战略关系的出现，对后来国际冷战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冷战两极格局的解体，大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

①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人民日报》1968 年 8 月 23 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 年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1968 年 11 月 1 日。

③ 《毛泽东会见巴卢库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 年 11 月 28 日。

第五章　1956年波匈事件中的苏中关系

苏中关系在同美国冷战对抗中、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其中，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更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国际关系或现代化的角度讲，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的研究，既是冷战国际史，更是中苏关系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① 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②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

---

① 目前历史学家查阅有关1956年危机的档案文献，除了去俄国、匈牙利、波兰的档案馆外，还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档案馆（SUA）和军事历史档案馆（VHA），以及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档案馆（SAPMDB）。此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收藏了各种文字的有关这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

② 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4、5、6；Csaba Békés，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Issue 2，1992，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24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Leszek 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 "Polish October"，*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Mark Kramer，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1956，*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A. Werblan，J. Stepien，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l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ty z pazdziernika 1956r.，Dzis，nr. 4/1995；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XXIX，nr. 4/1997. 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

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1]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民间机构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2]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3]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国际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4]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

---

① Janos Rainer, The Yeltsin Dossier: 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pp. 22－24。

②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Christian Ostermann ed., *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6.

③ 见 В. К.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实际上，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还有东德、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文献。

④ 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以下一些：波兰学者Tony Kemp-Welch的论文讲述了波兰危机的起因（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 The Spring of 1956,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2, 1996），而Leszek Gluchowski的文章则详细讨论了波兰危机的过程，特别是波兰内卫部队的作用（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 *CWIHP Working Paper* №17, 1997），俄国学者В. Л. Мусатов和Л. Я. Гибианский的两篇论文研究的是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在其中的作用（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5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1; Н. С. Хрущев, И.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2），美国学者Mark Kramer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苏联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决策过程（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1996/1997），匈牙利学者的论述集中反映在两本论文集中（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 – Forty Years 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7; Jen Gy 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而Csaba Békés的文章（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WIHP Working Paper, №16, 1996）和Johanna Granville的专著（*The First Domino: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 2004）则重点研究了西方大国对事件的政策及其影响。此外，Granville在另一篇文章（1956 Reconsidered: 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80, №4, October 2002）中，还对这两次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

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1] 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2] 究其原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3] 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4] 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

---

① 例如 Granville 在其 300 多页的专著中，提到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地方仅有几处。就笔者所见，研究中国与波匈事件关系的，只有旅美华人学者陈兼（Chen Jian）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 年，北京）提交的一篇论文（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后来被修改并扩展为他的一部很有影响的专著（*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中的一章。

②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除一些通史类著作对此略有涉及外，主要是一些回忆录，如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担任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文章（《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国际问题研究》1981 年第 1 期）和当时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骆亦粟的文章（《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比较集中谈到中国对事件的反应和作用的应属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录（《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至于研究著作，涉及波兰问题的有一些论著，如王逸舟的《波兰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刘祖熙、刘邦义的《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等，其中论述 10 月事件的内容均比较简略，且使用的资料已显陈旧。利用最新解密档案研究匈牙利事件的唯一学术成果，应属胡舶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该书辟专章讲述了中国与匈牙利事件，其结论是"中国的影响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第 250 页）。

③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现在已经对外开放，而且解密的文献年限在 1—2 年后即可到 1960 年，学者期待的是那时可以看到有关波匈事件的中方档案。

④ 过去中国官方对匈牙利危机的定性是"反革命事件"，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仅限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当时公布的文献，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等。其实，早在 1980 年代末匈牙利政府就已经为 1956 年的事件平反了——被称为"起义"或"革命"（详见 Terry Cox, 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 pp. 1 –13），外人又何必战战兢兢，况且在这里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两国关系发生哪些变化。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①

一、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苏中关系又因此发生什么变化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苏联与东欧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斯大林解决战后东欧问题依据的是两个原则，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而从内部强化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为了与西方大国合作以求得和平发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给予东欧各国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这两项原则的政策体现，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避免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利益集团，而宁愿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来保证各国政府的亲苏政策，不鼓励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等等，这就是冷战态势形成以前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基本框架。斯大林主张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失败，再加上美、英、法等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的进逼方针，导致莫斯科迅速转变了对东欧的策略，作为国际性集团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

① 应该承认，除中国档案外，已经发表的各国文献和口述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其中充满了矛盾和疑点，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解读，小心考证。限于篇幅，本文只以经过笔者梳理和对比后确认的材料构成叙述主线，至于许多史料和论著中的偏差和舛误就不再一一指出了。

局应运而生。[1] 在冷战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督促各国实现共产党一党统治，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而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到 1952 年 10 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2]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 1955 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38 年 8 月 16 日无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12 月 8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3] 第一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猝死莫斯科，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 1939 年在卡廷发生的枪杀波兰军官案件、重新评价 1944 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4] 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

---

① 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述详见《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 年第 6 期）、《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冲突的起因和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有关战后初期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俄国档案文献已有大量译成了中文，可参考沈志华（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第 7、17、19、22、23、24、26 各卷。

② 有关资料除可以参见俄国学者近年发表的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不久前出版的专题档案文献集：Т. В. Волокитина и Г. П. Мурашко，*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Т. 2，*1949 – 1953*，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

③ А. А. Фурсенко，*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 906。

④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22，оп. 40，1956г，п. 336，д. 10，л. 31 – 32；А. М. Орехов，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Р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 – 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1995，с. 222 – 224。

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Edward Ochab），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①] 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出山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②] 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③]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在1953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Ger? Ern? e）、法尔卡什（Farkas Mihály）和雷瓦伊（Révai József）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伊姆雷（Nagy Imre），内务部长法尔卡什和理论家雷瓦伊则退出领导岗位。尽管纳吉的改革由于阻力重重而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反对优先发展

---

① 3月15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华沙，并参加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有材料说，奥哈布由于其在党内的中间立场而备受苏共中央的青睐，尽管赫鲁晓夫本人有自己的考虑。但重要的是，经过激烈争论，波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付印交与各级党组织讨论。见 Орехов，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ИР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 223。

② ［波］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于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7—28页；［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5—137页。对于当时波兰的社会状况，新华社记者在内部曾有一篇非常详细和生动的报道，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1895期，1956年6月1日，第585—597页。

③ 有关波兰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党内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派）斗争的详细情况，可参见 Tony Kemp-Welch，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A. Werblan，Czy Chinczycy uratowali Gomulke?，*Polityka*，26 X 1991r.。笔者请陈世泽先生翻译了 Werblan 的波兰文论文，才得以了解其内容，谨在此表示感谢。

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1955年2月下台，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主义错误而失去了权力，8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改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前匈牙利外交部长拉伊克（Rajk László）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特别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①]

东欧与中国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进行访问，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②] 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在1949年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③] 在建国之初与苏联大使罗申（A. Roshchin）的谈话中，毛泽东反复表示了他对与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尽管当时中国“甚至不知

① В. Л. Мусатов，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г.，№1，с.4 – 6；Б. Г. Путилин，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ИР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242-248；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28 – 30、35 – 40、85 – 87；Гибианский，Н. С. Хруще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с.12.

② APRF（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f.39，op.1，d.31，pp.45 – 46。转引自 Odd Arne Westa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 – 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99 – 300。

③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8，л.11 – 50。

道他们外长的姓名"。[①]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最初提出的访苏计划中，再次安排要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到东欧访问一个月。[②]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东欧的访问始终没有成行，但他对东欧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③] 毛泽东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况且，东欧国家与中国如何发展关系，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东欧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④] 在1950年10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朝鲜战争而面临危机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⑤] 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围，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外交往来，对相互间的国内政策谈不上有何影响。[⑥]

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密切注视着东欧发生的事情，[⑦] 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的召开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都在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兴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国传播以后，一时众说纷纭，思想极为波动，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国党如何表态。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

---

①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48－51；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2－33.

② И. В. Ковале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г.，No 1－3，c.89.

③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Ковале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c.78－79；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2页。

④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1－2.

⑤ 中国驻华沙使馆报告了波兰人听到中国出兵的消息后无比兴奋的状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083—03，第2—3页），作为中国首批驻苏联的外交官，荣植先生也曾向笔者讲述过同样的情况。

⑥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4—77页。

⑦ 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览的《内部参考》在这一时期连续不断地大量刊登对东欧的报道，就是一个证明。

解吧！[①] 波兰人还常以羡慕的口气对中国留学生说："你们中国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国，斯大林不敢命令你们，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政策的。我们是小国，一切都要听从别人。"[②] 匈党中央委员、驻苏大使波尔多茨基（Boldoczki）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匈党中央书记科瓦奇（I. Kovács）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③] 如果说过去人们赞赏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开始关心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都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情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波兰非常流行，受到极大的赞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④] 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以至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⑤] 据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报告，格罗在解释"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人士对苏联表示冷淡的问题"时说，在许多党内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发展，然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

---

① 《内部参考》第 1817 期，1956 年 3 月 5 日，第 17—19 页。另据新华社记者报道，在波兰有人因不了解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几个论点而未能通过哲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考试。见《内部参考》第 1919 期，1956 年 6 月 28 日，第 719—720 页。

② 《内部参考》第 1895 期，1956 年 6 月 1 日，第 588 页。

③ 《内部参考》第 2013 期，1956 年 10 月 8 日，第 820—822 页。

④ 《内部参考》第 2033 期，1956 年 10 月 24 日，第 1209—1210 页；第 2211 期，1957 年 5 月 7 日，第 26—27 页。2004 年 4 月 17 日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

⑤ 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43, Jul. -Sep. 1970, p. 122.

国家好像没有个人崇拜现象"，"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以苏联为榜样"。[①] 还有，纳吉被迫引退之后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万隆会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中"。[②] 这与中共后来在处理波兰危机时的主张不谋而合。[③]

看起来，东欧各国，特别是那里的改革派是可以接受中国了，问题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指挥的苏联的态度。

中国与苏联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8 年上半年。[④] 尽管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令毛泽东有些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和所有共产党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或曰"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波匈事件发生一年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P. Iudin）说："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⑤] 如果仔细品味毛泽东在 1956 年 3—10 月对内对外的讲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以及批判斯大林的方式等问题上，中共确有不同看法，这些

---

① АПРФ，ф. 3，оп. 64，д. 484，л. 64 - 75，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03 - 304.

② Imre Nagy，*On Communism*，*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New York：Frederick Praeger，1957，pp. 20 - 23.

③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 8 月的一份讲话稿中也提出了这个观点（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第 633—605 页）。而中共是在 1956 年 10 月 30 日与苏共中央会谈时提出，并于 11 月 1 日见报的。

④ 参见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⑤ 1957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АПРФ，ф. 3，оп. 65，д. 589，л. 173 - 179。

情况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也已经有所了解。[①] 过去人们把这些分歧看得很重，似乎这就是中苏分裂的起点。[②]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苏论战时期双方互相指责的过激言论的影响。其实，任何盟国关系中都会有分歧和矛盾，而且时时都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要分裂，况且，后来导致中苏反目的根本原因与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③]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强调的主要还是以前斯大林在中国问题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现在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1956 年 4 月 6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他，"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④]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时，虽然肯定斯大林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执行了正确路线，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些错误"可以写一本书"了，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感慨地说，二十大"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最后，毛泽东又高兴地总结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⑤]

从苏联方面来说，《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最普遍的反应，是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而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⑥] 此后，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同时，斯大林故乡格

---

① 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 5，оп. 28，д. 409，л. 108；оп. 49，д. 128，л. 36，К. Аймермахер и т. д.，*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 27 – 28。

② 直到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中苏论战始发于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见高正礼：《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③ 笔者对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参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31 页。

⑤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0，д. 9，л. 124 – 130.

⑥ 1956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发王甫对苏联若干情况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不久，《真理报》出版社确实在对该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了小册子，发行 20 万册。见 1956 年 7 月 6 日《人民日报》。

鲁吉亚的骚乱和党内讨论时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叛情绪，也使苏联领导人确实感到“捅了娄子”。[①] 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中的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中共的观点——“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开始慢慢刹车了。[②] 到年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③] 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理由是“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于是，1957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由15—2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共访问学习。[④] 苏共派人到兄弟国家学习党的建设的经验，这还是头一次，足见中共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⑤]

二、波兰危机中的苏中波关系

关于中国参与处理波兰1956年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⑥]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

---

①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 А. Пыжиков，ХХ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г.，№8，с. 82；А. Пыжиков，*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с. 61 –62、65；Аймермахер и т. д.，*Доклад*，с. 27 –28。

② 决议原文和有关的评论详见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39，л. 1，30 –34，Аймермахер и т. д.，*Доклад*，с. 352 –368、33；А. К. Соколов，*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 –1991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с. 203。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对尤金说：“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АПРФ，ф. 3，оп. 65，д. 589，л. 173 –179。

③ 荣植：《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新年宴会》，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9—20页。

④ 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 5，оп. 49，д. 41，р. 8862，л. 16 –17。

⑤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99—600页。

⑥ 《内部参考》第2236期，1957年10月18日，第3—13页。

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①] 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②]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20 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做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 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 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遭到镇压，[③] 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④] 引起波兰党内外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⑤] 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 月 12 日哥穆尔卡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了。[⑥] 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了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了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⑦] 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在 15—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

---

① 《内部参考》第 2036 期，1956 年 10 月 27 日，第 1283—1284 页。

② Andrzej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Dzis*, nr. 10/1996, c. 123 - 124. 该文系笔者请陈世泽译自波兰《今日》杂志，谨在此表示感谢。

③ 实行镇压的是波兰军队，据 Granville 考察，关于波兹南事件中的死亡人数，是波兰新闻社最先发表的：38 人被杀，270 人受伤。后来，1956 年 7 月 17 日波兰首席检察官 Marian Rybicki 透露，死亡的实际人数是 53 人，这包括了在医院死亡的人数。1981 年在波兰出版的《波兹南危机》一书提供了一个新数字——73 人死亡。见 Granville, Reactions to the Events of 195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8 (2), 2003, pp. 264 - 265。

④ 见《真理报》1956 年 7 月 2 日。新华社发回的报道也称为“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并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代理人、武装间谍和反动组织”的阴谋，只是作为次要原因提到“波兰党和政府有较严重的困难和缺点”。《内部参考》第 1945 期，1956 年 7 月 28 日，第 591—604 页。

⑤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c. 225 - 226；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第 29 页。

⑥ 这与奥哈布转向支持改革有直接关系，与匈牙利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自愿让位给哥穆尔卡的。后来接受采访时奥哈布说：“我根本没有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而焦虑。”见 Teresa Toranska, *Them: Stalin's Polish Puppe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p. 78，转引自 Johanna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16, №2, Spring 2002, pp. 534 - 535。

⑦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2—24 页。

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订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K. Rokossowski）元帅。[①] 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波兰当局正在走向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W. Komar）将军[②]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A. Ponomarenko）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波党八中全会即将开幕。[③]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与中国的许多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俄国档案显示，通告的全部内容是："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问题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

---

① 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然保留着苏联国籍，后来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详见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p. 63－70；А. Ф. Носкова，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1945－1953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c. 109－110。

② 科马尔是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复政治名誉，8月出任内卫部队总司令。

③ 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42—143页；Орехов，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ИР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c. 227；Gluchowski，Khrushchev，pp. 38－39。

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① 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②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里等待着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

---

① Орехов，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ИР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 228－229；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pp. 548－549；Jen Gy 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litary Occupation，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 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6—27、55—82页。只有吴冷西的回忆说，苏联调动军队的命令是17日下达的（《十年论战》第34—40页），这显然是记忆错误。

② TsAMORF（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f. 32，op. 701/291，d. 15，pp. 131、238。转引自A. 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 132。Kirov引用这条史料是要说明匈牙利的紧张局势，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要对付波兰的，因为当时匈牙利的局势尚不足以让莫斯科做出这样的决定。

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作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在向华沙移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苏军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①] 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

---

① 王炳南：《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第38页。《内部参考》第2029期，1956年10月22日，第1075—1076页。

了武器装备。[①] 此时，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经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②]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难以取得成功，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③] 此外还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甚至中共也还没有

---

① ЦХСД, ф.5, оп.49, д.5, л.102－103. 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232－233.

② 本段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8—40、55—63页），赫鲁晓夫的回忆与此基本吻合（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23—326页）。还可参见：Gluchowski, 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pp.4－51；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p.549；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230－232。

③ 《内部参考》第2236期，1957年10月18日，第3—13页；第2031期，1956年10月23日，第1135—1136页。

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①]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关于19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

据说，10月18日尤金大使接到莫斯科转来的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后，紧急约见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立即见他。[②] 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③]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据骆亦粟和吴冷西回忆，尤金19日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吴冷西说：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7时，毛泽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还回忆说，22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这主要是在波兰遇到了坚强抵抗，但中国党的表

① 笔者2004年4月17日对骆亦粟进行访谈时得知，23日刘少奇、邓小平到莫斯科后，中国驻波兰使馆参赞余湛来汇报波兰情况（骆随同余到莫斯科汇报），其中说到：19日晚华沙街头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邓小平说，这个提法不好。以笔者的理解，这个标语不过是表明了当时波兰人对中国的期望和信任。

② 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0页。此事目前尚未得到文献证明。

③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1页。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采用了这个说法。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01—602页。

态对此也有一定影响。[①] 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②] 但在笔者看来，此言不足为信。既然苏共中央的通知里没有关于武装干涉的内容，尤金怎么可能私自将如此机密的军事调动的安排告诉中国人呢？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劈头盖脸地指责苏联领导人呢？[③] 退一步讲，即使毛泽东在20日晚上（华沙时间20日中午）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这个消息对于20日凌晨苏联做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回到了莫斯科。所以，究竟有没有20日晚毛泽东接见尤金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都是需要拿出文献证明的。[④]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别说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就是中国驻波使馆，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对波兰形势的看法。对于波兰问题，中共中央主要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是大使馆，一个是新华社，但二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前者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后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比较接受新华社的估计。[⑤] 早在10月12日，新华社的报道就对波兰的局势发展持乐观看法，认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波兰出现了“如狂风般的空前广泛、空前热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讨论”，目前波兰全国上下“都在积极设法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和缺点。大多数人们并未失掉信心，人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在这场大讨论中有过一些偏差，而且目前也存着一些矫枉过正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4—44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0—13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骆还说，毛泽东把中共的答复也告诉了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在访谈时骆告诉笔者，他当时在华沙，对于国内发生的情况他是听说的。

② 甚至一些很有影响的论著也引用了这种说法，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4页；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146－147。

③ 19日晚关于苏联部队进军华沙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所以北京有可能通过新华社记者或外电报道知道这一情况。但这只是传说而已，中共不大可能以此为根据当面指责苏联，且按照吴的说法，毛泽东自称得到的是“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

④ 其他中文材料都说在波兰危机的紧张时刻，毛泽东接见尤金只有两次，即在21日和22日，而那时苏联已经停止了军事行动。以后还会看到，吴冷西回忆中的误差确实很多，特别是在时间的记忆方面。不过，关于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吴的记载还是准确的。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6页。

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正确的。"[①] 中国使馆人员无法像新华社那样活跃在民间和街头，因此消息就闭塞得多，而王炳南大使与波诺马连科私交甚笃，对波兰局势的看法也深受其影响。[②] 至少在10月23日之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在华沙到处可听到这种不满的言论。"而大使馆在这篇报道上加了按语说："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③] 这就表明此时使馆还不了解中共中央的立场，也没有得到有关的指示。事件过后不久，王炳南在给中国留学生作报告时承认，使馆对波兰八中全会前后形势的判断与中央的估计不一样，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④]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会议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无论如何，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为慎重起见，会议还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⑤] 在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订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

① 《内部参考》第2019期，1956年10月12日，第941—963页。

② 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

③ 《内部参考》第2031期，1956年10月23日，第1136页。

④ 中国驻波兰前大使刘彦顺当时在华沙的留学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上述情况是笔者在"冷战时期的中国与东欧"国际研讨会（北京，2004年3月）上听刘发言得知中。

⑤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4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1—42页。

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1] 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2] 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3] 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4] 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5] 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至于对波兰问题的处理，中共倾向于和平解决，但最后的主意还是要莫斯科自己来拿。

---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3；оп.14，д.67，л.129；оп.14，д.67，л.1，4，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3—48页。

② АВПРФ，ф.0122，оп.40，1956г，п.336，д.10，л.108，Орехов，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ИР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234。

③ 这里尚待解决的只是罗科索夫斯基的去向问题。但Gluchowski认为，直到23日苏联似乎仍然没有放弃武装干涉，理由是据波兰材料，那时苏军还在向华沙前进（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65）。这个说法与俄国档案关于21—23日情况的记载相矛盾，而"波兰材料"究竟是什么，是否可靠，都需要进一步拿出证据。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4—45页。

⑤ 逄先知：《毛泽东传》，第602—60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2页。这个讲话内容可以证明，吴回忆的毛泽东20日与尤金的谈话，在内容上也是值得怀疑的。

与此同时，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对波兰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大约是在10月21—22日。据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Mieczyslaw Marzec）回忆，他曾作为波兰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八大，10月1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少奇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政治局通报中国对波兰改革的态度，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①]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②] 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③]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

---

①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c. 128 –130.

②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5、5об,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9页。

③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页。金冲及：《刘少奇传》，第804页。逄先知：《毛泽东传》，第603页。

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①] 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至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很难理解。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刘少奇还批评说：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如 1950 年 1 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批评日共。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是不适当的。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何必这样呢？这种事情要很慎重，这种方式要改变。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

---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5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52—53 页。

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曾提出一个多中心的议论，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我们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十月革命40年，第一个社会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不怕波兰。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① 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② 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③ 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

---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另参见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2—43页。

②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1956年11月10日。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传》，第805页。

③ 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1—42页。

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中国共产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后来汇报说，我们在莫斯科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①] 尽管这条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②] 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证据如下：10 月 23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哥穆尔卡请求于 11 月 8 日进行会晤，此其一。[③] 据师哲和骆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忆，26 日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此其二。29 日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此其三。[④] 在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确定，将与哥穆尔卡在布列斯特地区举行会晤，讨论匈牙利问题，此其四。[⑤] 实际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是 11 月 15—18 日访问苏联的。[⑥] 因此，10 月 23—31 日哥穆尔卡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刘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 45—46、56—58 页。

② 如《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3 期，第 162—163 页）刊登的一篇文章就采用了这个说法。

③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5、5об。关于这个问题，诺沃提尼的另一个记录是："哥穆尔卡同志告诉苏共中央他将接受邀请并在 11 月 11 日后抵达"。见 *CWIHP Bulletin*，Issue 5，p. 53。

④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5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 42—43 页。骆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肯定地讲，那时波兰代表团没有来莫斯科，如果有这方面的会谈，一定会要他做翻译。另据波兰报载，哥穆尔卡出席了 10 月 27 日开幕的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军官全国会议。

⑤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15－18об，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79－484。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第 28 页。

⑥ 会谈情况详见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第 100—102 页。

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过分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①] 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给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②] 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深夜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S. Kiryluk），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③] 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

---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5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4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2—43页。

② 据骆回忆，这个情况是后来刘少奇自己说的（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11月2日赫鲁晓夫与铁托会谈时，也提到他曾劝说刘少奇去华沙，但中国人一直没有得到签证，毛泽东为此很生气。见［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第179页。

③ 1956年10月27日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 124－126。

指派波杰罗夫斯基（Bordzilowski）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①]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已经改变了态度，其原因显然是对同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两点。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②] 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③]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

① Gluchowski, 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pp. 81 - 82.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3页。

③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484, л. 2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17页；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6 - 14,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57 - 463。公开发表的宣言文本见1956年10月31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及195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三、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过程中的苏中匈关系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 月 23—24 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Kádár János）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①] 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 23 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机步步逼近。10 月 6 日为拉科西大清洗中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 20 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也是民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线。特别是当新闻影片中出现了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②] 10 月 14 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③] 这时，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④]

---

① 有许多历史文献反映了莫斯科在挑选拉科西继承人时的考虑及决策过程，详见 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c. 138－139、152－157、172－173、176－182。

② ［匈］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2 年，第 119 页；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c. 194；《内部参考》第 2063 期，1956 年 11 月 28 日，第 664 页；2004 年 6 月 8 日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夏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使馆随员。

③ 详见 1956 年 10 月 7 日《人民日报》。

④ АПРФ，ф. 3，оп. 64，д. 484，л. 64－75，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c. 300－306.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①]

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订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②] 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③] 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第二天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形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

---

① 《内部参考》第2063期，1956年11月28日，第673页；Путилин，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ИР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c. 257。

② 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c. 316－318；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134－135.

③ 与以往宣传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同，裴多菲俱乐部不是由学生组成的机构，而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松散地组织起来的辩论团体。在23日危机爆发以后，俱乐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了。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专题研究见András B. Hegedüs，The Pet? fi Ciercle：The Forum of Reform in 1956，Terry Cox ed.，Hungary 1956，pp. 108－133。

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①] 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 8 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人群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 9 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伤亡（谁打第一枪的问题至今没有可靠的证据）。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②]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 年 7 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订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 月 6 日至 19 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 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③] 由于 10 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P. Lashchenko）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 月 2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了。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

---

① 俄国档案证实，苏联大使馆有两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三秘克留奇科夫）是游行的目击者，他们认为，白天的示威游行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可以控制的。见 Мусатов,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 10。

②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321 – 323、349 – 356；Мусатов,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 10；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 258 – 260；Jen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Jen and Miklós ed., *Soviet Military*, pp. 15 – 19、26 – 27；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

③ TsAMORF, f. 32, op. 701/291, d. 15, pp. 131、238. 转引自 Kirov,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Jen and Miklós ed., *Soviet Military*, p. 132。

（Y. Malashenko）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亲自掌握局势的变化。[①] 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也于23日赶到匈牙利。[②] 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Bata István）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至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③] 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M. Tikhonov）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Miklós Szücs）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了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④] 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他，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⑤] 还有材料说，喀尔巴阡军区的第128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⑥] 无论如何，在匈牙利正式提出军事援助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处理危机的措施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⑦]

---

① 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00 – 309、315 – 316；Y. I. 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221；Jen and Miklós，Additional Data，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7 – 8.

② Путилин，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с. 258 – 260。

③ АВПРФ，ф. 059а，оп. 4，п. 6，д. 5，л. 88 – 96，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37 – 343；Jen and Miklós，Additional Data，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25 – 26.

④ Miklós Szücs，I was Colonel Miklós Szücs in 1956 with the General Staff，Budapest：Szabad Tér Publishing House，1989，pp. 60 – 62，转引自 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12 – 14。

⑤ 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222 – 223。

⑥ Jen and Miklós，Additional Data，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10 – 11。

⑦ 根据布拉格的档案记载，赫鲁晓夫本人在10月24日向东欧国家领导人介绍说，23日（傍晚）格罗曾与他通电话，说因匈牙利局势恶化不能去莫斯科参加关于波兰问题的会议，但没有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因此，当过后不久朱可夫报告格罗曾向苏联驻匈使馆武官试探给予援助的可能性时，被拒绝了。见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 54；Путилин，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с. 261。

根据匈牙利的材料，23日晚9点到9点半，集聚在格罗房间里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给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①] 大约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的局势，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10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立即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②]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基里琴科随声附和。会议决定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③]

与此同时，匈牙利领导人也在紧张地开会。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

---

①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pp. 535 – 538.

②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9, №1, с. 48 – 49、79 – 80.

③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4 – 4об,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356 – 359.

主席。22 时 22 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 1/3 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 24 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Hegedüs András）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且决定同意邀请苏联军队和发布戒严令。① 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

10 月 23 日 23 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 5 个师 31550 人，拥有 113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 门火炮和迫击炮，185 门高射炮，380 辆装甲运兵车，3930 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 4 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 159 架，轰炸机 122 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 10 月 23 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 24 日 2 时至 4 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 4 时 15 分至 6 时 20 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②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 12 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其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通

① ［匈］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第 286—298 页；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349 - 352。据赫格居斯回忆，在讨论邀请俄国军队的问题时，会场很乱，纳吉疲惫地坐在沙发里，没有明确表态。决定通过后，格罗和安德罗波夫认为纳吉已经同意了，并千方百计要他在后来起草的邀请信上签字。但纳吉始终拖延没有签字，直到 10 月 26 日，在莫斯科的催逼下，由已经不再担任政府首脑的赫格居斯勉强签了字。

②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484, л. 85 - 87、88 - 8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79—281 页；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368 - 369。

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10月24日邮电局停业后，一切国际通讯中断，使馆只能偶尔通过匈外交部向国内发送简短的密码电报。[①] 至于中国领导人对危机的态度，直到10月30日之前，在所有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中，都没有丝毫反映，甚至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论著都很少提到这一点。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②] 但是，在30日之前的讨论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

---

① 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43 (Jul.-Sep., 1970), pp. 122－123；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5页；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

② 逄先知：《毛泽东传》，第604页。

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①] 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②] 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③]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订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④] 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⑤] 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的“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5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2—5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

② 对来到莫斯科的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赫鲁晓夫甚至连解释也没有，在10月24日晚上，赫鲁晓夫只是向这些东欧国家代表通报了处理波兰和匈牙利问题的经过。关于这次会议，目前没有发现俄国档案，捷克斯洛伐克档案中的记载全文见 *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 53 – 55。

③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54 – 61об，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39 – 441。据赫格居斯回忆，纳吉于28日11时从苏联使馆回来后，告诉格罗和赫格居斯，苏联人也认为他们应该下台（《赫格居斯回忆录》，第310页）。28日17点25分，纳吉代表新政府发表声明，谴责那种将目前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视为反革命运动的观点，政府宣布各地立即停火，号召所有手持武器的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允诺政府将与苏联签订一个苏军在最短期限内撤离布达佩斯的协议。18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政府声明及新的领导班子成员。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41 – 444。

④ Jen and Miklós，Additional Data，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p. 70 – 71.

⑤ 见1956年10月28日和29日《人民日报》。

四、苏联第二次出兵匈牙利过程中的苏中匈关系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①]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至美国驻苏大使波伦（C. Bohlen）认为："纳吉于28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②] 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③]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9日到31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也是前后不一。只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10月29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8000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④] 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苏斯

---

① 1960年9月17—20日苏共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CWIHP Bulletin*，Issue 10，1998，pp. 172－173；1960年11月26日苏共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АПРФ，ф. 3，оп. 65，д. 610，л. 100－120。

② ［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刘裘、金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18页。

③ 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Jen and Miklós ed.，*Soviet Military*，p. 277.

④ АПРФ，ф. 3，оп. 64，д. 484，л. 151－16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08—311、447—449页。

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①] 但是，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29日深夜，苏联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并于第二天讨论通过。[②] 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做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③]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④] 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⑤] 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

---

①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4, п. 6, д. 5, л. 13－14,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50－451.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逄先知：《毛泽东传》，第604页。
③ Н. С. 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359－360.
④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484, л. 122－1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12—314页。
⑤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70－471.

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①]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所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提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表示赞同，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②] 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③] 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因此可以说，苏联最初放弃匈牙利的决定是在中共的

---

① 见195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关于苏联从布达佩斯撤军的具体情况见 Jen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Jen and Miklós ed., *Soviet Military*, pp. 71、244－245。其中说，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苏军撤出布达佩斯是在17时。

②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6－14.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57－463.

③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6页。

影响下做出的。[①]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②] 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不撤而参加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泽东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中共代表团建议与苏共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

---

① 在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共中央指责“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4页），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研究者坚持这种说法。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② Н. С. 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 359 – 360；《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968—971页。

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①]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说法做出是非评判。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②] 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Münnich Ferenc）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J. Tito）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6—17页；逄先知：《毛泽东传》，第604—605页；金冲及：《刘少奇传》，第805—806页。吴冷西回忆的过程与此大体相同，但有两点差别。按吴的说法：第一，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向苏联提出的意见不是商量的口气，而是严厉的指责，第二，刘少奇紧急约见赫鲁晓夫不是在30日夜晚，而是在31日。于是，中共代表团离开的时间也不是31日，而是11月1日（《十年论战》第51—53页，《忆毛主席》第14—15页）。笔者以为，在这里又是吴的记忆错误。

②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6 – 14，Волков и т. 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57 –463.

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①] 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官方的观点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11月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②] 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③] 至少在11月4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④]

说到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⑤] 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Rádvanyi）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

---

①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5－18об，Волков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479－484.

② 见1956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人民日报》。

③ АВПРФ，ф.095а，оп.4，п.6，д.5，л.20－22，Волков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522－523.

④ 实际上，从25日晚卡达尔取代格罗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直到其突然失踪，包括请求苏联撤军在内的所有匈牙利政府的决定，都是纳吉与卡达尔共同做出的，他们的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卡达尔到莫斯科后就改变了态度，而纳吉则始终坚持反对苏联出兵的立场。参见 Huszár Tibor，*Kádár János Politikai ? letrajza*（*1912—1956*），Budapest：Szabad Tér Kiadó-Kossuth Kiadó，2003，pp.301－302。朱丹丹为笔者翻译了这部很有影响的匈牙利著作——《卡达尔的政治生涯》的片段，谨在此表示感谢。

⑤ 过去认为是《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来自布达佩斯的报道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判断，显然有误。胡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析性报道是后来（1957年1月3日）发出的，而据使馆人员夏道生告诉笔者，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中国在布达佩斯根本没有一个记者。

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11 月 1 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现在苏联又要插手，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郝德青允诺他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请求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 1959 年 5 月 5 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对 1956 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 1956 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 10 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①

至于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 10 月 27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

---

① 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43, Jul.-Sep., 1970, pp. 123、126；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还有研究者认为，甚至卡达尔的出走都与郝德青有关。众所周知，11 月 1 日夜里明尼赫和卡达尔突然神秘地失踪并转道苏联军营去了莫斯科，这是苏联得以建立匈牙利新政府和取得出兵合法性的前提。胡萨尔 · 蒂伯尔对比了各种材料，对这个问题的论断是：当夜，卡达尔与郝德青进行了谈话，然后就来到明尼赫在内务部的办公室。在那里，明尼赫接到安德罗波夫的电话，要他们去苏联使馆。两人在使馆门口等待时，来了一辆苏联汽车将他们带到了苏联军营，并很快转送到莫斯科（Huszár Tibor, Kádár János, pp. 329－333）。前匈牙利驻华大使叶桐（Otto Juhasz）2004 年 3 月 26 日与笔者交谈时也肯定地说，为明尼赫开车的司机曾告诉他的朋友，明尼赫是在苏联使馆门口被苏联人劫持走的。看起来，卡达尔和明尼赫失踪之谜现在是可以解开了。至于卡达尔与郝德青谈话，还有其他材料提到（Jen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Jen and Miklós ed., *Soviet Military*, pp. 79－82）。不过，据夏道生告诉笔者，卡达尔只是参加了纳吉与郝的谈话，但并未开口。后来也从未听说郝与卡达尔有私下接触。

的话重述了一遍。10 月 29 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10 月 31 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① 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② 当然，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 10 月 30 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③ 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Glashimov）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④ 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⑤

11 月 1—2 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⑥ 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⑦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目前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 10—15 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

---

① Jen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Jen and Miklós ed., *Soviet Military*, pp. 31 - 32；时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第 97—111、122 页。

② 关于这两个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见：Terry Cox, 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 pp. 1 - 13；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WIHP Working Paper №16；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 271 - 273。

③ АПРФ, ф. 3, оп. 23, д. 200, л. 60 - 62,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76 - 477.

④ ЦХСД, ф. 3, оп. 64, д. 485, л. 2 - 3.

⑤ Kramer,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pp. 370 - 371；胡舶：《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第 118—120 页。

⑥ 除哥穆尔卡有些勉强外，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支持苏联出兵的决策。详见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WIHP Working Paper* №16；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510。关于赫鲁晓夫与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会谈的详情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 172—182 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ИРИ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 235。

⑦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30,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512 - 513.

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31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①] 但是，一切都晚了。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②] 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③]

五、结论：苏中关系的新态势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

---

①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19－22,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94－497.

② 笔者2004年4月17日采访中国前驻匈牙利大使（1985—1989年）朱安康记录，朱于1954—1957年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文学院留学。

③ 对苏联第二次出兵过程的详细描述见：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Jen and Miklós ed., *Soviet Military*, pp. 244－266。

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国家的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启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事件方面，中共并没有也不会注重如何具体地解决问题，而是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②] 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

---

① 关于苏共二十大以及中共对此反应的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

② 顺便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能否真正实现平等原则，是另一个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的结论部分。

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① 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② 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1957 年 1 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 1 月 16 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③ 波党中央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甚至波兰军队在其建设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结论：在处理 1956 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

---

①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刘少奇在与尤金大使会谈时说：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波兰同志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的话，复辟是不可避免的。АВПРФ，Ф.0100，оп.50，д.5，п.423，л.48，转引自 Б. Т. 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c.178.

② 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Moscow v. Pekin*，Baltimore：Penguin Books Inc，1963，p.54.

③ 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anos Rainer ed.，*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pp.498－499.

④ 笔者对骆亦粟的采访；1957 年 1 月 4 日谢皮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笔者自存俄国档案复印件，SD10181）。

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1] 从此，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欧洲事务有了发言权。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挑战。

波匈事件后，斯大林时期的苏中关系态势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开始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挑战它的权威地位。这预示着苏中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将对整个冷战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①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p.5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161 - 162.

第六章　中美苏在印度支那的角逐及相互关系的变化（1961—1973）

在两极对峙的冷战年代，亚洲在美苏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战后美国直接参与、苏联暗中和间接参与的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这从某一个角度表明，美苏竞争、乃至争霸的矛盾焦点，实际就是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当他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基本确定和稳定之后，即将目标转向了亚洲。而东南亚地区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咽喉部位，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中印度支那半岛更是控制此东西方战略通道的关键一环。由此，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地区，作为大国利益和大国彼此间矛盾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自然成为争夺的热点。换言之，美苏若想在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就须取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双方为追求此目标都要培植各自的势力集团，以相互抗衡。于是，印支半岛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环节，而越南又作为印支地区的重点，便成为美苏争夺的首要目标。

此外，对于美国而言，东南亚地区是其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桥头堡，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寻找楔入的契机。这样，越南作为东南亚的地区性大国，也即被美国纳入重点对象之列。对于苏联而言，要在中苏分裂后达到抵制中国反苏战略的目的，插手印支事务，拉拢越南抗华，是其最现实可行的途径。而对于中国来说，支持并抓紧越南，不仅是抵御美国侵略威胁的需要，而且更是防止苏联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进而与苏对抗的需要。至于越南，由于上述安全利益、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一直是各大国战略考虑中所注重的一个因素，故而也始终受到大国间关系好坏的直接影响，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

在冷战前期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苏于亚洲尚不处于直接对抗的位置。苏联和中国在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目标虽然一致，但苏联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

外交政策要旨，对援越保持低调，而中国则已因朝鲜战争被推到了亚洲反美的前沿。中国对美国干预越南的估计过为乐观，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美国则高估了中苏插手越南事务的风险，不断加紧军事介入的步伐。在这一背景下，越南战争爆发了，中美苏三国开始角逐于印度支那战场。①

本文切入的角度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选择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视角，即中美苏角逐于印支战场时构成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外交斗争，以及在此三角关系中各国外交政策的定位、变化和最终结果。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进行讨论，主要是因为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中三国对外政策的取向，对于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则是因为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绝不容忽视，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印度支那局势的演变即展示了冷战状态下国际关系中的这一引人注意的现象。

一、军事较量：中苏两国同时援越抗美

日内瓦协议签订，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和越南的政治、军事目标就同美国在印支寻求的目标产生了抵触。中越努力实现印支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保住整个越南北部，将之作为基地，完成下一步统一国家的大业。而美国的既定方针则是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实际决定了中越两国要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

① 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学者多年来已就美国发动并升级战争、战争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颇丰，而中国和俄国学者对于中国和苏联参与这场战争情况的研究，则是近十年来才开始的。关于中国参战情况，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见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这方面的研究最值得称道的是旅美华人学者翟强（Qiang Zhai）著：*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 – 1975*，（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Chapel Hill and London*, *2000*。另外，中国学者关于美国与越南战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关于苏联参战情况，俄国学者的研究著述主要有 *Ilya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苏联与越南战争），*Chicago*, *1996*；*Ilya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 – 1963*，（面对越南：苏联对印度支那冲突的政策，*1954—1963*），*California*, *2003*。

在1961年至1964年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所谓的“特种战争”时期，中国调整对越方针，开始积极援越，苏联则消极回避，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向中国一方倾斜。1964年末，面对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苏联为恢复其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也着手调整对越方针。翌年初，美国将对越战争升级，此后至197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同时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印支战场与美国展开了较量。

随着越南对苏联军事援助的倚重，苏越关系趋向密切，而此时中苏关系却从破裂走向敌对，中苏积极援越的行动开始涂抹上了利益冲突的色彩，两国不断加大军事援越力度的同时，事实上也在进行着争夺越南盟友的较量。

1. 中国支援北越武力统一南方与美国对越军事卷入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更为实际的则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8年夏，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① 翌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确立了主动进攻、以暴力革命解放南方的指导思想。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② 但此时，中国方面对越南在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仍未明确转变态度。

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美国对南越军事干涉的逐步加强，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

---

①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② 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48页。

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①] 另一方面，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1962 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②] 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③] 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与此同时，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这样，在这几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着手调整对越方针，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1960 年 5 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④] 是年，中共中央还明确地向越劳党中央表示：过去我们没有你们那样了解情况，曾认为还不到暴露力量的时候。现在我们认为，你们主张在南方进行武装斗争是对的，我们完全支持你们。[⑤] 中国的

---

① 参见 196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接见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13、514 页；1964 年 10 月 7 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② 参见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63、565、567 页；《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45 页。

③ 1962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9 月 26 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版，第 38 页。

④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 51—55 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 67 页。

⑤ 根据笔者自存有关报告。

对越政策发生此重要转变后不久，[1] 9月召开的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此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卷入基本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在越南南方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之后不久，1961年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特种战争”随之开始。6月，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2] 在中国的支持下，1961年成为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美国则于是年末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3] 其后，1962年夏胡志明和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书记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中国领导人与越南领导人在北京研究确定，中国扩大对越援助，推动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进一步开展。[4] 据此，中国政府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5]

1963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并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了协议。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6] 到是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

---

①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6—59、68、6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③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79、73页；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④ 根据笔者自存有关报告。

⑤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1962年毛泽东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谈话记录。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4页。

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①]

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②] 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③] 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④] 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⑤]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中国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30万到50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⑥] 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

---

①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105页；《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48、136页。

②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接见越南文进勇等人谈话记录。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5页。

④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外宾谈话记录。

⑤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越方陈辉燎说美国进攻北越只是威胁性的，主要是想摆脱他在南越的败局，是在失败中的挣扎。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为什么他过去不讲，现在讲呢？就是他没有把握，打了三年了。见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外宾谈话记录；另见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接见越南文进勇等人时刘少奇的插话。

⑥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

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①] 与此同时，中越之间开始磋商实施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行动，国防部长林彪率团出访河内。12 月，中越双方签订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为中国将派遣 30 万军队（5 个步兵师和 5 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②] 是年，中国空军先后派出由高级干部组成的防空专家组和 100 多名专家，考察越方的防空能力和帮助越方训练人员，还在云南建立航校，培训越南飞行员，并允许越南的飞行部队从云南的蒙自等机场转场作战。[③] 随越南南方战争的扩大，中国在更大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无偿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2 年至 1966 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支 27 万支、火炮 540 多门、枪弹 2 亿多发、炮弹 90 多万发、炸药 700 多吨、军服 20 万套、布匹 400 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④]

不过，美国总统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迈出这一步，即如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所言：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⑤] 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则在召开的情况分析会中认为：世界和美国国内情况不允许美国政界中的好战分子马上动

---

① 1964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② Memorandum of the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Glavnoye Razvedyvatel' noye Upravleniye [GRU]）for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July 14, 1967. SCCD（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f.5, op.59, d.416, pp.119－122. 转引自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 p.16.

③ 参见笔者 2001 年 11 月 30 日访问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恽前程同志记录。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 35 页。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FRUS*），Vol. I: Vietnam, 1964, Washington, 1992, p.991.

用最大的军事力量介入越南这场战争。最大的问题，也是导致美国一切战争计划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场上美—伪集团越来越陷入被动和失败的境地，美国主要依赖的西贡伪政权被严重削弱。[①] 同期，美国却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②] 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子也势必更重了。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1961—1964 年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赫鲁晓夫之所以不愿使苏联卷入印度支那半岛的复杂局势中，除为继续实施与西方缓和政策而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考虑外，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现状也是他所顾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造成了越南在 1964 年底以前主要依赖中国援助的局面。由此，尽管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上是向中国一方倾斜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合作也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1960 年中越之间达成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这其实是对越南获取苏联援助的一种约束。另据越南方面记述，此期邓小平曾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可以向河内提供 1 亿元人民币的资助，但交换条件是，越南拒绝接受苏联任何形式的援助。[③]

此外，越南领导人在苏联人面前也并不回避对中国一些立场的维护。1964 年 2 月，黎笋率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寻求苏联对其在南越发动全面起义计划的支持。越苏两党会谈时，黎笋针对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

---

① 1964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1964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 125 页。

②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 176 页。

③ Minister-Counselo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Mitrophan Podolski to Moscow, December 17, 1966. SCCD, f. 5, op. 59, d. 327, p. 7;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p. 4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16. 这两份材料，尚未见有中方档案材料予以支持，特别是后者出自中越关系极度恶化时越方出版的小册子，其观点和材料应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故二者均只能作为参考。

拒绝帮助中国试制核武器，较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提出批评。苏联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的亲华立场大为不满，赫鲁晓夫表示，除非越方改变其立场，否则苏越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密切合作的前景；并告诫说，苏联或许会回击越南的政策。[①]

苏共中央甚至考虑要与其他兄弟党一起终止发展同越劳党的关系，向其说明，鉴于中国的分裂活动，支持中国即是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暗示苏越合作的前景必须建立在河内对苏态度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这个基础之上。[②]

为避免与越南南方劳动党进行政府级官方接触，1964 年 7 月，苏共责成苏联亚非团结会出面邀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由于该代表团提出了大量有关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的请求，亚非团结会建议苏共中央接见之。但苏共中央国际部反对这项提议，理由是如若接见越南南方这些爱国人士，苏共中央就须对该团提出的援助问题做出明确答复。苏共领导人采纳了此意见。[③] 当"东京湾事件"发生时，8 月 3 日苏联《真理报》仅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而且其消息来源于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事隔一日，苏联方面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也是语调温和。赫鲁晓夫为表白自己与越方的行动无关，还特意致函约翰逊，说明他是从华盛顿近日来的声明、给美国军方发布的命令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越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④] 是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还曾"诬蔑越南和中国挑起东京湾事件"。[⑤] 莫斯科的种种立场和态度，不能不令越南方面感到遗憾。在他们需要自己的社会主义盟友进行物质援手之时，到 1964 年夏之前，实际上却只有中国在向越南北方和南方提供各种武器装备、食品和运

---

① 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CCD, f. 4, op. 18, d. 582, p. 5.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9.

② 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CCD, f. 4, op. 18, d. 582, p. 5.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 9－10.

③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 July 25, 1964. SCCD, f. 5, op. 50, d. 631, pp. 163－164.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11.

④ *FRUS*, 1964－1968, Vol. 1: Vietnam, 1964, p. 637.

⑤ 1965 年 4 月 1 日外交部"请审批'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11，卷号 7（馆藏以下简化为：全宗/目录/卷号），第 37 页。关于东京湾事件，黎笋 1964 年 8 月 13 日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证实说，第一次事件（8 月 2 日）是由越南司令官现场决定的结果。毛泽东告诉黎笋，据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8 月 4 日的第二次事件不是美国"故意的进攻"，而是由其"基于错误消息的错误判断"引起的；另据有些西方学者调查研究论证，这起事件是由美方蓄意的、挑衅性的行为引发的。详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 172—174 页。

输工具等援助。

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对越南的影响不断增强，中越两国之间各种代表团频繁往返交流，仅1964年第3季度即达32次，平均每月10次之多，而其间苏越之间的交往却只有3次。[①] 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在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做交易，这是很清楚的”。[②] 是年11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向苏联驻越武官通报说，越南军事力量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策略与苏联的有所不同，为此，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明显的被排斥的状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③]

2. 苏联调整对越方针与中苏同时援越

1964—1965年冬，根据越劳党中央军委的指示，越南南方各武装力量开展了春季攻势，重创西贡政权的主力军，扩大了解放区，作为美国“特种战争”脊梁的南越军队处于被消灭的危机之中。[④] 1965年2月初至3月初，约翰逊政府为了挽救危局，开始实施轰炸北越的“火箭行动”和“雷鸣行动”，最终跨过“战争边缘”，迈出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严重步伐。3月份，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美国地面部队首次进入南越参战。此后至1967年末，美国已在南越增兵至56万。[⑤] 越南战争升级为一场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开始进入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

面对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特别是自己在越

---

① USIA Report, April 1965.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NSA), V－16, Vietnam, G. McT. Kahin Donation, box4.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16.

②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

③ Top secret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to Moscow,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DRV", November 19, 1964. SCCD, f. 5, op. 50, d. 631, p. 253.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 16－17.

④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125—131页。

⑤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90－19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36、41页。

南地位和影响的颓势，苏联既不愿冒遭受中国公开、尖锐的批判，进而丧失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危险，更不愿就此放弃地缘政治利益，彻底葬送其加强在东南亚地位的前景。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前景下，苏联的近期战略目标是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构建对付中国的据点，远期则是要独占对该区域事务的主导权。由此，它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噬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于是，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1964 年 11 月 9 日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柯西金与之进行了会谈。这是继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首脑首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苏越双方就苏联对越经济、军事援助问题达成了共识。① 是月 27 日苏方发表声明，第一次对越南做出承诺，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② 这样，到 1964 年末，苏联的对越政策最终由“脱身”改为“插手”。

1965 年 2 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鉴于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轰炸，苏方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说：苏联人民将履行其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职责，与盟国一起，采取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安全和加强其国防力量的措施。4 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③ 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这一年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 1 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④ 苏联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这种状况使得越南方面把苏联的地空导弹部队安置在河内周围的中枢部位，河内外侧 100 公里以外是中国的高炮部队保卫，由

① Pravda, November 10, 1964.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 19 – 20.

② USS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Soviet Union-Vietnam: Thirty Years of the Relationship, 1950 – 1980, Moscow, 1982, p. 85.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20.

③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February 3, 1965. NSA, V – 16, box3;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1965, p. 275.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24；另见 1965 年 2 月 9 日《真理报》，转引自［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沈芜清等译：《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37 – 438 页。

④ Memorandum, "Value of Soviet Military Aid to North Vietnam", October 26, 1965. Harriman Papers, Special Files, Subject File: Vietnam. General Box52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59.

此确定了苏联在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中的核心地位。[①]

1965 年至 1968 年，苏联的对越援助稳步增长。虽然在 1967 年前苏联援助的总额还落后于中国，[②] 但其中军事援助部分却大大超过了中国。1965 年下半年经由凭祥铁路运入越南的援越军事物资共计 65000 吨，其中苏联和东欧（主要是苏联）的物资为 50000 吨，中国的仅为 15000 吨。[③] 1966 至 1967 年，莫斯科又承担了向越南提供 5 亿卢布军事装备的任务。[④]在 1967 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 50% 是给越南的，其中近 60% 是军事援助。[⑤] 而到 1968 年，苏对越军援数额已达 3.57 亿卢布，占是年苏援越总额 5.24 亿卢布的 2/3 强。此外，是年苏联的对越援助额也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 50%，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国。1969 年初越美和谈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苏联对越军援数额虽然有所降低，但总计仍达 2 亿美元。[⑥] 从 1965 年到 1973 年，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 10 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 20 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⑦]

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1965 年 3 月 22 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越南建成

---

① 参见笔者 2001 年 11 月 30 日访问恽前程同志记录。

② 至 1967 年，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对越援助总额约为 10.5 亿卢布，其中苏联的援助额为 5.473 亿卢布，占援越总额的 36.8%；中国为 6.662 亿卢布，占 44.8%。见 Report，“Socialist Countries' Economic Aid t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USSR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November 1967. SCCD，f. 5，op. 59，d. 329，pp. 125 – 126.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p. 58，264（note 4）.

③ 1965 年 7 月 26 日中国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 1965 年，卷号 409，第 7 页。

④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for 1966. SCCD，f. 5，op. 58，d. 263，p. 148.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 59.

⑤ Memorandum，“Value of Soviet Military Aid to North Vietnam”，October 26，1965. Harriman Papers，Special Files，Subject File：Vietnam，General Box52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 59.

⑥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for 1968，19 and 1969. SCCD，f. 5，op. 60，d. 375，p. 48；f. 5，op. 59，d. 332，p. 26；f. 5，op. 61，d. 459，p. 126.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p. 59，58，215.

⑦ 《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 103 页。

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①] 1966 年 3 月，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与毛泽东讨论苏共领导人的问题时也曾评价说，苏联“提供的高射炮，毕竟是击落美国飞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同志要求他们援助，并且感谢他们”。[②]

此期，虽然就实力而言，中国远远比不上苏联，但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世界革命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促使他们继续密切关注越南的抗美战况，竭尽全力去帮助越南。事实上，对于越南来说，中国的援助也是最直接和最及时的。到 1966 年 3 月止，中国在越南北方的支援部队，包括两个高射炮师，总共已有 13 万人。[③]

是年 8 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④] 他曾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并亲自交待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则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要求：“给南方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送。”[⑤] 1967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等人谈话时指出：“因为你们是在前线，所以首先感谢你们。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我们的援助只是帮助你们修路，给些武器和物资。”[⑥]

从 1965 年 4 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具体提出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6 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第一批军队入越始，至 1968 年 3 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 23 个支队 32 万余

① 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1965 年 3 月 26 日，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 SD08116。

② 1966 年 3 月 29 日毛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二次谈话记录。

③ 同上。

④ 1966 年 8 月 26 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⑤ 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73 页。

⑥ 1967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

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①] 1964至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共计约达1.8亿美元。[②] 至于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5到1976年期间向越南提供的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等军用物品，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③]

196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并逐渐走向敌对，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已决不可能与修正主义苏联在越南问题上联合行动，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④] 但是，尽管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联合行动的要求，[⑤] 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两国同时大力援助越南的事实，却为河内将这场抗美战争进行到底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国、苏联同越南一起在印支战场上与美国进行较量，使之陷入战争泥潭，难以自拔。

中苏两国在各自分别援越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矛盾冲突也由此而生。特别是，由于越南力争得到中苏双方的最大援助，使得中苏两国在协作时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斗争的内容主要为：中国反对苏联派志愿军援越，中苏双方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发生争执，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纠葛不断，等等。不过，这种状况并未严重影响和阻碍两国援越抗美进程的发展。[⑥]

---

① 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页；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272、273页。笔者目前尚未查到1965—1969年中国援越量的统计数字，但在上述援越数额中，后一阶段，即70年代初的援助所占的比重应更大。具体数字，可见下文。

④ 1966年11月8日毛主席接见越劳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毛泽东说：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嘛！

⑤ 1965年2月柯西金来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提出应在越南问题上搞联合行动。3月，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协商会晤时进一步讨论了这项主张。该提议遭到中国的拒绝和批判（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47—248页）；"莫斯科三月会议参加者对会议的评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人民日报》，1965年3月21日、11月11日；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101/4/501，第25—27页。等等。

⑥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3. 中苏加强援越与争夺越南盟友

1970—1972 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一起，这令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在援越问题上寻找新的机会，两国同时加强援越的过程，实质上也成为一场对手之间的竞争。

此期，尽管苏联为了确保越美和谈的顺利进行而减少对越军援数量，以缩减越方的战役行动，但仍然每年与越方签订新的年度援助协议。1969 至 1971 年，莫斯科同北越签订了 7 个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其中两个为 1971 年签订的关于加强越南防务力量的补充协议。[①] 1972 年，苏联又向越南提供了导弹等新的军事援助。[②]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不仅向越南提供了飞机、火箭、坦克、炮兵和步兵武器等最现代化武器、弹药和物资设备、运输工具，以及石油产品、黑色和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药品及其他物品，而且还培训了越南人民军的各类军官及大学生和实习生 1 万多名，派遣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赴越工作，帮助越方掌握现代化战斗技术，恢复被炸坏的企业和电站；到 1970 年 8 月止，苏联为 90 多家越南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了设备，并且帮助建设了其中的一半。苏越双方还经常举行最高级会晤，研究对越援助问题，商定政治方面的共同步调。[③] 对此，黎笋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苏联人民的支持是“鼓舞我们全国同胞和战士争取新的更重大胜利的强大动力”。[④]

与此同时，苏联着手与越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援越方针出现新的动向。1971 年 4 月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

---

①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for 1969. SCCD, f. 5, op. 61, d. 459, p. 126; List of Princip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DRV, undated. SCCD, f. 5, op. 66, d. 71, pp. 120 - 122; “Basic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DRV”. SCCD, f. 5, op. 66, d. 71, pp. 121 - 122.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 215, 231；另见 1971 年 7 月 1 日苏驻越大使谢尔巴科夫与越南副外长阮基石会谈纪要，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 SD01826。

② 1972 年 6 月 16 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 1972 年，卷号 53，第 68 页。

③ 参见《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第 440、437 页；另见 1970 年 8 月 28 日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谈话记录，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 SD06765。

④ 《真理报》，1971 年 4 月 1 日，转引自《苏联对外政策史》，第 379 页。

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其有利的情况，将短期（每年）援助向有计划、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而且不能让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脱离苏共的政治路线；在军事合作领域内，则继续在接近苏联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①

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早在1969年9月底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② 进入70年代后，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200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③ 此后1971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④ 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72年5月开始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入越执行援助任务。在中国的帮助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越南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了近一倍。⑤ 1971—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

① 参见1971年5月21日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01829。

② 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8页。

③ 参见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 22, p. 175；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毛泽东对1970年11月外交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67—1971年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的批示，长春市档案馆，1/1－23/21，第67页；1971年11月14日外贸部关于下达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清单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23，第3页。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1页。

⑤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92页；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为5亿美元。参见USSR 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 “Vietnam-China Relations”, July 4, 1973. SCCD, f. 5, op. 66, d. 71, p. 88.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231。

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①] 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导致中国对越方针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除了中越两国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②] 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以及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寻求与美国实现和解，为此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战略进攻态势，以求尽快结束战争，及早实现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等两点之外，一个突出的因素即在于：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时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步，中国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如叶剑英对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越南领导人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③] 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方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此期中国顾及到苏越关系的发展将使自己在中苏越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过度反感；以及中苏开始边界谈判，两国边境形势趋向平稳等，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冲突较之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有

---

① 《当代中国外交》，第162页；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约为50万美元。参见 USSR 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 "Vietnam-China Relations", July 4, 1973. SCCD, f. 5, op. 66, d. 71, p. 88.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231。

② 1972年10月16日李强在答复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关于越方请中国发运军事物资的要求时提出：属于南方要的，尽快运去，不是南方要的，是否可以慢一步。11月13日李班向李强转达越副总理黎清毅的意见：希望中国发运重武器。因重武器的生产需要时间，故建议中方先从各单位借来交付越方，待供越重武器生产出来后再予归还。如不这样办，一旦停战，国际监督一实行，运送重武器到南方去就有困难。现在未实行国际监督，又是旱季，要抢运重武器到南方去。李强在指出越方有货接不过去，压车的军事物资很多等情之后表示：建议还是想法多运些军火，正如李班同志说的在实行国际监督之前，抢运军火到南方去。参见1972年10月16日、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44、147、149－150页。

③ 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谈话记录，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2月25日李强与吴船、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8，151，165页。

所缓和，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纠葛虽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

二、政治斡旋：越美和谈中的中苏对垒

美国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时所寻求的政治、军事目标就是要使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因此，伴随着不断增兵、轰炸越南北方等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一次次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活动。对于美国的和谈意向、各方的斡旋，以及越美巴黎谈判，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10月的这段时间中一直坚决反对。中国此时之所以坚持这种立场，除了革命理念——高举反帝旗帜、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防止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半途而废；革命经验——根据中共过去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只有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拥有谈判桌上的主动权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安全利益问题。由于苏联以斡旋越美和谈为杠杆，力求实现对美关系的缓和及稳定，同时掌握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得美苏在和谈活动中的密切合作及其发展趋向，以及越南逐渐亲近苏联和苏越结盟的前景，给中国的安全态势造成了新的潜在性威胁。中国对此十分敏感，故而坚决予以抵制，并且极力阻止越方在和谈活动中有任何让步的意向。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是关系到此项定位问题的关键。由此，对待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也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的看法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或者可以说，中国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也突出体现在这一变化中。

1. 苏美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的接触

苏联开始加强援越、插手越南问题的战略考虑在于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以响应美国和谈意图为机缘，缓和及稳固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掌握对越问题控制权，寻找应付中国的盟友。苏美之间在通过政治磋商解决越南问题上目标的相近，使得美国主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努力将越南战争纳入和谈的轨道。这样，在越战开始升级至196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过程中，约翰逊政府关于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就越南问题在巴黎进行

谈判的一系列重要呼吁活动，主要都是通过苏联政府发起的；而美越之间的各种接触实际也都是通过苏联的斡旋实现的。①

事实上，勃列日涅夫在实施对越"插手"政策之初，即积极寻求以政治手段解决军事争端的途径。1965 年 2 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后，苏联在拟定援越军事计划的同时，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和谈问题。2 月 16 日，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1. 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或五大国、九大国会议，讨论越南问题，美国停止轰炸数周以为会议做准备。2. 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为：南越中立化；其他国家保证不干涉越南事务；不向整个越南运送武器等建议。② 柯西金并在就访问越南等国情况发表的演说中强调苏联主张各国"接触"，"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③ 随后，苏联方面即展开和谈活动，在越南表示反对和中国尚未答复的情况下，于是月 23 日由其驻法大使向戴高乐递交了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备忘录。法方旋即提出该项建议，旨在由苏、法两国协调努力，通过国际会议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一面将其绝密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的有关内容泄露给西方记者，一面多次与美方进行接触，表示只要美国有意，可以通过苏联打开通往越南的道路。腊斯克也从 2 月下旬以来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政治途径一直是敞开的"，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不挫伤第三国的和谈试探。4 月 7 日，约翰逊宣称美国愿意同"有关政府"就实现越南和平进行"无条件的讨论"。7 月 28 日又表示"可以讨论河内的建议"，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的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越南的四点主张"可以成为美国和北越谈判的基础"。④ 1966 年 1 月，在约翰逊政府提出解决越南问题"十四点"计划的次日，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即奔赴河内，其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越

---

① 参见《关于越美接触的情况（1971 年 9 月 1 日）》，Исдочник No. 1997. 1，pp. 54 – 57。

② 1965 年 5 月 3 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77/11/25，第 82 页；1965 年 4 月 1 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 38 页。

③ 夏义善编：《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1 页。

④ 参见 1965 年 4 月 1 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 38 页；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p. 27、31 – 32；1965 年 5 月 3 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77/11/25，第 81 页；1965 年 8 月 3 日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越南问题的"和谈"活动等三个问题的通报，长春市档案馆，1/1 – 18/31，第 60、61 页。

南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只是没有成功。[①] 接着，柯西金就同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在新德里举行会谈，详细讨论了美国关于政治解决越南冲突的设想和做法。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后苏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接触，美方认为会谈结果令人鼓舞，美苏关系能够并且应该得到改善。[②] 此后，当美国于夏季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二次大反攻时，苏联支持印度政府拿出了在越南实现“和平”的七点建议。[③] 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白宫举行会谈。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葛罗米柯认为，美国首先应该停止轰炸北越。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这次会面双方虽然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约翰逊强调说美苏之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④]

随着美国对越南南方人力、物力的投入和付出愈来愈大，约翰逊急于同越南经谈判结束战争，维系住南越政权。而苏越关系的发展，使美国更加看重苏联作为和谈倡导者和积极斡旋人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希冀其凭借是越南主要盟国和武器供应国的身份，促使河内为实现和平做出必要的让步。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要竭力避免“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避免出现对中国和美国两线作战的局面，从而十分强调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⑤] 美苏两国由此就实现越美和谈问题更趋频繁地进行接触。1967年6月23、25日柯西金两次会晤约翰逊时讨论了越南问题。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讲话，提出新的和谈方案，表示希望与越南进行“导致有成果的讨论”。苏联随即做出配合，在9月到12月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开会期间，葛罗米柯反复强调越南问题久而不决的危险性；苏联方面并表示不会反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要求美国政府设法让安理会

① 参见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 84.

② 参见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101/4/501，第25－27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52页。

③ 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246/1/56，第30—31页。

④ ［苏］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⑤ 参见1966年8月23日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58，дд.262；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5，оп.61，дд.558；《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64、179—180页。

"讨论"越南问题的决议，从而实际上支持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插手干预越南问题。12月19日，柯西金还在莫斯科同准备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密歇根州州长罗姆尼就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①]

和谈斡旋活动到1968年初形成了紧锣密鼓的气候。1月下旬，柯西金与英国首相威尔逊在莫斯科就越南问题进行会谈，把苏联关于越南问题的态度向其交底。双方并分别派人到东京同佐藤政府商谈。与此同时，柯西金还到新德里同英迪拉·甘地和访印的铁托联络，威尔逊则于其后赶往华盛顿向约翰逊报告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和结果。对于莫斯科的积极配合行为，美国及时予以补偿：建议联合向苏联的盟友印度提供核保护。投桃报李的是，苏联也一再建议美国"听取理智的呼声"，"抓住机会"，下决心"利用"目前存在的"走出（越南战争）死胡同的可能性"，"停炸和谈"。美苏的接触在2月份可以说进入了蜜月的状态：6日，柯西金在莫斯科接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三天后，即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官方身份出面呼吁"停炸和谈"。15、16日，接受指令刚刚返任的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连两次同腊斯克会商越南问题。同一时间，苏驻英大使拜会访美归来的威尔逊，听取"美国目前对越南问题的态度"。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后，6月4日，约翰逊于葛拉斯堡罗发表演说指出，在美苏关系上取得了"看得见的""希望和成就"，在"推进两国合作方面"，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这个时期"更有成果"。[②]

上述美苏之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交往，不论是双方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深刻的分歧"也好，还是在安排"和谈"方面，约翰逊和柯西金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也好，[③] 在中国看来，其密切接触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的潜在性威胁：这种合作酝酿着进一步反对中国的大阴谋。美苏正联合行动，企图在中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一道反革命的"遏制墙"。其间令中国更为敏感的是，美国要加入对印度的核保护、鼓励苏印合作的态度，不啻于进一步加强

---

① 参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88、191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05页；《人民日报》，1968年3月18日。

② 参见《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29、130页；《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94、195页；《人民日报》，1968年3月15日、2月5日、6月8日。

③ 《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05页；《人民日报》，1968年3月15日。

了印度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力量。[①] 总之，中国领导人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②] 这种态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如果越南让步，抗美斗争半途而废，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而如果苏联掌握了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河内愈益倚重莫斯科，其结果依然相同。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地缘政治反应，事实上成为除革命理念、革命经验外，决定中国此期对越美和谈问题立场，以及将批判和谈活动的重心放在揭露美苏勾结，特别是斥责苏联出卖越南人民利益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 中国对苏美和谈斡旋活动的应对方针

此期中国对苏美就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调停活动的因应方针主要为以下两个步骤：

其一，集中揭批苏联的政治斡旋举措。

莫斯科通过斡旋活动与河内和华盛顿的接触，对于中国来说，实际预示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将拥有主要发言权的前景。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在响应苏联提出的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时，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利益，[③] 则造成了仍然以苏联为首的现状。中国不能容许这种局面的发生，故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揭露苏联为促成越美和谈同美国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的目的和性质上。如揭露苏联千方百计地为美帝国主义的和谈阴谋服务，是妄想胁迫越南人民放弃抗美救国斗争，听任美国侵略者永远霸占南越；而"在美帝国主义拒绝全部撤退它的侵略军队、加紧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兜售任何方式的'和平谈判'只能是出卖越南人民的利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④] 指责苏共领导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因此"绝不能把他们包

---

① 参见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101/4/501，第25－27页；《人民日报》，1968年2月5日。

② 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 22，p. 130。

③ 参见1965年4月吉林省第九次外事工作会议文件之六：《关于当前国际形势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宣传口径》，长春市档案馆，1/1－18/42，第96、94页；1965年12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函，福建省档案馆，101/4/501，第32－33页。

④ 参见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77/11/25，第79、80页；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吉林省档案馆，1/1－22/45，第7页；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246/1/56，第30—31页；《人民日报》，1968年3月15日、6月8日。

括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之内，更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帮助他们欺骗世界人民，粉饰他们假反帝、真投降，假支持、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叛徒面目”。“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划清界限”，等等。[①] 通过这种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舆论批判宣传，进一步削弱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抵制重新奉苏联为首的呼声，防止苏联把对越问题主导权纳作自己的禁脔。

其二，对美国缓和与中国关系的意向不予回应。

美国在越战中寻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政治解决越南问题，鉴于中国坚定地实行援越抗美反对和谈的方针，华盛顿不得不努力地试图在对越政策和对北京政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谨慎处理对北京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导致强化北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的强硬政策，干扰越美和谈的进程。根据这一思路的指导，美国在约翰逊政府初期就已向中国发出了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

继 1965 年放宽允许去中国大陆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种类[②]之后，1966 年 3 月 16 日，美国方面在华沙第 129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没有敌意，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以便缓和紧张局势和减少恐惧；重申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希望中国利用它的影响把“斗争”从战场上移到政治舞台上来。称美国愿意在大使级会谈，别的会议或任何一级会议中同中国讨论越南问题并且完全同意回到日内瓦协议上来；强调增加中美双边接触。认为先从小问题着手，就有可能解决大问题。除重申允许美国记者、医生、科学家访华外，又提出一系列“小步骤”，诸如中国科学家访美、交换两国气象书刊和资料、允许中国宣传品（如《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在美发行、赔偿美国飞机和轮船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物质损失，等等。[③] 约翰逊则在 7 月 12 日关于亚洲的讲话中申明，“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和解”是亚洲和平的基础之一。美国的立场是“打开封闭的观念和封

---

① 参见 1966 年 8 月 12 日刘宁一在首都各界欢迎维护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运动光荣传统的各国朋友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 7 月 28 日周恩来致第 12 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贺电，1966 年 8 月 12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福建省档案馆，246/1/56，第 22—23、12—13 页。

② 这项措施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符合了去中国的条件，不过只有约 300 人进行申请并被许可发放护照。见 1966 年 12 月 1 日美国远东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 1964 - 1968, Volume XXX China, Washington, 1998, pp. 471 - 475。

③ 1966 年 4 月 6 日外交部抄发第 129 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77/12/1，第 129—132 页。

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思想、人民和商品的资源流动"。以此透露出某种在最高层次上改变对北京政策的意思。①

时隔不久，美国国务院又递交了一项关于放宽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的动议，试图通过这一行动赋予政府"坚定而灵活"、"遏制而不鼓励"、"和解"等新口号以实际内容和意义，向中国大陆内部那些奋力争取实用主义政策和与外部世界和睦相处政策的分子发出新的、鼓励性信号。② 为了进一步阐明华盛顿的态度，国务院还特于8月31日电示美驻波兰大使在即将举行的中美第131次会谈中，重申停止中美两国冲突的手段是相互减少敌对态度的意向，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中方提出的任何建设性建议感兴趣。当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的研究委员会的提案中甚至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此时，美国政府在考虑于局面允许的前提下，继续静悄悄地、周密谨慎地推进尝试缓和关系的计划，包括试图进一步取消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限制，表示要将这种措施，以及美国在华沙的努力和对扩大与共产党中国和平关系的兴趣，作为对中国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在1966和1967年两年中，华盛顿一方面反复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强调面对越南问题的局势，美国不寻求和鼓励扩大战争的任何行动。要求蒋介石避免采取给中共发出错误信号的行动，保证赋予解决越南问题以比反攻大陆更为优先的地位。④ 一方面主张静观待变，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尽可能不在美中接触中注入任何新的特殊因素，包括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对中共直接或间接威胁的军事行动。针对1967年初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问题，腊斯克指示美驻波大使在美中第133次会谈中，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要求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飞

① 参见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 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8月31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pp. 364－366、375－378、471－475。

② 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 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pp. 364－366。

③ 1966年11月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9月6日阿尔福雷德·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pp. 375－378、437－440、380－382、471－475。

④ 参见1966年9—10月腊斯克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7年3月16日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pp. 402－403、539－540。

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机的侵犯行为不是有意的。[①]

美国频频发出和缓美中关系信号的举措，是建立在避免双方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以保证越美和谈能够实现这一基础上面的，可以说它只是一种消极的权宜之计，并不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发生质的变化。[②] 加之上述的美苏密切接触对中国构成的新的威胁，使得北京只是通过与华盛顿的信息沟通就战争界限问题达成某种默契，对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一点基本心中有底，[③] 从而安心开展文革运动外，对其示好姿态的基本立场却是："最近，美国官员纷纷表示要同中国'和解'，要同中国'搭桥'，要同中国实行'和平合作'。美国政府以为它们讲了这么几句漂亮话，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会被迷惑住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既不害怕美国的威胁，也不相信美国的谎话。十七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要'和缓'中美关系的说法是一文钱也不值的。"[④]

在对美国上述种种表示不予理睬并予以驳斥的同时，中国所做的是大张旗鼓地进行揭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宣传，以及从道义和物质上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3. 越美之间的和谈试探

事实上，越南政府早在 1961 或 1962 年就曾探寻过以谈判方式解决与美冲突的

---

① 参见 1966 年 11 月 9 日美国务院致美驻加拿大大使馆电，11 月 15 日、1967 年 5 月 29 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pp. 420－424、436、575－577。

② 1966 年 12 月 1 日邦迪等人在致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中即特别强调：全面放弃对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更为重大的政治行动，而且被认为是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当前美国在越南的强有力的姿态为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避免冒被误解为对共产党侵略立场正在发生变化的危险。参见 *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pp. 471－475。

③ 1966 年 6 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对多勃雷宁强调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美国不会进攻或轰炸中国大陆，中国起码不会使其军事力量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在"大叫大嚷"，实际上"对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却极端谨慎"。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 162 页。关于中美此期信息沟通问题，见下节。

④ 1966 年 9 月 7 日王国权大使在 131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246/1/56，第 16—17 页。

途径。即便到1965年初约翰逊将战争升级，河内也没有关死和谈之门。[1] 翌年初，美国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一次战略反攻，同时扩大轰炸越南北方，并干扰北越的导弹弹道，使保卫河内的导弹营发射的60%的导弹失去控制和自毁。面对美军现代化的装备技术和新的轰击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队感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此后，随着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战场增兵，加强轰炸北方，直至1968年初，越美实际进入一种拉锯战状态，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准备在持久战的基础上，争取扭转南方的战争局面，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2] 由此，河内不断通过苏联等第三国尝试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据美国官员统计，1968年以前关于美越和谈的大小试探共达2000余次。[3]

在越美之间断断续续相互试探的过程中，越南政府曾多次发出过让步的信号，如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五点宣言，提出只有在美军撤出南越后才能谈判。北越在刊登此宣言时即做了若干改动，暗示只要美国事先保证撤军，谈判就可开始。4月13日，北越政府宣布了关于美国从南越撤军和停止对北越轰炸等解决越南问题的四点立场，并正式解释说：这是“最健全的政治解决的基础”，而不一定是美国必须全盘接受的和平协议的条款。只要美国承认它们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即可开始。翌年1月4日和6月初，北越又通过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和外长等人的谈话表明了承认四点立场不是越美谈判先决条件的态度；并于6月下旬向印支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表示：越南方面不想干预西贡政权的构成问题，也不会提出南越中立化，而且愿意就美国撤军问题讨论一个“合理的日程表”。同时希望预备性会谈通过苏联绝密地进行，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对。1967年1月28日，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发表讲话提出，只要停炸就可以和谈。半年后，范文同于7月24日会见衔约翰逊之命到河内调停的法国人R·奥布拉克时再次表示，

---

① 1965年8月外交部的一个通报谈道：越南人关于和谈的做法与我们不同。北越从来没有完全将和谈的门关死，这就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制造了机会，助长了他们压北越进行和谈的幻想。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124，卷号123，转引自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and London, 2000, p. 169。

②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168、177、183—184、186、191、227、202、194页。

③ 越美之间尝试接触的情况，详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242－252页；《多勃雷宁回忆录——信赖》，第177—178页；Robert K. Brigham,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页。

没有美国官方的正式宣布，只要实际停炸，河内即可接受谈判。以此降低了接受和谈的条件，不再坚持以美军全部撤出为谈判前提的要求。9 月 29 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广播讲话，提出停炸、“导致有成果的讨论”的和谈新方案后，越南方面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同本国政府开始谈判的基本条件十分接近，预示了越美对话已成为可能。故此，当 10 月北越因美国恢复轰炸越南北方而拒绝这次呼吁和谈的所谓“宾夕法尼亚行动”时，是以一种“模糊”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的，借以作为向美国发出保持巴黎谈判渠道畅通的一个标志。阮维桢并在 12 月末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当轰炸停止时，“会谈就将开始”。这与一年前他所说的，随着轰炸的停止，“会谈可以开始”相比较，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①]

1968 年 3 月 31 日，约翰逊拒绝威斯特摩兰关于要求再增援 20 万远征军的建议，通报华盛顿决定将限制美国在越南的活动，停止对越南北方北纬 20 度线以北领土的轰炸，同意派代表到巴黎与越南方面谈判和宣布不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4 月 3 日，越南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响应，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确定美国无条件停炸越南北方和停止其他一切战争行动的问题。5 月 13 日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至 10 月 15 日初步达成协议，河内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议。10 月 31 日约翰逊政府宣布从 11 月 1 日晚 8 时起停止空军、海军、炮兵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袭击。[②] 四方会谈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进程启动了。

4. 中国对越南和谈方针的干预

对于中国来说，尽管直到 1968 年初，越南政府在和谈斡旋活动中最终没有为实现对话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但他们所表露的和谈意向，以及为此而做出的让步迹象，则一直令中国方面十分不满。尤其是他们绕开中国请苏联出面做调停人的做法，更加重了北京对河内的反感。中国领导人这时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在 1968 年 11 月以前，中国关于越美对话的指导思想是，“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无论是升级或降级，都是侵略战争”。“越南问题的核心”，“决不是什么战争逐步降级

①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 245、249—251 页；Robert K. Brigham 前引文。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 41—42 页。

的问题，而是美国侵略者立即、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的问题”。“美国政府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1] 由此，中国在通过发表谈话、声明阐明自己立场的同时，一方面针对越南对美国停止轰炸行动的关注，启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大力揭露批判所谓美国“停炸诱和”、“以炸迫和”的诡计；一方面反复向越方强调自己对和谈问题的看法，力行劝阻。不过，中国对越美谈判的方针，在和谈试探、调停和开始的两个阶段中，依据越南方面态度的变化和发展而有所不同。

第一，在谈判开始前的越美对话试探、调停期间，中国方面主张，越南可以同美国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2] 此方针的基点在于，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

对于河内在战争升级伊始就为政治解决冲突留出余地的倾向，毛泽东于1965年10月20日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提醒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3] 陈毅、周恩来等人也不断告诫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苏联插手越南问题，给越南一些武器，是企图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以便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总路线的轨道。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人民处在反美斗争第一线，正在为世界革命而流血，是代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帜不能折断在敌人设下的圈套里。[4]

---

① 1966年9月7日王国权大使在131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246/1/56，第29－30页。

② 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4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2页。

④ 参见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与法国外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页；1965年12月17日陈毅与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记录，12月19日周恩来与阮维桢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p. 91、92－93；1965年11月9日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5页。

这样，进入1966年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地关注越南南方战场形势的变化，并直接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以此排除他们在和谈时机问题上的犹豫及动摇。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毛泽东建议越方在越南最南边的金瓯半岛发展一点主力军，以吸引一部分敌人主力。他指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你们抓到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60年到66年，7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要增兵？那还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1968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名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他甚至曾向胡志明提出：我要去打，不仅去北方，而且去南方，走胡志明小道，不一定要死在中国，被美国打死很好。①

1967年3月底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就越南形势交换意见。在4月7日至1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所接触。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但同时又阐释了中国对于这时的政治斗争内容的理解，即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他并告诫说：越南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不要半途而废。② 当越美双方在“宾夕法尼亚和谈活动”中的接触失败后，10月，毛泽东又对越南人强调指出：你们是在前线，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并指点说：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的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③

特别是到1967年末，在毛泽东看来越南的抗美斗争已不是胜还是不胜，或大胜还是小胜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周恩来也认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

---

① 1966年8月26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4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③ 1967年10月5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

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已经展现在越南人民面前了。[①] 这种关于战争时局的认识，使中国对越南在和谈活动上表现的让步倾向就更不能理解了。12 月 19 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的贺电中即明确表明了中国这时对和谈问题的立场："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②] 当 1968 年初河内决定在发动春季攻势后与美国谈判，迫使其降级战争，从而再次考虑接受美国重新伸来的橄榄枝时，中国驻越大使又致函越南方面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军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③]

第二，在越美和谈正式启动后，中国方面进一步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此态度的基点在于，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

此期，尽管中国方面表示同意越南政府分步骤地同美国接触谈判，走一步看一步，但基本认识仍然是和平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因此指出：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认为：美国、仆从国和伪军三方面现在有 100 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④] 但与前一阶段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这时突出批判了越南方面的四个行为，即 1. 指责河内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是一种妥协行为。认为约翰逊 1968 年 3 月 31 日的声明只是一个欺骗性的计划，他只是为了要渡过难关，完全没有打算结束战争；而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表态，也不过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常

---

① 1967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 年 12 月 19 日周恩来在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 年 12 月 20 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59 页。

③ Document: Comrade B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WIHP Bulletin, Issue 12/13, Fall/Winter 2001, p280.

④ 1968 年 5 月 7 日周恩来接见越南外交部长春水时的谈话，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54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233 页。

用的把戏。越南4月3日声明的结果是帮助约翰逊解决了难题，并给整个形势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将4月4日美国黑人领袖路德·金遇刺的责任也加在了越南的身上，说如果越方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2. 批评河内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在提出的以金边为会晤地点的意见遭到美国拒绝后，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做了第二次妥协。3. 责备河内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打算只运送武器过去，不再进行人力支援。对此，尽管越南方面解释说是误会，但北京实际已认定河内有此项举措，而且认为这是又一个妥协行为。4. 严厉斥责河内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的让步等于是承认南越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取消了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南方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方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妥协了四次，尤其第四个妥协行动是最实质性的让步，它使美国帮助其西贡傀儡谋求到合法地位，而却使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为此，北京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而削弱中国的立场，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①]

总之，对这一阶段的越美接触，中国批评越南的调子升高了，或者说对越南和谈方针及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加强了。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②] 此言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妥协让步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的性质。

在越南方面看来，每当中国人这样指手画脚时，都非常令人讨厌。[③]

5. 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

越南战争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后，美国对中国南部的威胁客观上减轻了。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苏联沿苏中边界地区军事部署的加强，中国切实感受

---

① 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p. 123—129，138—140。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

③ 参见1968年4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p. 129，139；Document：Comrade B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Bulletin，Issue 12/13，Fall/Winter 2001，p. 280。

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而越南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厌倦，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北京的离异情绪加深，以及文革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领域的冲击，中国事实上已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必须寻找契机予以摆脱。于是，毛泽东着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从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此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却似乎将他的抗美激情暂时沉寂下来，除了发出一封强调的重点实际在于反对苏联的贺电①外，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这种状况事实上从某个角度表明，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196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②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同他在1965至1967年时坚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③ 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

---

① 1968年9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出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49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③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如前所述，1967年4月周恩来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

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①]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②] 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

这样，到 1968 年 11 月，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指导方针随毛泽东态度的转变而做出了重要的调整。此后，在中美试探性接触，谋求高层会晤，最终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双方关系每遇反复，中国都会在越美和谈问题上做出或反对、或赞成的反应，而对越南的道义、物质支持和援助则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于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做了一个重要筹码；而就美国方面言之，事实上也已将北京在此问题上态度的变化看作是中国对越、对美政策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向了。

三、战略定位：中美苏越重新构建盟友关系

1965 年初至 1970 年代初，随着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挥剑断袂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中美苏越之间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在印支战场这个大舞台上，四国构成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中美苏越关系重新组合，其结果是中美实现和解，着手联合抗苏，中国实际退出冷战，苏联复又走向与美国对抗的前沿。中越关系呈现恶化的前景，苏越结成盟友，转入与中美抗衡的历程。

1. 越战升级时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在越南战争尚处于“特种战争”时期，中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北越在南方开展

---

① 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 1972 年 3 月 23 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244/1/77，第 115 页。

② 1968 年 11 月 30 日周恩来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Pan Ba）的谈话，《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267 页。

武装斗争，一方面也在思考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底线。此时中国党和政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特种战争”的范围；第二步可能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则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①] 1964 年 6 月以后，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倒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如果他们轰炸或登陆，我们就要打，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中国人去越南，跨一步就到了。[②] 周恩来则在 7 月召开的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当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时，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③] 这样，中国领导人以 17 度线[④]为雷池，给美国划定了升级战争的范围。8 月，中国政府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⑤] 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与此同时，中越协同对美作战的决心和行动，使得经历了朝鲜战争前车之鉴的美国也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中国对越南实施军事介入的问题。中国方面关于战争底线的信息，令美国人“重新想起了 1950 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⑥]

由此，中美双方开始围绕 17 度线上的进退问题进行信息沟通，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尤其是当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避免直接卷入越战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196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

---

① 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 84 页。

② 1964 年 6 月 24 日毛泽东接见越南文进勇等人谈话记录，1964 年 7 月 27 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外宾谈话记录。

③ 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20—221 页。

④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确定以北纬 17 度线为越南南北两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

⑤ 《人民日报》，1964 年 8 月 14 日。

⑥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中国威慑计划：印度与印度支那），Ann Arbor，1975，p. 175.

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①] 2 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袭击美军基地，取得波莱古大捷后，约翰逊下令实施"火箭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报复性的猛烈轰炸，战争进一步升级。这时，中国政府一面发表声明提出警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②] 一面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③]而且由周恩来借 2 月 27 日接受菲律宾《塔里巴》日报、《中吕宋邮讯》周刊采访之机提出：不必担心台湾问题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决不侵犯别人，决不会挑起战争。[④] 由此向美国方面传递信息。

3 月，美国实施"雷鸣行动"，持续轰炸北越，同时实施岘港登陆，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南方作战，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后，由于美国方面一直对有关中国军队，或中国军队与北越军队共同干涉越南战争的情报持怀疑态度，认为尽管中国向北越提供援助，但是它"尚未准备进入战斗"，[⑤] 故而，美国此时与中国沟通信息的方式，可以说一是进行军事试探：加紧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一是舆论试探：宣称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军将对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人实行穷追，等等。[⑥] 以此切实摸清中国方面的底线，及其捍卫这条底线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对于美国的行为，中国政府 3 月 12 日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

---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57 页。

② 郭明等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中册，时事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57－358 页。

③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June 1965, RSS No. 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 (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 XXXV 6/16－30/65,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BJL), Austin, TX. 转引自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提交 2000 年 1 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关于"第三者"，该文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 2 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14 页。

⑤ 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Volu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McCone comments at White House meeting on February 10, 1965, and at NSC meeting, March 26, 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 2, pp. 223, 482. 转引自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前引文。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 424 页。

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1] 其后，周恩来又于20日接见叙利亚外长等人时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2] 这种强硬态度给美国提供了中国要坚决维护战争底线的明确信息，由此，美方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就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事情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3]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于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4] 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之后，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应该打，坚决打"，周恩来批准"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5] 一方面，周恩来于4月27日在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谈到支持越南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6] 周恩来还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7]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

---

① 《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中册，第561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9页。

③ 参见1965年4月2日周恩来与阿尤布·汗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39页。

④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3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4页。

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7页。

⑦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4页。关于口号问题，1965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援越抗美"的口号则是在5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中首次公开提出的。见"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人民日报》，1965年5月1日。

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①] 华盛顿方面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请英方将此情况通告北京。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②]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③]中美双方频繁地互发信号，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出兵援越的策略上，中国以派出防空、铁道、国防工程、筑路等支援部队形式介入战争，而且不公开宣布，并将支援部队的军事行动限制在越南北方。而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军事任务，也不予公开点破。约翰逊政府通过信息沟通摸清了中国的真实意图后，在决定扩大战争时，也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越雷池一步，将美国的战争行动限定在中国划出的界限之内。

1965年7月，约翰逊政府向南越增兵。美国要扩大战争的新动向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8月20日，周恩来就在与赞比亚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同时重申了上述中国的四点立场。[④] 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

---

① 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国方面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 Peking（Mr. Hopson）to FO（英国外交部），No. 720，Priority/Confidential，May 1965；Washington（Sir P. Dean）to FO，No. 1466，June 1965；Peking（Mr. Hopson）to FO，No. 750，Confidential，June 1965，FO371/180996，PRO（英国伦敦档案局）．转引自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前引文；另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3页。

② Peking（Mr. Hopson）to FO，No. 720，priority/Confidential，May 1965；FO to Washington，No. 4546，priority/confidential，June 1965（d. 0240，June 1965）；Washington（Sir P. Dean）to FO，No. 1466，June 1965，FO371/180996，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William P.）Bundy，"Subject：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 MEMORANDUM"，June 1965，NSF-CO，Box238，LBJL. Peking（Mr. Hopson）to FO，No. 750，Confidential，June 1965，FO371/180996，PRO. 参见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前引文。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6页。

④ 同上，第750页。

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①] 以此更加明确地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方面准备抵抗美国侵略的信息。事后，毛泽东对陈毅说，这篇讲话很重要，把问题摆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面前，使他们有所准备。[②] 在新的战争形势面前，中国的态度没有退缩，仍然是：中国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再较量一次，中国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③]

而美国在将战争不断升级的同时，也在寻求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为保证此目标的顺利实现，避免与中国兵戎相见变得更为迫切起来。华盛顿既要保持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又要防止北京对其升级战争的步骤做出过分反应，将地面作战部队投入越南战场，干扰越南的和谈意向，于是继续传达缓解美中紧张对峙的意向，消除中国方面的疑虑。1966年初，针对中国报刊和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宣传报道和言论，美国方面在3月16日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声明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④] 对于美国方面做出的姿态，中国方面的反应是，周恩来再次于4月10日对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详细地复述有关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段话。[⑤]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方面的底线，已是心中有数。

翌年2—4月，美军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了第二次战略反攻。其间，美国飞机

---

① 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

② 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第153页。

③ 参见196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69页。

④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77/12/1，第129－132页。

⑤ 外交部编：《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谈话参考资料》，福建省档案馆，246/1/56，第15—1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7—28页。

曾多次侵入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国方面担心中国会因此而中断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此，腊斯克特指示美驻波大使：在预定于6月7日举行的第133次会谈中，一方面要强调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这种会议，认为它使美中之间能够有机会就双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国飞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一方面要告诫中国，如果冲突扩大到越南之外，将导致美中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严重危险发生。[①] 133次会议结束后，中国方面没有终止以后的会谈，保留了这条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又在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周恩来并在6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特别提到：帝国主义就是拿原子弹、导弹、氢弹吓人的，并且想垄断它们。我们要揭穿它。[②] 借以回应美方的告诫。

总之，在越南战争开始升级的几个阶段中，中美双方通过信息沟通，确定了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界限，并且理智地将各自的行动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由此，在整个越战期间，美国的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17度线，中国也没有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派出志愿军直接赴越参战。而中美之间达成的这种默契，事实上也缓解了中国领导人在中苏关系转入敌对后产生的两面受敌的危机感，并奠定了日后调整对美政策的心理基础。

2. 苏联成为中国的首要敌人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③] 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1960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中苏关系开始注入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逐步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

1963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

---

① 参见 *FRUS*，1964－1968，Volume XXX China，pp. 575－577。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61、163页。

③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4页。

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①] 这种提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密切关注，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②] 随着中苏边界摩擦事件的增多，以及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立场的趋向强硬，苏联的回应带有了军事色彩：一方面，从 1963 年起，莫斯科不仅适度增强其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而且还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自是年开始重新进驻蒙古布防。[③] 7 月，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其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在蒙古的铁路两侧及其以东边境省份活动，为苏军的进驻勘察阵地。[④] 一方面，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将华沙条约组织的职责由欧洲东扩至亚洲，关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是年 7 月赫鲁晓夫致函华约成员国领导人，通告说苏共中央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约的请求持肯定态度，并提议召开华约成员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这一申请。[⑤] 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尽管赫鲁晓夫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建议因罗马尼亚和波兰

---

①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 年 3 月 8 日。

② 参见［苏］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第 211 页。

③ 参见 NIE 11－12－66，The Outlook for Sino-Soviet Relations，December 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 32 页。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因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必要保持常备军。苏军于 50 年代分批撤出。参见徐焰：《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5 期，第 4 页。

④ 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3 页。

⑤ 1963 年 7 月 10 日赫鲁晓夫就蒙古希望加入华约事宜致哥穆尔卡函，1963 年 7 月 15 日赫鲁晓夫就华约成员国武装力量等问题致哥穆尔卡函，1963 年 7 月 15 日泽登巴尔就希望加入华约事宜致西伦凯维兹函，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13011、13012、SD13013。英译本可分别见：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11/docs/rel_100763.pdf，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11/docs/rel_150763_2.pdf，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11/docs/rel_150763_1.pdf。

的反对而未能实现，[1] 但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已从罗马尼亚方面获得了这个信息。[2]

这样，进入1964年后，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步骤，苏蒙关系的新动向、苏军在蒙古调动的迹象、中蒙关系破裂的前景，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以这一年为转折点，中国的"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了一起。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4—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3] 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4]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

---

① *English translation*: *Shorthand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Romanian Workers'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July* 18, 1963, in: 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20/630718.htm; *English translation*: *Memorandum by Polish Foreign Minister Adam Rapacki opposing Mongolia's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in the Warsaw Pact*, *July* 20, 1963, *in*: 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20/630720.pdf.

② 1960年代初期，由于同苏联矛盾的发展，罗马尼亚有借助中国力量抵抗苏联压力的要求。从1963年初开始，罗主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国则积极响应。自是年起，根据罗方建议，中罗两国外交部加强非正式往来，沟通、传递信息。中罗两党两国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保持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22—327页）。在这种状况下，罗马尼亚有可能将苏联建议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消息反馈给中国。不过，目前尚无档案材料支持这一推测。

③ 参见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

④ 关于中国对苏安全战略的转变问题，见李丹慧：《1964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574页。

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①]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②] 毛泽东则在是月末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③]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一系列声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依据。翌年3月，较大规模的珍宝岛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事件爆发，中苏两国关系一度濒临战争的边缘。时隔不久，勃列日涅夫在6月举行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并于此后陆续派出二十多个代表团到东南亚、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活动，宣传该体系，试图拉这些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面对莫斯科构筑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及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毛泽东转而将苏联确定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

---

① 参见王仲春前引文，《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52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1页。

③ 1966年3月28日毛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一次谈话记录。

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威胁。

中苏之间发生较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现实，初步打破了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对中国来说，苏联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首要敌人，这即为中美两国寻求实现关系和解，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对各自的外交政策做出战略性调整，提供了国家安全利益相同的基点；而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后中国公开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事实上也已经为这种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①]

3. 中美在印支战场较量的进程中化敌为友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面对苏联的威胁，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实现和解提供了现实基础。中苏分裂、边界冲突升级，两国关系甚至进入战争临界点的事实，使西方世界切实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分化趋势正堪利用。于是，因泥足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战争、借助中国力量与苏联抗衡的可能性。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中国南部的压力在客观上减轻的现实，则为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条件。中美之间出现了相互接触的历史机遇。

1968年11月中旬毛泽东给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方针定出新的基调，表明北京不再干涉和谈问题、反对河内让步政策的立场之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对美对越关系的思考中，务实地解冻与美关系，同时不放弃援越抗美革命步调，抓牢盟友越南的中国外交战略新棋局的走势初步形成。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

① 1968年6月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雄等人时即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参见1968年6月29日周恩来与范雄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 138）。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8月23日周恩来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宣读经过毛泽东审阅的讲话稿中，公开谴责苏联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参见蒋本良：《“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中共党史资料》第72辑，第40、4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34页）。

共处五项原则问题。[1] 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2] 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做出了初步结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并且开始琢磨，中国的这种姿态是寻求借助西方力量抵消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呢？还是直接就是对《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号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精深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即将就任总统的尼克松则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其对外事务代表，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3]

翌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正式启动，越南战争切实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进一步看到了加快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珍宝岛事件爆发后，4月，经毛泽东确定[4]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提，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5] 中国以此将中苏边界冲突的文章做大，既让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

---

①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 Alfred 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December 2，1968. 此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③ 参见塔德·肖尔茨著：《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邓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④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⑤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①] 美国由此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性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确定，中国加快了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对抗苏联。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随着越美和谈的进行，在与美国为打破双方关系僵局进行的探索和呼应中，中国一方面重申坚决支持越南的立场，一方面则把对越援助着重放在了经济援助上，开始向越南方面强调，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应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表示：过去建议越南应组织大规模战役，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这个建议是不可行的，着手陆续撤出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并将对越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较1968年减少了近一半；对于越美和谈，也再次表达了不干预的态度。[②]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当1970年4月30日美国出兵柬埔寨，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之后，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再次提出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并强调：谈判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此后中国中断中美会谈，毛泽东并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

---

① 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另，美国方面对林彪报告的分析理解，见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 1979, p. 176。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6日；《出使七国纪实》，第127－128页；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等人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 pp. 156－15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5、538—539页；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91—97页；李可、郝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页。

美会谈之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1] 以此向美国施加压力，既表明中国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立场，试探美方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更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

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7月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此间，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是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2]

中美两国向着高层对话阶段前进时，1970年末，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将战争又一次升级。这次，中国没有中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而是采取了务实而不屈从、革命而有限度的更为灵活的步骤，一方面于次年3月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明确向美国做出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警告性回复，间接向美国重提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以此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还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一方面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发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的信息。[3] 此后不久，毛泽东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来适时通过叶海亚·汗向尼克松发出邀请，尼克松获悉后即向中方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4] 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为中美高层会晤做准备时，已考虑到要在和谈问题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3月24日、5月5日；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p. 163－16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6—367页。

② 参见［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1945年以来美中关系正常化》，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1970年7—12月中美联系情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51页；*White House Years*，pp. 697－703；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 178；《“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71年3月11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1页；1971年2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挪威驻华大使的谈话，*White House Years*，p. 706。

④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2—353页。

上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作，提出：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支三国撤走。认为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中国方面并设想通过中美高层接触和举行国际会议，来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①]

1971 年 7 月和 10 月，基辛格两次访华。中美高层接触的结果是，其一，双方在各自的主张中看到了共同点。美国表示从越南撤军后由台湾撤军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则强调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已同美国谈了 15 年多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两者虽然初衷不同，但客观上都已把解决美国撤军问题放到了首位。其二，中国方面看清了美国在阮文绍问题上不会让步，于是，为尽快结束越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转而劝说越南方面先解决撤军问题，委婉地劝越南领导人不要再坚持搞掉阮文绍。[②] 其三，中美双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7 月 12 日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即秘密前往越南通报情况。尽管越南领导人表露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但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再为越南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面对越南的不满及越苏接近的趋向，中国方面开始以大规模援越作为补偿。是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 7 项无偿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 36.14 亿元，占中国该年度援外协议总额度的 48.67%。[③]

1972 年 1 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抵达北京。在 1 月 4 日同周恩来的会见中，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几点口信，其中有关

---

① 参见 1971 年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 - 1975*, pp. 197 - 198；《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467 页。

② 参见 S. T. Ball, *The Cold War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47 - 1991，（冷战：一部国际史，1947—1991），N. Y. , London，1998. p. 140。

③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84 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

越南问题的是：美国已经做了种种让步，而越南还在袭击。河内努力要侮辱美国，而这种侮辱是任何大国都不能接受的。口信还特意将越战与苏联对华威胁联系到一起，说“东南亚战争的继续进行只能给莫斯科提供机会，使它得以加强它在河内的影响，从而发展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计划。”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能力必须得到维护。”通过打苏联牌向中国施加压力，以期北京能敦促河内对和谈条件做出让步。对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美国方面明确表明了中国不会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中牺牲越南利益，以及尼克松不能以保护者的姿态来中国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①] 对抗苏联是中美双方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中国有求于美国。

2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乔冠华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讨论越南问题时，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而毛泽东则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②] 以此进一步示意：中美双方目前只有一个敌人，即苏联，为对抗共同的敌人，两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对于中国不向河内施加压力、不干预谈判的立场，美国方面虽然有些失望，但只要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而非重新鼓励河内穷追猛打，他们就满意了。[③]

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签署，双方在台湾问题和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正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周恩来于3月初再次亲往河内通报情况时，既迂回地表明了中美关系打开后，北京希望巴黎谈判能够谈出成果的态度，又以自我批评的姿态，以及中方在中美和解与援越抗美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安抚了越南领导人。只是在河内看来，中国与美国结束敌对状态，即如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因此，黎笋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

---

① 参见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78—81页；《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506—50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9—360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64页；《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

③ 参见 White House Years, p. 1052。

们会谈过了，不久，他们就要更猛烈地进攻我们了。"[1] 中越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3 月底，越南军队在越南南方战场发起全面进攻后，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大规模恢复对越南北方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苏联和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苏中两国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的压力和越南的离异倾向，中国方面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同时开始大规模援越行动。

5 月份，当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美国和苏联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美苏之间出现相互接近的趋向。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来说，无疑是个威胁。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之的先决条件则是越南问题，这点已是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坚持的一个共识。由此，中国希望美军及早撤出越南，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且，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结束实际将更有利于越南以后统一南北两方的军事行动。这样，中国方面对实现越美停火的兴趣更大了，中国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为越南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基础，一方面积极劝告越南和压美国适时结束战争。[2]

1973 年 1 月 27 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2 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 4 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 8 套惯性制导系统。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不久，基辛格于 2 月 15 日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他时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的联合反霸战略。[3] 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 月 1 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

---

① 参见《出使七国纪实》，第 138—139 页；Document: Comrade B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Bulletin, Issue 12/13, Fall/Winter 2001, p. 280。

② 参见 *White House Years*, pp. 1304、1396、1403、1413；《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 296—297 页；《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 534 页；1972 年 7 月 12 日周恩来与黎德寿谈话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 pp. 182－18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 56 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642 页；*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pp. 204、263。等等。

③ 参见 NSDM 204, Henry 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Commerce Memorandum, February 6, 1973。此份档案 1994 年 5 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等，均予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 367 页。

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中美化敌为友，关系解冻的过程，是在双方对各自盟友——北越和南越进行援助的较量中完成的。中国虽然为了避免破坏与美和解的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而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没有如某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大国之间的交易有时可能会牺牲小国并压垮它"[①] 那样损害越南的利益。实际上，如前所述，1971—1973 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的时期，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年份。而尼克松政府面对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将美国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维护与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更着眼于莫斯科，从而对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内的立场及行为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谅解。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因越南问题而遭到破坏。不过，与此敌友关系转换相随而来的是，中越关系逐渐步向低谷。

4. 越南在苏中之间选定盟友

越南对中国的怨气由来已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1954 年中国说服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向侵略者法国做出让步。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 1956 年 8 月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②]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美国人的到来，为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③] 可以说，黎笋的这种积怨是导致他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一个重要因素。

1960 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以来，中越两党在对苏认识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中国领导人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事实上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力。中越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矛盾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两国关系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④]

---

① 李先念与范文同谈话备忘录，转引自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 - 1975, p. 201。

②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 37 页。

③ 参见 Document: Comrade B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Bulletin, Issue 12/13, Fall/Winter 2001, pp. 279、280。

④ 邓小平在 1966 年时就曾向黎笋指出：我们的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评判问题，你们是在怀疑中国帮助越南有自己的企图。参见 1966 年 4 月 13 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与黎笋、阮维桢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 p. 96。

苏联调整对越方针，大规模援越之后，中国开始密切关注苏越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①] 中国反对苏联提出的在援越问题上联合行动的倡议，排斥苏联援助的态度，将急需各国援手的越南置于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河内在中苏交恶之中如履薄冰，反感的情绪日益加深。

在勃列日涅夫插手越南事务新举措取得的成效，苏越关系转向亲密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处理对越关系问题的态度也趋向强硬。1965 年 4 月，黎笋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苏联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公开宣称："如果美国强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于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对此，周恩来在 10 月与范文同会谈时即提出：我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彭真、罗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见。[②] 周恩来和邓小平还在是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③④] 1966 年 3 月，周恩来在同黎笋谈到越南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志愿飞行员时，特意提醒说：苏联可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敌人。你们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不久，他又和邓小平于会谈中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侮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邓小平还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

---

① 1965 年 10 月 9 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6 年 3 月 23 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p. 90、93－94；1965 年 11 月 8 日周恩来与胡志明会谈记录。

② 参见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 39；1965 年 10 月 9 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 90.

③ 参见 1975 年 9 月 29 日邓小平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 195.

④ 1966 年 3 月 23 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p. 93；1966 年 4 月 13 日越南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记录。

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①] 6月，美国出动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的油库，胡志明7月17日发出告全国军民书，呼吁各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华约在苏联的倡议下发表声明予以响应，提出将组织志愿者入越参战。对此，中国在声援越南的声明中特别重申毛泽东关于外援的思想，强调说外援不能代替本国人民的斗争，越南人民应当依靠自己将战争进行到底。周恩来还以中国的支援部队是正规军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国可以拒绝其他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的要求。[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在毛泽东与黎笋、林彪与范文同和长征分别进行的三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都指责说越南劳动党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③]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表态，已带有了明显的施加压力的性质。对此，越南领导人在极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国控制的同时，离异心理也加重了。在黎笋等人看来，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④] 因此，面对中国方面关于苏联正在出卖越南的指责，越南领导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依据的应该是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其他。[⑤] 对于越南来说，苏联正在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全力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越南婉拒了中国关于是否需派地面作战部

---

① 1966年4月13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与黎笋、阮维桢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 pp. 94－96。

②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172—173页；SNIE 13－66, Current Chinese Communist Intentions in the Vietnam Situation, August 1966；1966年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 p. 99。

③ 1969年8月15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给康·维·鲁萨科夫的报告，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01840。

④ 参见Document: Comrade B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Bulletin, Issue 12/13, Fall/Winter 2001, p. 283.

⑤ 参见1966年4月13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与黎笋、阮维桢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 p. 97。

队入越参战的探询，表示他们自己能打，不需要外国的这种援助。[1] 此种反应，事实上显露了越南方面对中国已怀有了某种戒备的心思，中国的强硬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将越南推向了苏联一边。

1970年代初，在中国要求重视苏援的越南在反修问题上同自己保持步调一致的时候，苏联加紧了拉拢越南，打击中国的步伐。此期，苏联不仅在对越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方面与中国一争高低，努力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而且还密切关注将越南纳入苏联轨道，使其对外方针政策的倾向由北京转向莫斯科，以及增强河内对东南亚地区影响的前景。[2] 尤其在中美开始寻求接触之后，苏联方面对越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所谓“印支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挑拨越南认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激化中越矛盾；并对越南独立自主倾向的增强予以支持和鼓励，使之依靠苏联顶住中国的压力。[3] 对于越南来说，抗美战争还在继续，越南的民族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越南的首要敌人仍然是美国，而作为自己盟友的中国却在同美国化敌为友，并且寻求结盟，对付大力援助越南的苏联，由此，对中国的抵触情绪进一步加重了。

当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在望时，面对苏越关系的顺利发展，美国从越南撤兵后苏联将填补其空白的趋势，中国大规模援越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要拉住越南，避免其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而苏联加大援越力度的目的也是要争取越南与之结盟，通过对河内的影响，使越南成为苏联利益的代表，打开影响东南亚的通道，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抗衡中美结盟之势。中国和苏联在越南的影响此消彼长，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

其时，随着苏联与越南关系的持续升温，越南的报纸杂志开始发表影射历史的文章，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反华舆论。越南政府则开始向中国入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与美接触、

---

① 参见1966年3月28日毛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一次谈话记录。

② Political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the DRV, "On Possibilities and Specifics of Coordination of the DRV Foreign Policy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June 25, 1970. SCCD, f.5, op.62, d.492, p.149.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216－217.

③ 1971年5月21日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01829。

探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行动的消息。中国支援人员与越军指挥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越港口以维护主权为由，禁止一艘执行贸易协定任务的中国船只进港；越以主权问题要求中国支援部队的高炮部队在名义上受越人民军防空指挥部指挥，并派其联络组进驻，等等。[①] 越南对中国援越意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对越南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现在则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②] 即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③]

1971年，越南领导人建议由中国挑头组织反对美日同盟的世界联合阵线，遭到中国方面的婉拒。中国领导人的理由是，如果建立的这条阵线包括苏联，他们就将控制它。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④] 于是，当中国为排斥苏联插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提出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时，越南方面也不予接受；[⑤] 次年，河内还婉拒了中国提出的派两个师的军队去越南帮助抢修铁路和桥梁的建议。[⑥] 越南对中国的戒心愈益加重，与中国离心离德的趋势事实上已经无可挽回。苏联由此看到了控制越南以把握印支半岛，进而主导东南亚地区事务，与美国竞争，最终占据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美好前景。而对中国来说，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如果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苏联对华实行全包围的企图。[⑦]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预感到了越苏走到一起的危险结局。

总之，越南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力量不足的现

---

① 1966年4月13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与黎笋、阮维桢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 95。

②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1966年11月8日毛主席接见越劳党代表团谈话记录。

③ 张如磉等著：《与河内分道扬镳——一个越南官员的回忆录》，强明、华实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④ 1971年3月7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 22，pp. 179－180。

⑤ 1971年5月21日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01829。

⑥ 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会见黎德寿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23页。

⑦ 参见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 22，p. 130。

状，使其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由于对苏联军援的倚重，越苏关系也从冷漠趋向亲密。而在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等因素的作用下，越南一直把毗邻的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潜在性威胁，戒心始终存在。这种状况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较量，从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以及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越南领导集团中的亲苏疏华倾向逐渐发展。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到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①] 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

越战结束后，美国对越南的威胁已经消除。越南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统一南方的需要，更加依赖于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对外战略。结果，尽管中国在越南抗美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个盟友。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四、结语：中美苏印支战场角逐的战略轨迹

在 19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初越南战争期间，中美苏三国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外交主导方针，在印支战场的角逐中，三方之间的关系相互转化，并由此引发了中苏越三国关系的重新组合。其间，无论是中美苏还是中苏越，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外交活动确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不过，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里，美国凭借其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始终处于关键地位，保持着最大的机动性；苏联次之；中国则在客观上对美国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中苏越三国跨出同一战壕，进入选择一边对抗另一边的三角互动之后，越南对于苏联则是一种较强的依从关系。但是，尽管在这两个三角关系中，各国力量的对比并无均势可言，中国、越南相应都是三

① 参见 Document: Comrade B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Bulletin, Issue 12/13, Fall/Winter 2001, p. 282.

角中最弱的一边，美苏两国却也受到这两种小三角格局的制约，不能左右逢源。中美苏越四方虽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却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其中越南周旋于中美苏三国之间，还带动了大国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1. 中美苏越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因素

可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三个主权国家之间，都会发生具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利害关系。但是，不同时期组合而成的三角关系，就其三边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而言，却有着不同的实质和内涵。具体到中、美、苏、越交叉构成的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是如此。

在1950年代，中美苏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意义上的关系，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双边关系，即以中苏为一方展开的对美外交活动，其所强调的是一种由于观念、制度上的水火不容而造成的割裂和敌对。而中苏越更是同一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彼此不分你我。此时，社会主义国家以意识形态确定自己的战略取舍，这从某种意义上言之，是一种畸形的国家关系，其以意识形态结盟为主体，相互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压抑或隐蔽起来，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因素自然就大大削弱。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和中苏越关系，还处于一种定式的凝固状态，尚未形成任何两边都可能相互联盟对抗第三边，而每一边的政策变化都会引起另外两边相应变化的动态的三角格局。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徘徊在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的现实，赋予了中美苏、中苏越关系以新的含义。在印支战争的舞台上，中美苏越之间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尤其是中美苏关系完全突破两极结构，进入到单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三角外交的进程中。虽然中国在三边中是最弱的一方，其力量、地位和作用都还无法与美苏比肩而难以构成三角均势，但就其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言，这种三角外交应该说已纳入到了国际战略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与此相对应，中苏越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其关系也带有了某种三角战略的色彩。

在越南战争后期，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互动影响，交叉重叠，敌友转化，扑朔迷离，既有相互制约，又有相互依赖，外交游戏做得复杂而多彩。

近观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由敌对升级至对抗后，毛泽东打开中美外交僵局，

并试图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同时竭力避免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于是，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迅速结束战争，及早实现此战略目标。中美之间从1973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逐渐构筑起了“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并使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其实，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方面来看，其对亚洲政策的主旨不仅在于与美国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遏制中国。为此，它不但将对越政策由脱身改为插手，并且还极力拉拢越南，联合越南抗衡中美联袂。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中，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在越南问题上，苏联一面积极发挥其政治斡旋作用，避免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一面也大力援越，并利用中美联合问题离间中越关系。这时，苏联已将目光牢牢盯住了对东南亚的控制权，而且开始把握印支这把开启东南亚之门的钥匙，认为自己已拥有了在印支地区确立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为此，苏联试图最大限度地运用这种有利地位，发展和巩固与越南关系的新机遇。越战结束后，苏越战略联盟逐渐形成。苏联扶植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其入侵柬埔寨，并控制老挝，建立所谓印支联邦，把印支半岛变成了一个反华基地，终于导致了1979年中越之间的一场战争。

就美国方面而言，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对三角外交战略的最初运用，便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公开化。美国一面告知苏联，其不断援助越南、强调战争的做法正在危害业已改善的美苏关系；一面以美中关系制约苏联，通过打中国牌刺激苏联对越施加压力，帮助美国尽快从战争泥潭中拔足。而美国从越南撤兵的事实

对其自身并无损害，它正可留下中苏两国去争夺对越问题的主导权，增加中苏之间的矛盾，促使苏越联合对抗中国，进而推动中国倒向美国，双方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的抱负；同时既通过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利用美苏缓和之势制约中国，使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①] 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在中美苏的三角外交中，美国表露出了赤裸裸的战略意识。

而就越南方面来说，它要力争获取中苏两国最大的经济、军事援助，依靠中苏力量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为战争结束后统一祖国的斗争铺垫道路；同时在中国反苏及缓和对美关系政策的影响下，又要依靠苏联抵制中国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中越裂痕逐渐加深，种下了以后兵戎相见的祸根。越南为实现其近期对付美国，远期抗衡中国的战略目标，选择新的靠山，最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

纵观这一时期中美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演变，可以说中苏分裂是其基本背景和动因。但是要找出令中苏两国分道扬镳的始作俑者殊为不易，究其根源，还应在于社会主义阵营以意识形态为国家关系的基础、以国际共运为国家交往的形式这种构架的不合理性。这种畸形的框架以两党关系取代两国关系，为实现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总体战略目标，要求各成员国具有一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命感、统一的政治步调、共同的阵营利益即国家安全利益。此类不合理因素，其实注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终将四分五裂的命运。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实际都未摆脱这个框架的束缚。苏联对华遏制和包围的政策将中国推向美国，而中国压越反苏的方针又把越南推给了苏联。

中美苏印支战场角逐中三角游戏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因中美的联合而于二战后第一次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中国因与越南反目而不得不面临来自苏越的新的军事威胁；至于美国，这场战争噩梦过去之后，不仅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失去了盟友南越，使苏联填补了其撤离后的力量真空。在苏联夺人的气势面前，美国只能退保东盟，借对东盟国家的控制，在东南亚与基本由苏联掌握的印支国家相抗衡，转而力求与苏联分享地区舞台。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四国中力量最弱的越南，虽然对苏联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但就实际利益而言，战争结束，美国撤兵，越南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矛盾，

---

①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记录。

借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越南从此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19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美苏走向全面对抗。由此，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变化中又增加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因素，这即使中美苏三角外交超出了地区的、局部的性质，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全局性意义。

2. 从国际冷战的角度看中美苏印支战场的角逐

从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美苏印支战场角逐的历史过程，中美苏和中苏越在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变化，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

第二，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第三，以冷战时期世界格局的变化而论，亚太地区与欧洲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是两大阵营、两大军事集团进行对抗的典型的两极格局，具有成熟的政治、安全、防务协商机制。亚太地区则呈现为多元结构、多种军事力量并存，其难以形成欧洲式的对话机制。在亚太地区，双边关系，包括双边对话机制、防务联合等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此，亚太地区形势往往受到此地区主要国家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由中苏兄弟分家而至的中美、中越、苏美、苏越关系的变

换，即影响到了亚太地区冷战格局演变的趋势。换言之，随着中美外交战略的调整，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 1950 年代的亚太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 1960 年代，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及至 1970 年代初，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中美联合对苏，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则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朝鲜战争后的第二次转型。

第七章　中苏同盟的破裂及其原因

一、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

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这是事实，但这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分裂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当双方都感到无法容忍对方的观点和政策，同时又都意识到不可能修正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以消除分歧和矛盾时，同盟的破裂才会出现，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那么，在什么时候，是什么问题，使中苏双方感到不能再容忍对方，而决定采取一种不妥协的立场来处理他们的同盟关系呢？

过去，人们常说中苏分裂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个观点最早是中国方面在中苏大论战时提出的，现在仍有研究者坚持这种看法，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①] 这是一个神话。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并没有根本分歧。[②] 因此，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后来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10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

① 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63页；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页。

②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更加密切。[1] 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想法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58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2] 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苏联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

---

[1] 详见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727、728页。

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①] 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 1958 年 5 月 24 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 41.9 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②] 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政策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8 月 23 日，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③] 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④] 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⑤] 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

---

① 详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②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达维德关于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情况的报告，1958 年 6 月 7 日，见 Из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54 – 1964гг），Документы чеш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6，2003，c. 145 – 147。关于会议通过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7 日。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第 186 页。

④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 855 页。

⑤ 参见 1959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c. 97 – 98。

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① 赫鲁晓夫后来为此大动肝火，他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在会谈中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② 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③ 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④ 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 P-12 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⑤

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表现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 1959 年 6 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反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不过，让毛泽东下决心与苏联决裂的并不是莫斯科的这个决定，而是此后一个月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

---

① V. Zubok and C.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3.

② 参见 1959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2, c. 94 – 98。

③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 223.

④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9—21 页；《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9 日。

⑤ Н. С. 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c. 334;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第 266—268 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章嘉琳等译校，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第 413—415 页。

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①]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②] 于是，15 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 3 年赶上英国，5 年赶上苏联，7—10 年赶上美国。[③]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④] 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⑤] 因此到 1958 年 11 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⑥]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⑦] 对于人民公社，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中国 9 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 6 篇顺带提到了公社，而苏联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提。[⑧] 苏共

---

①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国史学会 1998 年印制，第 44、715 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68，第 17—23 张。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第 117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126，第 1—12 张；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01，目录 12，卷宗 223，第 15—17 张。

④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59，第 6—9 张。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第 450 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1，第 6—11、25—28 张。

⑥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2，第 1—6 张。

⑦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8 年第 2540 号，第 11—14 页；1958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内部参考》1959 年第 2774 号，第 15 页；《内部参考》1959 年第 2803 号，第 12—14 页。

⑧ 《内部参考》1958 年第 2654 号，第 24—26 页；1958 年 11 月 8 日《人民日报》。

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① 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他们“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②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③ 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在7月21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火，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④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⑤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⑥ 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

---

① В. Сидихменов，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 40。

②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马贵凡：《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③ 见《内部参考》1959年第2831号，第19页。

④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48，第8—15张。

⑤ Б. Т. 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с. 262、272；《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8—239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6、367、387—388页。

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①] 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鲁晓夫在几个月前的心态一样，毛泽东也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

这时，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公社问题反映出中苏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但“赫鲁晓夫很幼稚”，又“不懂马列主义”，“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而真理在中共一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中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修正主义。[②] 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③] 苏共中央同样认为，中苏友好对于两党两国都是重要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必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第462—463页；第504、506—507页。

②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5, л. 89－9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602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1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需的，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错误和缺点。因此必须"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条件下克服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① 此时，中苏分裂已成必然趋势，除非有一方承认错误，从而达成妥协。

1960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劝说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联会议公开散发批评苏共的材料，试图压服苏联改正错误，而苏共则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试图逼迫中共就范。结果，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② 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尽管1961—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的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③ 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二、中苏同盟破裂的结构性原因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取名为"国家情报评估"（NIE），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④ 其中，包括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分析判断。

中情局当时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1958年夏季毛泽东因"联合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⑤ 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

---

① 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② 参见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科兹洛夫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报告评估》，《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笔者保存的有关布加勒斯特会议记录的俄国档案。

③ 笔者保存有关于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记录的俄国档案。

④ 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NIC 2004－05, October 2004。研究者也可以在网上查阅这些文件（*http:\ bookstore.gpo.gov*）。

⑤ NIE 13－58，1May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124.

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①] 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②] 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5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③]

中情局评估报告所做关于中苏关系发展前景的结论，其理由是很充分的，推理也完全合乎逻辑：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④] 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

① NIE 13-2-59，10 February 1959，p. 2。（此文件 Tracking the Dragon 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② NIE 13-59，2July 1959，p. 3.

③ NIE 100-3-60，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 218、227.

④ NIE 100-3-60，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 220-221、224-232.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一方面是情报来源有限。有研究标明，到1949年6月，中央情报局已经撤退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工作人员。到1956年，由于派遣工作屡遭失败，中情局又关闭了所有旨在对付中国的海外行动中心。① 同时，美国为了避免落入台湾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圈套，当时基本不接受国民党情报机构收集的情报。因此正如这些评估文件所显示的，绝大多数情报分析的依据是中国公开的新闻报道，这就难免受到局限。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对共产党国家的决策思维和依据缺乏了解，也就是说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殊不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逻辑，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必须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中去寻求。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分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

① Memorandum Howe to Butterworth, 2 June 1949, NARA, RG 59, Entry 1561, Box 7; Evan Thomas, The very best men, NY, 1995, p.157。转引自 Ю. Тотр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в Китае (1945－1956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2, №2, сс.117、121。

存在。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那里明显地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会恶语相向，乃至刀兵相见。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存在。

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首先，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茹约维奇向苏联驻南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认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则，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进一步举措也会迫使莫斯科感到无法容忍；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其次，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上述情况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

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况且，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 1978 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先进经验，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从组织关系讲，莫斯科不再是领导者，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

牙利在1956年10月危机中的地位：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那时，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两个大国，一个领导着欧洲各国共产党，一个指挥着亚洲革命运动，如果他们像以前那样继续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隐患，即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从根本上讲，那时中国和苏联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

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意识。由于这种时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完全不同，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是根本对立的。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美苏两极冷战对峙格局也因此受到巨大冲击。

第八章　台湾问题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中关系

半个世纪以来美中关系的发展脉络表明，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从敌对、遏制走向缓和、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始终面对台湾问题的缠绕，美台关系是牵制和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调整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地权衡和处理对台关系。冷战前半期的美台关系，表面上平平淡淡，实际上充满玄机。美台之间不断发生的折冲樽俎恰恰成为美国缓慢调整对华政策的有机部分。历史帷幕之后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其实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矛盾。而60年代初期肯尼迪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就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渡期。它虽然没有在对台政策上实现重大改变，但已酝酿调整对华政策，并对蒋介石的言行进行某种施压和牵制，为尔后尼克松时代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探路和铺垫的作用。

老问题困扰新总统

对华政策之于肯尼迪，可说是老问题困扰着新总统。再沿着遏制、封锁和对抗的老路走下去，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在世界和亚太区域事务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没有中国的参与并发挥积极作用，很多国际问题包括当时令美国深感困扰的东南亚和东北亚问题就难以解决。采取“鸵鸟政策”，回避现实，实非长久之计。其次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同中国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关系，总比僵持不下的冷战关系要好。美国政治家开始认识到，长期和中国保持敌对而紧张的关系，试图使中国处于孤立的状态，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这样僵持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相当于“双负”，至多不过是“零和”。如果能从接触和对话开始，使这两个大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哪怕暂时只是一种

“冷淡的工作关系”，应该是对双方乃至世界都有好处的“双赢”。[①]

正如肯尼迪当选后审视对华政策时承认的那样：“没人能从中国目前的孤立中得到好处”。[②]

美国对华政策在肯尼迪主政时期，开始孕育着一些变化。如果同五十年代相比，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已经消退，民间研究机构的认识在变，公共舆论在变，政府官员们的倾向也在变。[③]

肯尼迪政府已经设想过一些办法来逐步改变政策，并将其中一些设想付诸试探性的行动，还曾明确地表达过想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意向。肯尼迪如果不是猝然被刺，他向别人透露过的将在第二届任期内做出对华政策的某些改变，也不是毫无可能的。

但是，肯尼迪在世时毕竟没有来得及把美国对华政策加以实质性的调整。这是多方面的复杂原因造成的，其中台湾当局对中美两大国的和解这一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进程，起了相当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作用。美台关系成为美中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障碍。

这时期的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同台湾当局发生龃龉，例如美国可否采用“两个中国”等方法接近新中国的问题，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同蒙古关系正常化问题，海外台湾独立运动领导人廖文毅的签证问题，台湾当局反攻大陆问题，沿海岛屿撤防问题，从缅泰老边境地区撤走国民党残部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涉及美国对台湾的总体政策，需要一一探讨。

毛泽东与蒋介石可否兼得?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中国的巩固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连最不愿意看

---

① Background Papers: Differences in Sino - Soviet Approach to the Conference, Conference on Laos, Geneva, Tab J, May 12, 1961, Papers of President Kennedy (Hereafter cited as PPK), Trips and Conferences, Box 244, Folder: Secretary of State, Geneva Conference on Laos, John F. Kennedy Library (Hereafter cited as JFKL), Boston.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 24, 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14 - 15.

③ A. T. Steele,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New York*, 1966; *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 - 1979*, Greenwood Press, 1984, pp. 95 - 130; 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7—32 页。

到这个局面的人，也不得不正视现实了。美国国内原先反共反华一面倒的舆论，这时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变化的特点是想在不“抛弃”台湾当局的前提下，适当改变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从只承认“中华民国”，滑向“两个中国”。毛泽东和蒋介石可否兼得？这方面的探讨逐渐升温，各种类型的方案纷纷出笼。

1959年9月，拥有众多学术人才的美国民间机构“康隆学社”受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委托，提出一份咨询报告。其亚洲政策建议主要由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斯卡拉皮诺执笔，要点有：(1) 取消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运；(2) 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3) 建立“台湾共和国”；(4) 提议中国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台湾为联合国普通成员国；(5) 重申美国协防台湾的义务不变；(6) 台湾军队撤出金门、马祖；(7) “台湾国”成立后，“大陆难民”如愿离台，美国可协助解决；(8) 与中国订立贸易条约，予以事实上的承认，等等。报告还提出分阶段实行的步骤，建议首先同中国交流新闻记者，继之交流学者和商业代表，再通过民间杰出人士和团体同中国领导人讨论问题。这个报告没有被艾森豪威尔政府采纳，也不可能被台海两岸所接受。但在舆论界学术界甚至政界都打破了麦卡锡时代造成的中国问题禁区，为后任政府变革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

在此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腊斯克（Dean Rusk）的主持下也网罗精英，集思广益，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研讨。从自由派代表鲍尔斯到保守派代表《时代》周刊发行人卢斯，以至哈佛名教授基辛格等，都参与了这项讨论。他们要求注意利用已现端倪的中苏分歧，沿着“两个中国”的路子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研究报告1960年12月发表，并出版了专集。[2]

腊斯克随即在肯尼迪当选后被聘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

鲍尔斯1960年担任肯尼迪竞选班子的外交顾问时，发表了《中国问题的再思考》一文。指出中共政权已经稳固地控制中国大陆，要阻止它对东南亚的扩张，实现世界性的裁军，就要与之打交道，而美国目前这样同中国各执己见的谈判很难有成效。美国应承认中国，劝台湾撤离金马，另建一个“中台国”，文化上是中

---

① Conlon Associates, Lt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②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Prospect for America*: The Rockefeller Panel Reports, Garden City, N. Y., 1961.

国，治理者是台湾人。他认为中苏关系不是僵硬的，不是坚如磐石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①]

鲍尔斯当过参议员、州长、驻外大使，富有政治经验。为肯尼迪助选成功后，曾任主管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

长期担任民主党领袖并两度竞选总统的史蒂文森也撰文拥护台湾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全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②]

他随后被肯尼迪任命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提议：在原则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宗主权”，台湾保持自治，有权经营自己的防务和外交。[③]

1962 年肯尼迪政府班子将他请到华盛顿，参加对华政策咨议会。这是麦卡锡时代以来这位老资格的中国问题权威第一次有机会直接给政府提供咨询。

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对外交政策很少公开提什么批评或建议。但他在 1957 年 10 月《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民主党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认为世界结构正从美苏两极对抗转化为多极鼎立，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美国的政策对这种变化中的大国关系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他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过分强硬和僵化，要求重新估价对华政策。不过，他又认为当年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④]

在 1960 年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和尼克松这两位竞选者在著名的电视辩论中，把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和马祖，作为一个交锋的题目。肯尼迪攻击共和党政府在此问题上，冒着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去协助蒋介石防卫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岛，政策失当。尼克松则辩解道，这两个小岛对于保卫台湾是至关重要的，并由此鼓动选民们去怀疑这位竞选对手的战略判断力。[⑤]

肯尼迪的上述言论立即在台湾引起震动。台湾“外交部”在愤慨情绪的推动下，对记者提问做出书面答复：“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放弃一寸领土来讨好

---

① Chester Bowles,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Vol. 38, No. 3, 1960.

② Adlai E. Stevenson," Putting First Things First: A Democratic View", *Foreign Affairs*, Vol. 38, No. 2, 1960.

③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71, Praeger, 1972, pp. 189 - 191.

④ Kennedy, John F., "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35, No. 4, Oct. 1957.

⑤ *New York Times*, Oct., Nov. 1960.

他人，包括参议员肯尼迪在内"。这话当然在肯尼迪竞选阵营中引起了反应。蒋介石担心一旦肯尼迪当选，将影响双方的关系，便把"外交部长"沈昌焕叫去教训了一番，后来又把加写这句话的次长许绍昌外放到某国当大使。"寄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蒋氏心中的那番滋味，当是外人难以体会的。[①]

可是，在台湾当局的记忆中，四十年代后半期同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关系，确实充满着无限的伤感与痛楚：杜鲁门的"姑息政策"是大陆"失陷"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及时地爆发了一场朝鲜战争，连台湾这块地方也要被美国"抛弃"了。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虽然同台湾当局也有矛盾，但比较起来，还是更坚定地支持了台湾的防御和发展。现在民主党又要卷土重来了。肯尼迪当选后，新政府委派到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官，公开谈论实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可能性，新任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甚至扬言：如果继续辩论是否让中国大陆获得联合国席位而逐走台湾当局的话，美国可能袖手旁观。[②] 向以亲台著称而又影响较大的《时代》周刊，在1961年的中国专号上宣称：不承认中国的政策是"六十年代的愚蠢政策"，催促政府重新估价美台关系。[③]

凡此种种，都使蒋介石集团对这位以开拓"新边疆"自诩的美国新总统，反应谨慎而冷淡，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更。[④]

迟到的支票

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方面是遏制中国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表示必要时将用美国军事力量支持台湾的防御。另一方面却远未走到正式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步，尽管其政府内有"两个中国"政策的酝酿。[⑤]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修改了杜鲁门时期"中立"台湾海峡的政策，自称其对

---

①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6页。

② 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1954 - 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3, (December 1985), pp. 637 - 661.

③ Maga, John F. *Kennedy and New Frontier Diplomacy*, pp. 116 - 117.

④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0, 1961,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 37;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July 7, 1961, *ibid*, p. 89.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14, 1961, ibid, p. 2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8, 1961, *ibid*, p. 51, ft. 2.

台政策有三个要点：(1) 保障台湾与澎湖的安全；(2) 支持蒋介石，以维系海外华人的反共士气；(3) 保持蒋介石军队有在大陆作战的能力，但要置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之下。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要求，则采取了回避政策。①

美国实际上担心被卷入一场既非自己选择，也非自己挑起的台海战争中去，故想尽力防止事态发展到两岸开战的地步，并设法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恰恰是很容易引起战火并把美国卷入战争的敏感地域。②

尽管美国军方有不同意见，但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认为金门、马祖有多么重要的战略价值。他几次想让蒋介石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均遭到蒋介石的抵制。其间他于1955年4月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远东助理国务卿，联袂赴台劝说，也未成功。这桩未了的心愿就一直搁置下来。③

1959年6月，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届任期的后半期，终于到台湾造访一次，用意是在美国历届总统从未到过的这个地方，向世人显示美台关系是重要而友好的。

蒋介石所需要的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姿态，而更重要的是实质性支援。他除了提出美国应全面加强同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之外，还具体要求美国提供若干军事项目的援助，其中之一是能大量空投伞兵的C-130运输机等。

百战沙场的艾森豪威尔完全了解这种飞机的作战用途，没敢立即答应，把蒋介石这桩用意甚明的要求搁在心中掂量了一年有半。直到退出白宫前夕，他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1961年1月12日通知蒋介石，"我已授权此时即向贵政府提交C-130B型运输机一架"。除了费心解释只能提供区区一架蒋方渴望已久的这种飞机，是出于何等的困难之外，还许诺了一个十分光明的前景："如果看到你们运用这架飞机的经验显然表明另一架同样型号的飞机会被有效地使用，我相信，美国政府将认真考虑你们的进一步要求"。④

这份迟到的新年贺礼，即便能引起蒋介石的兴奋，也是转瞬即逝的。1月20

---

①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Gettsburg, June 21, 1962, *ibid*, p. 257.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May 10, 1961, *ibid*, p. 56;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sel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June 15, 1961, *ibid*, pp. 72-73.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14, 1961, *ibid*, p. 29; Also see *FRUS, 1955-1957*, Vol. 2, pp. 445-1 ff.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 12, 1961,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1-2.

日新总统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即由国务院下令推迟该项供货，原因是“对于C－130可能之用途有所保留”。国务院用一架空投能量较小的C－54运输机作为替代，于8月28日交货给蒋，敷衍了事。[①]

由此来看，肯尼迪固然不想助蒋反攻，引起海峡两岸的战争，艾森豪威尔是否真有诚意，也值得怀疑，他毕竟是拖到可以只开支票不须兑现的时候，才签发了一张给蒋介石的支票。

肯尼迪酝酿调整政策

肯尼迪当选后，面临着一系列已经提上日程的紧迫问题：（1）应否继续促使蒋介石放弃容易引发战争的沿海岛屿？（2）对中国大陆遭遇的粮荒采取何种立场？（3）是否改变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4）应否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谈判建交并任其加入联合国，从而为亚洲共产党国家树立新的关系模式？（5）是否给流亡日本的台独运动领导人廖文毅发访美签证？（6）要不要出版多年前已经编好的1943年美国对外关系系列文件集的中国卷，其中涉及到当年美国官方对国民党政权的大量批评。

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涉及是否需要调整原有的对华政策，并关系到进一步变革的方向。

据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来看，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初对新中国的政策，大体上说，是想继续保持华沙会谈的接触渠道，并试图通过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稍微扩大一点接触，伺机把中国拉入核控制谈判。在粮食贸易、记者交流这类问题上也可以放松限制。但不打算在第一届任期内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关系正常化的重大步骤。对于台湾，则继续遵守1954年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换文的规定，大力援助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承诺武力防台的义务。同时也试图劝蒋撤出靠近大陆的沿海岛屿。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一面维持台湾当局的席位，一面探索实行“两个中国席位”的可能性，但首要目标是尽可能阻止新中国近期内

① *Ibid*, pp. 1－2.

进入联合国。①

3月初，肯尼迪向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透露：他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中国问题的，在对华关系的难题上，并不特别在意法律条文和理论。他对此问题是带着比较开放的头脑来上任的，曾准备采取可能缓和紧张气氛的步骤，使双方有探索发展关系的某种可能性。如果他发现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愿在全国范围内着手解决象"百万人委员会"这样的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上层社会团体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对。他觉得如果能够显示新的步骤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这些步骤就最终会被大家接受，就是应取的正确步骤。②

国务卿腊斯克3月4日为中美大使会谈下达的指示，基本精神也是缓和气氛，改善对话，设法探寻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他指示美国代表比姆：会谈中应表示希望中方采取适当步骤，以符合双方最高利益的方式谈判具体问题。美国准备对释放在华美囚和实现记者互访等事项提出具体建议，还准备表示美方愿考虑允许中方购买美国粮食，并且无意利用此事进行宣传。对台湾问题，美国将再次申明从未试图迫使中国放弃对台湾的要求，只是试图让中方同意以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要求。③

此后的几次中美大使会谈，美国代表均奉命采取低调姿态来阐述立场，避免争论。美方企图先绕开从台湾撤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具体问题，小步改善关系的建议。中方则坚持中美关系的根本障碍是台湾问题，应先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才好解决其他枝节问题。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会谈继续处于马拉松长跑途中。④

台湾的诘问和美国的争论

肯尼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这种酝酿，引起台湾方面的极大担忧。

---

① Position Paper, July 27, 1961, PPK,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Hereafter cited as NSF), Countries, Box 26, Folder: China, Subjects, JFKL; Memorandum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an. 15, 1962, PPK, NSF, Meetings and Memoranda, Box 313, Folder: NSC Meetings, JFKL;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 3,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4 - 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14, 1961, *ibid*, pp. 29 - 3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17, 1961, *ibid*, pp. 34 - 3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5, 1961, *ibid*, pp. 43 - 45.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3, 1961, *ibid*, p. 21.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oland, March 4, 1961, *ibid*, pp. 22 - 24.

④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8, 1961, *ibid*, pp. 51 - 5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9, 1961, *ibid*, pp. 85 - 86.

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叶公超1961年2月3日奉命拜访腊斯克，直接询问美国酝酿对华新政策的传言是否属实？腊斯克向叶保证：新政府全心全意承担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义务，继续努力促进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至于台湾所担心的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腊斯克安慰说："看不到以任何形式发生这种问题并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的前景"。他解释，北京方面没有迹象显示有兴趣提出这个问题，美国又不打算采取主动。北京要求美国放弃台湾政府，美国当然不会这样做。[①]

美国的这番保证，不足以使台湾当局满意。因为美国没有表示支持台湾对大陆的进一步要求或行动，也没有保证永不承认新中国。腊斯克强调的不是美国没有这样做的"意向"或"考虑"，而是北京尚无兴趣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美国目前还找不到"形式"，看不到"前景"。后来，腊斯克再次向叶公超强调，由于北京和美国政策上的原因，北京没有被承认的前景。可是，如果北京或华盛顿的兴趣来了，政策变了，前景又会怎么样呢？腊斯克暂且避而未谈。[②]

这种暧昧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肯尼迪的幕僚们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他们彻底检讨了一番对华政策。对于主张变革的人来说，来自台湾的坚决反对倒还不是妨碍他们下决心同新中国接近的唯一原因，阻力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

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科莫（R. W. Komer）建议肯尼迪乘刚上任的机会，刷新对华政策，正视新中国的存在，"尽可能巧妙地同对华政策的无效益的方面脱钩"。在联合国改取"两个中国"的政策，相机实现国民党撤离沿海岛屿。[③]

他和副国务卿鲍尔斯（C. A. Bowies）、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等都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应把印度和日本作为遏制和抗衡中国的主要力量，不必因高估台湾的作用而不敢对蒋介石的要求说"不"。[④]

但更多人认为，新政府不宜甫一上任，就"造成一个将有对华新政策的糟糕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 3, 1961, *FRUS, 1961－63*, Vol. 22, pp. 4－5.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17, 1961, *ibid*, p. 34.

③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rch 1, 1961, ibid, pp. 19－20;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y 4, 1961, *ibid*, pp. 53－54.

④ Draft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Komer, July 27,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2. JFKL.

信号”。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共和党人、国会和副总统约翰逊（L. B. Johnson）都是保守意见的代表，公众中的阻力也相当大。①

中国当时在国内经济和国际共运中的困难处境，在美国政治家眼中是一个调整政策的时机，只是方向不易确定：缓和关系，还是加强压力？鲍尔斯不断地发动同僚们探索对华政策问题，希望能有所变革，至少能说服海峡两岸结束内战状态，以免把美国卷进去。②

国务院远东司的人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不会接受类似“两个中国”的政策。既然中国对美国的敌视已是“命定之数”，他们倾向于利用中国的困难施加压力。“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谋求确保（中国）双方不以大规模的动武来实现其目标，而不是谋求不现实的目标，劝说双方放弃其愿望”。③

尽管实际上肯尼迪和僚属们仍在继续探寻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但保守的主张暂时占了上风。肯尼迪没有像台湾担心的那样变更对华政策。相反，他就职不久就决定暂不变动美国的政策。④

决策人的悄悄话

一面感到需要调整对华政策，一面又感到暂不宜也不能做明显变更，这种矛盾心理集中表露在美国两位最高决策者的私下谈话中。

据国务卿腊斯克回忆，1961 年 5 月初，肯尼迪和他曾有一次单独谈话。他问肯尼迪是否想让国务院探讨变更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两人大致排列出这样一些选择：（1）承认中国的两个政权，采取所谓“两个中国”的方针。（2）幕后悄悄活动，谋求北平与台北之间的妥协。（3）稳坐不动，静观事态发展。他们都认识到，

---

① Letter from Chiang Kai-shek to L. B. Johnson, June 9, 1961, PPK, NSF, Counties, Box 26, Folder: China Subjects: Chiang Kai-shek Correspondence, JFKL; Editorial Note,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 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3, 1961, *ibid*, pp. 7 – 8;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rch 1, 1961, *ibid*, p. 19;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y 4, 1961, *ibid*, pp. 53 – 54.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May 10,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56 – 57.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May 10, 1961, *ibid*, p. 56, ft. 2.

④ Editorial Note, ibid, p. 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3, 1961, *ibid*, pp. 21 – 22.

多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没有反映亚洲的现实情况。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排除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任何变动。原因在于肯尼迪在大选中是以极微弱的优势获胜的，他觉得新政府没有获得美国人民的强有力的授命，所以对一些可能在国内导致政治大争论的问题必须非常小心。而对华政策上的任何变动，都会成为这种争论的导火线。艾森豪威尔卸任之前就曾警告肯尼迪，尽管他大体上会支持肯尼迪的对外政策，但是将强烈反对新政府承认北京或接纳大陆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任何企图，必要时将站出来说话。①

除了现实的政治考虑之外，冷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两极对立，也束缚着肯尼迪的作为。以自由主义相标榜的肯尼迪，实际上深受冷战时期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柏林危机、古巴吉隆滩事件中都表现了这一点。对中国问题的立场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围堵中国。至肯尼迪就任总统时，美国同台湾早已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承担了用武力防御台湾的责任。这一立场当时不仅受到国内的广泛支持，而且是出于美国在亚洲的冷战需要。正如腊斯克承认的那样，"我们的这种立场并非仅仅因公众的意见所造成，而且也是基于战略形势和远东盟友的态度所使然。我们认识到这一立场本身构成了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障碍"。②

在此战略格局的规定下，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至多也不过是朝着"两个中国"的方向做一些试探。而"两个中国"的出发点之一，是要把台湾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现代化"的样板，在冷战中同社会主义中国竞争。肯尼迪曾向蒋介石讲解过实现冷战战略目标的根本手段："长远地看，自由世界能够通过增强民主制度并使其更适应世界人民之愿望，来最好地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③

撤兵金三角

肯尼迪在执政的头一年中，就同台湾当局发生了几场风波。

---

① Dean Rusk, *As I saw It*, *As Told to Richard Rusk*,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p. 282 – 284.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rch 14,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 29.

③ *Ibid*; Letter of J. F. Kennedy to Chiang Kai-shek, May 8,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2, JFKL.

1949年末至1950年，在大陆失败的国民党残军一部退入缅甸、老挝、泰国边境地区，得到台湾当局的长期支持。缅甸政府1953年在联合国提出抗议台湾当局侵略缅甸的议案。在联合国监督下，美国和泰国协调缅甸、台湾从这一地区撤走国民党残军。至1954年9月1日，已有大约5500名国民党残军和1500名家属撤往台湾。台湾当局也曾在联合国许诺不再给留下的残军提供补给。但实际上，台湾当局并没有履行诺言，继续企图利用这股残军侵袭骚扰中国大陆西南边境，配合实现其反攻计划。从1958年起，又加紧向留在中缅边境的残军提供武器装备，并派去了新的军事教官和指挥官。这股残军大约5000多人，许多人已经同当地人通婚，在那里建立了种植和输出毒品的基地，财源茂盛，无意离去。①

1960年4月，中缅两国领导人就消灭边境地区国民党残军问题达成共识，随后两国军队协调行动攻击残军的基地和机场。②

国民党残军流窜到泰国和老挝边境，建立所谓的缅泰老三角游击区。美国政府担心这股残军给中国提供进军东南亚的口实，损害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另外也担心台湾言而无信，不仅丧失国际信誉，而且殃及在国际上支持台湾的美国，所以一直督促台湾当局撤出这股残兵败将。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也不例外。然而蒋介石集团显然愿意看到东南亚局势紧张化，甚至激化，好从这里把美国拖入一场同中共的直接战争，以助其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所以一直寻找借口，百般拖延再次撤走残军。③

新任国务卿腊斯克1961年2月3日第一次会见台湾"大使"叶公超时，就从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角度，敦促台湾当局制止其在缅甸的残部窜入老挝捣乱，以免给中共出兵老挝提供口实。他强调：老挝具有战略重要性，特别关系到越南与泰国的安全，不幸的是蒋军残部从缅甸窜入老挝西北地区，如果中共以此为借口出兵干涉老挝，不仅是老挝的大灾难，而且不利于动员世界舆论。叶公超辩解说，他们数年前已经帮助许多残部撤出缅甸了。腊斯克指出，台湾当局曾经同意

---

①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Dean Rusk, Feb. 20,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1, JFKL.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306、400页。

③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Dean Rusk, Feb. 20,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1, JFKL.

不再同仍然留在那里的残部保持联系，但实际上仍为他们进行空中补给。他要求台湾明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①]

美国驻台北“大使”庄莱德（E. F. Drumright）2月7日奉命劝蒋介石接受美国的撤军方案。蒋介石仍然沿用以往搪塞敷衍的惯技，答应从缅甸撤出部队，但想保持在老挝的部队。蒋经国毕竟气盛，竟然“以从来没有过的愤慨和怨恨”同庄莱德争辩起来。庄莱德虽然不得不阐明美国立场，但心里着实同情蒋氏父子，于是转过身来又为他们向美国政府说情。[②]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推波助澜的国际争端。2月15日，一架国民党飞机在穿过泰国北部企图给缅甸境内的残部空投补给时，被缅甸战斗机击落。这一事件引起有关国家对台湾的抗议，东南亚各国舆论纷纷对蒋军残部的非法活动提出谴责。缅甸军队在进剿国民党残军时，缴获到美国制造的新式军事装备。缅甸民众的不满进一步扩及到美国，举行示威游行并捣毁了美国大使馆，缅甸政府提请联合国秘书长关注这个问题，国际舆论沸沸扬扬，美台当局狼狈不堪。[③]

肯尼迪和腊斯克显然已失去了耐心。他们2月21日就此事进行协商后，由腊斯克于2月22日发给庄莱德一封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报，令其尽早让蒋介石明白美国政府对此事的“严重关切”，立即安排一切愿意返回台湾的人员返台，不愿返台者应予解除武装，分散安置在老挝以外的地方，不得再以大股有组织的力量存在。美国警告蒋：如果再用美制飞机给那里的残部提供美国物资，将构成“对美国政府的一种重大冒犯和违背义务”，“这种行动还严重损害了美国政府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困境中施与有效政治援助的能力。”“美国政府决心保护自己的名声和信誉，必要时不惜以中华民国政府为代价。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可能之步骤，减少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合作，以澄清自己同这些活动全无干系”。美国要求台湾别低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以最大的勇气行动。腊斯克告诉庄莱德，上述立场之所以要表达得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 3,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6 – 7.

②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Dean Rusk, Feb. 20,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1, Box 14, JFKL.

③ Position Paper: KMT Irregulars, Vice President's Trip to Far East, May 1961, PPK, NSF, Trips and Conferences, Box 242;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Dean Rusk, Feb. 20, 1961;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March 31,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1, JFKL.

如此严厉，就是为了让台湾当局意识到美国这次可是要动真格的了。[①]

美国国务院开始计算可以用来迫蒋就范的杠杆：减少某些对台军事援助，停止训练台湾特种部队和交付 C－130 飞机，停止与台共同设计反攻大陆的方案等等。[②]

庄莱德求见蒋介石，遭蒋婉拒。深知蒋个性的庄莱德意识到，把这种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照会，在正式外交场合当着别人的面递交蒋，将使其面子上下不来。于是，他把腊斯克来电内容转告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沈昌焕，望其促蒋迅速采取行动，以免难堪。他还通过同蒋氏父子有特殊关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R. S. Cline），向蒋经国转达了美方的严肃态度，望其劝说乃父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接受美方的要求。蒋经国、沈昌焕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向蒋报告，并同张群、陈诚等先后进行长时间的磋商。[③]

蒋介石深受震动，认识到一意孤行下去，将激化同美国及缅甸等国的矛盾，这才很勉强地找个台阶下。于2月25日在住所召见庄莱德，承认那里的形势确实给美国造成不便和困窘。他的政府虽然不能保证全体残部都能听命撤出来，也不能保证留下的那些人会缴械，但会把"接受我们影响的那些人撤回台湾"，并停止空投补给留下的那些人。[④]

庄莱德承认，蒋介石的新承诺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要走很长的崎岖道路才能落实。不过，他已由此发现，启用克莱恩——蒋经国渠道，是把令人不快的意见传达给蒋介石，而避免当众诵读的尴尬场面的最好办法。蒋经国能够私下向老蒋讲别的官员不好讲的意见。这一渠道后来在肯尼迪与蒋介石就棘手的问题沟通意

---

①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b. 22,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12 - 13.

②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Dean Rusk, Feb. 20, 1961; Memorandum for McGeorge Bundy from G. Parsons, Feb. 23,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1, JFKL.

③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Dean Rusk, Feb. 20, 1961;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March 31,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1, JFKL.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 25,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16 - 17. 克莱恩：《我所知道的蒋经国》，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90 年，第 119 - 123 页。

④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March 31,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1, JFKL.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 25,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16 - 18.

见时得到了充分利用。[1]

美国警告泰国政府不得在境内给台湾运送补给的飞机提供加油等便利，也反对老挝政府收编国民党残军。随后在3、4月份展开的撤军作业中，美国承担了部分遣返费用，泰国提供了集结地和空军基地，由台湾空军将4300名残军及家属运回台湾。但仍有两千多名残军散布在缅、泰、老边境，出于种种原因不肯撤出。[2]

至此，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全部撤军，但是在肯尼迪政府的压迫下，总算从敏感的缅、泰、老边境撤出了大部分残军，并承诺不再同撤军后留下的残部发生正式联系。从此这一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对当地政府和中国南方边境基本上不再构成威胁，蒋介石“反攻大计”中的“偏师”就被这样瓦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确实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线中的“软肋”。美国比较担心中国抓住理由和机会，在这个方向采取军事行动。

沿海岛屿弃守之议

金门、马祖等台湾当局控制下的沿海岛屿，长期以来就是美台关系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蒋介石与美国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前者想要重新统治大陆，后者认为这个目标很不现实。前者认为重返大陆的最好机会将随着美国与中共开战而降临，为此特别强调金门等岛屿对于维持士气和军事攻防的重要性，不惜在这里惹起的战端把美国卷进去。后者则希望尽量不再卷入中国内战，消除刺激中共并引起战端的导火线，为此不惜让台湾当局放弃最容易惹是生非的沿海岛屿，使国共双方远隔台海的格局固定化。美台对彼此间战略上的这种矛盾了然在胸，只是嘴上不说，暗中较劲。[3]

按照美台防御条约的规定，美国承担协防台、澎之义务。但沿海岛屿一旦遭遇猛烈进攻，究竟是应坚守还是弃守？美国能否认定这就是进攻台湾的开始，从而援引美台有关的“条约义务”实施军事介入？关键在于美国。如果总统判断这

① *Ibid.* 克莱恩在前引书中也叙述了他和蒋经国之间不寻常的私人关系。

② Position Paper: KMT Irregulars, Vice President's Trip to Far East, May 1961, PPK, NSF, Trips and Conferences, Box 242, JFKL;《我所知道的蒋经国》，第123页。杨美红：《罂粟花红——我在缅共十五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第48－53，242－247页。

③ Position Paper: GRC Premier's visit to Washington, July 27, 1961, PPK, NSF, Meetings and Memoranda, Box 313, JFKL.

是攻打台湾战役的一部分，就可动用美国军队协防金马。换言之，如果总统判断这种进攻只限于金马，不构成攻台的一部分，就可以不出动美国军队。判断的标尺之一，是中共自己的舆论是否将这种进攻同“解放台湾”相联系。①

然而，美国在此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端出底牌，有意不预作决定，只称授权总统来“临机决断”。这就是所谓“刻意模糊”（calculated ambiguity）的策略。其用意是使海峡两岸都摸不清美国的底牌，而不致轻动。②

艾森豪威尔时期，国会虽然授予了美国总统在台海危机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临机决断权，但并不意味着美方承担了必须投入战争的义务。③

艾森豪威尔向新政府传授经验时说，是否将中共进攻沿海岛屿认作攻打台湾的前奏，判断的尺度之一是中共自己的宣传。如 1958 年危机时，中方以大量宣传称其目标是解放台湾，这就使他可以有根据地把对金马的进攻当作攻台的第一步，而动用美国武装。由此可以看出，总统根据授权对金马被攻之意义下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是有一定伸缩余地的。④

肯尼迪政府上台伊始，就向台湾当局说明：新政府会全心全意承担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的义务，继续支持台湾；还将注意努力促进台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番话一方面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暗示：不会支持台湾越出防御条约的规定，进犯大陆，也不会支持台湾政治军事上的过分要求，美国支持台湾把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这是冷战制胜的要诀。⑤

鉴于沿海岛屿的火星随时有可能演变为能把美国卷入的大战，肯尼迪幕僚班子中不乏乘履新之际变革有关政策的呼声。

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马吉（G. C. McGhee）1961 年 3 月 10 日提

---

① *Ibid*; Statements by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regarding Quemoy and Matsu, Jan. 1953 – Jan. 1961, PPK,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hereafter cited as WHCF), Box 45, JFKL.

② *Ibid*;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June 21, 1962,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260 – 263.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May 10, 1961, ibid, p. 57. 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Statement, Sept. 9, 1958, Sept. 30, 195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58, pp. 1153 – 1154, 1166 – 1167. Secretary Herter, News Conference Ststement, July 9, 1959,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ly 27, 1959. p. 114.

④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June 21, 1962,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256 – 257.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 3, 1961, *ibid*, pp. 4 – 5.

出一项《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新基本方针》。建议为美台关系寻求新的基础，在国际上推行“两个中国”，要求盟邦分担防卫台湾的义务，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让中共承担拒绝加入联合国的责任。同时诱迫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政策，撤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这位“智囊”不乏想象力地描绘道：“我们把放弃围绕沿海岛屿的危险冲突看作化内战为和平的手段，让敌对双方相隔 100 英里的蓝色海洋，自由世界关于台湾有权拥有自己的前途的感觉就会增长”。他建议以增大美援为诱饵，在台湾当局依赖美国生存的敏感问题上施加压力，以达撤离海岛之目的。[①]

尽管当时尚不具备足以让美国抛弃台湾，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客观条件，但两岸国际地位消长的大趋势却足以让台湾当局忧心忡忡。它对美国政策上的任何微妙变化都高度敏感。美国新闻界的有关报道，使台湾政界普遍认为美国新政府将滑向“两个中国”的立场，一股怨恨美国的情绪在蔓延。

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科莫建议索性对台湾当局采取“坦率的行动”，一方面，“必须让蒋相信，我们支持自由中国的决心没有丝毫变化”，另一方面，“从我们和他们的长远利益着想，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政策中已经临近失灵地步的那些问题，即联合国成员资格和沿海岛屿问题。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现实，即多数自由世界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将不再支持我们”。他认为陷在这些岛屿上，等于“给中共发出长期有效的邀请，让其对我们施加如此严重的压力，以致我们被迫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②]

代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斯蒂夫（A. E. Steeves）也主张，美国的长远目标是摆脱沿海岛屿的负担，应找机会动员台湾当局弃守这些岛屿。但他承认，无论选择什么方案，都需要台湾的合作。美国目前无论如何都没有足够的筹码引诱或强迫蒋撤出沿海岛屿。[③]

---

① 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sela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March 10, 1961, *ibid*, pp. 27 – 28.

②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rch 1, 1961, ibid, pp. 19 – 20;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y 2, 1961, *ibid*, pp. 53 – 54.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Steeves)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April 15, 1961, *ibid*, pp. 48 – 49.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副主席摩根（G. A. Morgan）指出，采取类似于“两个中国”的政策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必须找到对付台湾当局抗拒的办法，实现沿海岛屿之撤离，获取国会和公众的支持。他建议将此事作为紧急情况进一步研究。同时要最大限度地约束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军事活动。①

但远东司认为，台湾当局不会接受结束内战的政策，说服台湾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会有不幸的后果。新中国也不会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反正新中国对美国的仇视已是“命定之数”，还是利用其当前的经济困难来施加压力为好。②

政治事务助理副国务卿詹森（U. A. Johnson）也认为，必须继续寻找结束中国内战的办法，因为两岸对峙的局面“很可能把我们卷入既非我们选择也非我们制造的敌对冲突中去”。但是，中共出于革命的迫切性和内部形势，不可能宣布对台放弃武力，对国民党军队撤离沿海岛屿也无兴趣。蒋介石集团的法统地位也不允许放弃对“光复大陆”的诉求。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美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事态发展到把自己卷入的敌对状态。在这一点上，他提醒大家：国会关于沿海岛屿的决议授予总统临机决断之权，并非美方必须承担投入战斗的义务。③

迫蒋弃岛有无可能？

美国政府内部不仅对防守沿海岛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不同看法。而且对于究竟有没有可能说服或压服蒋介石撤出沿海岛屿？强迫蒋服从美国战略利益弃岛将对台湾造成什么后果？也没有多大把握，不得不反复考虑和讨论。

马吉1961年6月15日再次向腊斯克建议：应采取某种政策，最大限度地止息国共内战、最少限度地卷入国共冲突，实现“中华民国政府”撤离沿海岛屿。为实现这些目标，应制订方案，采取行动，克服困难，开通途径。腊斯克和远东事务助卿麦克瑙吉（W. P. McConaughy），国务卿特别助理斯旺克（E. C. Swank），代理政治事务次卿詹森等对这些政策目标没有异议，但都认为当前正为联合国中国

---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May 10, 1961, *ibid*, p. 56, ft. 1.

② *Ibid*, p. 56, ft. 2.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May 10, 1961, *ibid*, pp. 56 – 57.

代表权问题同台湾当局闹得不可开交，暂不就沿海岛屿问题采取行动为宜。[①]

美驻台“大使”庄莱德不赞成迫使台湾按照“两个中国”的方案处理联合国代表权和沿海岛屿等问题。他担心蒋介石在恼怒之下，会退出联合国，从而动摇台湾的稳定，给中共一个不战而胜夺取台湾的机会。这对美国是个太大的代价。[②]

同这位总为台湾当局担忧的大使不同，美国情报机构6月间估计，如果美国改变现行政策，主张两个中国或正式承认新中国，施加极大压力迫使台湾当局撤出沿海岛屿，台湾当局将深受震动。但多数人还是会顺天由命地在台湾创造最好的未来。只要美国继续加以援助和保护，台湾可能仍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国情报部门还判断：（1）台湾当局的主要目标仍是再度控制大陆，目前不能排除他们不同美国协商即实行飞机轰炸和骚扰的可能性。（2）台湾的领导人认为，重返大陆的最好机会将伴随着美国与中共发生的战争而到来。但他们还不至于试图挑动这种战争。（3）在政治意识方面，台湾人一般是反对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统治的，但缺乏领导和组织，不足以构成对现政权的威胁。国民党政权的保安力量绰绰有余地能够对付任何内乱，但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几乎一定会越来越紧张。（4）未来数年，北京国际地位的提高，将给台湾造成挫折。但只要美国确保经济支持和军事保护，台湾当局便能度过危机，做出适当调整。[③]

这种可以压蒋弃守沿海岛屿的乐观估计，却没能落实为政策性的行动。既然台湾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能生存和发展，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能迫使它放弃沿海岛屿呢？肯尼迪的助手们多次探讨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过一些方案。

对华政策的策划者们提议，对台湾施以援助和影响，目标是要促使台湾当局通过改革，取得本土人民的支持。为此，应对美援附加条件，使其成为促进变革的杠杆。另一方面，也应在双边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劝台湾当局熄灭同中共的内战，撤离近海岛屿。[④]

美国国务院主要首脑人物都认为，如果中共不惜代价，就能够夺取沿海岛屿，

---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sel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June 15, 1961, *ibid*, p. 73.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0, 1961, *ibid*, pp. 37 – 38.

③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 43 – 61), June 20, 1961, *ibid*, pp. 74 – 76.

④ Draft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Oct. 26, 1961, *ibid*, p. 166.

也可以为其他目的在那里再次制造危机，因此台湾当局应该撤离这些岛屿。面对台湾当局不肯撤离的现实，国务院中国科制订了应变方案。提请决策者们考虑，可以趁新总统上台、欧洲形势吃紧的机会变更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或在下次发生危机时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腊斯克等人 7 月 13 日讨论了这个计划，然而意见分歧，没有结论。[①]

为了进一步厘定美国的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根据邦迪和腊斯克的要求，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拟制了一个文件：《沿海岛屿：可选择的方案与可能的后果》。其中明确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说服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将驻军撤回台湾。但无奈的是可供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很有限。智囊们绞尽脑汁，提出四种可供美国选择的行动方案：（1）默许台湾当局继续占据这些岛屿，但不扩大美方现有的承诺。（2）默许台湾当局继续占据这些岛屿，将美方的防卫承诺明确从台澎扩大到这些岛屿。（3）运用美方拥有的一切适当手段早日实现撤离沿海岛屿。（4）在较长时期内追求实现台湾当局撤离沿海岛屿的目标，运用现有或将有之手段耐心活动，保持充分的低姿态以避免破坏性的危机。这个被誉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文件受到国务院各主管的赞扬。虽然迟迟未就此明确采取什么决策，有意思的是，文件的制订者们显然倾向于选择（3），政策委员会主席马吉却建议选择（4）。但后来长期的实践证明，美国只能采取第（1）项选择，即继续默许台湾当局驻守沿海岛屿，而美国也不把对防御台澎的承诺扩大到这里。[②]

在联合国面临危机

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1961 年是个重要的时刻。美国和台湾当局这一年面临着在这个问题上失败的可能性。肯尼迪政府力图改取“重要问题”方案，蒋介石却力图顽固地坚守渐已失灵的“延期审议”战术。双方对于策略应否转换以及怎样转换存在着严重分歧，发生了一番紧张的交涉，从而在美台关系中引起了一场危机。另外，美国出于对“共产党世界”的战略考虑，有意同蒙古人民共

---

① Highlights of Discussion at Secretary of State Rusk's Planning Meeting, July 13, 1961, *ibid*, pp. 93 – 94.

② Editorial Note, *ibid*, p. 129; Memorandum for Mr. McGeorge Bundy from George McGhee, August 25, 1961, Enclosure: The Offshore Island-Alternative Courses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s,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2, JFKL.

和国建交并接受它加入联合国，苏联阵营又同一些非洲国家在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达成了一揽子交易，如果蒙古入会申请被台湾当局否决，毛里塔尼亚的入会也将被搁置，这些非洲国家将迁怒于台湾当局，从而影响到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这些因素更增加了这年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复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95 年台湾被日本占据。1945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就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在台北举行日军受降仪式，恢复了在台湾省的主权。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应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应把已经被推翻了的前政府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从 1950 年 9 月召开的第 5 届联合国大会起，就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展开了激烈斗争。美国开始是在幕后导演各种活动，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第 7 届联大开始，美国干脆自己出面，年复一年地提出“延期审议”或“不审议”中国代表权的议案，纠集多数成员国加以通过，由此将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而让台湾当局在这里继续占据中国的席位。[①]

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会员成分起了变化，美国的指挥棒也越来越不灵了。在 1960 年第 15 届联大上，美国所支持的对中国代表权的“不审议”案，仅以 42 票赞成、34 票反对、22 票弃权，勉强获得通过。有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同美国打招呼：今年为照顾关系，没投反对票，但这是最后一次了。[②]

不仅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的态度在起变化，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也不想在此问题上再追随美国。在它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了政权，是一个既成事实。而它们自己的政权，也往往是先打破“法统”，建立“事实政权”，再取得国际合法地位的。否定新中国入会，也就从法理上否定了自己的会员资格。[③]

---

①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310—314 页。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1, 1961,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 105.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3, 1961, *ibid*, pp. 4 - 8, 33 - 36, 105 - 107.

肯尼迪政府1961年初上台后，立刻面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新班子清楚地认识到，在当年9月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第16届大会中，继续运用“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战术，可能面临失败。一旦这个问题突破美国的刁难，列入大会程序，则成为一个“由谁来代表中国”的席位证书问题，到会成员国的简单多数即可决定此事。结果当然对实际上早已不能代表中国的台湾当局不利。肯尼迪虽然有一些逐渐调整对新中国的政策的想法，但是这位刚刚以微弱优势胜选的新总统，不敢在执政之初就冒挑发国内政治争端和损伤国际声望的风险。他很快确认，今年在此问题上的首要目标，是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于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了美国新政府煞费心机的难题。[①]

大体说来，美国政府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政策可供选择。一是继续坚持台湾当局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各占一个席位，实行“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三是以某种方式（不使用否决权）默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听任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当然，第三种选择这时还不可能被美国政府采纳。

如果做第二种选择，虽然会有许多国家认为符合“现状”而予以追随，但是不会取得中国当事双方的认可，美国国内的亲台势力也不答应。如果做第一种选择，实行的方法又可以分为：（1）继续沿用快要失灵的“延期审议”策略，把中国代表权问题排除在大会议程之外。如前所述，这有失败的危险。（2）改取“重要问题”案，即把中国代表权的变更，说成是属于联合国宪章第18款规定的“重要问题”的范围，须由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实行。白宫和国务院有很多官员倾向于采取这个策略。[②]

---

①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rch 1961, *ibid*, *pp.* 19 – 2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17, 1961, *ibid*, pp. 28 – 36;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5, 1961, *ibid*, pp. 46 – 47;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els, May 10, 1961, *ibid*, pp. 56 – 57.

②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March 1961, *ibid*, pp. 19 – 2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17, 1961, *ibid*, pp. 28 – 36. 按：联合国宪章第18款第二项开列的“重要问题”，与改变会员国的代表权无关，但第三项规定：“关于其他问题之决议。包括另有何种事项应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问题，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之过半数决定之”。中国方面的立场可参见熊向晖前引书第316、319页。

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国际上一直有“两个中国”的主张。肯尼迪本人觉得：“虽然事实也许是台湾是个单独的国家，但是中华民国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他倾向于在联合国有两个中国席位，但从国内政治考虑，又不能承受一上任就让“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指责。所以最初的想法是，今年力保台湾当局的席位，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明年再试图以某种方式推行“两个中国”。[①]

由于这年能否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声誉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肯尼迪政府在同所有外国政要会见时，都把此事作为一个主要议题，阐明美国立场，谋取国际支持。正如腊斯克在说服蒋介石转变策略的最后关头，因失去耐心而向蒋抱怨的那样：“美国政府在与其他政府领导人进行的最高级会谈中，花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时间远比其他任何问题都要多得多。”[②]

确实，当年美国政界反华反共的气氛如此浓厚，即使是涉及策略转变和“两个中国”的动议，也会引起对“红色中国”可能最终加入联合国的恐惧。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搬出白宫前，曾警告即将入住的新主人：如果新政府企图承认北京或接纳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他就要站出来强烈反对。这股阴霾沉重地压在肯尼迪的心头。他在解释美国不能抛弃“中华民国”，将强硬反对“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原因时，常常闪烁其词，自相矛盾。时而表示担心若提出允许中共入会的问题，美国政界就会发生分歧和对抗；若中共果真入会，联合国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时而又抱怨中共所表现的对美国和他本人根深蒂固的敌意，是难以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时而又承认，尽管中共的敌视是一个障碍，可如果不是出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5, 1961, *FRUS*, *1961 - 63*, Vol. 22, pp. 42 - 4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5, 1961, *ibid*, pp. 112 - 113, Editorial Note, *ibid*, pp. 133 - 136. 这位新总统曾向人请教：中共在什么场合表示过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结果被告知，这是中国长期一贯的政策。直到1961年10月9日白宫决策班子才确定：总统不论其个人意见如何，不可以公开赞成两个中国的观念。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24, 1961, *Ibid*, p. 15;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pt. 17, 1961, *ibid*, p. 137。

②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pt. 17, 1961, *ibid*, p. 137.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t. 2, 1961, *ibid*, p. 144.

于国内政治原因，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相对说来并不重要。[①]

在与新西兰总理的一次谈话中，肯尼迪强调，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要看结果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对台湾和亚洲的影响。如果值得做，他愿应付国内的麻烦，主要是国会议员的强烈情绪。这么说来，国内的障碍似乎又是可以克服的。可是，既然台湾和亚洲的反共"盟友"们都显然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肯尼迪也就觉得没必要去费劲克服那些国内的反对势力了。[②]

美国决策集团经反复讨论，大体上同意把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目标限定于保留台湾席位，不公开宣扬以排斥中共政权于联合国外为目标。美国领导人心里明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大势所趋，终将实现。因此，美国向亲密的"盟邦"交底时，往往说明自己的目标不能锁定于阻止中国入会，而保住台湾的会员资格才是根本问题。只是面对台湾当局时，才大讲阻止中共入会是美国的政策目标。肯尼迪认为，要（至少在第一届任期内）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从而使"红色中国"自动地不想加入。[③]

可以看出，肯尼迪政府在战略上为将来实行"两个中国"留有余地，在策略上则暂时顺应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用保持台湾当局的席位来排斥新中国。实际上，肯尼迪和腊斯克都不想把宝押在新中国永远进不了联合国上，而想刻意营造由新中国自行拒绝入会的条件。

"重要问题案"还是"延期审议案"

美国比较了各种方案后，认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最有效办法，是在第16届联大会议上提出，变更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属于重要问题，按照宪章，需要与会国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3, 1961, *ibid*, pp. 4 – 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24, 1961, *ibid*, pp. 14 – 1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3, 1961, *ibid*, pp. 21 – 2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14, 1961, *ibid*, pp. 29 – 3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5, 1961, *ibid*, pp. 42 – 45, Editorial Note, *ibid*, pp. 70 – 72. Dean Rusk, *As I Saw It*,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p. 282 – 284.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3, 1961, *FRUS*, *1961 – 63*, Vol. 22, pp. 21 – 22.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5, 1961, *ibid*, pp. 43 – 4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4, 1961, *ibid*, pp. 63 – 65.

但是，在台湾当局看来，美国这种变化，是从原来根本不许在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立场上后退。“重要问题案”不仅意味着中国代表权问题可以列入联大辩论议程，而且终有一天将导致接受中共人会或“两个中国”议案的通过。所以台湾顽固抵制“重要问题案”，希望“延期审议案”继续得到足够的支持。

3月17日，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叶公超要求美国不要放弃延期审议的战术。腊斯克指出：必须避免“延期审议案”失效后出现的由简单多数决定中国席位归属的局面。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被定为“重要问题”，或许任何议案都不会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叶公超个人似乎甘冒“两个中国”的风险。他指出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有这样做的先例：当塞内加尔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台湾当局曾指示其代办继续留在那里；1956年在墨尔本举办奥运会时，尽管中共派团出席，台湾也还是组团前往，结果北京退出了奥运会。但他个人的这种主张显然被台湾高层驳回，旋于3月22日奉命通知腊斯克：他的政府绝难同意任何“两个中国”的方案。[①]

多少年来，台湾当局一直提心吊胆，惟恐美国政府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而美方的种种表现，如在大选辩论和政府更迭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表达的应该变更对华政策的信息；美国要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举行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谈等等，都使台湾忧心忡忡。现在美国又要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后退，更使台湾觉得美国要同中共妥协。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全心全意支持，延期案必能再度获胜。而美国改变提案，就是准备推行“两个中国”。[②]

深受台湾的失望情绪感染的美国驻台北“大使”庄莱德3月20日向华盛顿报警：“我相信，很难向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推销任何带有‘两个中国’意味的方案，即使出于策略意图也罢。这方面的任何方针都要小心谨慎，不然就会使国民政府愤怒之极，以至退出联合国，自行其是。依我之见，此间领导层在被逼急了的情况下，很可能这样干。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当然会动摇台湾的稳定，给中共一个多年求之不得的机会，不战而胜，夺取台湾。”这位忧虑万分的“大使”不顾自己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3, 1961, *ibid*, pp. 4 – 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17, 1961, *ibid*, pp. 33 – 3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1, 1961, *ibid*, pp. 76 – 79.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3, 1961, *ibid*, pp. 4 – 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1, 1961, *ibid*, pp. 76 – 79.

政府内部正在进行的讨论，一再向台湾当局保证：美国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中共人会。[①]

蒋介石4月初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宣称“本政府不可能接受所谓‘两个中国’或任何影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其他安排”，希望同美国政府继续合作，找出排斥中共进入联合国的办法。叶公超4月3日向腊斯克递交这封信时，强调1958年10月美台签订的联合公报，是台湾方面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腊斯克再次指出，蒋介石的信意味着坚持用“延期审议案”的方式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这是一个由简单多数即可表决的方式。如果延期案失败，同样由简单多数即可决定中国席位的归属，接纳中共人会。美国的策略目标是“获取多数国家支持，使北平政权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内而自外于联合国，以此把责任转嫁给北平”。[②]

肯尼迪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深感不安，4月17日亲自复信加以安抚。他保证美国将忠实遵守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义务，继续为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但没有对排斥中共政权做出明确承诺，回避了蒋来信中责难的“两个中国”问题，也没有搭理蒋鼓吹的“大陆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只说明正在紧急考量保持台湾席位的手段：“我们在联合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保持中华民国的成员国地位。我们的问题不在目标，这方面我们一致，我们的问题在于选择何种手段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严重怀疑下届联大中延期审议案能够获得充分的支持，顺利过关”。[③]

蒋介石的反抗

蒋介石并不满意肯尼迪给他的这些说辞，要求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在亚洲的冷战中起更积极的作用。

美国副总统约翰逊5月间受肯尼迪委托出访东南亚，顺道访问了台湾和南亚。14日下午，约翰逊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转交肯尼迪给蒋的一封信。同4月17日的信相比，肯尼迪这次不仅强调要保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明确表示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保证无意承认中共政权。约翰逊解释此行的目的，是加强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0, 1961, *ibid*, pp. 37 – 38.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1, 1961, *ibid*, pp. 46 – 48.

③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April 17, 1961, *ibid*, pp. 50 – 51.

对盟邦的援助，以达成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他还故意向蒋透露，美国已极力劝说英法政府给台湾更多支持，而英法非常不愿这样做。

蒋介石对此并不领情，反而毫不客气地把美国政策批评了一通，认为老挝事件证明，东南亚条约组织不过是个空架子，使人们丧失了对它的信任，并且影响了人们对美国的信任。必须另图良策，挽救形势。他的良策就是要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反共政策，取代英法来领导东南亚的反共事业。[①]

反共，一直是台湾当局用以牵动美国政府的一根政治杠杆。蒋介石现在就挥动着这根杠杆来教训美国人。他指出，美国需要全面地检讨亚洲政策。尽管美国同若干亚洲国家订了双边条约，但缺乏积极领导下的统一政策。他催促美国在全亚洲地区实施积极政策，不要继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致力于解决单一国家的问题。陈诚也在一旁敲边鼓，指出巴特寮部队有苏联的飞机、中国的顾问、北越的援兵，自由世界也应通力合作，统一计划，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台湾当局多年来想拼凑亚洲反共联盟，或挤入地区性条约组织，被美国一再婉拒，这时总算有机会一吐怨气。

然而更令蒋介石生气的事情还在后头。肯尼迪政府为了打破同亚洲共产党国家关系上的坚冰，一边注意观察利用中苏分歧，一边试图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入手探寻同亚洲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认为此举还有多重战略意义，可以给亚洲共产党国家提供一个和美国友好共处的榜样，还可以在中苏之间取得一个搜集情报，并伺机上下其手的立足点。为此，美国支持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从6月2日起开始和蒙古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谈判建交事宜。[②]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恼怒，因为蒙古问题在他看来，既涉及“领土主权”，又意味向亚洲共产党国家敞开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他6月9日给约翰逊的访台感谢信，差不多写成了抗议信。其中强烈反对美国企图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指责美国正在“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全球斗争的原则立场倒退”，并在为“两个中国”的方案铺平道路。他还下令通过外交渠道强烈抗议和抵制美国对蒙古的政策，反对美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 in Hong Kong, May 15, 1961, *ibid*, pp. 58 - 62。

②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 May 23, 1961;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May 29, 1961, *ibid*, pp. 417 - 420.

国给海外台独领导人发入境签证。[①]

美国还在顺着自己的思路行事。腊斯克5月26日向肯尼迪提出过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方案。他的判断是：延期审议案不再可靠，多数成员国将接受“两个中国”提案。但如果只能在新中国政权和台湾当局二者之间选择一个中国代表，多数成员国将选择新中国。若通过某种方案，让新中国在保持台湾席位的情况下申请联合国席位，就可以绕开台湾当局的否决权，而置新中国于拒绝入会的境地。[②]

庄莱德1961年6月20日同蒋介石夫妇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蒋激愤地就三件事谴责美国：美国决定发给自称流亡日本的“台湾共和国总统”廖文毅入境签证，是推行“两个中国”，推动台独的一个步骤，将严重影响美台联合反共大业；美国事先没有同台湾当局充分协商，就要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这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在联合国企图实行“两个中国”，台湾当局不赞成这个方案，必要时宁可退出联合国。蒋警告说：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像是把美台关系当成了主从关系，而不是盟友关系。这三个问题使他怀疑，美国政府是否不顾抗议，仍要策动对华政策的变更。若证明确有此意，美台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庄莱德听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严重”，不敢怠慢，立即转报华盛顿。[③]

美国政府对来自台湾的噪音显得不大耐烦。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麦康瑙吉就蒋介石6月9日的来信，替约翰逊草拟了一个相当冷漠的答复。其冰冷程度连对蒋介石一向不热心的肯尼迪也看不过去，批示道：“我看没有比这个稿子更具灾难性影响的复信了！它几乎显得故意冷淡，对蒋介石来信中提的问题，一个也没答复，也没有将我方的善意做任何实质性的表达，我认为此时恰恰需要做此表达。”

腊斯克就是要给蒋介石一个冷脸看。他辩称，实质性问题应由外交渠道讨价还价，副总统不宜深深卷入同外国当局有分歧的问题中去，还说约翰逊本人也持这种看法。于是这封充满官样陈词滥调的“灾难性”信稿，几乎未加更动地发了出去。[④]

---

①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July 14, 1961, *ibid*, pp. 95 – 97.

②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 May 26, 1961, *ibid*, pp. 66 – 69.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1, 1961, *ibid*, pp. 76 – 79.

④ 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 July 15, 1961, *ibid*, pp. 98 – 99.

肯尼迪的退让

在美台关系日见疏离、纠葛丛生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在一系列问题上阐明美国的立场，同台湾当局达成谅解，腊斯克决心邀请蒋经国或"外长"沈昌焕来华盛顿访问一次，由肯尼迪当面锣对面鼓地同台湾讲讲清楚。①

蒋介石起初曾考虑派蒋经国访美。的确，蒋经国具有许多别的人选不可比拟的特点：可以推心置腹地同乃父蒋介石交流想法，实际上是老蒋的接班人，同美国政军情治各界有密切关系等等。但是，面对美国方面频频施以高压，蒋介石愤而取消了蒋经国访美之议。②

美国决策层迫不及待地决定向台湾当局摊牌。国务院 6 月 30 日电令庄莱德晋见蒋介石，挑明美国在中国代表权、外蒙古、廖文毅赴美签证等问题上的态度。蒋介石再度冷峻地回答：民国政府不排除变更延期案的可能性，但宁肯退出联合国也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③

台湾当局对美国在外蒙、廖文毅签证等问题上的做法感到惊讶，又怕美国在联合国中有不利台湾的举动。尤其震惊于美国在这些关系重大的事情上，不待与台湾协调一致，就要自行其是。在美台交涉面临僵局的情况下，蒋介石又拿出四十年代的老手段，绕开正常的外交渠道，另辟蹊径去"疏通"。

这次牵线搭桥的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他 7 月 7 日径向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邦迪报告：国民党人"正处于五年来最惶惶不安的情绪中。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奇特的世界中：只有美国把他们和灾难隔开。因此美国态度上最微妙的变化迹象，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他们"对美国深感愤慨，准备自己单独冒险，包括进行自杀性地反攻大陆，否决外蒙加入联合国案，并在联合国其他问题上给美国作梗。蒋委员长亲自决定取消原订的蒋经国的访美计划"。克莱恩担心搞不好会发生决裂，蒋会让美国重蹈马歇尔、艾奇逊的覆辙。他抱怨国务院给蒋"生硬地上了一课"，事先未经充分磋商就强加于人，造成蒋对国务院极

---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June 26, *ibid*, p. 83.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July 7, *ibid*, p. 90

③ *Ibid*, p. 90, ft. 2.

不信任。克莱恩和邦迪建议肯尼迪亲自写信引导蒋正视面临的严峻难题，不要否决蒙古入会，同时也要对台湾的“反攻”意图表表“同情”，暂时放弃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打算。[①]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也报称，据研判，蒋有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向大陆空投特种部队的迹象。[②]

蒋介石不惜铤而走险，拼个鱼死网破的姿态，吓住了美国总统。肯尼迪考虑再三，为了保证联合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过关，决心在蒙古和廖文毅问题上向台湾当局让步，暂缓同蒙古建交及发给廖文毅入境签证。[③]

他急忙查问国务院哪一级批准给廖发签证。腊斯克回答是他亲自决定的，主要理由是：拒不给流亡者发签证，违反美国的传统；在压力（即便是友邦的压力）下这样做，更错。富布赖特参议员等人长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请国务院办理此事，签证就是这样批准的。[④]

肯尼迪随即于7月14日写信给蒋，澄清“误会”。说明他已下令暂不发给廖文毅访美签证。美国虽然认为在中苏之间的蒙古派驻“自由世界”的代表，在战略上有利，但考虑到台湾的反对，可以延缓对蒙古的外交承认。然而，台湾若否决蒙古入会案，将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发生不利影响。此外，美国也不相信延期讨论的策略今年还能成功，必须另寻善策，改取“重大问题”方案似乎较好。他再次建议派蒋经国或另一个“完全可信赖”的代表前来华盛顿，磋商面临的战略和策略问题。[⑤]

陈诚访美

蒋介石终于答应派他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访美，主要目的除了要获得美方坚定维护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地位的保证之外，还想进一步推动美国牵头拼

---

① *Ibid*, pp. 89 - 91.

②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Felt)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ly 10, 1961, *ibid*, p. 93.

③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July 14, 1961, *ibid*, pp. 95 - 97;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all to President Kennedy, March 23, 1962, *ibid*, p. 197.

④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June 26, *ibid*, p. 83.

⑤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July 14, 1961, *ibid*, pp. 95 - 97.

凑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反共联盟，并阻挠美国同蒙古发展关系。

7月31日，陈诚刚抵达华府，肯尼迪即予接见并讨论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了迎合对方，肯尼迪不再讲美国的基本目标只限于保住台湾席位，却宣称美国的政策是要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他告诫这位总以为只要美国以强硬立场支持就万事大吉的盟友：计算联合国的票数必须现实，别把不属于我们的票算成赞成票。我们可不想在联合国以几票之差败北。陈诚虽然主张坚持延期战术，但是拿不出争取多数票的有效方案。①

8月1日继续会谈时，台北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大概觉得这位字“辞修”的顶头上司实在有些“辞羞”，竟不顾礼节，越过陈诚直接发难，责怪美国虽在欧洲对共产主义采取坚定立场，在亚洲却一再退让。肯尼迪反驳：1945年以来美国在亚洲打过仗，在欧洲却没有。蒋逼问：那么美国能不能保证对蒙古的政策与对波罗的海各国一样？肯尼迪表示，美国可以不再继续与蒙古谈判，但苏联和非洲一些国家把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绑在了一起，如果美国或台湾否决蒙古入会，非洲国家将迁怒于台湾，从而可能支持中共入会，甚至不惜逐走台湾当局。他反过来责怪这些不自量力的朋友：“你们不能什么都想要”。

台湾当局恰恰是什么都想要，既不想让中共入会，也不想让蒙古入会。但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呢？对不起，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陈诚赖以游说的资本，仍然是反共意识形态。他强调台湾当局誓死反共抗俄，美国若承认蒙古，则将提高苏俄和共产世界的威信。他还抛出一个大计划，声言对自由世界来说，重要的是应形成更大的团结和更强的组织以对付共产阵营。因此需要在亚洲自由国家之间建立永久性的参谋机构。他的政府已就此拟订了方案，译成英文后即呈送腊斯克国务卿。接着他就鼓吹了一番这个计划多么符合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如能尽快采纳，将解除美国的一些忧虑。

美国立即讲明自己需要解除的忧虑是什么。针对台湾正在准备中的“反攻大陆”，腊斯克提醒道：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换文中清楚地载明，只有经过双方协商一致，才能使用武力。肯尼迪进一步强调：双方就任何可能引起军事反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ly 31, pp. 102 – 103.

应的行动密切协商，是最重要的事。为了使台湾方面不致有丝毫误解，他索性直言相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卷入基于希望而非事实而对中国大陆采取的行动中"。陈诚对此没有躲闪的余地，只好保证台湾当局一诺千金，言必有信，从未违反、也不打算违反条约。

话题转到廖文毅签证风波。陈诚说廖文毅本无足轻重，但是台湾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想把廖弄到美国扶植起来。肯尼迪否认美国想扶持廖成个气候，实际上很少有美国人听说过廖。腊斯克在旁解释，美国现在可能有500人听说过廖，但如果他的签证问题闹成了人权风波，就可能会有一亿美国人知道他了。

陈诚又提议合作加强对大陆的情报战和心理战。肯尼迪强调美台双方必须确认是否最充分地掌握了有关大陆的情报。言下之意，在没有掌握充分情报之际，不得轻举妄动。陈诚连忙摆出曾任三青团首领的"老资格"，表示尚有三万忠实信徒潜伏在大陆。但在追问之下，又承认已经同潜伏大陆的"地下人员"失去无线电联络，只有通过港澳传信，台湾当局无法依赖大陆上那些缺乏全面组织的特务。但他坚称，对大陆同胞获得"最终解放"的信念从未动摇。

美国当然不能仅仅根据陈诚的"信念"行事。对于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美国坚持以"协商一致"的条约义务来约束台湾当局。对于台方后来送交的代号为"太平"的《西太平洋反共各国集体安全组织纲要》，美国也予以否定。

若就这次会谈的主题即联大中国代表权的策略问题而论，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尽管如此，陈诚访美还是有所收获。美方承诺了暂不再同蒙古谈判建交，暂不给廖文毅发签证，将在今年联大中尽最大努力保持台湾当局的席位，阻止新中国加入。台湾方面却未肯承诺对蒙古人会案不行使否决权。[①]

8月2日，陈诚在五月花饭店备下美酒佳肴款待肯尼迪。肯尼迪则以甜言蜜语请陈诚回赠蒋介石：美国政府希望在今年联大中，尽最大努力保持民国政府的席位，并防止共产党中国加入。无论美台之间对于在联合国中应以何种办法避免失败为好，存在分歧，都应记住："两国政府"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②]

美国既然在"根本问题"上把自己同台湾当局的命运连在一起，能够迫使蒋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ly 31,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Countries Series, China, JFK Library, Boston.

② NSF Files, Countries Series, China. JFK Library, Boston.

介石让步的砝码就不多了。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7月25日以76比0票通过议案，众议院8月31日以395比0票通过议案，都重申支持台湾当局，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这样，肯尼迪政府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面临台湾和国会的两面夹击，进退余地也实在不大。①

肯尼迪及其僚属同陈诚会谈后，感到若逼急了蒋介石，蒋可能会蛮干一气，不惜房倒屋塌，连自己带美国一块砸进去。为了避免在联合国的失败，美国只能继续说服蒋接受"重要问题"案，不要否决蒙古入会申请，以换取非洲国家的支持。肯尼迪甚至准备必要时由美国出面对蒙古入会投赞成票。同时他也还考虑建议联大设立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代表权问题，明年向联大提出以"继承国方案"为基础的"两个中国"议案。②

陈诚通过这次会谈，却得到一种印象：似乎肯尼迪本人强烈地支持蒋介石，而腊斯克在耍滑头。他把这个印象带给了蒋介石，使蒋认为美国总统与行政部门对台态度不同，这里有空子可钻。这种错觉助长了蒋在联大代表权问题上本来就很顽固的立场。③

分道扬镳还是协调行动

随着联大召开的日期临近，美国越来越急于取得台湾当局的让步。肯尼迪8月15日又给蒋介石去信，强烈反对台湾当局在蒙古入会问题上行使否决权。总统国安助理邦迪也出面向台湾当局说明，在总统、国务院、国会之间，并无可资利用的分歧。台湾必须认真考虑关于不得否决蒙古入会案的告诫，作为回报，美国愿尽力争取非洲各国支持台湾的席位。④

台湾当局分化美国未成，自己内部却发生分化。叶公超暗中向美国透露：自己强烈支持改变台湾当局的立场，但希望美方不要把自己的态度报告台北。他实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31, 1961, *FRUS*, *1961 - 63*, Vol. 22, p. 103, ft. 1.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5, 1961, *ibid*, pp. 112 - 113; Editorial Note, *ibid*, pp. 133 - 134.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Oct. 4, 1961, *ibid*, p. 145.

④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August 22, 1961, *ibid*, p. 127;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August 22, 1961, *ibid*, 128.

际上反映了台湾部分高层官员的想法。①

肯尼迪试图向蒋介石发动最后一击。9月6日再度写信给蒋，对他顽固坚持要行使否决权“深感遗憾”，此举“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代表权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肯尼迪的结论是：对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是防止中共今秋在联合国取代国民党政权的“决定性因素”。他以最后通牒的口气写道：“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我肯定你将理解我们必须保留选择自己认为是达到贵我共同目标的最佳途径的自由”。②

9月13日，腊斯克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大使下达了由肯尼迪批准的训令。大意为：(1)“美国在第16届联合国大会的目标有两个方面：阻止共产党中国入会，维持国民党中国的席位。”(2)促使一些国家，或索性由美国出面，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据联合国宪章第18款为“重要问题”的议案，需有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变更。(3)对蒙古入会申请投弃权或赞成票，以助成毛里塔尼亚入会。并以此进一步争取原法属非洲各国支持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③

但是，肯尼迪低估了蒋介石的犟脾气。直至联大开幕后，台湾当局仍顽固地向美国表示，宁肯破釜沉舟，退出联合国，也不会在蒙古入会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妥协。台湾岛内弥漫着不能退让的空气。国民党人对美国极为不满，不相信有必要调整在联合国的策略，生怕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新中国进入联合国。④

美台关系至此紧张之极。腊斯克恼怒地命令庄莱德正告蒋介石：“我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将不分担任何责任，并在必要时做出非常明确的澄清：尽管美方已尽最大努力，民国政府还是选择了在联合国里政治自杀的道路。”他要求庄莱德对台湾官员怀疑美国动机的任何表示都要做出“尖锐的反应”。针对台湾当局

---

① 这些人包括台湾当局“外长”沈昌焕、“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黼等，参见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August 22, 1961, *ibid*, 128;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pt. 6, 1961, *ibid*, p. 135.

②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pt. 6, 1961, *ibid*, pp. 134 – 135.

③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the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 (Stevenson), pp. 135 – 136.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pt. 17, 1961, *ibid*, pp. 137 – 138.

对美国的不满正在增长的说法，腊斯克反唇相讥：美国对台湾当局的不满也在增长。后者以其特有的愚蠢以为美国政府尚未尽力说服联合国成员。“如果民国政府官方试图发出信号，表示对美国的失望和愤慨，那么他们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他们以为民国政府对美国的看法是双方唯一关注的事情。应该提醒台北的某些人担忧一下美国对民国政府的看法了。我们几乎看不出民国政府为美中关系贡献了什么”。①

如此尖刻的批评并未动摇蒋介石的决心。至9月底，表决在即，他仍顽固地坚持原定立场。又急又气腊斯克抛开外交辞令，露骨地威胁道：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不幸的后果将影响未来的美台关系。台湾失去的不仅仅是国际组织的席位，更重要的是损害自己的对外关系，包括“美国保护台湾当局的能力”。②

这番严厉的告诫总算震动了蒋介石。他10月2日向美国端出了自己最苦恼的七个问题，探测底蕴。其中蒋问：如果“民国政府”否决蒙古入会，美国会同“民国政府”断交吗？美国答复：不会，但双方关系将受影响。“民国政府”将失去非洲的朋友，随之失去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国际上将出现纷纷承认新中国的潮流。蒋接着问：如果“民国政府”否决蒙古入会，而中共被联合国接纳，美国政策会是因台湾目前地位不复存在，而视其为中共领土吗？美方未直接回答，只是说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的最佳办法是保持“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③

看来还得恩威并施。邦迪再次请叶公超向蒋转达一些动听的恭维，说肯尼迪很尊敬蒋介石，视蒋为英雄，总统和国务卿都无意改变同台湾的条约关系。这时，国务院也建议肯尼迪利用双十节五十周年的机会，再给蒋发一个“热情的个人信件”。④

---

① *Ibid.*

②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ew York, *ibid*, p. 141;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t. 2, 1961, *ibid*, p. 142;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Oct. 4, 1961, *ibid*, p. 145.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t. 2, 1961, *ibid*, pp. 142 – 144.

④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Oct. 4, 1961, *ibid*, pp. 145 – 146.

肯尼迪不仅发了热情的贺信，而且意犹未尽，又于10月5日致函蒋介石，强调自己亲自批准了对他那七个问题的答复。国务院对否决蒙古案的严重后果的分析，完全代表他本人的看法。他想同蒋交换保证："贵方避免否决，我方避免在现在情况下对蒙古采取新的外交主动。"显然，他刻意用"现在情况"这一措辞来避免承诺将来不同蒙古建交。[①]

蒋介石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哪能轻易就范和让步？他强调自己若在蒙古问题上后退，将面临向官员、军队和民众做解释工作的艰巨任务，可能引起士气人心的大跌落，甚至会发生统治危机。为了向民众和立法院有个交代，他要求肯尼迪公开声明：美国坚决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将用一切手段包括必要时在安理会用否决权来阻止中共入会。只要有这种声明，他就准备放弃对蒙古入会的否决权。言下之意，得不到这个声明就不放弃。[②]

这样的勒索把肯尼迪逼到了墙角。他考虑再三，只好先忍下这口气，答应以记者会的方式再次声明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权，反对新中国入会。但他不愿预言可能对此使用否决权，因为这将显得美国对"重要问题案"没有信心，从而损害各国的支持。另外，美国从长远考虑，一贯主张在纯属联合国席位证书的问题上不动用否决权。华盛顿一再传话给台湾方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让步至极，忍耐至极。决策层也确实有人力主明年对中共入会应采取顺乎自然的态度，总统不必公开赞成"两个中国"。[③]

在这番紧张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国政府似乎比台湾政权更不愿冒失败的风险（准确地说，或许是新任的美国总统比强硬的国务卿更承受不起失败的指责），只好做出让步。肯尼迪答应给蒋介石一个秘密保证：如果任何时候美国的否决将有效地防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使用否决权。但这一保证必须严格保密，蒋只能悄悄告诉几个最可靠的关键人物。如有泄露，美国政府将把此事作为"谣言"予以否认。邦迪也再度启用秘密渠道，绕开庄莱德大使，指令中央情报局台北站

---

①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t. 5, 1961, *ibid*, p. 147.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6, 1961, *ibid*, pp. 148 - 149.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t. 7, 1961, *ibid*, pp. 150 - 154.

长克莱恩直接找叶公超（美方发现在同老蒋打交道时，这是个“极有帮助的人”）和蒋经国，向老蒋转达肯尼迪的意向。[①]

蒋介石得寸进尺，表示乐于接受美方这一秘密保证，但此外还要求：（1）美国对蒙古人会案不得投赞成票；（2）肯尼迪应及早做出台湾方面所要求公开声明。若如此，台湾方面就答应对蒙古人会案不使用否决权。占尽便宜之后，蒋开始以特有的中国方式表现他的“宽宏大度”：提议肯尼迪不必以书面形式作秘密保证，只要由庄莱德大使口头转达即可。[②]

10月16日，肯尼迪下令向蒋介石口头转达秘密保证：“我愿向您保证：如果任何时候美国的否决是必要的，并能有效地防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将行使否决权”。肯尼迪叮嘱：“这是我的政策，蒋总统有资格知道此事，但任何公开利用这个政策，将迫使此间予以外交否认。”他还向蒋通报了拟于18日做出的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的声明内容。后来的历史证明，肯尼迪在此强调这是“我的”、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且保留了一旦公开利用即予否认的权利，实在是老谋深算。[③]

肯尼迪的决定遭到来自其政府内部的反对。国务院政策设计者们主张不能关上变更对华政策的大门，应研究一旦情势变迁，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承认中国，当排斥中国于联合国外的目标不再现实时，可供选择的目标、策略和行动时机。[④]

有意思的是，在交涉程序上逸脱常规的美国，发现自己的对手也没按正常的程序决策和出牌：蒋介石拍板后通过蒋经国把实情告诉克莱恩，而把第一线交涉的叶公超和庄莱德都蒙在鼓里，蒋氏父子外交全然瞒住了台湾政要。美蒋双方显然都很珍视这一特殊管道的价值，相约严格保密，不宜滥用，只在必要时启用。更有意思的是，尽管蒋介石把官员们的激昂情绪作为不好转弯子的口实，迫使美国让步，叶公超却透露，蒋介石放弃对蒙古人会案使用否决权是大多数负责官员

---

①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Oct. 11, 1961, *ibid*, pp. 154 - 155.

② Message From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Oct. 14, 1961, *ibid*, pp. 156 - 157.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t. 7, 1961, *ibid*, p. 160.

④ Editorial Note, *ibid*, p. 161. Draft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Oct. 26, 1961, *ibid*, pp. 163 - 164.

劝说的结果。[①]

暂时的结局与长远的后果

10 月 25 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1 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蒙古入会案。台湾当局未参加投票。2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630 号决议案，接纳蒙古加入联合国。台湾当局未参加表决。12 月 1 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提出议案：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变更问题的议案都是“重要问题案”。15 日此案以 61 票赞成，37 票反对，7 票弃权，被通过为联大第 1668 号决议案。[②]

表面上看，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引起的美台关系的这场危机，似乎是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结束。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实际上台湾当局几乎没有付出任何真正的损失。延期审议策略和否决蒙古入会，本来就不利于台湾。如果硬要付诸实行，势将严重动摇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甚至导致当年便可能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并加以表决，而被台湾得罪的非洲国家集团的票数将对表决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调整对华政策、实现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改取重要问题案的策略，也是暂时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再拖一拖的唯一办法。[③]

由于美国把自己和台湾当局绑在了一起，使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失败成了美国的失败，为了避免这种失败，只好反过来向台湾当局做出重大让步。不否决蒙古入会本来就有利于拉拢非洲国家投票赞成维护台湾席位，蒋介石却以此作筹码，迫使美国又做公开声明，又做秘密保证，还暂停了同蒙古的建交谈判。肯尼迪政府为此付出了战略利益上的代价：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难以同新中国、蒙古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调整关系。但蒋介石放弃书面保证，只要口头承诺，也于十年后吞下了重文字契约，轻口头允诺的美国政要食言自肥的苦果。

---

① Message From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Oct. 16, 1961, *ibid*, pp. 158 - 159.

② United Nation Documents, S/4968;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61, p. 145.

③ 如果不是发生中印之战，后来又发生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代表权在 1962—1963 年或 1966 年都是很有希望解决的。

对于中国来说，联合国代表权之争实际上不仅是一场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多数的斗争，而且是打破遏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考虑要走出这一步？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加以研究。但总的看来，中国的立场要想得到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还需要时间做很多工作，中国领导人对此显示了充分的耐心。早在1960年1月，中国外交部编印国际情况简讯，提到美国正逐步削弱蒋帮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蒋帮则大力增派驻联合国人员和设法恢复在其他国际组织的会籍。毛泽东看后写下一个批语："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①

美国当年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对华政策调整的底线是"两个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而要美国完全接受中国的条件，暂时又不可能。于是毛泽东决心以反叛者的姿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挑战，不惜大闹天宫，索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表现"毫不在乎"的态度。以此向美国政府表明，你所要做的那种调整，我并不稀罕。我的条件，你必须接受，否则就对峙下去，闹个不休，直到实现"要美就我"、"要美国服从我们"的目的。

虽然在国际斗争的现实中，很少有一方完全将就对方、服从对方的情况，结局往往是双方的妥协与让步。但十年后中美在联合国较量的实际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席位，台湾当局的代表被迫退出联合国。"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方案被抛弃了。对美国来说，肯尼迪所设想的调整对华关系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是有没有可能使这一胜利结局早日出现的问题。

到底谁被谁牵着走？

美台关系中时而有之的一种奇怪现象，典型地表现在肯尼迪执政头一年同蒋介石打交道的记录中：美国几乎总是放弃较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而迁就台湾当

① 毛泽东：《在关于国际情况的一期简讯上的批语》，1960年1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第4、6页。

局。为什么会有这等怪事？从前文所述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各种意见中可以略知答案。实际上，影响肯尼迪政府对台政策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冷战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国站在与美国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台湾就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肯尼迪曾告诉蒋介石："长远看来，自由世界通过增强民主制度并使之更适应世界人民的愿望，就能最有效地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基于这个意义，美国越来越重视台湾近些年来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①]中央情报局头子克莱恩也不讳言，当年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让台湾充当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展示西方现代化和民主生活的橱窗。[②] 这个大目标的实现，是肯尼迪政府最看重的"国家利益"，其他相对来说都次要。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知道美国离不了他的台湾，所以才不时地挥动"反共"这根杠杆，要求美国这样做那样做，或不得这样做那样做。美国对此尽管不满，但为了冷战大局，到头来只有迁就这个小盟友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讲，肯尼迪当时即使想将对华政策做一些调整，也必须顾忌到台湾的反对，困难重重。

但是，美国政府在蒋介石集团意欲反攻大陆一事上，始终保持着警觉，利用各种手段加以约束，尽可能避免出现会把自己卷入战争的局面。在这一时期美国决策人的意念中，对台政策的另一目标就是不让蒋军渡海峡。

六十年代初，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大陆的经济困难，实行鼓吹多年的反攻。肯尼迪政府流露的想调整对华政策的种种迹象，更使蒋介石坐卧不安，急于以强硬的行动激化台海局势，迫使美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于是，"光复大陆"被蒋介石定为1962年实行的目标，厉兵秣马，跃跃欲试。这就把美国对华政策拖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肯尼迪政府煞费心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拖延蒋介石集团的反攻计划。美台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执，双方角智角力，斗劲斗狠。而这一切又都在高度保密的高层交涉中进行，外界难以察觉。围绕台海战略问题酿成的这场危机，就像貌似平静的大海一样容易给人某种错觉：海底暗潮汹涌，海面水波不兴。以至人们长期以为美国政府是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积极支持者，甚至是指

---

①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April 17, 1961,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50－51.

② 《我所知道的蒋经国》，第105－117页。

使人。近年新公布的美国档案资料，为人们窥探这场暗潮酝酿的内情提供了绝好的线索。

想方设法“拴紧蒋”

早在1961年上半年肯尼迪就任不久，台湾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反攻计划，其中包括一次空投二三百人的行动。7月下旬，经肯尼迪批准，美国只同意台湾分批空投6个20人小组到华南进行侦察活动。这显然把台湾当局的行动规模打了折扣，台湾当然很不满意。数月后，准备工作完成了，台湾却打起退堂鼓，理由是投入人数太少，达不到目的。[①]

1962年，国民党领导集团看到中国大陆已明显陷入经济困难，中苏间的裂痕正在加深。而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和蒙古问题上的表现，更使他们忧虑美国政策会滑向“两个中国”或与大陆接近。于是想抢先发起反攻大陆的行动，迫使美国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大力支持台湾，最终把美国卷入同大陆的冲突中去。所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强烈鼓吹，1962年的任务是努力革新，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美国分析家认为，蒋对美国政策的上述理解，终将导致他越来越想赌老本拼一场，试试“反攻大陆”的可行性。[②]

果然，蒋介石1月24日询问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同肯尼迪讨论全部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提议双方就时局交换意见，探讨在什么情况下反攻大陆是可行和必要的，或是可期希望的。克莱恩同主管情治系统的蒋经国私交甚笃，立即将老蒋的要求转报华盛顿。[③]

肯尼迪的谋士们普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应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主要的顾虑是毫无胜算，反会给中苏提供一个重新合作的机会，使苏联成为最大获益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科默计算了反攻的各种前景后指出：“我仍然支持继续拴紧

① Draft Message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Washington, March 9, 1962,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 *193*.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rch 30, 1962, *ibid*, p. 202;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Washington, May 29, *ibid*, p. 233.

③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ibid*, p. 181.

蒋。针对红色中国的重大侵袭行动的成功前景很成问题，特别是苏联握有在他们选好的任何时机反将我一军的选择。他们可能让北平苦撑一时，使其得到教训。但如果形势变坏到一定程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插手进来。果若如此，我们算是成功地把北平和莫斯科又推到一起了，实际上等于延长了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互卡脖子的时间"。①

可是，怎样才能"拴紧蒋"？这是美国的难题。驻台北大使庄莱德拒绝按照国务院的指令对蒋直话直说，去提醒他那鼓吹反攻的元旦文告不得意味着政策的改变，采取行动前要先同美国商量，等等。庄莱德断定，这样做只会伤害蒋，并激起他对肯尼迪新班子的潜在敌意。国务院于是改令庄莱德通过台"外交部"申明此意。②

美国派遣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副助理彭威廉（Bundy，William P.）到台湾摸底。蒋介石则乘机试探能从美国得到什么。他在2月23日晚上的会见中宣称，并不想让美国"参加"反攻，但希望美国"默许"并秘密地给以"间接的后勤支援"。彭威廉未肯答应，只是大念"共同协商"的紧箍咒。③

但是，念紧箍咒者，也有自己头疼的问题。鉴于蒋氏父子接二连三地催美国同意他们的反攻计划，急于若干月后就付诸行动，美国感到支持则惹祸，反对则失和，真是进退两难。④

恰在此时，美台之间为着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年中国卷的编辑出版，又闹起一场风波。这一卷早已编好，原拟1957年发表。由于其中不可避免地收录了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甚至华盛顿的民主党政府对蒋介石内外政策和政治腐败的尖锐批评，其中一些文件曾经被1949年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选录，用以说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是咎由自取，美国不能负责。如今，大量同类的文件又要发表，其冲击力或许不亚于当年让国民党人寒心的白皮书。在台湾当局的一再抗议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总算拖着没出版。而今肯尼迪政府在学界政界各方压力下，

---

①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ibid*, pp. 182 - 184.

②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ibid*, p. 184.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February 28, 1962, *ibid*, p. 186.

④ *Ibid*, p. 187.

觉得再拖下去，对美台关系的损害比发表还大，于是决定出版。消息一出，台湾舆情大哗，庄莱德也表示反对。美国这次顶住压力，终于在1962年3月20日出版了。[①]

肯尼迪和腊斯克都觉得庄莱德受台湾当局影响太深，未能有效地代表美国表达立场。虽然明知会引起蒋介石的猜疑，还是决定召回这位已经和蒋难分你我的大使，改派柯克海军上将担任新大使。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和登陆作战的经验，但是比庄莱德更坚定地认识到美国的现实利益是阻挠反攻大陆。美国选这样一个新大使，也是煞费苦心。表面上似乎是重视和适应蒋之需要，实际上是为了"拴紧蒋"。[②]

百般敷衍拖下去

在新大使到任前，克莱恩继续同蒋经国讨论反攻事宜。台湾要求美国援助空投二三百人的队伍到大陆。克莱恩认为如果直言"不行"，将给美台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更可怕的是刺激台湾向大陆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硬把美国牵进去。他主张美国暂且同意为台湾大约五十到一百人的行动提供C-130或C-123飞机和其他援助，然后以"做准备工作"为借口拖延时间。[③]

白宫的确担心这位倔强的"盟友"不顾一切地蛮干，所以屡屡表示愿意讨论蒋方的计划，但不做任何承诺。一再强调台湾有义务在采取行动前获得美国的同意，也一再指出蒋方所获情报不足以构成决策基础。实际上是有步骤地拖延蒋介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April 10, 1962, *ibid*, p. 215, ft. 4.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ne 22, 1962, *ibid*, p. 268.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rch 6, 1962, *ibid*, p. 190, footnote 2;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Washington, March 6, *ibid*, pp. 191-192;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ice)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Washington, March 28, 1962, *ibid*, p. 199. (后一种飞机能载运200人。见 Memorandum for Record, Washington, May 17, 1962, *ibid*, p. 228).

石的反攻计划，又不直言“不行”。①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小希尔斯曼3月8日到达台北，当天便同蒋经国会谈。②

接着，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又被派往台湾去“拴紧缰绳”。③

肯尼迪令哈里曼向蒋阐明：双方1954年换文中的谅解，仍然支配着反攻问题的全部讨论，去年袭击古巴的失败，就是基于错误情报而贸然行动的前车之鉴。美国只能批准6个20人小组规模的空降行动，不能在现有的情报基础上支持空投200人的集团。④

3月14日晚餐前后，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两次同哈里曼会谈。他试图让美国人接受他对1954年条约和换文的曲解：反攻大陆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只有义务同美国“协商”，没有义务事先取得美方的“同意”。哈里曼不得不一再重申：不仅要“协商”，而且要“同意”。蒋介石得不到松绑，只好表示将谨慎行事。他虽然已通过蒋经国向美国要求提供5架C－130军用运输机，但为了避免直接碰钉子，这次会谈时宣称不谈这类“技术问题”。他推销的“战略”是：大陆人民正孕育着反叛，但需要有较大的空投行动，才能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因此第一阶段需要美国空运帮助。引发大起义后，就不需要美国出兵了。他指出：目前正是天赐良机，必须抓住，否则便永远失去机会了。大陆的情况糟透了，秋季将是决定性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rch 6, 1962, *ibid*, pp. 189－190;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Washington, March 6, *ibid*, pp. 191－192;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ice)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Washington, March 28, 1962, *ibid*, pp. 198－199;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3－3－62), Washington, March 28, 1962, *ibid*, p. 20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rch 6, 1962, *Ibid*, pp. 202－204;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March 31, 1962, *ibid*, pp. 204－205; Memorandum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Washington, March 31, *ibid*, pp. 206－207.

②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3－3－62), Washington, March 28, 1962, *ibid*, p. 200, footnote.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rch 6, 1962, *ibid*, p. 190, footnote 2;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ibid*, pp. 191－192.

④ Draft Message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ibid*, pp. 192－193.

的阶段。一爆发民众反抗，他就得采取行动。哈里曼深知台湾情报的浅薄和美国政策的底蕴，不为蒋的战略所动，只是提醒蒋：美国总统乐于谨慎从事，一个错误就是一场灾难。[①]

哈里曼离台后，蒋氏父子又找“够朋友”的克莱恩，要求肯尼迪给予下述秘密保证：美国继续支持他的国民政府采取秘密行动，联络和援助大陆的反抗力量，当双方一致认为拟议之行动时机成熟时，美国对国民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予以秘密支持，提供能够运送大批武装分队到达特定目的地的飞机。蒋氏父子还进一步施加压力，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侵害了国民政府的主权和行动自由，应重新审查。[②]

美国不敢贸然答应。根据哈里曼和小希尔斯曼同蒋氏父子的谈话和访台印象，美国情报机构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后果作了评估。结论之一是，台湾当局派出的特种部队即便能在大陆立足，也很快就会被打垮；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支援，就不会有明显的军事胜利；而没有明显的军事胜利，就没什么人、也没什么重要的军事单位会投向台湾部队。结论之二是，美国拒绝支持台湾的特种部队计划，将使美台关系紧张；在美国不批准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仍可能采取某种袭击大陆的行动。结论之三是，万一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受到威胁，苏联几乎肯定会在必要的程度上支持该政权镇压反叛，同时趁机努力将北京的政策和离心倾向拉回苏联的轨道。[③]

白宫决策层 3 月 31 日开会，听克莱恩汇报台湾的反攻计划。由于大家都认为直率的拒绝可能引起大麻烦，讨论的焦点便转向怎样拖延应付。肯尼迪提议可以在美国为台湾准备两架 C－123 型飞机，并帮助训练驾驶这种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克莱恩认为这会令台湾方面感到满意。国务卿腊斯克提醒道：美国只是“准备”飞机，在做出进一步决定前不送往台湾。[④]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rch 15, 1962, *ibid*, pp. 195 - 196.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ice)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Washington, March 28, 1962, *ibid*, p. 200, footnote 2.

③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3 - 3 - 62), Washington, March 28, 1962, *ibid*, pp. 200 - 201。

④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March 31, 1962, *ibid*, pp. 204 - 205.

最后的决策于31日当天书面下达给克莱恩。这份肯尼迪亲自批改的训令，共有七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向台湾方面说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联合调查大陆的情况，增加对未来详细计划的相互协商"。"美国赞成试探行动，特别是联合训练、装备和督导前已批准的侦察分队范式"。授权克莱恩就"计划和准备较大规模的相机而定的秘密行动"同台湾当局保持密切联络，其规模至多一次空投二百人。根据肯尼迪的旨意，在此应强调："重要的是这种行动的准备和执行的全部责任由中国政府承担"。美方相应地为此在美国准备两架C－123飞机，并在美国培训中国机组人员。这种准备和培训要用六个月的时间，在双方共同认为行动时机成熟时，飞机将提供给台湾当局使用。肯尼迪在此亲笔加了一句："一定要理解，我们将为这个行动准备能力，但此时尚未决定实行之。"①

限制与反限制

选择拖延的办法，只能应付一时，不能避免最后的摊牌。而且还会反过来导致美国越来越深地被台湾当局"拖"入陷坑。

由于美国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帮助准备"，蒋介石只好同意把反攻的时间从原订的6月推迟到10月，也同意和美国官员合作，达成"对大陆形势的共同理解"。但他要求美国方面也同意：以10月1日为发动空降的开始日期，要联合研究空降成功后的"续进行动"方案，并根据彼时形势联合决定首次空降和续进行动的执行和时机。②

对蒋介石的反提议，美国仍坚持原定的七点原则。关于空降，只打算研究其可行性，日期要双方讨论和商定，不能由蒋指定。准备的两架飞机也要在有过硬的情报证明行动会成功时才能提供。至于"续进行动"，更不在考虑之列。听了克莱恩的传达，蒋氏父子再一次跌入失望的深渊，但口头上仍表示，愿以七点原则

① Memorandum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Washington, March 31, *ibid*, pp. 206－207. 这份训令实际上由邦迪起草，获腊斯克和哈里曼同意，肯尼迪又亲笔作了多处批改。稿子注明"不签名"。肯尼迪特别叮嘱克莱恩只能据此而谈，不能交给任何中国人。同时转交的一封肯尼迪致蒋介石的信也不签名。笔者认为这意味着一旦泄露，美方将矢口否认。

②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Washington, April 17, 1962, *ibid*, p. 218. 蒋后来抱怨美国把他原计划4、5月间就发动的反攻行动拖延下来。见 Telegra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Saigon to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McCone, Saigon, June 7, 1962, *ibid*, p. 241

作为同美国紧密研究与合作的基础。[①]

这时，老挝三方政治力量的合作局势又起波澜，美国公然向泰国增兵，引起围绕东南亚的国际局势紧张。中国南方春荒严重，涌向香港的灾民潮于5月份达到高峰。台湾当局认为形势乐观，磨刀霍霍，试图冲破美国的约束。

蒋介石请再次回美国汇报的克莱恩转告肯尼迪：形势对美国以及国民政府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双方应就行动政策和路线达成一个战略协定。鉴于大陆的形势，国民政府必须采取某些军事准备措施。台湾上层特别是军界要求乘机采取积极行动的压力十分强烈，如果蒋继续推迟反攻大陆的行动，将面临难以遏制的不满和内部反抗。他已承诺10月1日前不采取行动，但到那时候就很难再拖下去了，除非美国答应再增加军事援助，使他有理由说服将领们再等下去是有好处的。他索要的军事援助包括C－123飞机5架，B－57飞机16架，登陆艇20－25艘。他还批评许多美国官员根本不同情他的“国家利益”。他希望肯尼迪明白，以报复相威胁，以限制美援来向国民政府施压，只能适得其反。[②]

蒋介石的躁动和愤怒未能动摇美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情报部门5月间再次就中国大陆的形势做出评估，认为尽管中国陷入经济困难并存在广泛的理想幻灭和不满，但不可能发展成有组织的反抗。大陆政权拥有的军队、组织和交通网络足以粉碎任何初期的反叛。[③]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调查后，也承认涌入香港的难民的态度“反映出大陆人民不想把不满转变为政治行动或迎回中华国民政府的统治”。[④]

这与蒋介石的形势判断大相径庭。蒋断言大陆上可能发生暴动，国民党人可以掌握这种反叛，也可以通过小规模军事行动激发这种反叛。当然，台湾当局也承认，即使发生这种暴动，若没有台湾军队的大量增援和美国的最终卷入，至少给予后勤支援，也不可能反攻成功，重获对大陆的控制权。所以，尽管蒋介石不时以“采取独立行动”要挟美国，可是双方心里都明白：没有美国的援助，反攻

①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Washington, April 17, 1962, *ibid*, pp. 218－219.

②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May 17, 1962, *ibid*, pp. 227－229.

③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13－4－62), Washington, May 2, 1962, *ibid*, p. 222.

④ Telegram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at Hong Ko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ong Kong, June 22, 1962, *ibid*, pp. 272－273.

绝无成功之可能。台湾不能同美国闹翻了。[1]

美国非但不想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而且还想继续努力让他撤出惹是生非的沿海岛屿。这也是美台关系中更敏感、更有争议、也更令美国举棋不定的问题。

1962年5月，美国把对中国核试验日期的预估修订为1963年或1964年。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国务院主管官员们几乎一致认为，如果台湾或美国需要同沿海岛屿脱钩，那么就应在中国核试验之前撤离沿海岛屿。可问题在于，无论是引诱还是压迫台湾当局撤离沿海岛屿，美国都难以做到。因为，引诱的代价是美国必须坚定承诺支持台湾反攻大陆，还要有充分的支持表现，才能使台湾当局相信撤出守岛重兵是为了使军队获得机动，可以用于反攻大陆。但美国政府显然不准备给予这种承诺。压迫的办法是明确否定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要求，停止军事援助，废除共同防御条约等等。施加这种极端的压力是相当冒险的，台湾当局绝望之极也可能同大陆拼死一搏，或是蒋介石在压力下倒台，台湾陷入政治混乱，甚至可能最终导致共产党占领台湾。这也是美国不肯付出的代价。此时美台关系因蒋介石坚持要发动反攻而处于紧张而微妙的状态，美国只能耐心而有分寸地进行周旋，不能再节外生枝地提出一个撤离沿海岛屿的问题来。除非是下决心不惜美台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同蒋介石的反攻计划摊牌。[2]

美国军方的主要倾向，是不赞成弃守沿海岛屿，力主助蒋坚守，而且论证这是守得住的。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在最终做出谋求台湾当局撤离沿海岛屿的决策之前，应充分考虑他们关于这些岛屿的军事重要性和可防性的论断。他们认为：沿海岛屿与台澎防御密切相关，构成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防御海链上的重要一环。这些岛屿封锁了上海至广州之间的两个最重要的口岸（厦门与福州），使中共不能从那里发起对台澎的进攻。它们还为台澎提供了早期预警、监视侦察、心理作战的基地。如果美中发生战争，沿海岛屿可能是对华南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宝贵财富。从这种地方撤退，军事上是荒谬的。假如台湾当局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主要的岛屿是守得住的。若无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则不能够在任何较长时期内顶

---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Washington, May 29, 1962, *ibid*, pp. 233 - 234.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McGhee), Washington, May 29, 1962, *ibid*, pp. 237 - 238.

住中共的决定性进攻。他们的结论是，沿海岛屿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政治、心理价值。保住这些岛屿，连同保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的地位，将继续构成中共占领国民党全部领土的严重障碍。在这里失败，将大大损害美国的威信，降低对美国有决心在各地坚定防御“共产主义进犯”的信任度。①

而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则不认为这些小岛有那么大的战略价值。他们相信中共如果不惜代价，总是可以夺占这几个岛的。况且一旦中国有了渡过辽阔的海峡，攻打台湾的能力，就不必同这几个远离台湾的小岛纠缠，可以将那里的十万蒋军置之不顾，直接渡海作战。由此看来，在这些贴近大陆，远离台湾的小岛上派驻这么多军队，简直是一种浪费。他们主张尽量劝诱，并在必要时辅以压力，让蒋介石撤出这些小岛。这些意见，反映在1962年3月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关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文件稿中。在收到军方上述反对撤离沿海岛屿的政策意见后，已担任副国务卿的马吉认为目前还不是讨论美国对沿海岛屿长远政策的时机，收回了这个文件稿。②

1962年6月22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在其著名的以“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中国大陆的政策建议中，再次主张用美国的影响和援助来促进台湾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淡化国共内战。并将美国的威望同沿海岛屿防御脱钩，说服台湾从那里撤军或只作为有少量驻军的前哨阵地。③

肯尼迪本人对沿海岛屿的看法，已经在大选中流露过。直至他横遭不测中断任期，也没来得及批准过任何对华指导方针性的文件。

为“春热”做“冷敷”

台湾当局继续以攻为守，5月23日又向美国官员提交一份有关反攻行动第二阶段的方案大纲。根据尚不完全的透露，其中拟议的反攻步骤有：在福建和广东沿海实施各种规模的突击空降和登陆，以诱发大陆民间的“反抗运动”；在若干地点实行登陆后，用常规作战为民间“反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点；将台

① Letter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itz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McGhee), June 21, 1962, *ibid*, pp. 264 – 266.

② *Ibid.*

③ Editorial Note, *ibid*, p. 271.

湾的部队深入推进到福建、广东内地等。[1]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小希尔斯曼针对台湾的反攻计划，提出四种可供美国选择的对策：默许、直率拒绝、权宜应付、有礼貌地拖延。美国的主要顾虑，一是判定蒋之反攻毫无胜算；二是担心给美国招致政治尴尬和战争升级的风险，及整个西方阵营在国际上的被动；三是担心促使苏联支持中国大陆，两个正在分裂的共产党巨人重归于好；四是怕中共在东南亚特别是老挝实行反击，使美国在那里重陷战争泥潭。肯尼迪很想对蒋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不支持你反攻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但是，强行阻止蒋介石的行动，美国没有必成之把握，反怕把蒋惹恼了，会不顾一切地单方面发动孤注一掷的自杀性反攻，把美国拖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局势中去。况且，美国国内尚有强大的亲台政治势力，牵制着政府的对台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看出，蒋在美国不支持反攻的情况下，也许会暂不采取单方面行动。可以在获得美国支持台湾政权并增强其军力的保证下，继续等待形势变化。而国际和大陆都存在着让蒋抱有希望的变化因素。这才是美国最希望诱导蒋做出的选择。总之，美国要避免明确拒绝最终援助台湾反攻大陆，使蒋介石方面一直抱着获得支持的希望而等待下去，当然美国为此也将承受蒋方不断施加的压力，美台关系将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紧张限度内”。[2]

令人奇怪的是，明明情报不足，没有胜算，蒋介石却仍然沉迷于反攻的迷梦中，坚持要求美国援助，这是怎么回事？他真的相信反攻会成功吗？柯克向白宫指出，这不过是想以此把美国拖入进犯大陆的计划而已。肯尼迪等人考虑再三，决心继续给蒋介石的“春热”（这是柯克用以形容蒋头脑发热的词）做冷敷。指出他的大陆情报既不充分，也不可靠。情况不明，何以言战？继而冠冕堂皇地提出，需要由美蒋双方加强情报合作，待掌握充分和可靠的情报后，再研究怎样作战。5月29日肯尼迪召集的白宫会议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准备一个“特殊行动的单子”，以求获得更多关于大陆的情报，至于蒋方提出的增援运输机（2架C－123）、轰炸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uly 27, 1962, *ibid*, pp. 294－295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Washington, May 29, 1962, *ibid*, pp. 234, 237;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McGhee), Washington, May 29, 1962, *ibid*, pp. 237－238;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June 18, 1962, *ibid*, pp. 246－247.

机（16 架 B－57）、登陆艇（7 万－10 万吨），则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以此压下蒋介石迫不及待的行动计划。[①]

受命拟制“特殊行动的单子”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 6 月初顺访台北，同蒋介石等人围绕台湾各种形式的作战意图进行会谈。蒋试图把发动两三百人的空降，划在必须双方协商并获美国同意的“正式军事行动”之外。麦康坚不让步。蒋只好答应这种规模的行动也必须经美国同意，但忿忿地说自己设想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摆脱被强加的各种限制，领导一个“独立的革命运动”。[②]

肯尼迪听麦康汇报了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后，惊讶地问：如果我们对他直话直说，美国不支持他任何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他又能怎么样呢？在场者都认为蒋会单干。有人指出蒋相信苏联不会干涉他在长江以南的军事行动。肯尼迪沉思了一下，指出苏联空军可能加入中共作战。麦康建议美国政府可以开始聚集空投和登陆器材，但要把这些东西控制在自己手里。腊斯克未置可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认为，在国民党的情报足以表明登陆有机会成功之前，不应聚集登陆器材。[③]

就在美国煞费心机地拖延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并且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严峻反应迫使蒋介石从“春热”中清醒一些。

大陆军民严阵以待

60 年代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日益险恶。印度对华从友好转向敌对，在边界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中苏关系从意识形态分歧走向国家关系紧张，1962 年 4 月苏联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地区策动 6 万多居民逃亡。东南亚局势忽弛忽张，东南沿海战云密布。毛泽东开始改变 50 年代提出的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战争可能打不起来的看法，转而强调世界战争早晚要爆发，不可避免。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集团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实行反攻的企图已有警觉，判断台湾准备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闽浙结合部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从 5 月中旬就

①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May 29, 1962, *ibid*, pp. 239－240.

② Telegra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Saigon to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McCone, Saigon, June 7, 1962, *ibid*, pp. 241－244.

③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June 18, 1962, *ibid*, pp. 246－247.

开始做军事上的应急准备。

5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紧急召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布置修订两年前中央军委拟制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29日毛泽东再次召见罗瑞卿，令全军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强战备。30日，以刘伯承、徐向前为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开会，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林彪、陈毅也在会上讲话。会后，总参作战部用保密电话向上海的罗瑞卿汇报会议情况，汇报持续了四五个小时，用坏了两部保密电话。31日，罗瑞卿赶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敌人一突上来对我们很不利。今年他要来不让他上来。从连云港到香港，统统不让他上来。还要准备第二手，防止敌人突破，防止敌人空降，在我中心地区占领一个城市。毛泽东之所以决定这一年不采取放国民党军进大陆来打的战略，是感到国内情况还没准备好，明年则看情况再说。他甚至想最好是不战而令敌知难而退。指示通过政治攻势，警告蒋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南下部队到达后沿海地区后可以公开行动，叫蒋介石知道，以破坏他的进攻，推迟他的行动。[①]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6月1日回到上海，向华东地区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备战动员。接着又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嵊泗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传达和落实毛泽东关于东南沿海备战问题的指示。6月4日赶回北京。5日向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汇报了毛泽东的备战指示。5日至8日召开三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9日至12日召开作战会议，做出军事上的具体部署。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各军区入闽部队根据部署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各部队都是夜间从驻地出发，乘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都严禁开门或下车，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部队则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至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指定地区部署完毕。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②]

---

① 总参谋部编写组，《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68－370；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页130—133。

② 《罗瑞卿传》，页371—2；红色家族档案》，页133—134。

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要看美国支持不支持。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罗瑞卿6月初在总参谋部办公室向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介绍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状况，并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争论。周恩来命王炳南立即返回华沙，尽快通过会谈了解美国的态度。[①]

王炳南赶回华沙，立即约卡伯特6月15日见面。可是，由于国内南方大雨，冲断了一些重要桥梁，向福建前线调集兵力受阻，王大使又奉紧急电令，称病不出，推迟会见。22日才再度约卡伯特次日会面。这期间美方的态度已趋明朗。[②]

美国的危机处理

尚未等到沿海三军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故意“示形”，美国情报部门6月中旬便发觉了中共军队的大调动，初步判断台湾对面已经调集的兵力用美军的标准计算相当于7个师，可能还会再加入5个师，这是“自韩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震惊之余，开始紧张地研判中共调兵的意图：威慑国民党人不敢进攻大陆？制造一次新的沿海岛屿危机？袭取金门、马祖？无论如何，此举把美台利益间的矛盾冲突挑上了台面，美国随时面临卷入台海战争的危险。要不要协防沿海岛屿？要不要支持“反攻大陆”？国务院情报局长小希尔斯曼指出，中共有相当多的刺激手段来激化美台关系，而蒋介石最优先的目标又向来是要把美国卷入对大陆的战争。美国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预防或干预局势的进一步发展。[③]

肯尼迪急忙于6月19日召集军事顾问泰勒、国安助理邦迪以及彭威廉、麦康等会商台海情势。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也立即分别向台湾当局发出警告：在此形势下不要以任何官方的言论或行动给共产党提供进攻的口实。台湾当局在中共重兵云集的态势面前，也收敛起“反攻”的气焰。陈诚6月22日向美国代表保证：

---

①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3月，第86—87页。据王炳南回忆是5月底到总参听罗瑞卿的介绍。但据《罗瑞卿传》，罗5月下旬一直在上海杭州，6月4日以后才回到北京。

②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8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rsaw, June 23,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p. 273.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Washington, June 18,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247－249; Record of Meeting, Washington, June 20, 1962, *ibid*, p. 251, ft. 1.

台湾当局将很谨慎地行事，不给中共以任何进攻借口。他也弄不清中共的意图是攻还是守，反促请美国来和台湾当局共同提高警惕，准备对付“侵略行为”。①

6月20日再次召开的白宫高层会议，对中共大军欲攻欲守捉摸不透，争执不下。麦康认为很可能突袭金门。麦克纳马拉不相信会有这种进攻。他批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一直很糟糕，建议把预定返航美国的第四航母编队留在太平洋，在靠近台湾的海域部署航空母舰，增派两架U-2高空侦察机到台湾，同台湾已有的两架U-2飞机及F-101飞机协力扩大侦察，争取弄清情况。肯尼迪最担心中共发动进攻，所以除暂不增派U-2飞机到台之外，批准了麦克纳马拉的全部建议。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肯尼迪提议向苏联和中共发出警告。最后决定通过苏联、英国和中美大使会谈三条渠道知会中共：美国要实际上制止蒋，中共也不得进攻。肯尼迪还下令通过选定的新闻机构，透露美国已知中共麇兵的情报，向中共示警，并探测中方的反应。②

在中共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美国要不要表明自己对沿海岛屿的立场？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认为这时不宜做出决定，因为若决定不防御沿海岛屿，就会鼓励中共攻占这些岛屿，减少苏联影响和制约中共的可能性，恶化美台关系。若决定防御沿海岛屿，则可能使台湾当局进一步试图把美国更深地卷入战争，并使中苏关系好转。该智囊机构建议：继续保持美国意图上的模糊，却摆出足以让中共理解为美国准备协防的军事姿态，同时又不给台湾当局任何保证，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不利，使美国处于灵活机动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美国长期奉行的“刻意模糊”的策略。③

万一中国沿海打了起来，美国应否出兵？怎样才算师出有名？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咨询之下向中央情报局指出，同1958年的危机相比，这次中共没有把集结大军同解放台湾联系起来进行宣传，所以现总统若想援引国会授权案，命令美军

---

①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June 19, 1962, *ibid*, pp. 249 - 250;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June 19, 1962, *ibid*, pp. 250 - 251.

② Record of Meeting,, Washington, June 20, 1962, *ibid*, pp. 251 - 255;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Gettsburg, June 21, 1962, *ibid*, pp. 255 - 257;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3 - 5/1 - 62), Washington, July 5, 1962, *ibid*, pp. 289 - 291.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Washington, June 21, 1962, *ibid*, pp. 260 - 263.

参与沿海岛屿的防御，比较困难。如果中共空袭台湾，或侦察飞行距台湾太近，就可以成为总统援引国会授权令美军介入的根据。至于这些岛屿的军事价值，艾森豪威尔认为只具有防御价值，不能作为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①

应肯尼迪的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 24 日答复了泰勒将军询问的关于防御沿海岛屿的七个问题。其中提出外岛防御可能要求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应做出相应准备。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致函肯尼迪表示反对，认为有美国的支持，不用核武器就能有效地防御这些海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准备提议为这种目的使用核武器。他的应急对策之一是轰炸大陆沿海的飞机场。②

经过这番紧张的研讨，美国政府决定立即通过以下几个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传达明确的信息，缓解台湾海峡的局势：

代理国务卿鲍尔 6 月 22 日上午召见英国大使，希望尽快转告北京：美台条约及其换文约定台湾当局发动任何进攻前都需获得美国的同意，而美国政府在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攻大陆。但中共若进攻沿海岛屿，也有把美国军队卷入敌对行动的严重风险。美国认为借助英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转达这个信息，能比华沙渠道更快地引起中国的反应，北京也可能更愿意同英国人坦率地谈这个问题。由于英国代办当时没有在北京，美国改请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伦敦代办转达。③

当日下午 6 时，哈里曼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到家中小酌，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的意图。多勃雷宁表示并不知情。哈里曼解释美国在目前形势下无意鼓励或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根据美台协定，未经充分协商并事先获得美方同意，国民党人不能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另一方面，中共如果麇兵攻打金门等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多勃雷宁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地问："你们要防御沿海岛屿?" 哈里曼答："为什么不?" "可是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啊"。哈里曼表示，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进攻不会袖手旁观。他希望苏方设法约束中共可能发动的进攻。④

---

①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Gettsburg, June 21, 1962, *ibid*, pp. 256 – 257.

② Record of Meeting, June 20, 1962, *ibid*, p. 255;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to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June 25, 1962, *ibid*, p. 280.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Washington, June 22, 1962, p. 27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London, June 25, 1962, *ibid*, p. 279.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ne 22, 1962, *ibid*, pp. 267 – 269.

6月23日下午，王炳南大使邀请卡伯特“茶叙”。谈过东南亚局势后，切入正题。王炳南指出蒋介石集团正在准备侵犯大陆，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他警告说：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宣称自己奉命声明：美国政府在现存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条约，未经美国同意，台湾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对于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如系防御之意，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有进攻意图，将存在美军卷入的严重危险。王炳南要求他把最后这句话重述一遍。卡伯特重述后再次申明：美方无意允诺或支持在任何地方侵犯中方。王炳南历数美国多年来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军事援助，质问：若无美国支持，蒋怎敢进犯？如发生进犯，美国当然要负责任。在王大使的追问下，卡伯特保证美国会从言和行两方面澄清自己与进犯没有干系，并将谋求和平。据王炳南二十多年后回忆，卡伯特甚至说过，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据卡伯特当天的报告，他要求中方保证不进攻台湾，王炳南长时间考虑后，回答说并不存在中共进攻的问题，问题是台湾正在组织进犯大陆。卡伯特对未能达成相互保证表示遗憾。王急忙补充说：现在并未面临中方谋求武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进犯，整个情况的性质就变了。[①]

这次会谈应该说使双方都摸了底，两位大使立即把情况电告国内，对两国政府了解对方意图，做出理智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机关报25日发表社论，号召人民警惕美蒋窜犯，申明中国自卫立场。[②]

美国立即注意到中国表达的防御立场。它的高空侦察也证明中国兵力的部署不像要采取进攻行动，没有调集渡海船只。[③]

美国新闻界6月26日披露了中美大使在华沙的私下会谈。肯尼迪本人则在27

---

① 参见《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87-89；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rsaw, June 23,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273-275。

② 社论：《美国侵略者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62年6月25日第1版。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London, June 24,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276-27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London, June 25, 1962, *ibid*, pp. 278-280.

日的新闻会上声明："我们的基本立场一贯是反对在那一地区使用武力"。[①]

他还希望驻台使馆向蒋介石转达他本人的"强烈感觉"："最为重要的是美台双方都要避免显得此时正在酝酿侵犯大陆的任何行动"，"此时入侵显然不会成功，而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认为共产党人是侵略者"。[②]

柯克7月4日向蒋介石转达了肯尼迪这个"强烈感觉"。蒋保证不在金马地区向中共发动任何进攻，但追问报上披露的美国在华沙向中共保证不支持国民政府返回大陆的消息是否属实。柯克谎称消息不正确，美国只是一如既往地要求共同放弃武力。蒋有意提起赫鲁晓夫7月2日关于苏联将在台湾地区支持中共的声明，愤然指出华沙密谈的消息和赫鲁晓夫的声明，两相对比，给台湾的士气民心造成多么不利的影响。但在柯克的叮问下，蒋不得不再次保证继续同美国协商，不单方面行动。[③]

中国备战谋和

中共这次在东南沿海集结重兵，是为了防御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进犯，并没有攻占沿海岛屿或"制造"台海危机的意图。美国很快判明了这一点，下令第四航母编队返航。[④]

蒋介石集团迫于形势，只得暂时搁置反攻计划。但是，仍然心有未甘地希望获得美国的金口玉言，允诺将来支持他们反攻大陆。[⑤]

---

① Editorial Note, *ibid*, pp. 283 – 284.

②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June 28, 1962, *ibid*, pp. 285.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uly 4, 1962, *ibid*, pp. 285 – 287.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2日在电视广播演说中谈到：四年之前，在1958年，蒋介石集团勾结美国黩武主义者在台湾海峡曾经策划了挑衅性阴谋。苏联政府当时对玩火爱好者提出了严重警告，声明苏联完全站在兄弟的伟大中国这一边。现在我们再一次声明：谁胆敢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谁就必将受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苏联各族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毁灭性回击。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要有任何怀疑吧。新华社：《赫鲁晓夫谴责美国鼓励蒋匪帮准备冒险，谁胆敢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谁就必将受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苏联各族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毁灭性回击》，《人民日报》1962年7月4日第1版。

④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3 – 5/1 – 62), Washington, July 5, 1962,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289 – 291; Record of Meeting, Washington, June 20, 1962, *ibid*, p. 253, ft. 6.

⑤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uly 5, 1962,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287 – 289.

7月5日，蒋介石再次向柯克承诺，他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一定与美国充分协调政策。这位一度以鱼死网破的架势要挟美国的冒险分子，此时显得对美国领导人格外体贴，说是知道肯尼迪总统有很多难题要处理，他当然不会再做任何事给总统增加难题。然而，话锋一转，他又不动声色地提了一个难题：他的人民和军队的信心与士气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光复大陆”的憧憬中，而维持这种信心与士气是极为重要的，希望柯克帮他不仅保持而且增强军队的士气。柯克一眼就看穿：这是要以台湾的“士气”做借口，一步步引诱美国公开支持反攻大陆。[①]

台北驻华盛顿的“使节”蒋廷黻也向腊斯克提出，希望美国在中国大陆情况有变时，对台湾当局的行动采取“多少灵活一点的态度”。腊斯克对此毫不含糊地申明：“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采取灵活立场”。[②]

中国对美国的表态，虽然在舆论宣传上表示强烈的不信任，继续猛烈抨击美蒋合谋反攻大陆，但私下里还是予以认可。陈毅7月中旬在日内瓦向英国代表团团长麦克唐纳表示：美国向中国驻华沙大使做出的既不支持也不鼓励蒋介石进攻大陆的保证，受到北京政府的赞赏。北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进步，但是还不够，美国应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作为一种回应，中国不进攻金门、马祖，也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尽管中国能够这样做。台湾问题已经悬而未决十三年，中国人有耐心再等十三年。陈毅还表示，理解美国政府不能不顾及国会等处的敌视中国的游说势力和利益集团，以及美国民间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强烈反感。中国方面愿意谅解和忍耐。由于英国同美国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肯定陈毅这番话是有意说给美国听的，实际上，谈话报告马上就传给了腊斯克和肯尼迪。[③]

中国继续向美国传递信息。麦克唐纳11月初访华后，向美国通报了他通过与周恩来、陈毅的长时间谈话获得的印象。他了解到中共愿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安排中美学者记者交流，台湾当局与中共之间存在秘密接触，中共政治解决的方针是不“接管”台湾，允许国民党作为少数派政治团体存在等等。周恩来表示有耐

---

①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July 7, 1962, *ibid*, pp. 291 - 292.

②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3 - 5/1 - 62), Washington, July 5, 1962, *ibid*, pp. 289 - 291;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July 28, 1962, *ibid*, pp. 296 - 298.

③ Telegram from the Consulate at Singapor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ingapore, November 13, 1962, *ibid*, pp. 322 - 325.

心等待，不打算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无意进攻台湾。[1]

总之，这次中国调兵，促使美国以各种方式将政策底线向各方摊了牌。中国也多渠道地向美国表达了对台政策的底线。台海之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一场危机，就这样在折冲樽俎之下缓解了。

美国纵蒋窜扰大陆

蒋介石的反攻日程虽因美国的掣肘而被迫推迟，又因中共的严阵以待而有所收敛，却顽固地不肯轻言放弃。自1949年退守台湾以来，"反攻复国"的目标已经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精神支柱，并赖以维系孤岛上的人心士气。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准备，使其自吹自擂的"反攻"犹如满弓之箭，势在必发。大陆暂时面临的经济政治困难，在苦撑待变的蒋介石眼中，无异于难得的良机。尽管再不敢孤注一掷，贸然发动全面进犯，但以小规模的侦袭窜扰，引发大陆民间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动乱，这种幻想总像幽灵一般游荡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他继续要求松缰放绑，力图拖美下水支持他对大陆沿海的窜扰。美国虽然已经得知中国将尽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经不住蒋的死缠硬磨，终于准其发动严格限于20人左右的小股侦袭窜扰，绝不允许采取大规模行动。于是，东南沿海的局势转为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纵容下进行小股袭扰，大陆军民反袭扰的斗争。

8月初，蒋介石再次通过柯克，要求美国给他提供登陆艇和用于轰炸、空降的飞机，一次空投20人到大陆搜集情报。白宫考虑再三，担心继续敷衍或坦率拒绝，都会引起蒋的不利反应，决定可以先把两架空投用的C-123运输机送往台湾，却拖住轰炸机和登陆艇的供货。哈里曼助理国务卿8月8日指示柯克，可以参与研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民变蜂起时实行水陆进攻的能力，但不得参与研究台湾面临中共攻打沿海岛屿时的反攻大陆问题。美国的方针是万一中共发动这种进攻，应尽量把敌对冲突限制在当地，并努力平息之。[2]

肯尼迪8月22日批准了国民党实行不超过20人的空降行动。[3]

---

① Message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to the Ambassado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Kirk), Washington, August 8, 1962, *ibid*, pp. 301-302.

② *Ibid*, p. 302.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August 23, 1962, *ibid*, pp. 305-306.

接着，国务院也改变了“努力防止（国民党人）从沿海岛屿发难”的政策，同意给台湾从美国采购橡皮艇发放许可证，理由是这些小艇不会使台湾单方面行动的能力有重大增长，反正台湾也能从日本等国购得，等等。[①]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美国的这点让步，希望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9月6日，他在阳明山官邸同柯克进行了一场约束与反约束激烈辩论。柯克一端出缺乏过硬情报这个老盾牌，蒋介石立即反唇相讥：除非对大陆采取行动，恐怕很难有美国政府认为的那种过硬的情报。台湾当局有许多未向美国透露的情报来源，即使透露，美国也未必承认它们的价值。柯克指出美国政府一直在密切跟进国民政府的小股空降计划，打算一俟两架C－123飞机和机组人员准备就绪，就送来台湾。但行动的目标仅限于侦探性质。蒋立即提出，一旦探测到对方的弱点，就应以大批空降夺占一两个守备薄弱的城市，以唤起大量民众反叛。柯克提醒他，美国政府仍然觉得最好是把行动局限于小股空降，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向台湾提供轰炸机和登陆艇。蒋介石责问：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起义，美国是什么态度？柯克说将视情况而定，不能预言。蒋于是愤懑地表示怀疑1954年的条约是否依然适用，目前形势下死守条约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的政府必须重新考虑条约。柯克话里藏针地反问：“难道蒋总统提议的是废除条约，从而想让美国的军事和其他援助停下来”？蒋也不甘示弱地说：那就由美国政府看着办吧。但他接着还是给美国出了一个主意，即宣布反攻大陆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以此逃避美国负有阻止台湾进攻的责任。柯克坚称肯尼迪目前不能同意台湾当局的计划和希望。但柯克提议美台应通过两个组织来加强具体合作，一个是处理秘密情报的联合委员会，一个是研究公开作战的“420委员会”。后者发展为代号“蓝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②]

美国修订军援目标

在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后，即将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访问台湾，并到金门视察。他9月8日同蒋介石会谈一个小时。蒋对美国不肯援助他的宏大计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September 6, 1962, *ibid*, pp. 306－3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ruary 4, 1963, *ibid*, pp. 342－344.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September 6, 1962, *ibid*, p. 312, ft. 2.

划深感遗憾，认为美国怕激起赫鲁晓夫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试图说服美国相信，只要把反攻限定在黄河以南，中苏间的尖锐矛盾将使赫鲁晓夫不会援助毛泽东。泰勒则以在古巴的登陆失败为例，让这位过分乐观的朋友引以为戒。[①]

事后，泰勒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承认，美国允许台湾保持一个适应进攻大陆需要的军力结构，又帮助弥补预算中的亏空，当然就使蒋有理由保持反攻的希望。原来美国援助台湾发展军事力量的目标之一是使其“在远东发生全面战争时，能广泛援助美军”。这个目标是个无底洞，它可以证明维持几乎任何规模的台湾军力结构都是合理的。每年高达1亿6000万美元的军援计划已经能够适应防御台澎金马的合理需要。为了堵住上述的无底洞，泰勒建议把美国军援目标修订为使台湾军队能够：（1）维护内部安全。（2）用美国同意的援助保卫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3）保持三个师的远征力量，以供用于西太平洋其他地区。按照这个目标，台湾的陆军将减少到至多15个师，但以地对空、地对地导弹和预警飞机加强空防海防，并把大陆机场置于台湾导弹的瞄准镜中。他还主张更坦率地向蒋说清楚，对于支持他反攻大陆的要求，美国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②]

美国政策制订者立即表明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不是什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11月30日提出旨在“以压促变”的对华政策文件，特别提到要在坚持围堵中国，维护台湾政权的同时，“对北平甚至我们友邦铤而走险的越界行动保持格外警惕”。还具体建议：美国和国民党人都要避免进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将冒损失惨重的风险，为中共政权提供有效的凝聚力，并招来中共的反攻。“但是，我们应支持国民党人不断进行甚至大量增加小规模的试探和秘密军事行动，这对搜集情报可能有用，特别是可以探测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公众的情绪，也可能使该政权失衡”[③]

扩大行动再度碰壁

由于美国一直在原则上允许对中国大陆进行小规模试探性的军事活动，蒋介

① Paper Prepared by the President's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Taylor), Honolulu, September 20, 1962, *ibid*, pp. 314－317.

②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Washington, November 30, 1962, *ibid*, pp. 328, 330.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1962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0日第1版。《罗瑞卿传》，第373—376页。

石集团在大规模军事冒险暂不可行之下，从 1962 年 10 月 1 日开始，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了小打小闹的捣乱和窜扰，企图激起民变，再伺机扩大规模。

大陆军民洞悉机先，早有准备，密切配合，从当年 10 月到 12 月，先后在广东沿海地区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公布战果：总计歼灭美蒋武装特务 172 人，其中有 7 个特务纵队司令，14 个副司令，1 个队长、2 个副队长，4 个正副登陆指挥官。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 3 艘。缴获一批美制通讯器材和枪支弹药及伪造的人民币、解放军军服等等。[①]

台湾的报纸也承认已有 172 名游击战士不幸“成仁”，但还有其他游击战士继续战斗在大陆上。[②]

中国的报道强调美国支持蒋介石窜犯的作用，重申陈毅副总理兼外长 7 月间指出的：“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众目睽睽，美国政府要想逃避这个责任，是绝对办不到的。”[③]

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家谴责美国支持的侵略行为。美国深感处境狼狈。柯克直奔沈昌焕家中，向卧病在床这位“外长”提出责难。转告他：“肯尼迪总统强烈地认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必须没有丝毫可被指责为侵略性的行动”。沈承认已获悉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小规模窜扰的结果令人失望。[④]

但是蒋介石继续沉迷于激发大陆人民群起反共的幻想中，进入 1963 年后，不仅不放弃小股窜扰，而且加紧准备大举反攻，建造机械化登陆器材，训练伞兵，组建空降师等。据美国估计，台湾那时的装备，可以海运三万二千部队登陆，空运五千到一万人进行一次迅速的空降，而美方难以事先察觉和制止。[⑤]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anuary 10, 1963,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337, ft. 1.

② 社论：《祝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人民日报》1962 年 12 月 30 日第 1 版。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anuary 10, 1963,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337 – 33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ruary 4, 1963, *ibid*, pp. 345.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ruary 4, 1963, *ibid*, pp. 342; 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Kirk) to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March 29, 1963, *ibid*, p. 356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 4, 1963, *ibid*, pp. 342 – 34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ruary 4, 1963, *ibid*, pp. 345 – 346.

柯克1月16日向蒋介石递交了美方对其反攻方案的研究结论，认为蒋没有力量满足渡海登陆、空中掩护、后勤补给等等进犯大陆的需要，再度否定了蒋的反攻计划。固执的老蒋满心不悦，故伎重演。他乘柯克1月19日返美动手术之机，绕过这位不招人喜欢的大使，直接会见蓝狮委员会美国委员、防台美军司令迈尔逊。拿出一份《国军在大陆登陆的重要指导原则》。其中1至4条讲登陆兵力规模，可供登陆的地点，第5条提出不应把美国卷进来，第6条声称："这种军事行动系中国内政，是一个独立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所以其他任何国家皆无须插手"。哈里曼闻讯即令驻台代办高立夫1月22日向台湾当局澄清：美国不同意修改1954年条约和换文，蒋所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必须按照条约规定，经双方一致同意。[①]

回国动手术的柯克2月4日接连向邦迪和肯尼迪汇报了台湾形势，指出由于蒋介石集团紧锣密鼓地准备反攻，美国正面临一个"春热"期。蒋军自行登陆后，很可能陷入困境，必然求助于美国，美国届时无论想不想干，都得被牵着干。另一方面，中共可能实行空中反击，轰炸渡海的敌军和台湾港口，美国也面临是否依照美台条约投入战斗的难题。美军一旦和北京开战，可能就意味着走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柯克的情报来源使他坚信，蒋介石一伙总是千方百计要把美国卷入战争。这位在太平洋战区驰骋多年的老舰队司令，向年轻的前海军上尉肯尼迪讲述了战后美蒋之间的种种龃龉。指出蒋从来不反省自己在战略、民心等方面的失误，只知埋怨美国援助不力。他若有朝一日返回大陆，也不会感谢美国，只会没完没了地给美国找麻烦。他建议美国重新考虑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台湾是否对美国利益必不可少？[②]

考虑到柯克的意见，肯尼迪2月15日致信蒋介石，委婉而明确地告诫他不要试图绕过大使，另寻渠道同美国总统沟通。"请把柯克大使当作我最亲密的个人代表，异乎寻常地具有代表我坦率交流看法的资格"。信中还说已授权同台湾讨论一个新的建议。据尚未完全解密的相关文件透露，建议是把有争议的那三架C－123飞机送到台湾，但仍由美国掌握，仅供台湾机组人员用于南越，只有在一致同意

---

① *Ibid*, pp. 342－346; Message From the Char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lough)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Taipei, March 2, 1963, *ibid*, pp. 352－353.

②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Washington, Feb. 15, 1963, *ibid*, p. 347, ft. 1; Message From the Char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lough)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Taipei, March 2, 1963, *ibid*, pp. 352.

的情况下，才能用于大陆行动。[①]

对如此有限的慷慨，蒋介石报以模棱两可的口信：无意规避条约和相关协议，但应在条约范围内对解决大陆问题有所作为。据高立夫代办判断，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美国不要事先反对他反攻大陆，一旦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宣布撒手不管，拒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高立夫的结论是，“目前情况下给蒋更大的行动自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哈里曼对此完全同意。[②]

得知美国这一态度后，蒋介石3月5日亲自致函肯尼迪，辩称大陆日益增长的不满、毛泽东——赫鲁晓夫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造成空前的机会。促请美国给他充分支持。196 肯尼迪4月11日回信阐明：美国只能帮助台湾建设和防卫，“根据我们对形势的现行估计，不能同意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③]

美国之所以如此，中苏同盟关系仍是其顾虑的要素之一。直到7月底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时，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仍认为虽然中苏分歧很大，但未必很深，也不见得会最后分裂。哈里曼也不认为中苏两国会分裂，如果蒋介石在大陆登陆，苏联会全力支持中共。[④]

原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曾向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代理副国务卿约翰逊探问：万一台湾不经美国同意就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会做什么反应？约翰逊毫不含糊地回答：将引起毫不留情的最严厉的不利反应——如果台湾当局无视自己的条约责任，美方的条约责任是否还有效就成问题了。台湾应考虑它到底愿不愿意同美国保持条约关系。[⑤]

就这样，台湾试图让美国默许其扩大行动规模的努力又一次碰了壁。

蒋经国访美无功而返

在美国有限度的支持下，蒋介石不能大规模进犯大陆，又不甘心看着中共顺

---

① Message From the Char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lough)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Taipei, March 2, 1963, *ibid*, pp. 352 - 353.

②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April 11, 1961, *ibid*, p. 359, ft. 1.

③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Washington, April 11, 1963, *ibid*, pp. 359 - 360.

④ Summary Record of the 51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July 31, 1963, *ibid*, pp. 373 - 374.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15, 1963, *ibid*, pp. 361 - 362.

利渡过目前的难关。不能大动就小动，他要继续以小股窜扰，外加政治战、心理战，在大陆引发动乱，再趁机扩大军事行动。[①]

美国则力求把台湾的行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规模上，处处防备蒋逐步升级。

由于柯克患病，肯尼迪任命赖特将军接任。[②]

赖特 1963 年 6 月底到达台北，很快就促成蒋经国访美。这是双方都希望沟通战略的一个机会。

蒋经国 9 月 6 日至 13 日访问华盛顿。先会见了已经升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老朋友克莱恩，转达蒋介石的新战略：一年半内不进行军事进攻，除非大陆发生叛乱。希望美国支持国民党的秘密作战和大规模增加小股渗透活动。[③]

蒋经国随后会见了哈里曼和小希尔斯曼等政要。在会见邦迪时，他再次转达了乃父的乐观估计：鉴于美苏关系的缓和，如果台湾现在采取行动，苏联不会援助中共。台湾承认大陆问题要靠政治而不是军事来解决，但政治的定义包括了政治战、心理战、外交行动、沿海窜扰、小组空投等等。台湾当局打算分三个阶段，各以 6 个月为期，把海上窜扰和空投活动从小规模提到中规模，再到大规模。蒋经国还神秘地宣称，台湾已经侦察到大陆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原子设施所在地，希望与美国共同设法消除之。[④]

邦迪答复：美国把削弱中共政权特别是核发展的措施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将最慎重地考察进行的可能性。但他强调，美国政府厌恶触发重大冲突，若大举进攻中国大陆，将使中苏重归于好。美国远大利益在于让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成效。[⑤]

9 月 11 日，蒋经国会见肯尼迪，向他递交了蒋介石的信件和两个附录，内容是要求美国支持空投突袭行动，提供海空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蒋经国具体说明，台湾想在未来一年至一年半中，使用尚未动用的 4 架 C－123，再要 5 架 C－130 运

---

①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Washington, April 11, 1963, *ibid*, pp. 35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15, 1963, *ibid*, pp. 361; Draft Minutes, Washington, September 10, 1963, *ibid*, pp. 383 – 38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September 11, 1963, *ibid*, pp. 386 – 388, 390.

②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Washington, April 11, 1963, *ibid*, pp. 360.

③ Draft Minutes, Washington, September 10, 1963, *ibid*, pp. 383, ft. 1.

④ *Ibid*, pp. 383 – 384.

⑤ *Ibid*, p. 385.

输机，还需要增加登陆舰，将突袭规模增到每批500人。时机成熟时，占领长江以南的一省或数省。肯尼迪质问：鉴于台湾当局最近小股窜扰的失败，有什么根据相信空投100到300人或登陆300到500人会成功？蒋经国绕山绕水地从禁核条约扯到中苏论战，再扯到不能坐视中共走出困境，要趁机骚扰破坏。但在肯尼迪的叮问下，只好承认前一段的窜扰不太成功，伤亡率达85%。肯尼迪坦率指出，看不出这些骚扰给大陆政权造成了什么混乱。美国觉得特别缺乏来自中国大陆的可靠情报，在古巴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可靠情报。美国如果支持蒋的行动，其角色难免为人所知，这对美国是极为严重的。美国不想卷入被认为是进攻大陆而又会失败的作战行动。①

谈到联手摧毁中共核基地的事，肯尼迪表示愿以一切“合理的手段”削弱中共力量。他问蒋经国，是否有可能空运300至500人到远至包头的中共核基地，而飞机不致被击落？尽管台湾飞行员驾驶的美制高空侦察机屡被击落，且从无大型运输机成功飞越大陆内地之先例，蒋经国却好像蛮有把握似的回答：这种行动是可行的。②

美国应付归应付，打发走蒋经国之后，并没有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肯尼迪除了表示将“仔细研究”台湾增加运输工具的要求之外，最后允诺的唯一事情就是同台湾密切协作搜集大陆情报。③

中央情报局同蒋经国商议了具体的合作，确认去年3月31日肯尼迪亲自修订的由克莱恩带回台湾的七项原则仍是双方行动的指南。决定由一个联合小组来推行以下工作：（1）为大陆的反抗运动提供政治路线，也就是以蒋介石的《对大陆人民的十项誓言》作为政战心战的基本纲领；（2）渗透与颠覆，重点是策反大陆党政军人员；（3）研究以中共关键军事和工业设施为目标的破坏活动。双方同意，在有必要采取行动时，美国将提供充分支持。④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September 11, 1963, *ibid*, pp. 386 – 392.

② *Ibid*, p. 391.

③ *Ibid*, pp. 386 – 392.

④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undated, *ibid*, pp. 396 – 397.

潮起潮落失与得

台湾当局经过两年多来对肯尼迪政府的反复试探，至此总算认清美国不会在目前形势下同意它向大陆公然发动军事进攻，同时也确认美国会继续同它结盟，同大陆敌对，并在一定限度内默许和纵容它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袭窜扰活动。肯尼迪的这个态度，为其后任所继承，也就从而限定了六十年代台湾当局对大陆的行动规格。此后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尽管于心不甘，不时向华盛顿提出鼓动性地建议，不断将一批批"复国勇士"送往大陆"取义成仁"，但撼不动大陆军民的铁壁铜墙，也拖不动美国更深地下水，夹壁之下，此路不通。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窜扰活动只得面对无情的失败，悄然沉寂下去。

似乎可以认为，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计划是因美国的制约而未能实行，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行不通的计划，是痴人说梦。从六十年代大陆和台湾两边的实力和人心的状况来看，可以料定，蒋介石的反攻只能遭到覆灭的下场。何况大陆方面对此已有所准备，严阵以待，台湾连突然袭击的效果都达不到。所以反攻计划的流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美国不能支持它的原因。

可是，台湾当局通过这场闹腾，给美国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干扰和牵制了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终于还是把美国拖入对其小股侦袭窜扰活动的援助中，达到了使美国继续同台湾拴在一起，同新中国保持敌对状态的战略目标。由于国际风云的复杂变化，也由于台湾当局制造的海峡紧张局势制约了美国政策上的选择余地，1962 年中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和僵硬。

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为例，自 1962 年台海局势紧张以来，一直陷于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是非之辩中。9 月 9 日，国民党空军一架美制 U-2 型高空侦察机在南昌上空被击落。20 日中美大使会谈时，中方就此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种间谍活动完全由美国情报部门操纵，是美国煽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的结论是，U－2 事件证明肯尼迪政府比其前两任在对华政策上更富于冒险性，更不负责任。卡伯特辩解说，飞机是台湾当局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的，美国政府对制造商卖出的飞机的用途不承担责任。中方既然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台湾自然会采取侦察之类的预防措施。此外，他重申在 6 月 23 日会谈中的声明仍是美

国的政策。[1]

台湾空军依赖美国的装备和训练，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其高空侦察机多次深入大陆腹地拍照，也早为中共察觉。这次击落 U-2 飞机，就是根据对其多次飞行路线的分析，精心设伏的结果。这是1958 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上空击落的第四架美制侦察机。中方之所以由此提出肯尼迪政府更有冒险性的结论，应该是在中苏论战激化的背景下，对美国政策性质的一种判断，也是为了向美方施加更大压力。[2]

1963 年 2 月 20 日举行第 114 次会谈时，美方纵容蒋介石集团侵袭大陆的事实已被揭露。在世界舆论的谴责下，美国处境十分尴尬，又不能放弃对蒋帮窜扰的支持，于是会谈的口径有所变化。国务院指示卡伯特应继续不承认美国卷入侵袭行动，但避免重申去年 6 月 23 日会谈中所作的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的保证。[3]

至 1963 年下半年，鉴于中苏分歧的扩大，美国国务院曾考虑在华沙会谈中采取更为和解的调门，看看是否能得到中方的回应。谈判代表卡伯特奉命在 9 月 11 日第 117 次中美大使会谈中宣称，美国对中国打算“保持坚定而不敌对的态度”，并准备“耐心等待直至王（炳南）那一方愿意合作，缓和紧张”。[4]

然而，中方尚未来得及对这一表态的含义仔细研究并做出回应，11 月初台湾当局派遣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击落于大陆一事，又把中美关系推往继续敌对的方向。到了 11 月 13 日双方约定的下一次大使会谈，也就是肯尼迪生前的最后一次中美会谈，主题却成了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抗议与反抗议。王炳南把美方刚刚表达的“坚定而不敌对”的对华新立场斥责为“谎言”。他历数美国飞机军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空降蒋帮的游击队、邀请蒋经国访美、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南越和南朝鲜扶持代理人、装备印度军队、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等敌对行动，一一予以严厉谴责。卡伯特除了一一辩解之外，还坚持要求释放美囚，交流记者。双方的会谈依然陷于僵局。[5]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 20, 1962, *ibid*, pp. 318－320.

② 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68 页。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 20, 1963, *ibid*, pp. 349, ft. 4.

④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 11, 1963, *ibid*, pp. 392－395.

⑤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 13, 1963, *ibid*, pp. 405－408.

据大陆方面的资料，从1962年10月到1965年，大陆军民共歼灭登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击沉和缴获各型登陆用的船艇24艘。在海上歼灭国民党军小股袭扰武装47股，部分歼灭和击溃13股，击沉各种舟船18只，缴获20只，击毙约100人，俘获316人。还击沉“剑门”、“章江”、“永昌”三艘战舰。空中1961年到1967年共击落美制蒋军U－2高空侦察机5架，RF－101侦察机3架，F－104战斗机1架，P2V－7型飞机3架，以及RB－57、无人驾驶侦察机等多架。从这个角度讲，台湾损失惨重，大陆战绩辉煌。①

但从现在披露的美国档案资料来看，和当初大陆的人们想象不一致的是，美国上层人士包括军方将领访台，几乎都是致力于“拴紧”而不是“策动”蒋介石的反攻。同样，美国使节和顾问在美蒋合作机构中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是“制动器”的作用多于“发动机”。美国对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态度，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许大打，只准小闹。台湾闹不下去了，就只好黯然收场，海峡归于平静。

就美国方面而言，面对调整对华关系过程中来自台湾的不断干扰，美国政策设计者们已经认识到，从原则上讲，应尽量少让美台关系制约美国的行动自由。要让国民党人晓得，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广泛利益，而非台北政权一家的利益。但尽管认识如此，美国实际上还是难以摆脱台湾当局的牵制。在本文所论述的问题上，美台之间在互助协商的大框架中，施压与抗压、牵制与反牵制的互动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最近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使我们可以窥见他们双方争吵与合作的复杂内情，包括其沟通意见、化解危机、维护关系的各种机制。

由于冷战大格局的限制和肯尼迪本人猝然遇刺，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实现政策性的转变，但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设想，酝酿过一些调整方案，对尼克松政府推出新的对华政策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可以说，60年代初期是探索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时期。

---

① 韩怀智、谭旌樵：《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34—340页，345—353页，360—362页，365—369页。

第九章　战后初期美日关系的再选择与再定位

多组双边关系并列互动的微妙和分化重组的变幻莫测，是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演进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然而，其中一组值得注意的双边组合是美日关系始终稳定并日益密切化。从太平洋战争时期激烈较量的敌国，到日美停战、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并对其实施全方位的改造，乃至美日结盟，形成“美日命运共同体”，美日关系180度的大转换令人始料未及。战后的美日关系的上述变化，始自日本战败，并在冷战初期构建了基本框架。此后，随着冷战的展开，美日关系日益牢固并不断强化，对东亚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本文以战后初期美日关系的重新架构为中心，通过审视二战结束前夕和战后初期美日关系重建阶段的基本前提，回顾近代以来美日关系变迁轨迹和美国东亚战略依托点的转移过程，考察冷战初期国际形势变化对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国际法理化的影响。

一、处理天皇和天皇制问题：美日停战并重构关系框架的关键前提之一

战后美日关系的重建，必须以美日停战为基本前提。造成日本战争机器停转的直接原因，是盟国长期打击的结果。至1945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已进入第14个年头，对日本造成巨大的消耗。美国立体化的优势武装力量海对西南太平洋岛链上的日军逐个给予毁灭性打击，日军丧失了制海权、制空权，在丧失人性的“玉碎”中节节败退。8月6日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轰击广岛，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横扫关东军以及中国军民展开的大反攻，使得面临灭顶之灾的日本统治集团惶惶不可终日。

战败投降已成定局，但如何接受投降，仍然存在分歧。8月9日上午10时30分，战争最高指导会议成员就投降条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1时零2分，美

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上空炸响，形势愈加危急。首相铃木贯太郎、外相东乡茂德、海相米内光政强调在“保留国体”的唯一条件下，停战投降。陆相阿南唯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长丰田等坚持要在维护“国体”、即“不涉及变更日本皇室在国法上的地位”之外，还要加上“驻外的日本军队自主收拢后复员”、“战犯由日本政府处理”、“保证不进行占领”等多个条件。[①] 至下午2时30分至入夜10时，首相铃木等人的“唯一条件论”派和阿南等人的“多个条件论”派的争论仍在继续，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即使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支持铃木的主张，也难以抑制阿南们的嚣张气焰，铃木只得请求天皇裕仁的“圣断”。

深夜11时30分，御前会议在皇宫御文库的地下防空掩体中举行。外相东乡再次强调了“唯一条件论”派的主张，即“自主撤军”和“处理战犯”等并非“绝对条件”，“但皇室乃绝对问题——此乃将来民族发展之基础，应该把要求都集中到这一点上来。”海相米内立即表示支持。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继续坚持“多条件论”派的立场，并对“国内战斗意志昂扬”的“本土决战”前景，作出了“自信足以给敌人相当打击”的乐观估计。在激烈的争吵过后，8月10日凌晨2时30分，裕仁作出了“采纳外相方案”的表态。理由是：“自信获得胜利的奢谈说个不停，但至今计划和实际行动并不一致。按照陆相所说，九十九里滨工事可以在8月中旬竣工，但并未完成；新建了师团，但没有发给他们的足够武器。因此，看不出对机械力量占据优势的美英军队的胜算在哪里。”基于现实的考虑，裕仁决定“虽然不忍心令朕之股肱军人交出武器，朕之大臣作为战犯而被引渡，但基于大局考虑，朕决定仿效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还辽时决断之例，忍难忍之忍，解救人民于悲惨结局之中，并为人类之幸福而下此决心。”[②]“唯一条件论”派的立场得到天皇的肯定，“多个条件论”派虽然受挫，但仍以继续战争派的新姿态开展幕后活动。

循此“圣断”，8月10日早晨7时15分，外相东乡分别紧急电告驻瑞士公使加藤和驻瑞典公使冈本，立即与美中英苏四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取得联系，接受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但附加的说明是“帝国政府在使了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3年版，第627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628—631页。

解公告的条件中不包括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要求之下，接受公告。”[①] 同日上午11时15分至12时45分，外相东乡与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举行了会谈。东乡再次希望苏联政府充分理解“天皇在日本的地位与日本国民不可分离，基于这种有关皇族地位的考虑，理解日方此一立场是绝对的。相信联合国不难对此理解并接受，从迅速实现世界和平的立场考虑，希望明确表明结束战争的态度。”马利克表示个人无权表态，但答应将日本政府的请求报告苏联政府。[②] 同日，陆相阿南发布《布告》，继续鼓吹“七生报国”，要求“全国官兵应人人体现楠木正成的精神和北条时宗的战斗之魂，为击灭骄敌而勇往直前。”[③] 大势所趋之下，阿南们“勇往直前”的叫嚣，既是“大日本帝国”弥留之际的呓语，也表明为结束战争画上句号，绝非简单易行。

日本政府于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世界各地，欢呼声顿时响彻盟国的城乡。特别是在抗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抵抗最惨烈的中国，重庆和延安等地的军民彻夜未眠，大街小巷挤满了庆祝胜利的人群。但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提出了接受中美英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唯一条件，即“维护国体”问题。这样，交战双方如何在处理天皇、天皇制的问题上，找到彼此妥协的办法，成为尽快结束战争的关键问题。

从盟国和日本的往来电文看，“维护国体”也确实成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唯一条件”。8月10日华盛顿时间上午7时33分，美国收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所附加的“唯一条件”电文。美国总统杜鲁门召集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等，研究如何回复日本的答复电文。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处置天皇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最后，由贝尔纳斯起草了答复电文，要求天皇签署投降书；对日方提出的“国体”问题，答复是：“自投降之日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由其采取实施投降条款的必须措施”；敦促天皇授权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条款签字、下令日本军队停止战斗、向盟军交出武器；要求日本政府在投降后立即将盟军战俘和被扣押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这之后，对天皇制归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632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633—634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635页。

宿的表态是："日本国政府的最后形式，将依照《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民自由表述的意愿决定之。"①

对于天皇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置，在盟国之间也未形成统一意见。当美国将电文发给中苏英等盟国、征求意见时，英国认为让天皇签署投降书并不策略，建议改由日本天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与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在保留天皇的问题上，同意美国的复电。苏联和中国表态同意美国政府的立场。澳大利亚致电英国，表示反对宽恕天皇，"坚持认为，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应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战争罪行负责，因此要求废黜他"；随即，又向美国发去电文，强调："很难找到理由说明裕仁及其同伙跟希特勒及其同伙有所区别"，因此"明确废除天皇制，是破坏日本人把天皇当神崇奉的根本办法"，"天皇制不废除，日本人就不会改变，还将发动对太平洋的侵略，只不过把时间推迟，由后继者来干罢了"，"天皇本人在接受各盟国政府处理时，将跟投降的敌国中的任何一员一样受到同等待遇。"②后来，美国以促降时机紧迫为理由，说服澳大利亚接受了其对日答复的立场。这样，保留天皇、实际上是为裕仁开脱战争责任的美国促降方针，成了盟国的共同主张。8 月 11 日，中美英苏四国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按美国口径作出了统一答复。

那么，上述主张的始作俑者美国何以对天皇制最终作出如此选择，这种选择是否与美国对日政策保持了一致性？要弄清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回顾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关于处理天皇制的决策过程。

1943 年 3 月 10 日，当美军赢得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之后，美国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政治问题小委员会在制订处理战后日本的文件中，首次涉及到天皇制处理问题。该文件提出的问题是："一旦美国介入日本国内的政治发展，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保存皇室是否值得赞许？"③ 经过此后两个多月的研究和讨论，5 月 25 日，形成题为《天皇的地位》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以 12 页的篇幅，谈及天皇的历史、法律、政治、心理及其在宪法上的作用和权限等问题；同时，也列举了关于废黜或者保留天皇制的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废黜论者认为：为了在将

---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 635 页。

② 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1449—1450 页。

③ 坂本义和、哈德编：《日本占领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第 51 页。

来防止日本的国粹主义和侵略主义抬头，必须剥夺坚持这些主义并利用天皇的神秘性和权威的人再次把持政权的根据，废黜天皇是最有效的行动。但保留论者坚持认为："保留皇位，不仅是促进日本国内稳定的手段，而且是盟国推行对日政策、开展各种改革的手段，是具有极高利用价值的潜在资产"；同时强调在战后开展的改革中天皇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因为"非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如果在天皇的名义下，运用天皇的权威来论证诸改革，能够比他们更有效果地实现各种改革。"①双方争论不休，遂由国务院所属的国家及地区委员会（CAC）和战后计划委员会（PWC）提供处理天皇的多种政策咨询，以供政府选择与决策。

进入1944年后，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如何处理天皇和天皇制，成为国务院就国防部制订对日政策的热门话题。3月21日，战后计划委员会在综合各种意见之后，首次提出美国政府关于战后对日政策的基本构想。在处理天皇和天皇制问题上，提出完全中止、部分中止或不中止天皇职权3种政策建议，并主张对天皇和皇族实行保护性监护，天皇的统治权完全由占领军司令官掌握；同时，还认为"在民政官的亲本人直接监督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日本官僚，也可以将行政运营委托给日本人"，"为了使民政官更容易地利用日本政府的高官，在得到占领当局的承认下，赋予其一定的行政权力，通过天皇或者在天皇的名义下加以行使"；占领军当局"拥有指导、监督日本政府的基本机能与实际运用等方面的责任"，对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实行直接统治。②

在此建议的基础上，5月9日国务院和陆军部、海军部联合制订了关于战后对日政策的第一个正式文件，通称《赫尔5·9备忘录》。备忘录强调"日本人几乎狂热地崇拜天皇，从外界试图消灭天皇制很可能归于无效"，"仅仅废黜天皇是不会消灭天皇制的"，因而倾向于赋予天皇部分职权；强调占领军当局在处理天皇或者与天皇接触时，"应避免给日本天皇不同于其他现世统治者的优遇，避免默认或者支持日本人以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不可缺少的存在等观念"；"除了具有妨碍治安之虞的煽动性言行之外，占领军当局应当允许对其他各种问题，对政治问

① 坂本义和、哈德编：《日本占领研究》，第51页。
② 坂本义和、哈德编：《日本占领研究》，第54页。

题开展充分自由的讨论”。[①] 同年7月，国家及地区委员会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对天皇制和在位天皇裕仁应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构想，说“即使军政当局容忍天皇制的存在，是否应强制天皇裕仁退位?”报告书对此问题的结论是：未必让天皇裕仁退位。[②]这样，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基于维护美国一国利益的考虑，形成保留天皇和天皇制的定论。

在形成上述意见的过程中，军事部门的意见对保留天皇和天皇制有着直接的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顽强抵抗及美军的巨大伤亡，急欲结束战争的美国政要不能不想到天皇和天皇制去留的利与弊。1944年5月美军发动收复阿留申群岛的战役时，美军在阿图岛战斗中阵亡400、受伤1135人，日军“玉碎”2300人，被俘者只有29人。[③] 同年6月至7月的塞班岛之战，日军战死23811人，美军战死3426人，受伤13099人。[④] 在7月展开的印缅英帕尔战役中，日军的夜袭、围攻战和蜂巢式阵地，令进攻的美军叫苦不迭。在1944年10月展开的菲律宾战役中，连遭败绩的日军出动“神风特别攻击队”，将每架载有250公斤炸药、由飞行员驾驶的零式战斗机变成爆击美国大型军舰的人体炸弹，在10月25日对莱特湾美国舰队发起的第一次攻击中，5架“特攻”机造成美国军舰1沉4伤。至1945年8月，“特攻”机出动2664次，使用飞机2272架，飞行员自爆2530余人。这种疯狂的人体炸弹作战方式，令美军感到“非常恐怖，非常危险”，在此后的“10个月里，使得美国的舰船如同面临瘟疫。”[⑤] 12月在西南太平洋的莱特战役，日军战死饿毙7万人、被俘800余人，但也给美军造成1.55万人的伤亡。[⑥] 1945年2月19日开始的硫磺岛之役苦战一个月才结束，23000日本守军除200人被俘之外，其余全部“玉碎”；6万人进攻美军受伤2万余人，阵亡500余人。[⑦] 4月21日，冲绳战役开始，至6月23日结束时，日军伤亡11万人，美军则付出了登陆部队伤亡

---

①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1945.5—1945.12》，第一编，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5页；坂本义和、哈德编：《日本占领研究》，第55页。

② 坂本义和、哈德编：《日本占领研究》第55页。

③ 大佃笃四郎：《太平洋战争》下卷，《近代战争》7，人物往来社，1966年，第110页。

④ 大佃笃四郎：《太平洋战争》下卷，第146—147页。

⑤ 大佃笃四郎：《太平洋战争》下卷，第212—213页。

⑥ 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下卷，第1394页。

⑦ 大佃笃四郎：《太平洋战争》下卷，第259、163页。

3.09 万人、海军人员伤亡 9700 余人的沉重代价。[1] 凡此种种，给美国首脑人物造成强烈冲击。新任总统杜鲁门承认在冲绳战役中"我军生命的损失极为沉重"；对即将于 1945 年 11 月 1 日展开的对日本本土战斗"奥林匹克行动"，参谋长马歇尔估计"要牺牲五十万美国人的生命"；美英两国参谋长制订的日本本土作战计划预计战争将进行 1 年以上，"终止日本有组织的抵抗的日期为 1946 年 11 月 15 日。"[2] 尽快结束战争以减少美军的伤亡而不惜保留天皇和天皇制，成为美国决策上的思维逻辑。

在制订对日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学者对日本这个"极其可怕的敌人"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作的研究报告。本尼迪克特说："1944 年 6 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研究的最大动因和背景是"那年初夏，正是我国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刚刚开始显示其真正威力的时候，在美国，人们依然一如既往地议论着对日战争也许将延续三年抑或十年乃至更长时间"；而且，"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的阿图、塔拉瓜和比亚克的战争经验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同一个及其可怕的敌人作战。""因此，在 1944 年 6 月，回答我们的敌国日本的许多问题就很重要了。"[3] 本尼迪克特利用在美国可能搜集到的各种资料，从研究"战争中的日本人"入手，分析了日本人对道德、义理、善恶、报恩、效忠、人情和责任的理解及其在行动中体现的价值观念，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将日本文化类型归结为"耻辱感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用了相当的篇幅，集中研究了日军战斗意志、国民精神与效忠天皇的内在联系。她认为："近代日本作了各种努力，使'忠'归属于一人，把它专门奉献给天皇"；"军国主义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对天皇效忠的号召力"，"正如许多战俘所说的，日本人'假如有天皇的命令的话，即使只有一支竹枪也会毫不踌躇地进行战斗；若那是天皇的命令，也会同样迅速停止战斗'"；认为不仅天皇对军人有绝对权威，而且"'只有天皇的话才能使日本国民承

---

① 大佃笃四郎：《太平洋战争》下卷，第 294 页。

②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第 239、355、314 页。

③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4 页。

认失败，并安于为重建而生存下去’”；“在日本，只有这样的天皇才能起到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为国效劳的作用”。[①]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对美日战争期间制订对日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对制订战后对日政策同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尽快结束战争以减少美军伤亡，在美国朝野过高估计了日本继续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成为形成保留天皇和天皇制方针的最大依据。经过1943—1944年的争论和选择，至1945年1月，战后计划委员会再次修订美国对日政策报告，并提交给1944年12月设立的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审议。军方对处理天皇和天皇制的温暾水式方针颇不以为然。陆军部长助理菲伊斯讥笑报告“从整体上看，这个报告给人以星期天补习学校的不正规之感，因为它没有考虑敌人的本性、过去的行动，也没有预测将来的行动”；副参谋长哈尔少将认为“不将天皇作为战俘拘押，一切都无从谈起。”[②] 经过再次讨论，至同年3月，形成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第55号报告，题为《远东的政治军事问题——日本天皇的处置》。此后，这个报告被多次修改。在这个过程中，杜鲁门在1945年5月8日德军于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当天，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声明》，明确了无条件投降的主体是日本军队，而非日本国家，强调“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或是奴役日本民族”。[③] 对无条件投降主体的确定，在促成美国政府停止内部争论，加快敦促日本投降的同时，也为天皇避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尴尬，并进而为保留天皇和天皇制找到了政策依据。

美国政府的上述既定方针，促成了日本投降。8月14日，外相东乡紧急电告驻瑞士公使加濑，将日本政府接受盟国8月11日答复的决定立即转告中美苏英四国政府，表明天皇将发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下令签署公告规定的条款、日军停止战斗、交出武器，发出盟军最高司令官所要求的命令。[④] 当天深夜10时50分，裕仁出席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认为同盟国的回复对国体问题抱有相当的好意，再战无益，只有接受同盟国的要求。天皇一锤定音，会议在一片悲泣声中匆匆结束。11时25分，裕仁来到宫内省，录制了《终战诏书》。15日凌晨，妄想

---

①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第109、107、29页。

② 坂本义和、哈德编：《日本占领研究》，第57页。

③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18页。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637页。

继续战争的法西斯少壮派军官夺取录音磁盘的阴谋破产，事态按照天皇“钦定”的终战方向进展。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正，东京广播电台播出了裕仁的《终战诏书》。内称：“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局面。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裕仁解释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也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实难预测，继续交战，不仅会导致我民族的灭亡，而且会破坏人类之文明”；表示“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也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为万世开太平”，“于兹得以维护国体”；要求“忠良臣民”“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固守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运”。[①] 在这份通篇无“投降”二字出现的《终战诏书》中，“皇族皇宗”、“国体”各出现两次，强调“皇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全文的基调是：停战出于无奈，故必须接受《波茨坦公告》；只要“国体”得以维护，就有实现复兴的希望。

这样，就产生了日本究竟是停战还是投降，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究竟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的疑问。从当时日本帝国无力面对同盟国的打击来看，承认战败并及早投降是唯一的选择。至1945年8月10日，轴心国之中最强有力的纳粹德国已经败降3个月有余，日本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集中打击的众矢之的。由南北上的美军已经攻克了琉球群岛，对日本本土构成兵临城下之势；由北南下的苏军迅速击溃关东军，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深陷于中国战场的105万侵华日军首尾不能相顾，高级军官从欧洲、重庆的广播中得知日本行将投降，胆战心惊。从东京发来的电令自相矛盾，接踵而至，更使其迷茫动摇。8月11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收到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发来的陆机密电第61号，获悉“帝国对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准备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予以接受”后，被这个“晴天霹雳”所震惊；不久，又收到总参谋长的来电，命令“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来自东京的两种不同的声音，使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岩波书店，1997年，第148—149页。

得冈村之“处于迷惘之中”；8 月 14 日中午 12 时 30 分，冈村还接受了大陆令第 1380 号电，命令其所部“就地击溃来攻之敌，以期对苏、美、中进行持久战，并为帝国本土的全军作战作出贡献”，于是向所属部队发出相应的作战命令，但 17 时 20 分，冈村又从东京的参谋西浦的来电中，得知战败投降“已成定局”，使“受到很大打击”的冈村在夜里“辗转不能成眠”。[①]

8 月 28 日，盟军先遣部队飞抵神奈川县的厚木机场，随即在横滨设立了盟军总司令部（GHQ）。8 月 30 日，美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专机在厚木机场降落。在 9 月 2 日上午举行的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不爽前约，让政府代表重光葵和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在这份文件中，明白无误地规定向盟国投降的主体是“所有日本国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的所有军队的指挥官”，规定“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置于为实施本投降条款并而公认采取了适当措施的盟国最高统帅的限制之下。”[②] 此后至 9 月 6 日，美军的第 8 军、第 6 军等 46 万人占领部队陆续到达，完成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后，9 月 15 日盟军总司令部（“盟总”）迁入日比谷公园附近的第一人寿保险公司办公大楼，麦克阿瑟可以在这里居高临下地俯视距此不远的皇居和住在那里的天皇裕仁了。9 月 26 日，麦克阿瑟会见了裕仁，表示他乐意听取最了解日本的裕仁的建议。这番言谈与 9 月 3 日麦克阿瑟在受降仪式上大谈“宽容”、“相互信任和理解”一样，再次令裕仁感到宽慰，更加俯首帖耳地配合麦克阿瑟亲临日本后推行的战后改革。

随着美国占领日本和战后改革的开展，如何改造和利用天皇和天皇制的问题日益迫切。1945 年 10 月 26 日，经远东小委员会修订的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第 55/6 号报告，建议对天皇和天皇制采取下述方针：（1）“将天皇作为战犯处理，显然不能脱离我们的整个目的。”（2）“协助日本人建立对国民充分承担责任的民主代议制”。（3）“由日本人废黜天皇制，否则就保留天皇制，并必须以与助长建立民主政府的目的保持一致为底线，对天皇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4）“确立我国政府对天皇制一致的内部政策。”[③]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处置天皇和天皇制的政策基本精神，逐渐落实为：在战争结束之前，以模糊的承诺保留天

① 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3—28 页。
②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 150 页。
③ 坂本义和、哈德编：《日本占领研究》，第 61 页。

皇和天皇制，从而加快结束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为了美国的目的而使天皇免于作为战争罪犯被起诉，并进而利用经过改造的天皇和天皇制，为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服务。应该说，无论是保留还是废黜天皇和天皇制，都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正是在这一点上，保留派和废黜派最终找到共同语言。至此，美国对天皇和天皇制的政策方针最终确定。

天皇裕仁与“盟总”合作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自我否认神格，为修改宪法、取消近代天皇制创造条件。1946 年元旦，按照麦克阿瑟的授意，日本各大报刊登载了由亲美英的首相币原喜重郎代笔的天皇裕仁自我否定神格的诏书《人间宣言》。这个宣言首先引述了 1868 年 4 月明治天皇睦仁宣示的维新纲领《五条誓文》，强调“朕欲自此重新开启国运，则须遵循誓文之宗旨，去除旧来的陋习，长大民意，官民贯彻和平主义，架构富于教养的文化，以图提高民生，建设新日本。”为此，裕仁强调“联结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是依据相互信任和敬爱，并非基于神话和传说，也非基于视天皇为现人神、且以为日本国民乃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并进而拥有支配世界命运的虚构观念。”继而提出“我国民克服当前的困苦，为了振兴产业及文运而勇往直前”，“为增加人类的幸福而作出极大贡献”的“大业”，号召“一年之计在于春，朕欲同朕所信任的国民一心一意、自奋自励，庶几以成就此大业。”① 麦克阿瑟也在当天发表谈话，对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表示满意和赞赏。双方的配合，可谓默契。

综上所述，美国务实地处理天皇和天皇制问题，一方面，为适时结束战争，并将天皇和天皇制作为推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改革的工具加以保留，使得美国不仅以胜利者的姿态单独占领了日本，稳定统治秩序和为战后美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短期效应显著。但从另一个方面，即长期效应来看，保留天皇和天皇制，特别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又为帝国旧班底的沉渣泛起，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否认侵略的历史，提供了精神寄托、行动的依据和翻案的最大理由。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事件发生以来，右翼的鼓噪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给中国、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理顺国家关系，制造了难以跨越的外交难题。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政治

---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 162—163 页。

纠纷和感情摩擦，固然有利于美国在东北亚发挥均衡作用并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和影响力。但从更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否认侵略论调的泛滥，终将导致肯定“大东亚圣战”而否认美国参加对日战争的正当性，否定远东军事法庭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性乃至美国主导下的战后民主改革的必要性。最终，将使美国通过太平洋战争进入东北亚的合理性置于令人怀疑的尴尬境地。因此，从目前看，当年东北亚被侵略国家与日本政府关于历史认识的争论，固然是当今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麻烦，这决不意味着争论与美国无关，也非美国和美日关系之福。

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美日关系再定位的必要前提之二

德国和日本同样是战败后接受制裁的轴心国，与反法西斯盟国美苏英法四国对纳粹德国的分区占领相比，美国坚持单独占领日本。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美国何以容忍对德国的分区占领，而唯独对日本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从当时对日作战的军事态势来看，美苏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占领日本已是顺理成章。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后，150 万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分兵三路、自北而南横扫关东军。苏军运用其强大的陆海空优势打击力量和跨海作战的技术手段，在攻占千岛、南库页岛和朝鲜半岛北半部之后，顺势攻入日本列岛，并非难事。实际上，在对日开战 3 天后，8 月 11 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奉命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要求苏联参加对日占领，并且建议进驻日本的“最高统帅可以包括两个人，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莫洛托夫提出参加占领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在 1945 年 5 月 23 日，盟国的战争计划委员会参照盟国占领德国的方式，提出 80 万盟国军队分区占领日本的计划：由美军控制日本全境，苏军占领北海道和东北地区，英军占领九州和中国地方，中国军队占领四国，中美苏英四国共同占领东京。①

哈里曼对莫洛托夫的建议不感兴趣，因为他知道战胜德国后，单独占领日本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遂以“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为理由，拒绝了苏联的建议。② 12 日，中苏英三国同意了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出任美

---

① 五百旗头真：《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下卷，中央公论社，1985 年，第 217 页。
②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第 371 页。

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提名，一场风波过去。13 日，杜鲁门将命令日本军队投降的《总统命令第一号》的副本送交中苏英三国。其中规定：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中国占领区、台湾和法属印度支那北纬 16 度线以北地区日军的投降；苏联远东军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接受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纬 38 度线以北地区和南库页岛日军的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负责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半岛 38 度线以南地区日军的受降。

战胜日本的果实由美国一家独享的安排，引起苏联的不满。8 月 16 日，斯大林致信杜鲁门，对《总统命令第一号》提出两点要求，其一，整个千岛群岛应划归为苏军受降的范围；其二，美苏两军分别占领北海道南北两部分，北部划归苏军受降。斯大林强调说："最后一点对俄国的舆论特别重要，人们知道，在 1919—1921 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苏联舆论就会大哗。"① 杜鲁门接受了斯大林的第一个要求，同意将千岛群岛划归为苏军的受降区。但对斯大林认为"特别重要"的第二个要求，即参加对日占领的要求，未加考虑地予以断然拒绝。何以至此？

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单独占领日本已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的 1945 年 5 月 9 日，经外交、军事部门一致决定的《赫尔 5·9 备忘录》就提出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框架。其要点主要包括：第一，"日本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应分割"。第二，"日本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在武装占领时期应停止活动亦即终止其制定政策的职能。枢密院、内阁、国会、元帅府和军事参议院应予解散。陆军省、海军省、军需省、大东亚省应予废除、外务省可在盟国民政官指导下行使日常的行政职能，其政策事务应请示（美国）国务院。但内务省、大藏省、司法省、运输交通省、农商省、文部省、厚生省等机构可继续进行工作"。第三，"所有对日作战的主要联合国家应参加对日占领和管理"，但占领军由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国派出"象征性的"军队。② "日本应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分割"的方针，表明了单独占领日本的立场。7 月 25 日，太平洋陆军司令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坚持单独占领日本，引起后者的强烈共鸣。杜鲁门也认为："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

---

①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1945. 5—1945. 12》，第 1 编，第 1 分册，第 238—239 页。

②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1945. 5—1945. 12》，第 1 编，第 1 分册，第 244—245 页。

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①]

战争结束不久，在46万美军占领日本所有的战略要地之后，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SWNCC150/4/A）。这个文件涉及终极目的、盟国权限、政治、经济等四部分。其中，宣布美国在占领日本初期的极终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及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威胁"；第二，"最终建立和平并负责任的政府，该政府应尊重其他国家权利，并应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目标"。[②] 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国家目标，是制订对日方针的依据和出发点。这一基本目标在战争后期、1944年5月初就由国务院的战后计划委员会敲定。美国准备将对日占领期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在严格管理下，实行民主化与非军事化；第二阶段视进展的情况，逐步缓和监督；第三阶段是结束占领，并使日本作为主权国家，重返国际社会。[③] 这一目标在1945年6月11日日本投降之前，经过国务、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审议，定名为《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形成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其中，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得到最大的强调。因为在这个政策中，坚持美国单独占领与防止日本被分割原则，显然是不受任何干扰地实现美国政府最终目标的前提。

在坚持单独占领日本的前提下，美国政府提出落实《投降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3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由美国划定日本的领土主权范围"限定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开罗宣言》及依据美国已经参加或将来应该参加的协定所规定的周边各小岛"；（2）按照美国的意愿开展民主改革："必须使日本完全解除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必须从日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扫除军国主义者的权力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力，必须强制压制表现军国主义及侵略精神"；（3）推广美国式的民主："必须鼓励日本国民增强对个人自由、基本人权，特别是尊重信教、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鼓励形成民主的代议制组织"。[④] 这样，不仅日本的版图由美国决定，而且美国式的民主、美国的价值观等，也随着美国占领军一起进入日本。于是，单独占领并将日本全面美国化，构成美国对日

---

①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33页。

②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151—152页。

③ PWC108a 即 CAC116a，April 21，1944，RG 59，N. A. FRUS，1944，Vol. 6，p. 1230.

④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152页。

改造的多重内容。

在对待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中，《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也依据单独占领的原则，突出了美国凌驾于其他盟国的特殊地位。首先，在对日实施军事占领方面，强调盟国占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坚持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基本立场。其中，规定"为实施投降条款，促进达成实施极终目的，必须对日本国本土实行军事占领。这种占领是为了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盟国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具有为了主要盟国的军事行动性质。基于上述理由，期待并欢迎在对日战争中发挥过主导作用的其他国家军队参加占领，但占领部队必须在美国任命的最高统帅指挥之下，达成协议并设置适当的咨询机构，以满足主要盟国，努力制订为实施对日本占领及管理的政策，在主要盟国出现意见分歧时，服从美国的政策"。①

第二，确立了美国占领军与日本政府的主从关系，使天皇和日本政府成为只执行由美国政府任命、赋予实现美国政府目标使命的最高统帅指令或备忘录的驯服工具。《投降初期美国对日方针》规定"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限从属于最高统帅，后者拥有实施投降条款、执行制订对日本加以占领和管理所必须政策的全部权力。依据美国以日本社会目前性质而使用最少的兵力和资源达到目的的希望，最高统帅在圆满实现美国目标的限度内，应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和各种机关行使其权力。应允许日本政府按照最高统帅的指示，行使有关国内行政事务的普通政治机能。但在天皇及其他日本的领导人不能在投降条款上满足最高统帅的场合，最高统帅有权并有义务要求变更政府人事或采取直接行动，对其加以限制。"②

作为单独占领的逻辑发展，美国主刀操办了肢解日本帝国的过程。《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规定："解除武装及非军事化是军事占领的主要任务，必须立即坚决实行。日本不得保有陆海空军、秘密警察组织或任何民间航空；日本的地面、航空及海上兵力必须解除武装并加以解体；日本的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及一切秘密警察组织必须解散；陆海军资材、陆海军舰船、陆海军设施及陆海军和民间飞机必须引渡并按照最高统帅的要求，听候处置"。对军政高级职员、国家主义及军国主义团体的负责人、军国主义及侵略的重要推行者等，开除公职；社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152页。

②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152—153页。

会、政治、职业、商业上的超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团体及机关予以解散；废除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军国主义及超国家主义（包括军事训练）的教育制度等。[①]

第三，作为贯彻单独占领日本的组织保证，在对日占领机构的设置上，也充分体现出美国的一国主导地位。1945 年 10 月 2 日，盟军总司令部（简称“盟总”）先于盟国其他对日机构而建立。至 1952 年 4 月 28 日《对日媾和条约》生效之前，“盟总”是美国对日政策的实际执行机构。该机构的最高首长为盟军最高统帅，下设司法局（LS）、民政局（GS）、公共卫生福利局（PHW）、民间情报局（CLS）、天然资源局（NRS）、经济科学局（ESS）、民间情报教育局（CLE）、统计资料局（SRS）、民间通讯局（CCS）等 9 个局。这些机构所具备的职能涵盖了对日实行改造的方方面面，各部门主官均由美国人担任，且置于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兼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指挥之下。

如同美国占领军牢牢控制了日本各地，才邀请英国、中国等盟国军队象征性地参与占领，“盟总”成立两个多月之后，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设立盟国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远东委员会（Fastern Commission）。在会议发表的《公报》第二部分，规定远东委员会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国各派 1 名代表组成；总部在华盛顿。其任务是：（1）“制订日本于完成其投降条件之义务时应恪守之政策、原则及标准”；（2）“应任何一成员国之请求，审查任何向盟国最高统帅所颁布之命令，或盟国统帅之措施而与本委员会职权范围内之政策决定有关者”；（3）考虑参加国政府“一致通过提交本会处理之事务”。[②] 同时又规定：（1）“委员会不能对军事行动或领土调整，提出建议”；（2）“委员会之行动，应以下述事实为出发点，即：盟国已成立一管制委员会，并须尊重现在在日本之管制机构，此一机构之连锁，乃自美国政府起讫最高统帅部，自最高统帅以迄全体占领部队”[③] 前 3 条和后 2 条，都属于远东委员会的任务范畴，但两相对照则不难发现，前 3 条只是宣布了原则；后 2 条则将美国抢先在日本落实的各种举措，均作为打上美国印章的既成事实，例如对日本领土的划分、“盟总”的权威

---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 153 页。

②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95 年，第 16 页。

③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1945—1980》，第 16 页。

等，是不容其他盟国置喙的禁地。

即使如此，美国意犹未尽。在规定有关远东委员会的任务之后，立即补充规定了"美国政府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是：（1）将指令过程控制在美国政府手中，即"美国政府应依照远东委员会之决策拟具指令，然后经适当之美国政府机构转达最高统帅。最高统帅负责实施此项代表远东委员会决定之指令"。（2）赋予美国政府临机处置权，即"美国政府遇紧急事件发生，而不在委员会既定政策范围之内，得向最高统帅发布临时训令，以待委员会之决定；唯此项训令，倘涉及日本宪政机构或管制体制之基本变革，或涉及整个日本政府之变动，则须事先征询并获得远东委员会之同意方可发布。"①

从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字里行间，也折射出盟国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在对日管理权上的矛盾斗争。例如，在远东委员会的组织等相关规定中，强调美国政府的"所有训令均须报呈远东委员会"；强调了"大国一致"原则，即"委员会之决议案无可需全体一致通过，唯每项决议案至少须经全体代表多数之赞成，且赞成之代表须包括下列四强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中华民国。"② 这样，或多或少地对美国单独占领时期的对日决策，产生某种牵制作用。但总地看来，在美国已实施对日单独占领的情况下，远东委员会在决策方面的作用更具有体现反法西斯盟国战时合作的精神，仅具备文字上的意义，真正的实权仍由美国把持。

三国外长会议还征得中国同意，决定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或称对日理事会），由担任主席的最高统帅（或其代表）以及美国、苏联、中国等国代表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联合代表组成。委员会设在东京，"其目的在与最高统帅商讨及建议关于实施日本投降条款，对日本占领与控制，及其他补充之指令，并为行使本文件所赋予之管制权"。这样，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从设置之日起，就被定位为最高统帅的咨询机构。在它与最高统帅的不得少于每二周一次的会议和日常工作中，皆不得分享美国政府任命的最高统帅对日本政府的指令权。《公报》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关于实施投降条款、占领及控制日本、及其他补充之命令，均应由最高统帅颁发。在任何情况下，行动之实施，须听命及经

①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1945—1980》，第 16 页。

②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1945—1980》，第 16—17 页。

由最高统帅，渠为盟国在日之唯一执行当局。”只是最高统帅“在颁发重大事项之命令前，须视情势许可，先与委员会商讨及咨询”；或者在实施远东委员会政策时，如果该委员会的委员与最高统帅（或其代表）产生分歧，“最高统帅在远东委员会关于此事未有协议以前，应暂缓发布关于此项问题之命令。”[①] 由于最高统帅大权在握，美国政府有权越过远东委员会直接向最高统帅下达临时训令，因此，上述规定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

总之，虽然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设置，使得“盟总”垄断对日事务的局面得到某种程度的改观。然而，这种改观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盟国占领日本的框架，并改变不了美国单独占领的基本事实。特别是随着冷战开始，美苏的对立逐步升级，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这样，在美军单独占领体制下，“盟总”自然成为推行盟国政府训令的唯一有效机构。

三、历史的回顾：美国近代东亚战略抉择与单独占领日本的原因所在

美国坚持并实施单独占领日本并非偶然。从历史上看，重视日本并控制日本，历来是美国确定东北亚战略依托的传统政策。美国建国后的东亚贸易对象国主要是中国。1784 年，贸易船“中国皇后号”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并北上印度洋，驶抵广州，开拓了中美之间的漫长海运线。1789—1790 年，驶入广州港的美国商船已达 14 艘之多，显示出美国对华贸易的热情。至于邻近中国的日本，在当时尚没有被纳入美国贸易商的视野。

此后，情况有所变化。1791 年，前往广州的“华盛顿夫人号”和“天恩号”装载着大量生獭皮，驶抵纪州（今和歌山县）的樫之浦，虽未作成毛皮贸易，却首开美国商船进入日本海岸的记录。[②] 拿破仑战争期间，中立国美国的贸易商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租商船，从事对日“包船贸易”，丰厚的利润使其怦然心动。1818 年，新任总统门罗开始关注派遣舰队前往太平洋、为美国贸易商提供保护的问题，加快海军建设。门罗之所以对太平洋贸易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至 1820 年前后，

---

①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1945—1980》，第 18 页。

② 滨屋雅轨：《日美关系的原点——关于培理来日本的研究》，高文堂出版社，1992 年，第 11 页。

美国的对华贸易量已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821年起，美国的财政部开始发表对华贸易的年度报告，实现借道日本、前往中国市场的东亚政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1834年，罗伯茨携带总统杰克逊致幕府将军的亲笔信，在完成对暹罗缔约的任务后，准备赴日缔结通商条约，却因客死澳门，使命未果而终。[①] 1837年7月，美国快速帆船“摩里逊号”以送还日本漂流民为理由，驶入江户湾浦贺和九州鹿儿岛近海，要求开港贸易，却遭到幕府的坚决拒绝。在海岸炮火的轰击下，“摩里逊号”被迫离去，返回澳门港。[②]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美列强将东北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高强度压力有增无减，欧美舰船逼进日本闯关的件数急遽增加。但由于欧洲英、法、俄三强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霸权而无力东顾。美国取而代之，充当了冲击日本国门的角色。概括起来看，主要原因是：

首先，持续西进的扩张方向使然。美国建国之初，还是一个濒临大西洋西海岸的中等国家。在此后与印第安部落和墨西哥展开的扩张战争中，由东向西，占城掠地，版图迅速扩大。1846年美国得到了俄勒冈、逼进到太平洋，特别是在1848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加利福尼亚之后，美国的太平洋东海岸领土连成一片，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两洋国家。不停地西进，是美国从一个中等国家变成国土面积名列世界前茅大国的基本动因。当美国也成为太平洋国家后，跨越大洋的继续西进，自然作为美国国家发展新的战略目标被提上日程。在这个跨洋西进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中国市场的丰厚贸易利润，以及为弥补美英贸易中巨大的入超，促使美国政府和工业资本家急切把目光投向中国。到1850年，美国从亚洲输入数额为200万美元的商品，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家预算岁入的25%；输出额为300万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家预算岁出的7%，对亚洲的贸易在美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③] 但是，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条件的限制，远洋轮船尚不能从美国西海岸直航中国，需要中途停靠锚地，补充必需的煤炭、淡水和食物。这样，地处西太平洋并邻近中国的岛国日本，就成了美国跨洋西进中国的战略路线图中理想而重要的停靠锚地。此外，从19世纪40年代美国捕鲸业日益繁荣，需要在西北太平洋

① 鹿岛守之助：《日美外交史》，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4年版，第1—3页。
②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14—217页。
③ 滨屋雅轨：《日美关系的原点》，第15—16页。

寻找港口，为捕鲸船躲避风暴，补充给养。特别是至1845年，美国在东北亚海域用于捕鲸业的资本已达1700万美元，从业人员为1万人。[①] 从捕鲸船的海图上看，日本是躲避风浪、补充给养的恰当地点。

第二，是美国当时的综合国力状况使然。19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正在开展工业革命。建国不足百年的美国，综合国力尚在成长之中，难以与头号强国、“世界工厂”英国抗衡，甚至稍逊于法国。在世界弱肉强食的竞争舞台上，美国只不过是个二流国家。当时的美国在东亚尚未取得殖民据点，跨洋西进中国的战略目标虽说前景辉煌，但实行起来却颇感力不从心。另外，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北方工业资本家与南方大种植园主、奴隶制与民主制之间的矛盾，政治与经济的冲突在加剧，内战的危机日益加深，从而限制了美国在东亚扩张的活动半径。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美国政府只能在实施其东亚战略时，量力而行，选定可能实现的有限目标，把迫使日本开港作为东亚新战略的重点。

第三，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状况的认识与判断使然。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看来，中国固然地大物博，消费市场的前景可观，但由于国土过于辽阔，民风强悍，清帝国余威犹存，只凭借美国自身的力量难以在中国立足或单独控制中国。此时，欧洲列强接踵而来，逼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形成多国对华资源与利益共享的格局。欧洲列强均针对本国在中国市场和殖民权益的份额分割，制定了各自的计划表。美国只能作为一个分得一杯羹的伙伴国，与欧洲列强联合行动，从而确保其在华利益。

相形之下，日本尚处于未开放状态，虽然英、俄、法等欧洲强国对日本也不乏兴趣，但争夺欧洲霸权和中近东殖民权益的争斗，使欧洲三强国难以把目光集中于日本，对日本的冲击行动也因此而具有间断性或者偶然性的特征。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情况潜藏着由其打开日本国门的巨大机会。抓住时机，美国会以比控制中国要容易得多的满意心情，控制小国寡民、但战略地位异常重要的日本，使之永远成为美国在东亚、在中国扩张并谋取利益的战略依托。1844年7月迫使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的美国特使顾盛，就颇为得意地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

---

① 鹿岛守之助《日美外交史》，第5页。

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打开得更加宽阔了。”[①] 随着继续开拓东北亚门户方针的延伸，促日缔约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1845年3月，载有22名日本海难漂流人员的美国捕鲸船“曼哈顿号”驶抵浦贺港，幕府官员浦贺奉行大久保接收了日本漂流人员，并向美国船长赠送了煤水、食物和陶瓷器，并传达了将军的训令：“遵循祖宗之遗法，维护锁国方针，不许外国船停留”，拒绝了开港通商的要求。[②] 1846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宾德尔带着政府缔结通商条约使命，率领“哥伦布号”、“宾塞尼兹号”两艘军舰，驶抵江户湾浦贺港。在送交了波克总统的亲笔信并等待了1周之后，接受了幕府拒绝订立通商条约的谕书，拔锚返航。[③] 1849年4月，格林舰长指挥军舰“普莱布尔”号驶入长崎港，奉命接回一年前在虾夷地（今北海道）遇难并被押解至长崎的美国捕鲸船海员。1851年1月，返回纽约的格林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强调“促使日本门户开放的时机已经到来。兵力威胁的手段，是最恰当的。”[④] 同年6月，美国政府任命东印度舰队司令奥里克为赴日使节，携带总统菲里摩阿致日本皇帝、要求人道对待落难美国海员的亲笔信，踏上征程。途中，脾气暴躁的奥里克与部下发生激烈冲突，11月被撤职，以至无法完成使命。1852年3月，美国国家邮船总监M. 培理被任命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同年11月，培理奉命离开诺福克港，搭乘军舰“密西西比号”前往香港，与等待在那里的舰队会合，北上日本，实现其冲击日本国门的目的。

虽说美国多次冲击日本国门的行动受挫，但征服日本的目的越来越明确。1853年6月，培理率领4艘军舰闯进江户湾，停泊在浦贺。幕府虽在此前通过荷兰商馆提供的情报，对于美国舰队的到来已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仍免不了惊慌失措。奉命赶来加强防卫的彦根、川越、会津等诸藩官兵在浦贺海岸乱作一团，江户城的大街小巷里拥挤着逃难的人群。就在一片风声鹤唳的慌乱中，幕府被迫允许在久里滨登陆的美国官兵举行炫耀武力的分列式表演，接受美国总统要求开港的国书和培理的亲笔信，同意在第二年培理再次访日时给予答复。1854年1月，

---

① 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② 鹿岛守之助：《日美外交史》，第3—4页。

③ 箭内健次：《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下卷，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542页。

④ 鹿岛守之助：《日美外交史》，第5页。

培理果然不爽前约，率领由9艘大小舰船组成的舰队，再次来到江户湾，并将军舰巨炮的炮口瞄准了江户城。在强大的武力胁迫下，3月，双方在神奈川订立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日美友好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条约共12条，在“和亲”友好的名义下，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根两港；向美国船舰提供避风场所，保证来日人员安全和粮食、淡水、煤炭的供应；漂流者和往来者只服从公正的法律；美国人同样享有日本政府给予其他外国人的优惠待遇等。[①]《日美友好条约》实现了美国远东战略的第一个目标，在日本建立固定的锚地。其他欧洲列强遂接踵而至，纷纷与日本缔约，开港已成定局。从1854年至1866年，12年间的日本开港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854年3月—1856年8月为第一个阶段，即“友好条约”阶段。继美国之后，英国（1854·10）、俄国（1855·2）、荷兰（1856·1）也先后与日本订立了类似的“友好条约”。这些条约规定日本开放长崎、箱馆、下田三港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但还称不上是正式的通商条约。这是因为，“友好条约”规定的开放范围，仍基本限制在补充煤炭、淡水、食品，救护海难船员的水平；缔约双方友好并建立邦交关系，但尚无领事裁判权的正式规定，欧美列强将日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尚未得到满足。

1856年8月—1858年9月为第个二阶段，即通商条约阶段。1856年8月，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进驻下田。他充分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日本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幕府在1857年6月幕府订立了《下田条约》（也称《美日约定》），将货币同种同量交换权、领事裁判权、美国人在日本的居住权等拱手交给美国。1858年6月，双方又订立了《日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规定美国的外交代表进驻江户、领事进驻开港地，可以在日本国内旅行；日本开放箱馆、新泻、神奈川、兵库、长崎五港以及江户、大阪两市；实行自由贸易原则、关税协议制；外国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②] 接着同年7月至9月，英俄荷法等国也与日本订立以美日条约为蓝本的《友好通商条约》。时值安政5年，上述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日本因缔约而成为欧美国家商品在东北亚的新市场。“安政五国条约”还规定了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制等条款，严重损伤了日本的国家

---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近代卷，第18—19页。

②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近代卷，第27—29页。

主权，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禁教锁国体制彻底崩溃。

1865年11月—1866年5月为第三个阶段，即关税率值百抽五阶段。根据“安政五国条约”，欧美国家向日本输入商品的税率在5%—35%之间。欧美列强急欲施加压力，迫使幕府将对日出口商品的关税率一律降低为5%，使其产品更自由地进入日本市场。1865年11月，英、美、法、荷兰等四国组成联合舰队，在兵库海面游弋。1866年5月，幕府驯服地签署了由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起草的《江户改设约书》。“约书”规定：欧美国家出口日本的商品，一律按照5%的从量税的税率来征收关税，完全满足了五国提出的要求。至此，欧美国家所标榜的自由贸易原则在日本畅通无阻，日本继中国之后，被纳入列强东北亚新的国际秩序、即近代条约体系之中。

在上述3个阶段中，美国在打开日本国门的第一阶段和促成航海通商条约的第二阶段，均发挥了带头作用，但在强制日本降低关税的第三阶段，英国成为主角，美国下降为配角。造成这种角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削弱了美国在日本的外交立场，转而回归协同欧洲列强的传统方针。当内战结束，美国重返东北亚时，鉴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迅速调整了外交方针，重新倚重日本的战略依托。

1894—1895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战胜腐朽的清朝，成为东北亚一霸。1904—1905年，日本发动并赢得了对俄战争。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决定近代日本武力崛起的两次关键性战争中，美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道农民起义。6月日本派兵侵入朝鲜，与应朝鲜政府之邀、入朝平乱的清军形成军事对峙。此时，东学道农民军与政府达成协议，局势恢复平静。但日本政府拒绝了清政府两国同时撤军的要求，以中日两国共同主持“朝鲜内政改革”为借口，拒不撤军。求和避战的李鸿章吁请列强居中调停中日同时撤军事宜，美国政府虚于应付，7月9日，驻日公使艾德温劝告外相陆奥宗光日本撤军，同时表示“若日本兴无名之师，使防御薄弱的邻国化为兵火战场，合众国大总统当深为惋惜。”陆奥深知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遂借口“保护东亚和平”，拒绝撤军，美国的调停也就不了了之。[1]7月25日，日本联合舰

---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8页。

队袭击中国的运兵船，战争爆发。1895 年 4 月 17 日，战败国的谈判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订立了《马关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日本迫使清朝承认朝鲜自主独立，中朝宗藩关系彻底崩溃。日本割取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 2.3 亿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内地。日本作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崛起于东北亚。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俄之间围绕朝鲜半岛支配权的竞争随即展开。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国，展开的新一轮的 10 年扩军备战。1904 年 2 月 8 日，日本陆军在仁川大举登陆，联合舰队偷袭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2 月 10 日对俄宣战，战争爆发。战争的进程伴随着对韩国的殖民地化，在 2 月 23 日订立《日韩议定书》，变韩国为日本的后方战争基地。8 月 22 日迫使韩国订立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只能任用日本政府推荐的顾问，在与外国订立条约之前必须与日本协商。

日本以维护各国权益、保全韩国和反对俄国占领中国东三省维护门户开放等虚伪的理由发动了战争，在这方面，美国与日本的利益一致。因此，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支持日本。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了 2 亿美元的军事贷款，约为总战费的 1/5。[①] 美国舆论普遍偏袒日本，指责俄国。然而，日本接连击败俄军并在朝鲜半岛的快速扩张，引起美国对菲律宾安危的忧虑。1905 年 7 月，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在命令驻菲律宾司令伍德防止前来日军攻击的同时，派遣陆军部长塔夫脱访问日本，7 月 29 日和首相桂太郎在东京签订了秘密备忘录《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双方约定：共同维护远东的和平，日本无意染指并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作为交换，美国认为韩国问题是引发日俄战争的直接原因，作为战争逻辑性的结果，承认日本拥有决定朝鲜半岛的支配权。[②] 在得到桂太郎的承诺后，美国政府决心继续支持日本。

8 月 10 日，在老罗斯福的斡旋下，日俄开始媾和谈判。日方提出俄国割让库页岛和赔款 12 亿日元的要求遭到尼古拉二世的断然拒绝，谈判面临破裂。关键时刻，老罗斯福出面，说服日本放弃赔款的要求，作出只割取库页岛南部的让步。9 月 5 日，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订立《日俄媾和条约》。日本通过这个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条约，获得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和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的全部殖民权益，

① 刘世龙：《美日关系 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276 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 240 页。

割取了北纬50度线以南的半个库页岛，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崛起于东北亚。

为了回报美国的援助，也为了获得1亿日元的贷款，1905年10月12日，苦于财政拮据的桂太郎与承诺提供资金援助的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达成《关于满洲铁路的预备协定备忘录》（也称《桂—哈里曼备忘录》）。根据哈里曼的提议，备忘录同意由他来"收购日本政府获得的满洲铁路及附属财产，为了筹集恢复整备该铁道以及完成延伸并改善在大连的铁路终端，组建一个康采恩公司，当事双方对其取得的财产应拥有共同且均等的所有权"；在日本政府的监督下，联合经营满洲铁路。[①] 虽然井上馨、涩泽荣一等政界和财界巨头对备忘录持积极支持的立场，但签订了《日俄媾和条约》，从朴茨茅斯归来的小村寿太郎极力反对上述备忘录，并在元老们的支持下，取消了这个备忘录。与此同时，日本乘此战胜俄国的余威，11月17日，日本迫使韩国订立第二次《日韩协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设置统监总管韩国内政，将韩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各国驻韩使馆纷纷撤离，其中美国公使抢在各国之前，率先在汉城降旗撤馆。美国的支持，使日本政府心领神会，乘机加快灭亡韩国的步伐。

在吞并韩国的所有外交准备中，日美达成相互谅解，是最重要的环节。1908年11月30日，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E. 鲁特互换了《日美关于在太平洋方面的交换公文》（也称《高平—鲁特协定》），就双方在太平洋地区的共同原则和利益分割达成共识。其中，主要规定：（1）"两国政府希望鼓励两国太平洋商业的自由平稳的发展"；（2）"两国政府的政策均无任何侵略倾向，目的是维持太平洋的现状，拥护在中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3）"因此，两国政府决心加强相互尊重对方在太平洋地区已有的利益"；（4）"两国政府运用其权能范围内的一切和平手段，保全中国的独立及领土，支持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决心保护各国在华的共同利益"；（5）"在发生侵害上述维持现状或机会均等主义的事件时，两国政府应相互交换意见，协商所采取的有益措施"。[②] 日美达成协议，进一步加强了日本的外交立场。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韩国订立《日韩条约》，完全吞并了韩国，日本殖民帝国的版图足足扩大了一倍。

1914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进而跃居世界大国提供了机遇。

---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249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312页。

至1931年"九·一八"事件骤发，美日双方形成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概括起来说，就是：（1）美日关系对等，均为世界级强国与强国之间的关系。（2）日本成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强有力竞争者，双方既争斗，又合作。在列强支配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通过日本对英美的协调外交，相互定位。（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升级的侵略战争打破了日美之间的战略平衡，日美军事较量不可避免。（4）对华政策是制约美日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焦点是门户开放原则还是单边独霸方针之间的抗衡。

1914年8月，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9月，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迅速占领胶州湾，夺取了胶济线。10月，日本海军占领德国在赤道以北的南洋诸岛。11月，占领青岛。乘欧洲列强陷入混战而无暇东顾之机，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为了对日本有所让步以换取日本放弃独霸中国的意图，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订立《石井—蓝辛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日两国"承认在领土邻近的国家产生特殊关系"的原则，美国承认日本对近邻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在与日本领土接壤地区尤其如此"；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尊重中国独立以及"门户开放"以及对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①] 在1919年1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支持日本与英、法、意大利等大国对等享有支配地位，听任日本接管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在这次会议上，日本以国际联盟5个主要发起国之一的资格，出任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五强之一的日本，最终取得世界级政治大国的地位，对美国在亚太的权益和地位提出挑战。

美国为遏制日本在中国和亚太地区过快膨胀的势头，贯彻维护本国利益的"门户开放"原则，1921年11月—1922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了重新安排一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国际会议。日本在有关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上签字，承认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华实行美国所要求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自由贸易原则，并与中国解决了山东问题的悬案，承诺交还胶州湾并从山东撤军，其扩张势头受到美国的遏制。但在英、美、日、法《四国公约》中，日本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各岛屿的权益，特别是在英、美、日、法、意大利签订的限制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439—440页。

海军军备的《五国条约》中，规定5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拥有的吨位比例，分别为5:5:3:1.67:1.67。日本位居其三，取得仅次于英、美两国，却凌驾于法国、意大利之上的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的地位。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方面成为世界级政治、军事大国；但另一方面，在与美英等国综合国力的对比上，仍然居于劣势。大战期间，除棉丝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外，化学工业、海运业、机械制造业、钢铁业等重工业部门也取得新进展，形成大战景气。但战争结束后不久，贸易入超、股票狂跌、物价暴涨、工厂倒闭等现象接踵而至，社会问题丛生；大战期间畸形繁荣的日本经济对美英的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度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较有理智的政府官僚，如首届政党内阁首相加藤高明、外相币原喜重郎等推行对美英的协调外交，力图在避免与美英发生正面冲突中，维护日本的利益。1930年4月，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关于辅助舰造舰比例的妥协方案，与美英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竭力维持对美协调、稳定日美合作的大局。与此同时，颟顸狂傲的军部势力迷信日本精神力量，蓄意对美挑战。

1931年9月18日深夜，关东军自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占领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随后4个月的军事侵略中，日军侵占了东三省。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以此为转折点，日本颠覆了以日美合作、实施对华门户开放原则为基轴华盛顿体系，日美关系进入前景凶险的过渡时期。美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1932年1月7日，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声明"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准备承认任何由中、日两国政府及其代理人间所订立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其行政完整，或违反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准备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三国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的条款与义务的方式而造成的任何局势、或缔结条约或协定。"② 这样，以"恢复满洲原状"、不承认日本独吞中国东北、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为基本要求的"史汀生主义"，成为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政策的基调。

---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9—10页。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选译·日本·1931—1941》，第31页。

在1937年7月—8月间，侵华日军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事变，把局部侵华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损害了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日美矛盾日益尖锐，双方的关系框架随之畸形化。同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他把战争比喻为“传染病毒”，说：“很不幸，世界上正在蔓延着无法无天的危险病毒”；强调：“身体的病毒传染蔓延时，社会同意也协力把病人隔离，这样才可以防止传染，保证社会健康”；作为美国针对纳粹德国加紧战争准备和日本侵华战争升级的政策，罗斯福声明：“我们决心不参战，但我们不可能保证不受战争的破坏影响和不被卷入战争。”[①]。此后，美国加强了对日经济制裁的力度。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力图滞缓日本为夺取石油而对东南亚采取的军事行动，通过特别许可证留出的渠道，美国的石油和燃料油继续输出日本。从1939年至1941年5月，石油占美国对日出口物品的74%，1940年的对日石油出口总量比1939年增加了21%，1940年下半年出口日本的汽油和发动机燃料高达230万桶，约为1939年同期的3.2倍。[②]

美国政府试图以石油为阻滞日本南进步伐制动器的图谋，未免过于一相情愿。为利用1940年6月纳粹德国横扫西欧、法国投降的有利时机，直接控制东南亚石油资源，同年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伴随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为此，“不回避对美开战。”[③] 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署了《德日意三国条约》。日本与德意缔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在欧洲加紧援助英国的同时，在亚洲，加大援助中国抗战的力度。9月25日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11月3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向中国追加贷款5000万美元；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④] 12月29日，罗斯福向全国进行战争精神动员的“炉边谈话”。罗斯福强调由于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条约，美国的文明遇到从未有过的危险，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指出：“如果英国失守，轴心国将控制欧洲大陆、亚洲、非洲、澳洲以及各大海洋”，

---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选译·日本·1931—1941》，第124页。

②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81、279页。

③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104—105页。

④ 《近代日本综合年表》（第2版），岩波书店，1984年，第325页。

西半球将遭到轴心国的攻击，美国人将“生活在炮口之下”。罗斯福批驳了各种躲避战争的孤立主义言论，发誓让美国“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军火库”。在谈话中，罗斯福特别强调支援英国，并未提及对华援助。[①] 但随着美日矛盾日益白热化，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提上日程。

以援助英国为重点的欧洲中心主义，促使罗斯福政府继续以外交谈判来尽量推迟美日战争的过早爆发。1941 年 3 月 8 日，国务卿赫尔在会见新任驻美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时，希望日本政府“明确的和切实可行的想法”，以利双方即将开始谈判。随后，双方竞相提出谈判方案，但无法弥合彼此的分歧。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急剧变化。7 月 2 日，御前会议通过《伴随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制订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向处理中国事变迈进”、“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而向南方迈出扩张步伐”、“顺应形势变化而解决北方问题”的方针，“准备对英美的战争”提上日程。[②] 7 月 28 日，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作为回应，8 月 1 日美国全面禁止对日石油的出口。9 月 6 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现纲要》，声称“帝国为实现自存自卫，决心对美（英荷）不辞一战，大约在 10 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③] 11 月 26 日，美国提出最终谈判方案，重申“赫尔四原则”，即（1）“所有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可侵犯原则”；（2）“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3）“通商机会及待遇平等原则”；（4）“防止纷争及和平解决以及为缓和国际局势而依据和平方法和手续的国际合作与调停遵循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建议“日本政府与美中英苏荷泰等 6 国订立多边不可侵犯条约”；“各国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主权”；“日本政府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的军队和警察”；“美日两国政府不在军事、经济上支持临时首都在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之外的任何在中国的政府”等。[④] 美国的要求等于取消了“九·一八”以来日本所有侵略成果，而为日本政府所拒绝。12 月 8 日（东京时间），日本出动陆海军对珍珠港和东南亚展开突袭，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转而奉行击垮日本，“使中国大国化”并在战后东亚充

---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选译·日本·1931—1941 年》，第 488—496 页。

②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 106—107 页。

③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 108 页。

④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 112—113 页。

当与美国合作、维持东亚国际秩序的“国际警察”的新方针。在美国的安排下，1942年1月，中国参加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反法西斯战线重要的成员国；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发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也称《四强宣言》），飙升为新四强的伙伴国；同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邱吉尔在北非举行会议，发表《美英中三国关于日本的宣言》（《开罗宣言》），宣布三国与其他对日交战国协调军事行动，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剥夺日本自1914年以来在太平洋占领的所有岛屿，将日本从中国盗取的领土满洲、台湾及澎湖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与独立；[①] 1944年8月中国派代表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通过筹建联合国的《关于建立普遍安全性国际组织的决议案》；1945年6月中国代表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同年7月美英苏三国以中美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0月在联合国正式成立大会上，与美英苏法等国共同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

一场世界大战，使中国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在战前令人始料未及的沉浮转变。但务实的美国政府明白，日本虽面临战败，但仍然是个令其敬畏的敌手，因此在投降条件的交涉中，美国在“国体”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至于在制订战后对日政策和坚持单独占领日本，也与美国看重工业国基础犹存的日本不无关系。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中的一员，也恢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大国地位，却并未成为令美国看重的强国。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军民苦撑苦熬而不向日本屈服，数以千万计的人员牺牲等，固然赢得了盟国的尊敬，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的旧貌，绝非抗战胜利而彻底改变。成为恢复了主权独立的大国但非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在胜利到来前夕面临着成为大国的尴尬。例如，1945年2月美苏英举行决定战后世界和东北亚国际新秩序的雅尔塔会议，但中国并未被邀请参加。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秘密协定中，美苏英三国再次以牺牲中国而达成妥协。雅尔塔会议暴露了五大国关系架构依然受美苏英三强制约的真相，1945年12月决定盟国处置日本的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同样如此。可见，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使中国大国化”的方针，显然具有权宜性。工业化的日本，在美国政府心目中的分量，并未因日本战败投降而荡然无存。大国化的中国前途未卜，

---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407页。

战败的日本余威犹在，战后的东亚战略依托究竟放在中国还是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尚在斟酌之中。这样，单独占领并改造日本的后效如何，与国共对峙和内战的最终结局，直接影响美国选择战后东亚战略依托的一锤定音。

四、吉田茂组阁：利用冷战初期的新形势复兴日本经济

美国的单独占领并按照其既定目标改造日本，是美日关系重新定位的基本前提。但日本政府给予配合并接受改造，也是另一个必要的前提。由于近代日本培养了一批颇具见识的行政官僚，使之在战败投降的转折关头，得以迅速应变，甘当美国对日政策有作为的配角。近代日本外交的传统，是在某崛起的一时期内，与某个欧洲大国结盟，远交近攻，通过侵略邻国而膨胀为帝国主义强国。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日本积累了与欧美列强打交道的丰富的经验，使其能够灵活多变地转换结盟对象。太平洋战争，使日本朝野领略了美国的强大，在裕仁的《终战诏书》中，美国使用原子弹并非无缘无故地成了日本停战的最大理由。因此，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迎合并从属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从冷战开始后的新形势中寻找重新崛起的机遇，成为日本政府的现实选择。借助冷战重组日美关系，被日本政府视为头等重要的课题。

在战后初期局势骤变的混乱时期，日本政府经过频繁的内阁首相走马换将，逐渐降低了内阁更替频率，政权逐渐相对稳定，也使迎合并从属美国的路线得以顺利推行。从1945年8月宣布投降，到1948年10月第二届吉田茂内阁执政，日本内阁的更替频率明显放慢。1945年4月7日上台的铃木贯太郎内阁，在完成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和战败投降的程序后，于8月15日总辞职。8月17日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出任前所未有的皇族内阁首相，10月5日，执政50天的东久迩内阁总辞职。10月9日外相兼进步党总裁币原喜重郎内阁继任，执政未及半年，1946年4月22日内阁总辞职。同年5月22日，自由党总裁吉田茂在大选中获胜，组阁执政将近1年，1947年5月20日，内阁总辞职。同年6月1日，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组阁，执政8个月，1948年2月10日内阁总辞职。同年3月10日至10月7日，民主党总裁芦田均组阁，执政7个月。此后，1948年10月19日到1954年12月7日，由吉田茂连续4次组阁，创下了连续执政74个月的记录。战后初期铃木、东久迩、币原、吉田、片山、芦田等6届内阁，除吉田之外，均为短期内阁。至

1948年10月之后，开始出现以吉田茂为首的长期内阁。上述内阁执政时期由短到长的变化，恰恰与美日关系的再定位由混乱到明晰的过程相并行。这种现象既非孤立，也非偶然。实际上，是从内阁更替的角度，反映了美日双方相互选择、相互磨合到相互合作的过程，也说明重新构筑战后美日关系的任何一方，均为不可或缺的要素。

日本政局之所以在吉田内阁时期进入稳定阶段，固然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关，但也与首相吉田茂从政经验丰富、受到美国政府和“盟总”的有力支持密不可分。在人际关系的意义上说，战后美日关系的再定位，堪称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之间相互合作的结果。实际上，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和“盟总”在推行对日政策的同时，也在筛选最合适的首相人选。几经挑选，最终选择了吉田茂作为其合作伙伴。

吉田家族原系土佐藩武士，其父竹内纲1890年当选首届帝国议会众议院议员，1881年三岁时过继给其父好友、横滨怡和洋行的贸易商吉田健三，改姓吉田。1897年吉田入皇族和贵族子弟学习院大学学习，1904年转学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读。1906年毕业后通过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进入外务省，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在驻中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使馆历练后，1909年入赘亲欧美派天皇侧近官僚牧野伸显家，此后官运亨通。自1912年起，历任安东和济南领事、天津总领事、奉天总领事。1919年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团的随员出席巴黎和会，1927年作为奉天总领事出席田中内阁的“东方会议”，1928年出任田中内阁的外务次官。在对华持强硬态度的同时，采取亲英方针。1931年3月，出任驻意大利大使。1936年6月转任驻英国大使，至1938年10月奉命回国的两年多的期间内，吉田竭力加强日英关系，反对日本与德国结盟、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离任后的吉田原本可以在国内逍遥赋闲，但由于他坚信日本国运的兴衰取决于同英美协调关系，因此他曾经向亲英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等建议，设法邀请英国出面解决日中战争的扩大化问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吉田更加频繁活动，力主早日实现日美和平。1945年4月，吉田以“反军”罪名被宪兵逮捕，服刑45天。这个经历为吉田在战后政界的再崛起，积累了政治资本。

果然，从战后首届东久迩内阁起，赋闲6年之久的吉田随即重返政界。1945年8月27日，吉田茂在给来栖三郎的明信片中，表明了乘机大有作为的决心：

"我国现状颇类独立战争之后的英国，当时英国痛失殖民地十三州，欧陆从法国始皆是敌人，不仅没有奥援，反而是怨府所在，然而其中蕴涵着复兴之机。从拿破仑战争前后起，接连产生两个皮茨以及皮尔、凯斯勒里、卡宁、巴麦尊、狄斯雷利等外交界一代名臣，终于建立起19世纪之英国。重温此史，感慨万千。可有幸建立来栖一吉田公司，收罗上述名臣，挽狂澜于既倒?"① 在构思实现其政治抱负前景的吉田，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英国，以伊丽莎白时代为榜样，重建战后日本伊丽莎白时代式的新辉煌。亲英美并且熟知国际事务的吉田充分认识美国对战后日本的发展、包括对其从政生涯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成为美国需要的民主人士，大概会将今日风光集于一身"。② 吉田的从政生涯和亲英美的立场不仅受到麦克阿瑟的赏识，也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重视，认为他是"能与麦帅对话"的合适人选。③ 1945年9月11日，就在"盟总"下令逮捕东条英机等首批战犯的同一天，吉田被招进皇宫，受命出任外相。出马伊始，吉田首先促成了9月27日天皇拜会麦克阿瑟。裕仁与麦克阿瑟会见的政治意义，在与美日双方就免于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裕仁并不退位的问题达成默契。10月5日东久迩内阁总辞职后，在确立继任内阁首相人选时，吉田的活动对麦克阿瑟接受币原喜重郎，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于在麦克阿瑟的直接干预下，吉田于1946年5月22日组成第一届内阁，执政一年。随后又在1948年10月19日至1954年12月7日连续4次组阁，前后出任执政累计74个月。在此期间，吉田内阁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奠定了日美特殊关系的基础。概括起来说，这些举措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适应美国对日政策和复兴日本的需要，推行战后民主化改革。其中，事关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可谓举足轻重。有关改宪的程序启动于吉田执政之前，但是在第一届吉田内阁任内期间，完成了通过并颁布《日本国宪法》的程序。

1945年10月4日，麦克阿瑟下达了修改旧帝国宪法的指令。10月16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修改宪法的基本方针，第一，作为保留天皇制的前提条件，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国会负责全部财政；保障所有日本居民的基本人权；国家元首的行为遵

① 宋成有主编：《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51页。
② 《日本十首相传》，第251页。
③ 《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1235页。

循明确委任的职权。第二，作为保留天皇地位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内阁对立法机构负责；贵族院和枢密院不得对立法机构的法案行使否决权；天皇只能在内阁劝告、向议会提出得到议会承认的宪法修正方案；将来保有军队时，必须由文职人员主管武装部队，"帷幄上奏权"必须废止。[①] 循此方针，1946 年 1 月 7 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再次对"盟总"下达了题为《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的 228 号文件，强调在修改宪法时，必须以文官部门对军事部门的优势地位为原则，实现日本政府机构改革，敦促加快修改宪法的步伐。

修改宪法，特别是对旧宪法天皇主权的取消，受到了维护"国体"的帝国旧班底们的顽强抵抗。1945 年 12 月 8 日，负责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大臣松本烝治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议员中谷武世的质询时，公开了制宪四原则，即（1）对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基本原则不作任何修改；（2）扩大需要议会议决的事项范围；（3）国务大臣在负有辅弼天皇责任的同时，也对议会负责；（4）扩大人民的自由及权利的保护。[②] 1946 年 2 月 8 日，按照"松本四原则"制订的《宪法改正要纲》（通称"松本方案"），正式提交给"盟总"。这个方案对帝国宪法进行了某些调整，但强调维持旧貌。尤其是帝国宪法中第 1 至第 14 条有关天皇主权的规定被全部保留，仅将第 3 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修改为"天皇至尊不可侵犯"，等等。[③] 2 月 13 日，"盟总"拒绝了继续坚持天皇主权立场的松本方案，并将"盟总"民政局长惠特尼按照麦克阿瑟关于天皇为国家首脑、放弃战争、废除封建制度等制宪三原则，组织相关人员仅用一周时间紧急制订出来的"盟总方案"下达给日本政府。"盟总"之所以如此急不可待地越俎代庖，是因为此时国会大选在即，各政党或民间团体提出包括在日本实施共和制在内的十几个宪法草案，远东委员会其他成员国也越来越关注宪法制订问题。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日本单独实行的民主试验，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2 月 22 日，在"盟总"的压力下，币原内阁决定接受"盟总方案"。3 月 2 日，按照"盟总"要求，内阁制订了宪法修正案。3 月 6 日，内阁发表了载明主权在民、天皇象征和放弃战争三原则的《宪法修正草案要纲》，麦克阿瑟为此发表声明，予以完全认

① 坂本义和·福德主编：《日本占领研究》，第 76—77 页。

② 坂本义和·福德主编：《日本占领研究》，第 125—126 页。

③ 坂本义和·福德主编：《日本占领研究》，第 103 页。

可。4 月 17 日，内阁全文发表了《宪法修正草案》，4 月 22 日，币原内阁总辞职。至此，修改宪法的舆论公开程序完成，但法律程序尚待新内阁执政期间完成。

5 月 22 日，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6 月 8 日，枢密院通过了《宪法修正案》。6 月 20 日，《宪法修正案》提交国会讨论。6 月 26 日，吉田在众议院的发言中解释新宪法第 9 条时，全面接受了麦克阿瑟关于放弃战争的观点，强调放弃所有的战争、包括放弃自卫性战争的交战权。8 月 24 日，众议院以 421 票赞成、8 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新宪法。10 月 6 日，经贵族院表决通过了特别委员会加以修改的新宪法，并于当日送交众议院。10 月 7 日，众议院表决采纳贵族院的修改意见，完成了新宪法《日本国宪法》的立法程序。11 月 3 日，《日本国宪法》公布，1947 年 5 月 3 日开始实施。新宪法在保留天皇制的框架下，给予天皇作为国家和国民统一象征的名义和地位，却剥夺了旧宪法赋予天皇总揽统治权的特权地位，从而废除了明治维新以来建立的专权在握的近代天皇制。在某种意义上，在形式上维持了天皇制“国体”，实际上对此加以变更。同时，新宪法还规定了国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内阁对国会负责，司法权属于法院并不受立法或行政机关的干涉，据此将议会民主制的三权分立原则引入日本的国家政治生活，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议会政治体制。军部、枢密院等特权机构被取消，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新宪法的颁发和实行，从国家大法上使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与战败前的军国主义日本划清了界限。就吉田的从政生涯来说，在其首届内阁任内完成新宪法立法程序，既是吉田和麦克阿瑟相互合作的结果，也密切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首届吉田内阁执政期间，还在 1946 年 8 月 22 日负责实施解散财阀工作的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开始了运作，按照削弱日本大企业对美竞争能力的需要，自 9 月 6 日起，指定三井本社、三菱本社、安田本社、安田保善社和富士产业等公司为应予解散的控股公司，此后又陆续共计 5 次对 83 家公司加以指定和解散。1947 年 4 月 14 日，根据“盟总”的指令，颁布了《禁止垄断法》，禁止私人垄断市场和非法的限制交易，促进自由竞争，防止日本企业坐大。

1946 年 10 月 21 日，按照“盟总”的“农民解放指令”和第二次“劝告”，颁布了《农地调整法》。通过实施《创设自耕农特别措施法》、《农地调整法修改

法》，开始了解放农民、瓦解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第二次农地改革。至1950年7月农地改革结束，90%的农民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以赎买方式基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对先进农业机械设备需求的提高，粮食增产，减缓了城市口粮供应的压力，稳定了农村并开拓了国内市场的容量。

1946年12月，教育刷新委员会接受了美国教育代表团的劝告，起草了《关于教育理念和教育基本法的报告》。据此，1947年3月31日，废除以宣扬"忠君爱国"为教育指导方针的《教育敕语》及受其制约的旧《国民教育令》、《中等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和《大学令》等教育法令，另颁《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新的教育法，将民主教育、尊重真理和确认个人尊严作为新的教育方针。从此，美国式教育理念和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本科4年制的美国式学制引入日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教育理念成为历史的陈迹。

总之，在第一届吉田内阁执政期间，遵照"盟总"的指令，在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和教育改革等方面，均有所作为。尽管在执行"盟总"的指令时，例如解散财阀的过程中，并非那么心甘情愿。上述改革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经济构造和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通过这些领域的民主化、非军国主义化的全面改造，实现了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上的易弦更张。这种变更，是在大日本帝国崩溃的历史转折关头，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按照其自身价值取向、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对日本进行改造的过程和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充当了战后民主改革的主导者。通过改革，将日本改造成在东北亚展示美国式价值观、自由民主运作程式的橱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因素深深楔人战后日本国家和社会生活，以美国化为时尚，甚至主张将日本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的言论者，不乏其人。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吉田内阁，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接受美国的指导，确立了恢复日本经济的基本方针。由于战争的破坏，战败初期的日本经济凋敝，处于崩溃的边缘。美国在按照自身的意愿改造日本的同时，也在为挽救日本经济出谋划策。在美国的授意下，在第一届吉田内阁时期采取了若干应急措施。为稳定金融秩序，1946年10月8日，公布了《复兴金融金库法》，1947年1月25日复兴金融金库营业，设法筹集恢复经济的发展基金，并首先向煤炭、钢铁等特定部门注入资金。1946年12月27日，吉田内阁在确立《第四半期物资需求供给计划》时，决定改变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法，突出重点部

门，以解决全面需求与物资短缺的矛盾。这种方法被称为“倾斜生产方式”，即资金投向重点发展的煤炭、钢铁、化肥以及运输等国民经济基础部门，恢复经济扩大再生产的机能，拉动整个工业部门的复兴。其中，首先动用复兴金融金库贷款，投向煤炭、钢铁部门。这种应急性的生产方式，起初由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有泽广提出，随后被吉田内阁采纳，虽然行之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恢复的难题。这种情况，促使吉田再次将急切的目光投向美国。

自 1948 年 10 月起，吉田开始了连续 4 次组阁的长期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对吉田再次组阁出任首相非常满意，并随着对日政策大幅度调整力度的加大，对日援助的幅度大为增加。作为赠送给吉田内阁的第一份厚礼，同年 12 月 18 日，美国国务院与陆军、海军部发表联合声明，提出《日本经济自立复兴九原则》（通称《稳定经济九原则》）。次日，麦克阿瑟致信吉田，在向他通报了这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的同时，指示吉田加以执行。1949 年 2 月 16 日，第三届吉田内阁成立。组阁当日，吉田就发表谈话，强调要忠实地贯彻“稳定经济 9 原则”。美日双方的当权人物何以如此看重《稳定经济九原则》？首先，九原则的政治意义在于：标志着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转折性的调整，即由打击、改造日本，转变为援助、扶植日本。还是在 1948 年 10 月 7 日，国家安全局（NSC）提出的《关于对日政策的 NSC 报告》（NSC13－2）中，不仅提出了对日媾和的时机问题，更强调了对日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报告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并行，经济复兴应该成为今后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的。”为此，报告建议对日实施物资和资金方面的长期援助计划，推行包括向日本提供商船在内的恢复日本对外输出能力、扫除对外贸易障碍的新政策，并建议向日本政府提出加大劳动力度、提高产量、维持高水平输出、尽可能缩小劳资纠纷、紧缩财政等劝告，成功实施复兴计划。① 这份报告，实际上已经确定了《稳定经济 9 原则》的基调。

其次，九原则的经济意义在于：以牺牲职工、农民和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刺激经济的恢复。《稳定经济 9 原则》主要包括了国家预算综合平衡、增加税收、限制扩大信用、稳定工资、控制物价、强化外汇管理、加强资材配置、增加国产品的生产、改善粮食征购等。凡此种种，都为战后日本经济摆脱困境提供了便利

①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 年，第 79—81 页。

条件。1949年2月，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作为“盟总”的经济顾问，被杜鲁门任命为公使来东京，负责指导稳定并复兴日本经济的各项事宜。3月7日，道奇发表了《关于实施9原则的声明》。强调：“真正的稳定和进步，必须立足于在健全的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有效的稳定，必须将作为财政政策基本手段的政府预算与总政策的确定结合起来。”所谓“总政策”，即财政紧缩政策。道奇强调美国为复兴日本经济，至1948年共支付了12.5亿美元，如果一味依赖外国的援助，增加补助金，必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并引发国家危机。为了给困境中的日本经济注入活力，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道奇还承诺确订日元对美元的单一汇率。[①] 道奇依据“稳定经济9原则”，为日本重新编制了1949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吉田内阁全盘接受了这个预算，4月20日国会通过了道奇预算案。作为回报，美国决定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长期稳定不变。在道奇指导下，吉田内阁压缩对物价的补贴金数额，停发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加强税收，裁减国营企业和行政人员。上述举措通称“道奇路线”。休克式举措的实施结果固然减缩了货币发行量，因而遏制了物价狂涨的势头，物价也在逐年回落，但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和职工失业，也成为“道奇路线”的伴生物。1949年5月公布《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后，公务员和国铁职工成了人员裁减的主要对象。据统计，1949年2月至1950年6月，40余万人被裁。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员为日共党员或日共的同情者。在推行“道奇路线”时，突出反共特色是吉田内阁的一个创造，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冷战的阵营划分，争取尽可能多的美援，稳固国内统治秩序。

继道奇之后，为从税制改革角度支持“稳定经济九原则”，1949年5月，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S·肖普为首的税制改革代表团抵达东京。经过几个月的详细调查研究，9月肖普代表团向“盟总”提出了长达10余字、共计正文2编14章、附录2编4章的《肖普使节团日本税制报告书》（通称“肖普劝告”）。这份报告通过对1949年度财政预算的分析，认为在现行税制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公共事业中国家税收投入不足、法人税征收额度过低、个人所得税过高、税务管理混乱、重复征税等问题。建议：为增进国库收入并充实地方财政，应该对各类税收制度加以配套改革。其主要举措为：（1）调整并均衡税收，降低个人所得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217—218页。

税、提高法人所得税；（2）明确国家和地方税源的对等额配原则，避免重复征税，都道府县市町村等地方税独立运作；（3）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合理化改革，根据纳税者的实际收入纳税，等[①]。麦克阿瑟对肖普的税制改革建议表示赞赏，9月15日转送给吉田内阁，吉田全面执行不殆，加紧充实日本经济复兴的基础。

其三，利用中国局势的巨变与冷战初期的新形势，展示日本的战略价值，为美日媾和创造条件。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和重建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构想，曾经在罗斯福当政期间，推行过使中国大国化，并在战后取代日本，成为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并遏制苏联的东亚主导国，维护远东稳定“世界警察”。

但是，在美国在日本进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造期间，中国局势发生了令杜鲁门政府始料未及的巨变。1946年7月，50万蒋军进攻苏皖解放区，国共两党开始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3年内战。美国援助下的国民党政府连战连败。1949年5月，蒋介石退往台湾。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相机与中共之间的秘密接触无果而终。6月，毛泽东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总方针。8月，在年初苏共代表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探寻毛泽东的建国方针后，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得到斯大林援助新中国的承诺。同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司徒雷登奉命离任回国、中美接触渠道断裂，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宣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破产的批判文章，与美国分道扬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②]向全世界表明了新中国反帝反美的外交立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形成欧亚东方阵营。从1945年至1949年，短短的4年期间，中国局势的巨变成了杜鲁门政府的噩梦。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老盟友蒋介石惊魂未定、气息奄奄，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旗帜鲜明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10月3日杜鲁门发表的承认新中国的3个条件，即（1）事实上控制中国的领

---

① 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第1994年，第121—123页。

② 《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第10页。

土和行政机构；（2）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3）统治得到人民认可等[①]，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10月24日，中国公安部门逮捕了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政府予以回击，两国关系骤趋紧张。种种事态表明：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设计的战后远东蓝图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大陆权力更替不可逆转，并令美国政府越来越感到绝望。

中国局势的巨变并非孤立的现象，美苏均以不同方式介入其中。美苏关系由于共同的敌人轴心国被击败，正在失去维持战时合作的基础。不仅如此，美苏两国还因为各自世界战略的冲突，急剧走向对抗。继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揭开冷战序幕的演说之后，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演说》，强调加强西方阵营的合作，抵抗苏联“极权主义侵略”。以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美国军方出于向重点地区和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以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率先抛弃了罗斯福的构想，回归日本在军事战略上比中国更重要的传统观念。同年4月，美国三军联合调查委员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题为《从国家安全看对外援助》的研究报告。该文件确定欧洲、中东、拉美、远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并依据上述地区内各国的重要程度，排列了接受美援的先后顺序。日本排在第13位，中国则位列日本之后、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军方还特别强调日本为“唯一”能在远东阻挡“共产主义侵略”的国家，因此报告的结论自然就是：“在所有太平洋国家中，只有日本最值得美国优先考虑为恢复其经济和军事潜力而给予援助”。[②]

较之军方看重现有的军事态势并迅速制订应变对策，政界谋略家的眼光更长远。早在一年前，身为美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时，就在1946年2月22日致国务院第511号电报中提出苏联问题是“我国外交所曾面临的最巨大的任务，它应该是我们的政治参谋班子在目前这个时刻进行工作的出发点”，鼓吹对苏冷战的乔治·凯南，[③] 1947年5月，作为美国国家战略首席智囊人物、国务院政策设计组主任，继续从对苏冷战的立场来观察中国局势的变化。凯南在讲演中强调，即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也并不会如同在中欧那样产生严重影响。他还断言说，俄国

---

①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上），第74页。

② JCS1769/1, April 29, FRUS, 1947, Vol. 1, pp. 738－750.

③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45—1980），第11页。

将来同样会在中国遭受挫折。凯南对中国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1）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亚洲的军事强国，即使中国形势恶化，也不足以对美国构成难以容忍的威胁。（2）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不会甘心长期为苏联所控制。①

然而，在中国或日本在对苏冷战大格局中战略价值孰轻孰重的判断上，凯南和军方倒是不谋而合，也强调重新关注日本。1947年9月4日，凯南在政策设计组第54次会议讨论中，列举了下述理由：（1）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战略上，日本在美苏对局中的地位极为重要；（2）日本在亚洲拥有最强的工业能力和数量庞大的熟练劳动力；（3）日本在亚洲拥有经历过现代战争的庞大潜在兵力；（4）日本是亚洲唯一可能在国家规模上全民动员的国家。因此，他特别强调美国必须保证日本的安全。② 9月17日，凯南在一次讲演中，从世界工业化实力对比格局的角度，再次强调了日本的战略价值。他认为：世界上只有6大工业和军事中心，即美国、英国、德国、中欧、苏联和日本分别拥有足以发动现代战争所必备的工业潜力。其中，只有苏联对美国不友好。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未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苏联之外的欧洲和日本留在美国阵营之内。③ 在东亚，日本是唯一位列5大中心的国家。有鉴于此，凯南主张美国远东战略的依托对象应该是日本，而非毫无希望的中国。在从基础上，凯南最早也最完整地提出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构想，即组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南抵菲律宾群岛的西南太平洋岛屿链防御圈，日本和菲律宾是其中最重要的战略环节。11月，凯南领导下的政策设计组在题为《世界形势概述》报告中，再度强调："在几乎全部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远东地区，"对我们最为紧迫的是日本问题"；报告认为，"对日媾和问题，与盟国不可能很快达成协议，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今后一段时间继续在日本直接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为了"放心地让日本结束占领体制，需要"对我们的占领政策加以彻底的重要审查。"④ 美国政府采纳了凯南的对日新思维，对日政策随之发生转换。

---

①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1967, p. 374.

② PPS Meeting, September 4, 1947, Papers of Policy Planning Staff, National Achives.

③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 September 17, 1948, box 17, Kennan papers.

④ FRUS, 1947, Vol. 1, pp. 772－777.

1948 年 1 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考门维尔斯俱乐部的演说中，公开了转换对日政策的信息。罗亚尔说，实现日本投降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两个目标，是为了“防止日本的侵略”。他强调：由于出现了“新形势”，“产生了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因此，“在确定今后的道路时，必须充分考虑目前和此后发生的变化，上述趋势在对日初期方针确定之后出现了。”结果，“在最初实行广泛范围内非军事化的构想与建立自立国家的新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罗亚尔肯定了农地改革，但对解散财阀提出质疑。他说：“在某个阶段实行的极端排除产业集中，在进而削弱战争能力的同时，也损害了日本产业的制造能力，从而推迟了日本自立时期的到来。”他强调“我们进退两难。显然，与日本作为纯粹农业国则无法生存一样，也不可能作为商人和小工匠的国家而自立”。作为政策的调整，罗亚尔呼吁国务院和陆军部充分考虑占领初期以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出现的变化，重新思考对日政策；复兴日本经济，使之成为在东亚“发挥防止极权主义威胁作用的自立自足的民主国家”，重新站立起来。[①] 不难看出，罗亚尔所说的“新形势”、“出现的变化”、“极权主义威胁”等用语，显然是在谈论冷战新背景下，如何转变对日政策，扶植日本并使之成为美国开展对苏冷战的前哨阵地。伴随着冷战的进行，美国对日政策急剧转换。以复兴日本经济为中心的《稳定经济九原则》、“道奇路线”和“肖普税制改革建议”等举措接连推出。1949 年 5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13/3 号文件索性宣布终止拆迁日本工厂的中间赔偿计划，保留了日本的工业力量。

吉田内阁对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奥秘心领神会，积极加以配合。特别是美国重新重视日本战略地位的方针转换，令吉田们弹冠相庆。吉田出于反共的政治立场，敌视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开展的人民解放战争。1948 年 8 月，吉田致信麦克阿瑟，声称“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了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浪潮”，为了突出日本在美国东亚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吉田在信中强调说：“从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国民性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和远东的稳定力量。”[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田又以“中国通”的姿态，对新中国的前景成立说三道四。1949 年 10 月 3 日，吉田在家中单独接受合众社记者的采访，认为中国的事务“让中国人自己去

---

①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5，现代卷，第 213—215 页。

② 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年，第 308—309 页。

做”，还说“在上一世纪中，英国对中国干涉太多”，“在这一世纪中，日本又复如此”；预言“苏联未来会发现过分干涉是没有益处的”，强调“中共在苏联援助之下，已经获得了控制地位”，但其后在农村将“普遍发生反感。”① 10月9日，吉田针对通产省官员对开展中日贸易所持的积极态度大泼冷水，声明日本目前不能与中国全面开展双边贸易，因为“一切都要看‘盟总’的政策而定。”② 在东西方阵营冷战对立的格局中，心甘情愿地对美一边倒，变日本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竭力以最小的代价，获取结束占领并恢复主权地位等最大的国家利益。

五、利用冷战酿成的朝鲜战争之机，构筑美日关系的国际法基础

在冷战进程中，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充满了变数。当美国还在为“失去中国”而遗憾时，很快发现噩梦还在继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前往苏联访问，拜会斯大林。中苏两大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就发展相互关系、建构东亚战略格局达成共识。1950年2月，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中苏两国密切合作的战略目的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条约共计6条，主要规定：（1）“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及与其相勾结的任何国家重新侵略；（2）“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3）双方“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盟国于尽可能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4）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对于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以及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条约的有效期为30年等。③ 同时签订的《中苏两国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则规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军“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但“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两国“可共同

① 1949年10月3日中央社转发合众社电讯稿。
② 1949年10月9日中央社东京专电。
③ 《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1085—1086页。

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①] 通过上述条约和协定，形成中苏两国共同对付美日两国的军事同盟。

如同在调停国共冲突期间，对中国的第三种势力民主派寄予希望一样，美国国务院对中共的民族主义立场继续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试图分化和离间中苏同盟关系。因此，国务院一度从务实立场出发，盘算抛弃占据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以避免过分结怨新中国并待机改善中美关系。1949 年 10 月"华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军界发出对华强硬论的喧嚷，台湾成为美国制约新中国的重要筹码。军界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 NSC48 文件，要求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封锁、加强援蒋保台等强硬立场。11 月，麦克阿瑟等军界强硬派主张美国应不惜一切手段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中，建议美国宣布接管台湾，由美国委任统治或归还日本；[②] 12 月中旬，麦克阿瑟又向来东京访问的陆军部副部长福希斯强调说，失去台湾会对美国的太平洋安全造成致命的打击，要求宣布台湾中立，待局势稳定后，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政权。福希斯对不惜鼓吹"台独"以维护美国利益的意见表示赞成，并在回国后迅速转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总统杜鲁门。[③]

尽管如此，为了分化中苏关系和扩大中美接触的可能性，国务院和白宫另有一番考虑。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发表了仅仅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美国并不介入台湾事务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杜鲁门重申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有关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的条款，强调"美国无意攫取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也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将不会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方针"。[④] 1 月 12 日，国务卿艾奇逊重申美国在东亚的防御圈，只包括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台湾被美国排除在防御范围之外，美国国务院计划局官员与军界新星孙立人秘密接触，准备走马换将、逼蒋下台。与此同时，解放军加紧解放台湾的战前演练，东南沿海大军密布。在台湾问题上，由于美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抛弃蒋介石以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方针，在中美

---

① 《新华月报》，1952 年 3 月号，第 1086—1087 页。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Feary, "MacArthur's Views on a Japanese Peace Treaty," November 2, 1949, *FRUS 1949*, Vol. 7, pt. 2, pp. 890 – 94.

③ Voorhees's notes of meetings with MacArthur, December 14, 1949, P&O, 0 Formosa TS, RG 319.

④ 李元烨：《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7—38 页。

两个意识形态水火不容的国家之间，居然出现了短暂的战略默契期。

然而，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改变了事态向有利于解放台湾发展的势头。6 月 26 日，从休假地赶回华盛顿的杜鲁门在白宫布莱尔大厅召集军政要员的紧急会议，下达了 3 项应急措施，包括出动空军、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27 日，杜鲁门发表《总统声明》，宣布已派遣美军支援韩国政府，出动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加强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加紧援助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派遣军事使团等。[①] 同日，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召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援助韩国的决议。杜鲁门的所作所为，无可挽回地将原本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国内统一战争，变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战争；将朝鲜半岛武装冲突，扩大为台湾、印度支那的紧张对峙。特别是在其《总统声明》中，自食其言地抛出了“台湾地位未确定论”，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②] 杜鲁门的言行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6 月 28 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7 月 6 日又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对杜鲁门的《总统声明》和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提出强烈抗议。周恩来的声明指出美国的行为“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略任何其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痛斥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决定论”，申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强调中国人民必将“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③]

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双管齐下的方针，急剧激化了中美矛盾，两国关系顿时形同水火。7 月 7 日，在美国的操作下，安理会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7 月 8 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最高统帅，7 月 25 日联合国军在东京设立了司令部，7 月 31 日麦克阿瑟访问台湾，8 月 1 日宣布将台湾、澎湖纳入美国的东亚战略防御圈并缔结“美台条约”。自 8 月下旬以来，美国作战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袭击安东、临江、集安等边境城市。9 月 15 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国飞机袭击中朝边境地区中国城镇的行动有增无减。9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

①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第 48 页。

②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第 359 页。

③ 刘金质等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第 1 册，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7、8、12 页。

表社论，强调“美帝国主义已经公开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仇敌”。[1] 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2] 10月3日，周恩来通过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警告美国：“美军企图越过38线，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3] 10月7日，美军第一骑兵师、步兵第24师越过38线，向平壤疾进。朝鲜政府多次请求出兵援助。10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0月19日，志愿军第13兵团所辖4个军、3个炮兵师渡过鸭绿江。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场战斗。从此，开始了中美血战3年的兵戎相见。

朝鲜战争爆发和中美武力较量，为支持率日见下降的吉田内阁提供有所作为，以重建日美关系和复兴经济的“天佑良机”。日本始料未及地迎来因朝鲜战争军火生产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战后第一次经济繁荣时期，即“特需景气”。从战争一开始，日本就成为美军的后方基地。从1950年6月至1953年12月，用于战场特殊需要的狭义“特需”合同金额为13亿美元，其中70%为军火物资供应，30%为劳务，共获得美国支付的现金11亿1700万美元。[4] 若按战争期间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消费和外国机构支付的款项计算在内的广义“特需”统计，同期收入高达23亿多美元。[5] 在这个过程中，“特需景气”应运而生。库存的积压物品售空，各家工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完成订单，日本的工矿业生产指数直线上升。至1950年10月，工矿业生产指数超过战前水平，至1951年12月，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战前水平。[6] 日本的美元储备也在同期内大幅度攀升，从1949年12月的2.3亿美元增加为1951年12月的11.4亿美元，增长了4.5倍。[7] 出口贸易成倍增长，从1949年的5.36亿美元增加为1953年的12.6亿美元，增长了1.35倍。[8] 日本从此走出了

---

①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刘金质等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第1册，地42页。
③ 《周恩来文件文选》，中央文选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④ 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4页。
⑤ 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第54页。
⑥ 内野达郎：《战后日本经济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85页。
⑦ 宋绍英：《日本崛起论》，东北师大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⑧ 宋绍英：《日本崛起论》，第60页。

困境，开始了经济起飞。至于1950年10月解除政界、财界1万余人的处分，恢复其公职，以及将1950年8月设立警察预备队、1952年7月将其改组为保安队和海上警备队，1954年7月再升格为陆上和海上自卫队，使日本拥有了兵员约23万，配备各种先进武器的现代化军队等，也是朝鲜战争的重要副产品。

朝鲜战争爆发后，“盟总”发起针对日本共产党的“赤色整肃”，镇压日共等进步势力。吉田内阁紧随美国，在配合镇压的同时，也服从美国的对外战略需要，多方封堵新中国。通过以中国为敌，吉田内阁竭力制造缔结对日和约的政治气候，以完成二战后美日关系的再定位。本来在1950年3—4月间，中日贸易促进会所属的商社已经与中国外贸部门订立了进口中国大豆和媒体的合同，日本的参议院通过了中日贸易促进会议员提出的促进日中贸易的提案，两国民间的正常贸易有望顺利展开。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2月“盟总”下令对华实施全面禁运。吉田内阁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堵塞了刚刚起步的中日贸易渠道。1951年10月，吉田内阁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禁运的“巴特尔法”。1952年5月，日本友好人士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冲破阻碍访问中国。6月，在北京签订了总额为6000万英镑的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但7月加入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8月加入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CHINCOM）的吉田政府蓄意阻止贸易协定的执行。吉田内阁举行会议，宣称日本要与西方国家“巩固团结”，指责高良富等“无知人士无意间被共产党国家的宣称所利用”，讨论了处罚足帆、宫腰的措施。[①] 吉田内阁还利用舆论，散布高良一行访华违反了《护照法》，向中国出口农业机械、杀虫剂会增加粮食产量，提高中国人的战斗力和士气等奇谈怪论。在吉田内阁的阻挠下，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的实施日期一再被拖延，协议中应当出口中国的大部分日本商品被扣发。

对于日本来说，朝鲜战争不仅在经济上注入复兴的活力，形成一举走出战败后国破民穷困境的“特需景气”；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为实现条件宽松的媾和，以结束占领、恢复国家主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际上，早在1945年11月，外务省就迫不及待地设立了“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准备拟定和约了。1946年1月，由各省人员组成的干事会开始审议各种报告书。5月22日，在第一届吉

① 古川万太郎：《战后中日关系史》，原书房，1988年，第47页。

田内阁成立的当天，干事会讨论了已经形成的5份报告书。第一报告书主张分三阶段并力争在1947年夏天缔结和约；第二报告书提出“恢复主权和尊重独立”、“确保生存权和安全”、“重返国际社会”、“确立国际正义”等媾和4原则，主张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机制，国内由武装警察或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第三份报告书提出日方所希望的有关军事事项、领土、经济、国际合作、对日监督、国际条约等内容；第四、第五份报告书分别就政治或经济问题，提出具体的对应方针。[①]至9月下旬，干事会结束了对上述报告书的审议，择机提交“盟总”。1947年8月，外务省内增设审议室，以发挥内行外交官的干练业务能力。1948年12月，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两个月后，审议室完成了供联合国参考的对日和约资料集。在吉田的指挥下，日本政府焦急地期待着作出快速反应的时机。

美国对日媾和的酝酿，开始于1946年10月。当时，美国政府指令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局官员休·博顿（Hugh Borden）领导下的小组，负责拟定对日媾和方案。1947年3月，形成名曰“博顿草案”的第一份对日和约草案。在方案制订期间，冷战尚未开始，盟国联合制裁日本的大框架犹存。因此，“博顿草案”坚持战时大国合作和倚重中国的立场，主张严厉处置日本。例如，该草案主张按照《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关于日本领土问题的规定来处理；媾和后，撤销远东委员会、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盟国的大使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其25年内非武装化的有效监控，“盟总”继续推行改革，经过长时期的国际监督后，逐步恢复日本的主权；日本对战争受害国进行公正的战争赔偿，归还被其掠夺的外国资产和财物等。[②] 草案既没有规定日本媾和后由美国负责其安全的条款，也未要求在日本设立美军基地。

草案出台后，冷战骤起。在美苏从合作急剧转变为对抗的新形势下，博顿草案受到来自美国各方的指责而被束之高阁。3月17日，“盟总”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认为日本已经到了缔结和约的新阶段，强调在欧洲问题不是压制德国，而是帮助它站起来，美国在亚洲最大的问题，也是帮助日

---

① 西村熊雄：《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外交史》第27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第21—24页。

② 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92—93页。

本站起来。[1] 麦克阿瑟对日媾和的谈话，虽然引起华盛顿决策层的不快，却在美国国内的舆论界和政界引起要呼声越来越高的回应。1947 年下半年和整个 1948 年，杜鲁门政府面临着各种要求早日媾和的压力。但是，关注在欧洲对苏展开争夺的冷战战略和中国局势的不明朗，使得早期对日媾和的构想虽然一度被提出，但被暂时搁置起来。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亮明了对苏“一边倒”的旗帜后，美国政府再次启动对日媾和的过程。吉田内阁立即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予以积极的回应。当时，日本国内出现片面媾和与全面媾和等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吉田力主与美国单独媾和，在同年 11 月的国会参议院答辩发言中，吉田强调：如果单独媾和能够成为引出全面媾和的一直途径，何乐而不为，亮明单独媾和的旗号。与此持相反立场的社会党发表题为《对日媾和问题的一般态度》的声明，提出全面媾和、实现中立和不设军事基地等主张。1950 年 1 月 15 日，由左派和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发表《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要求实现全面媾和、非武装中立、反对设立外国军事基地、经济自立等主张，《世界》、《日本评论》、《世界评论》、《潮流》、《人间》等杂志纷纷加以转载，社会反响强烈。吉田内阁对全面媾和论加以冷嘲热讽，指责其虽然动听但不现实。1 月 23 日，吉田在第七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中强调，尽管所有人都希望全面媾和，但这得由国际上的客观形势来决定。[2] 言下之意，无非是继续坚持早日实现单独媾和的现实立场。老谋深算的吉田之所以坚持这种立场，一方面，是出自对冷战形势的判断；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民意所向问题。据当时《每日新闻》的舆论调查，49.4% 的被调查者支持早日媾和，认为即使推迟时日也要采取全面媾和方式的人占 33.9%。[3] 可以说，单独媾和论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并非吉田的个人杜撰。

1950 年 4 月，吉田内阁派遣大藏相池田勇人、首相特使白洲次郎等以商讨经济问题为名，前往华盛顿向美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对媾和问题的重要信息。池田在华盛顿期间，除了讨论推行“道奇路线”的经济形势、设立出口融资公司等经

---

① MacArthur interview with press correspondents, March 17, 1947, PRJ, Vol. 2, app. F, p765 - 767.

②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 4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第 160 页。

③ 日本教職員組合編：《講和問題资料》，日本教職員組合出版部，1950 年，第 225 頁。该调查只是在东京、大阪范围内。

济问题外，在与道奇的密谈中，也提出日本政府关于媾和的构想。一方面也为打开僵局作出努力。5月3日，池田向道奇转述了吉田的秘密口信。其内容包括：（1）日本政府希望早日媾和，愿意接受即使不包括苏联在内的和约；（2）为减少美国军方反媾和的阻力，日本可以向美军提供基地，如果美国政府不方便公开此项条件，可以考虑采取由日本政府请求美军驻留的形式；（3）需要研究使美军驻留而不违反和平宪法的问题。此外，吉田还隐晦地提到苏联可能先于美国提出和约草案，并以归还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① 吉田的口信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在客观上形成竞争。于是，华盛顿立即采取了相应行动。

1950年5月，共和党外交政策的首席发言人、冷战鼓吹手杜勒斯出任国务院高级顾问，参与制订远东政策。6月6日，杜勒斯向艾奇逊提出了对日媾和的备忘录。杜勒斯在这份文件中，对媾和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举措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他认为：对日媾和基本目标，应该是使日本从战时敌国转变为冷战盟友，并作为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榜样，以抵消共产主义对亚洲各国的普遍影响。由于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其容易滑入共产主义轨道，美国必须采取必要的举措加以阻止，包括：为防止日本对中国大陆贸易的"危险依赖"，尽可能取消盟国的赔偿要求以及对日本工业或原料供应的任何限制，美国向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以令其消除对日贸易歧视等。② 此外，杜勒斯还建议在缔结对日和约的同时，所有参加预备会议的国家、甚至可能包括苏联，缔结确保日本安全的条约，因为苏联在安全条约中地位并不特别重要。③ 6月21日，杜勒斯一行飞抵东京，并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谈，为对日媾和探路。

杜勒斯的备忘录确定了国务院对日媾和的基调，但国防部对美军驻扎日本和基地问题尚有疑义。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对媾和进程产生消极影响。1950年6月18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飞抵东京，与麦克阿瑟举行东京会谈。双方在力保台湾方面达成共识，但在是否尽快对日媾和

---

① 神谷不二：《战后历史中的日美关系》，新潮社，1989年，第64页。

② *FRUS* 1950, Vol. 6, pp. 1207－09.

③ *FRUS* 1950, Vol. 6, pp. 1210－12; Fredrick S. Dunn: *Peace-Making and the Settlement with Japan*, p. 101.

方面分歧依然。约翰逊等担心在日本中立化框架下实现媾和，必将丧失美国与苏联对抗所必需的战略依托，因此坚持继续占领日本。国防部的意见对麦克阿瑟不无影响，他在6月23日送走了约翰逊等人后，就于当天提出了一份关于对日媾和的备忘录，此即《6·23备忘录》。为了软化国内军界的反对立场，麦克阿瑟在备忘录中，作出了若干让步，例如放弃了先前占领结束后美军在日有限地区驻军的主张，将其修改为"日本全境均应被视为美国潜在的防御基地，美国驻军权利应不受限制地自由行使"。为了减少整个日本军事基地化"对日本国民心理的负面影响"，麦克阿瑟建议：美国在日军队部署的任何变化必须与日本总理大臣协商；驻日美军无权干涉日本的内部事务；向日本追加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作为无限制基地权利的补偿等。同时，麦克阿瑟还放弃了历来坚持的关于日本非武装中立化的主张，转而认为宪法和平条款并未否认日本的天然自卫权。虽然在备忘录中麦克阿瑟没有特别强调日本重新武装的问题，但承认了日本的自卫权，重新武装自然是水到渠成。[①] 麦克阿瑟在《6·23备忘录》中所作出的日本全境军事基地化、美军长期驻扎和日本重新武装等3点让步，使国务院与国防部的见解大幅度接近，杜勒斯认同麦克阿瑟的观点，从而加快了美国对日媾和的步伐。

6月22日，在麦克阿瑟的安排下，杜勒斯与吉田茂、众议院议长币原喜重郎、参议院议长佐藤尚武等进行了会谈。杜勒斯最关心的是日本愿意为自身的安全防卫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例如提供美军在日基地、重新军事工业化提供军事装备，以及重新武装等。在与吉田的会谈中，尽管吉田暗示在基地问题上可以作出令美国满意的安排，但却拒绝明确表态，也不愿接受任何附加条件。这与池田在华盛顿传递的吉田口信给杜勒斯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吉田对重新武装问题的反应也为消极，理由是重新武装会使日本经济难以承受，并引起民众的强烈抗议。吉田强调说，日本只希望实现"不拥有武装的自卫"。吉田的闪烁其辞令杜勒斯不得要领，仿佛进入了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②]

然而，杜勒斯滞留东京期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会谈局面明朗起来。杜勒斯立刻发现日方对待美军基地问题的态度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在29日返回华盛

---

① Memorandum on the concept governing security in post-war Japan by MacArthur, July 23, 1950, *FRUS 1950*, Vol. 6, pp. 1227 – 29.

② John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p. 383.

顿之前，杜勒斯报告国务院说，日本人已感受到“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威胁”，并因此“比过去更公开承认有必要继续保留在日美军。”[①] 随着驻日3个师的美军被派遣到朝鲜战场，日本组建一支准军事部队以维护国内秩序的问题提上日程。7月8日，麦克阿瑟致信吉田，要求日本组建编制为7.5万人的国民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现有的保安力量从1万人增加至1.8万人。麦克阿瑟的指令规定：警察预备队不同于现有的国家警察和地方警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出动、具有相当规模的机动力量。[②] 由于警察预备队名义上并非正轨军队，并不违反日本的宪法。吉田政府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加以执行。8月10日，吉田内阁公布《警察预备队令》。8月23日，7000余人的第一批队员入营并被用美国的卡宾枪、M－1步枪以及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等轻型武器武装起来。此后，警察预备队人员陆续到位，并拥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60和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以及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警察预备队成为事实上的日本军队。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目标，居然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现实。

杜勒斯回国后开展多方活动。7月19日他建议艾奇逊：充分利用朝鲜战争对日本朝野的心理影响，尽早推进媾和交涉。艾奇逊表示赞同，并在杜鲁门的支持下，着手解决国务院与国防部沟通问题。7月25日，杜勒斯和国务院东北亚局局长艾利逊以麦克阿瑟《6·23备忘录》为基础，提出新的备忘录《国际和平与安全》，很快得到国防部的回应。9月7日，艾奇逊和约翰逊将联名向杜鲁门提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合备忘录。9月8日，经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和杜鲁门批准，形成正式政府文件NSC60/1。[③] 其主要内容包括：（1）协商对日和约的程序。在华盛顿，美国与远东委员会的“友好国家”举行预备性的秘密会谈；在东京，由美国政府代表与麦克阿瑟秘密磋商，并与日本政府进行讨论。（2）预备性谈判的内容。包括与《对日和约》相关的一揽子问题，如视朝鲜战争的形势来确定和约生效的日期；确保日本在自然、工业和人力资源上不依赖苏联；驻日美军由美国指挥；美国以外的任何外国军队不得进驻日本本土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与日本签订的《安全条约》，并载明美军留驻日本，其去留由美国政府决定；给日本

① *FRUS* 1950, Vol. 6, p. 1231.

② Weinstein, *Japan's Postwar Defense Policy*, p. 51.

③ Allison to Acheson, August 29 and September 4, 1950, *FRUS* 1950, Vol. 6, pp. 1288－93.

自卫权并使之拥有行使自卫权的手段；订立《行政协定》，规定日本分担驻军费用等细则问题；不损害美国在马里亚纳、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的托管地位；确保美国对琉球群岛排他性的支配权；驻日美军有权应日本政府的要求，镇压日本国内的骚乱。（3）国务院在与远东委员会各国交涉期间，应该与参议院外交和军事两委员会沟通情况。（4）在适当的时候，并征得国防部同意后，国务院向外界公开谈判进展。[①] 以上内容，满足了国防部确保美军留驻日本、订立《美日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等要求，并力图将苏联排除在外。这样，国务院与国防部的争论平息下来，全面媾和方针也随之转变为单独媾和或曰片面媾和的方针。

9月8日，杜鲁门任命杜勒斯为专门负责对日媾和缔约的特别顾问。14日，杜鲁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已授权国务院开始与包括苏联在内的远东委员会各国，就缔结对日和约的程序问题进行非正式的磋商。随后，将根据NSC60/1号文件制订的《对日媾和七原则》，以备忘录的方式，送交远东委员会成员国。15日，杜勒斯在记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对日本重新武装不加任何限制，给予日本最大限度的经济和通商的自由，促进日本加入联合国并加入反共同盟；由于在远东发生了侵略，允许美军驻扎日本并保卫之。[②] 美国主导下的片面媾和方针，引发了国际争端。10月14日，杜勒斯开始闪烁其词地向新闻界提及美国政府已经形成对日媾和的原则，此后故意通过新闻报道，分批透露其内容。11月24日，国务院终于公布了“七原则”全文并附加了11月20日苏联政府回复美国的备忘录，点燃了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争论的导火线。

《对日媾和七原则》包括（1）“缔约国家”：任何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2）“联合国”：考虑接纳日本。（3）“领土问题”：包括承认朝鲜独立；对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实行国际联合托管；日本接受英、苏、中、美对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地位之将来决定，倘和约生效后一年以内未能解决，则应由联合国大会裁决；日本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利益。（4）“安全保障”：在联合国未能采取另外的安全措施，以承担充分有效责之前，为了维护日本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约将考虑日本的设施与美国或其他军队之间，有继续合作的责任。（5）“政治与贸易措施”：日本同意加

---

① NSC60/1, *FRUS* 1950, Vol. 6, pp. 1293–96.

② 西村熊雄：《旧金山和约》，第64—65页。

入多国反毒品及关于渔业的条约；经双方同意，可以恢复战前的双边条约；在缔结新的贸易条约之前，按照普通的例外为条件，日本给予最惠国待遇。（6）“权利要求”：所有的缔约国家放弃因1945年9月2日之前的战争行为而产生的要求权，但在盟国地区一般保有的日本人财产以及日本归还盟国国民财产而无法恢复原状时，按照损失价格协商的比例所提供日元除外。（7）“争端”：有关要求权的争端由国际法院院长设定的中立法院解决；其他争端，由外交途径解决或委托给国际法院。[①]

“对日媾和七原则”规定对日媾和的缔约国只能是赞成美国方案的对日作战国家，将台湾、澎湖、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均置于地位未定状态，赋予美军长期驻留日本的权力并为日本重新武装预留了空间，取消了盟国对日索赔的权利等，触犯了战时盟国的正当权益。因此，自发送之日起，就激起来自各方面歧义乃至抗议。苏联在11月20日回复备美国的忘录中，对美国的“七原则”逐条加以批驳：认为1942年1月盟国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规定“不得与敌国单独媾和”，美国的片面媾和与此相违背；强调美国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明文规定所属关系的台湾、澎湖、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加以地位未确定，和将宣言、公告中从未涉及的琉球、小笠原群岛由美国托管既无道理，也无根据；指出1947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制订的《投降后对日基本政策》规定禁止日本保持陆海空军，但美国却在“其他国家军队”的掩护下，重建日本军队；还强调指出：中国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强烈之苦，与对日媾和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但是美国没有采取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意见的措施等。[②] 12月4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强调“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蒋介石“绝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没有新中国参加的对日和约，“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③]

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反对美国取消日本重新武装的限制和放弃赔偿；缅甸反对取消日本军备限制；蒋介石反对放弃战争赔偿；加拿大、印

---

① 西村熊雄：《旧金山和约》，第66—68页。

② 西村熊雄：《旧金山和约》，第69—70页。

③ 《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67—71页。

度和巴基斯坦等英联邦国家也对美国过于优待日本不满，英国对中国代表权的抉择另有考虑。基本赞成美国对日媾和原则的只有荷兰和法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顽固坚持其媾和原则，杜勒斯往来穿梭于伦敦、东京，对英联邦国家又打又拉，对蒋介石等有求于美国的势力施加压力，对中苏等国采取排挤方针，执意把美国主导下的片面媾和道路走到底。

在这个过程中，吉田内阁与美国密切合作。1950 年 9 月杜鲁门和杜勒斯发表谈话后，以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熊雄为首的专业班子立即开始了研讨。10 月 4 日，完成将包括形势判断、美国草约设想、对应方针和对美陈述在内的“A 作业”，并于翌日提交给吉田。至 10 月 11 日，经政界、财界、学术界、舆论界的精英和军事专家的讨论，吉田予以批准。随后，又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迫使联合国军南撤等中美兵戎相见以及日本的战略地位凸现的新形势，在 12 月 27 日形成新方案的“D 作业”。此后，该方案经过多次修改，至 1951 年 1 月 19 日“D 作业”完成修订，并在次日将其要点报告吉田。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1）“日本与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民主国家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强化作为民主阵营一员的日本，必须完全恢复日本的自主性；为此而采取的途径，首先是按照美国的宗旨来缔结和平条约。”（2）“在美国的努力未能奏效因而需要相当时日的情况下，先与美国一国缔结和平条约。”（3）“如果说到美国的提案，最感欣慰的是七项原则没有在政治、经济上对日本加以特别的限制。安全保障是平等伙伴的合作关系，应在和平条约之外另行订立，根据美国军事上的需要来准备”；“希望冲绳、小笠原群岛留在日本”，“千岛群岛的最终地位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备感欣慰”。（4）“不希望日本重新武装”，“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经济自立和民生稳定”；理由是“重新武装会加重负担，反倒会在内部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引起各邻国对日本再侵略的恐惧”；“但应保有足以独力维持国内治安的手段”。（5）“设立增进由联合国给予一般安全保障的合作机构”等。[①] 纵观“D 作业”，说明吉田内阁一方面确定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对美“一边倒”的基本外交方针，并借助朝鲜战争战局的变化，加快实现媾和，乘机恢复国家的主权地位。另一方面，坚持经济复兴首位，有限再军备的立国方针。循此方针，吉田在应对 1 月 25 日来访的

① 西村熊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 84—85 页。

杜勒斯时，主要以“D作业”类似的理由婉拒杜勒斯对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但以同意订立日美安全条约防止谈判出现僵局。4月16日，杜勒斯再次访日时，吉田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远东条款”，即美军“为维护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可以使用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并将其列入日美安全条约。[①] 至此，美日间的媾和道路畅通，直待和会举行了。总之，吉田在美日媾和协商过程中确立的对美“一边倒”方针，为日本的发展营造了最佳国际环境。他所坚持的经济首位方针，则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而重新崛起，开辟了道路。

1951年9月4日（旧金山时间），由美国一手把持的对日和会在旧金山举行。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日本等5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国被美国无理排除在外，印度、缅甸和南斯拉夫等国拒绝出席。9月5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提议要求邀请中国出席和会，建议对和约草案加以若干修改，例如日本承认中国对东北、台湾和澎湖以及苏联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主权，琉球、小笠原群岛等岛屿的主权属于日本，美国占领军撤离日本，日本向被其侵略的国家赔偿等。[②] 在和会主席、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操纵下，苏联的提案被否决。9月7日，日本代表团团长吉田茂发表了接受美国和约的演说。吉田强调日本必须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合作，并此基础上加入联合国。在对无中国代表出席会议表示了“遗憾”之后，吉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新中国，声称：“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压迫与专制，阴谋势力在远东扩大不安和混乱，其到处公开发动的侵略，正日益逼近日本”。因此，“面对这种集团侵略”，日本“唯有取得自由国家集体保护之一途”，并将其解释为日本缔结《日美安全条约》的理由。[③]

9月8日，在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美英法等48个国家与日本签订了《对日和约》。和约共6章27条，主要规定：（1）和平条款，即日本与每一盟国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在和约生效之日起，即告终止”；“各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于日本及其领海有完全的主权”。（2）领土条款，即“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朝鲜包括济州岛、居文岛及郁陵岛在内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放弃南威岛和

---

① 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第47—48页。

② 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上册，三联书店，1983年，第383页。

③ 吉田内阁刊行会：《吉田内阁》（非卖品），1954年，第419—420页。

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放弃对千岛群岛以及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所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同意将琉球群岛、大东群岛、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硫磺群岛、冲之鸟岛、南鸟岛等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3）安全条款，即日本“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在其国际关系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总宗旨不符之其他任何方法，侵害如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各盟国承认日本以一个主权国家资格，具有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提及的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各盟国所有占领军应于本条约生效后尽早撤离日本”，但“并不妨碍外国武装部队依照或由于一个或二个以上的盟国与日本业已缔结或将缔结之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在日本领土上驻扎或留驻”。（4）政治及经济条款，即“日本承认盟国现在或今后为结束自1939年9月1日开始之战争状态而缔结之一切条约以及盟国为恢复和平而订之如何其他协定之完全效力”；放弃在《圣日耳曼公约》、《蒙得娄海峡协定》、《洛桑土耳其条约》等国际条约或协定中得到的一切权利和利益；“放弃在中国之一切特权与利益，包括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之最后议定书及其所有附件、补充照会与文件所产生之一切利益与特权”，“该议定书及其所有附件、照会与文件概行作废”；“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等。（5）要求及财产条款，即“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业务”，包括“日本尽速与曾被日军占领或曾遭受日本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要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等；“此项办法应避免以增加的负担加诸其他盟国”；“当需要制造原料时，应由各该国供给，借免以任何外汇上的负担加诸日本”；“日本放弃日本及其国民因战争状态之存在所采行动而发生的一切要求”，等。（6）争端之解决条款，即倘若本条约之任何一方发生争端时，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之。（7）最后条款，即“本条约应由包括日本在内的签字国批准，并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所有批准书应交存美国政府，并由其通知所有签字国”；“本条约所称盟国应为曾与日本作战之国家”，对于盟国之外的任何国

家，不给予任何权利、权利根据及利益；本条约应存放于美国政府档案库，美国政府将条约的一份副本送致每个签字国。[①]

在签订了《对日和约》5个小时后，艾奇逊、杜勒斯和吉田茂等随即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条约共5条，规定：（1）“在和约和本条约生效之日，有日本授予、并由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盟国陆、空、海军之权利。此种军队得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所给予的援助。”（2）“在第一条所述之权利被行使期间，未经美利坚合众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亦不得将基地上或与基地有关之任何权利、权力或权限，或陆、空、海军驻防、演习或过境之权利给予任何第三国。”（3）“美利坚合众国之武装部队驻扎日本国内及周围的条件应由两国政府之间的行政协定决定之。”（4）“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政府一经认为已有联合国之办法或其他单独或集体安全的布置，本条约即应停止生效。”（5）“本条约应由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批准，在两国于华盛顿互换本条约之批准书以后开始生效。”[②]

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是美日两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特定条件下相互合作的产物，更是冷战初期美国调换东北亚战略依托对象、日本政府密切配合的结果。回顾这段历史过程，除了众所周知的定论外，如果从美日关系的重新定位和美国传统远东政策的演进上来观察述两个条约，则不难看出经常被论者忽略的其他含义。概括起来看，这些含义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其一，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意味着近代以来美国向传统远东政策基点的再回归。所谓基点，即以日本作为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基本战略依托对象。至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缔约建交已过87年。在这一期间，依托并看重日本，一直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点。美国为日本坐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后来却不得不吞咽珍珠港事件的苦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出于击败日本并在战后抗衡苏联的需要，一度偏离了传统远东政策的轨道，转而推行“使中国成为大国”、中美对等合作以共同维护东亚和平的新方针。然而，在美苏对抗、冷战骤发的历史

① 《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33—347页。

②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

背景下，在中国接连出现国共内战爆发、老盟友蒋介石败退台湾、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将美军赶回38线以南等出乎美国政府预料的局势。于是，美国重新调整远东政策，对日政策从打击转换为全面扶植日本，重新重视日本并将其规定为美国在东北亚的最大战略基地。与此相反，在对日战争中抵抗时间最长、民族牺牲最大的中国，却被美国忽视，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于是，在策划、筹备、举行旧金山和会的过程中，杜勒斯多次出访日本，听取吉田内阁的意见，使日本得以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配角，在交涉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相反，中国却被排除在媾和磋商的所有过程之外，最终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成为美国急欲实现对日片面媾和的最大牺牲者和受害者。在《对日和约》中，日本通过条件宽松的和约，恢复了国家主权，并为经济复兴和回归国际社会创造了前提。与此成鲜明对照，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澎湖的归属本应昭告世界，却被美国的“归属未定论”搞得含混不清。而且，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在《对日和约》中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加剧了台海冲突的紧张局势，从总体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留下了最大的隐患。

其二，《美日安全条约》将近代以来美日关系重新密切化到空前的程度。美军继续留驻日本和保留驻日美军军事基地，是美国协调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意见，并在《对日和约》上达成共识的基本前提。因此，两个条约之间出现互为因果、相互支撑的密切关系。从《美日安全条约》的前言中有关“日本希望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一个安全条约，并与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和约同时生效”的宣示，即为表明两个条约互为表里的注脚。《美日安全条约》赋予日本“单独和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为了行使这种权利，并作为“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由美军“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美国“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派军驻扎日本，同时对日本提出两点希望：即（1）“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自卫责任”；（2）“经常避免任何可以成为进攻的威胁或不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军备扩张。”[①] 此两点希望表明了驻日美军的两重性：既保护日本的国防安全，又防止日本成为新的威胁或开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扩军备战。基于上述考虑的《美日安

---

① 《国家条约集》（1950—1952），第393页。

全条约》规定驻日美军具有负责日本安全和平息内乱的双重机能，驻日美军基地仅由美国使用，合法而无限期地驻扎日本。通过由美国直接掌握了日本国防和国内安全的控制权，进入半占领状态的日本凭借美国的保护，把节约下来的大笔军费开支，投入经济建设，迅速走向经济大国；美国则借助掌握日本国家安全钥匙的机会，构筑了介入东北亚国际事务的永久性阵地，成为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影响该地区全局的巨大国际存在。由于这种存在得到国际法的保护，从而奠定了美日特殊关系的牢固基础。

如果从横向观察《美日安全条约》，美日关系的特殊性则一目了然。在签订《美日安全条约》之前，美国还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订了相应的安全条约，即1951年8月30日签订于华盛顿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1951年9月1日签订于旧金山的《美、澳、新安全条约》。同样是在冷战初期西方主权国家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但在《美日安全条约》中，规定：日本希望美军驻扎，“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因此，日本“授予”而美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陆空海军的权利”，驻日美军既用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的安全”，也可以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与此同时，驻日美军基地成为日本的“国中之国”，因为该条约强调未经美国的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亦不得将基地上或与基地有关之任何权利、权力或权限，或陆、空、海军驻防、演习或过境之权利给予任何第三国”等等。[①] 但是，在美国与菲律宾以及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的安全条约中，第2条均采用了相同的措词，即“为了有效地达到本条约的目标，缔约国将分别或共同地以自助或互助的方式来保持并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个别的和集体的能力。”在这条规定里，强调的是“自助”和“互助”，保持和发展的，也只是“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措词基本相同的第3条中，所强调的是“当缔约国任何一国认为缔约国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在太平洋受到威胁时，缔约国应共同协商”；第4条则规定在发生武装攻击时，“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付共同的危险。”[②] 显然，美国对菲澳新三国所承担的，并非动用武装力量，而是道义的支持。上述规

①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
②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24—328页。

定，若与几乎视日本为美国的第 51 个州而加以全面、长时期保护的《美日安全条约》相比较，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如果从纵向观察美日安全保障体系的变迁，形成与冷战期间的美日特殊关系同样一目了然。1960 年 1 月，岸信介内阁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订立了《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条约》（亦称新“美日安全条约”）。条约在强调美日两国均为联合国成员国对等关系、取消了美军镇压日本内乱等有损日本国家主权条款、条约有效期为 10 年以及另订《美日行政协定》以确定驻日美军地位的同时，继续在第 6 条中规定：“为了对日本的安全以及对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被允许使用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①] 这样，即使该条约第 9 条宣布旧《美日安全条约》失效，但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继续使用军事基地等框定美日特殊关系的基本条件并未变化，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就继续存在。进而应该看到，由于新“美日安保条约”消除了影响美日两国关系健全发展的消极因素，使两国的特殊关系得以继续强化。1970 年 1 月“美日新安保条约”自动延长，构成冷战后期美日关系的基本国际法架构。

概言之，突如其来但又事出必然的冷战，对战后美国回归近代东亚传统政策、重建美日关系，产生了无以取代的深刻影响，造成美日关系的主从化、稳固化和密切化。而美日同盟又使东亚冷战对峙格局全面形成。

①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 3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年，第 421 页。

第十章　美日与苏中在东亚冷战对峙格局的形成

冷战在欧洲兴起之后，美苏矛盾对峙不断加剧，并向亚洲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起着关键性作用，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成为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对日媾和过程的变化为线索，勾勒出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美苏中日关系、对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①]

一、中苏同盟条约与美国对日媾和的决策

对日和约问题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不仅涉及到美国、苏联、中国等国家战后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②] 从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关于苏

---

① 笔者对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专门研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② 就笔者所见，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如：Michael Yoshitsu, 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5; Howard Schonberger, Peacemaking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 1951－1952, *Diplomatic History*, 10: 1 (Winter 1986)；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张淑雅：《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台湾问题（1950—1952）》，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三届讨论会论文，1996 年 3 月；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 年第 2 期，以及崔丕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新作《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感谢崔丕教授在论文发表前即提供给笔者参考。

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①]

众所周知，对日媾和从最初提出的设想到最后形成的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程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由美、苏、英、中等国外长会议协商，并遵循大国一致的原则，后来实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远东委员会商议，遵循的是多数通过的原则。从方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全面媾和，后来实现的是片面媾和。从内容上讲，原先确定的是把日本作为战败国进行管制和剥夺（解除武装、赔偿等），和约签订后撤走占领军，后来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新的盟国看待（重新武装、免除赔偿等），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冷战状态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和约方针。[②] 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但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导致美国主张对日尽早媾和，单独媾和，乃至改变东亚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投降告终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交战双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11月就开始准备媾和，并经反复研究于1946年5月提出了有关文件，设定于1947年夏左右缔结和约。[③] 然而，媾和的方式和条件，毕竟不是以战败国的愿望为转移的。[④]

---

① 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从俄国学者开始的：Б. Н.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 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1；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ия-Япония，Обречены н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 и заметки историка，Москва：ПИМ，1996；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年）论文。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② 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第197页；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提交“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上海，2004年）论文，第1—2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9页。

③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64页。

④ 1945年9月，美国政府发表的《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则：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用发展和平经济的办法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见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到1947年夏天，冷战态势在欧洲已经出现。[①] 不过，对于亚洲，美苏双方都采取了稳定局面的方针。因此，美国虽然确定了在欧洲对苏遏制政策，但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仍坚持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宗旨。这就是美国国务院1947年3月完成的对日和约“博顿草案”的出发点。[②] 在此基础上，7月11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开会时间暂定为8月19日，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美国倾向采取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制。[③] 7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的建议，认为其程序违背了以前盟国所通过的决议。莫斯科重申了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特殊利益。[④] 美苏关于对日和约的分歧首先在程序问题上反映出来。不过，预备会议推迟决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反对。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对（包括英国和中国），更主要的是美国内部开始重新考虑对日媾和的方针了。

一方面由于冷战在欧洲的兴起，美苏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状态，另一方面，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使美国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特别是让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期望彻底落空。于是，回国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再把分裂而动乱的中国看作美国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帮手，而开始把眼光转向日本。[⑤] 由此，博顿草案遭到美国军方和“遏制”理论创立人凯南的强烈反对。此后一段时间，在凯南的主持下，美国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媾和设想，其基点已完全从“大国合作”转为“美苏对抗”。1948年3月25日，凯南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美军在和约后继续留驻日本，坚持在美国的监督下重新武装日本等新方针。[⑥] 在凯南的推动下，国务院倾向于认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将稳定的日本纳入亲美的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系中去，成为追随美国政策的值

---

①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② 关于博顿草案，详见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98 - 99；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页。

③ 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37 - 338页。

④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 6。1947年7月22日苏联备忘录的英文本见香港大学所存缩微胶卷：XG0181，MF2527243 - 0526，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文本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9—40页。

⑤ 美国学者梁思文对此有专门研究，见 Steven Levine,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 Mission in Manchuri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 №2, Fall 1979, pp. 349 - 375。

⑥ 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53 - 361页。

得信赖的盟国”，从而主张推迟媾和，缔结和约的性质亦非惩罚性的，且不必非有苏联和中国参加。这些内容被纳入了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1948年10月9日），成为美国对日媾和的基本国策。[①]

此期，苏联始终坚持在1945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为对抗美国，斯大林不得不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示友好。在1947年11月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建议于翌年1月在中国召开专门的外长会议，讨论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②] 1948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国民党政府透露，将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其目的在于以中苏条约为基础，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如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苏方愿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与中国共同研讨对日政策”。[③] 在1949年5月23日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关于确定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对日和约条款的会议日期的建议。6月20日，苏联再次重复了这个建议。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④]

就在对日媾和问题因美苏意见对立而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49年夏天，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的亚洲政策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分歧、争论充斥白宫和五角大楼，1949年12月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反映了这种状况。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方针，以及“在西方实行战略进攻，在东方实行战略防御”的基本概念，不过是体现了华盛顿决策者面对其亚洲政策的失败，既要寻找借口，又要进行补救的复杂心态。[⑤] 看似形成统一意见的美国亚洲新方针，并没有消除决策层内部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方面的对立主张。

分歧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

---

① 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的形成，崔丕有专门的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形成探微》，《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另参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87—91页。

② 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 6。

③ 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1948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12.1/002，改善中苏邦交，第60—63页。

④ 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 6。

⑤ 关于对美国NSC48/1和48/2号文件具体内容的转述，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71—375页；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国务院则提出核心的问题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关于对日政策，军方人士认为既然美国要在远东对苏联保持战略守势，就应该把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国，推进日本经济复兴，减缓赔偿要求，允许日本拥有最低限度的军备，同时在和约中规定美国有权占领冲绳、琉球各岛和横须贺的海空军基地。为了约束苏联和中国的行动自由，必须由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交战国签署对日和约，实现全面媾和。在所有这些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应推迟媾和进程，以免“减弱美国在日本的势力”，并因此建议杜鲁门暂时不再授权讨论和约问题。外交人员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主张早日媾和，以尽快结束对日占领，从而平息“日本人与日俱增的不满和反抗”，保证日本在美苏对抗中与美国结成可靠的联盟。为了满足军方的要求，国务院工作小组在1949年10月提交的全面和约草案中，提出了美国继续对包括部分琉球群岛在内的一系列岛屿的托管权，以及通过一个预先约定的日美安全条约，以保证美军在占领终止后仍然留在日本。同时，为了引诱中国和苏联接受这个条约，准备拿台湾和南库页岛作为代价。如果苏联和中国仍然反对，美英则应该单独对日媾和。在双方激烈的争论中，杜鲁门表示倾向国务院的意见，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代表也极力支持国务院的方案，只是强调美国必须控制台湾。但由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不赞成片面媾和，更反对美国独占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坚持认为对日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①]

这里有一个逻辑的链条把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和中苏关系的状况连接在一起。从上述争论的内容分析，如果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成功，苏联的势力就不会很快扩展到亚洲，控制台湾的问题也将继续排除在美国远东战略防御的考虑之外；新中国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肯定会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承认，把中国（甚至苏联）排除在外的单独媾和的方针就更加难以推行；由于亚洲局势的相对稳定，美国独占日本和把日本纳人反共同盟的做法就会遭到包括日本在内

①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165 - 21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197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6—107页。库页岛又称萨哈林岛（俄国）、桦太岛（日本）。

的更多国家的反对，按照美国军方意愿实现对日和约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减弱。果真如此，美国决策层内部关于对日媾和方针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争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然而，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缔结了同盟条约。中苏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其在远东的未来对手，条约中还特别提到双方保证要“经过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①] 其结果是为美国内部的和解创造了条件。国务院在台湾问题上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对日和约问题更加显得紧迫，也促成单独媾和及早媾和的观点占了上风。

就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②] 3 月 23 日，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也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备忘录，主张在媾和后恢复日本在外交、内政两方面的主权，但在军事上仍保留盟军总司令部，占领军亦留驻日本，保持半占领状态，以备不时之需。[③] 此时，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关于日本媾和问题的意见正渐渐趋向一致，双方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在占领期结束后允许日本恢复有限武装和少量武器生产，保持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及驻军权利等方面，但在媾和的时机和具体条件等问题上还有分歧。[④] 在沟通和弥合双方意见的过程中，新任国务院高级顾问并负责主持对日媾和事宜的杜勒斯以及主政东京的麦克阿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在中苏结盟的背景下，把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台政策捆绑在一起。

4 月 7 日杜勒斯提出，安全问题和基地问题可以通过美日双边协定解决，而核心问题是尽快结束占领，给日本主权，否则，如果日本反美，那么不论美国在日本有多少驻兵和基地，都将失去其作用。此外，如果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国家组成某种共同防御体系，对日和约无论是否得到苏联的支持都不会有问题。[⑤] 5 月 18 日杜勒斯再次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就是“中立台湾”和让日本

---

① 条约全文见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 年）》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0 年，第 9—11 页。

② A. Кошкин, 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0, №12, c. 57。

③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 107 页。

④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47 – 249。

⑤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0, Vol. 6, *Far East and Pacific*,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161 – 1166。

独立。[1] 受到杜勒斯的影响和鼓励，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具体步骤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此相配合，就要增加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援助，并加速对日媾和。腊斯克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要把日本作为未来的盟友，现在就必须立即表明态度。[2] 到6月初，国务院关于对日和约的构想已经进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日程和步骤。但军方坚持己见，他们唯一的担心是和约签订将导致美国在日本军事力量的减弱。于是，麦克阿瑟的意见便有了重要地位——国务院和军方同时决定访问东京。[3]

在台湾问题上以强硬立场著称的麦克阿瑟，此时在日本问题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过去他宣称任何保持基地的动作都将引发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现在则认为必须把日本同意"保留美军基地"作为结束占领的条件。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压制政策，6月6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肃日共执行委员会及《赤旗报》员工，利用原为镇压极右派军国主义制定的法律，禁止共产党领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为了争取这位将军的支持，杜勒斯在启程访问东京之前，经艾奇逊同意，决定与国防部和麦克阿瑟作一笔交易，即以美国对台湾的防御重新作出承诺，换取他们支持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4]

6月17日，杜勒斯率领的国务院代表团与由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率领的国防部代表团同时到达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会谈。因受到华盛顿重视而颇为得意的麦克阿瑟当然知道代表团的目的：一个为了日本，一个为了台湾。为此，麦克阿瑟准备了两个长篇备忘录，其核心是，如果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夺得主动，就必须缔结对日和约并保证台湾不受到侵犯，二者不可缺一并互为补

---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314 – 316。

② *FRUS*, 1950, Vol. 1, pp. 347 – 349; Rusk's report of May 31, 1950, DOS, RG 59, in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61 – 263。

③ 详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8页；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 255。

④ *FRUS*, 1950, Vol. 6, pp. 1205 – 1207、1221 – 1223; 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 – 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for Confer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p. 11。

充。[1] 在访问的最后几天，两个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数度会谈。最后经麦克阿瑟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妥协。麦克阿瑟6月23日的备忘录反映了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为防卫作战之需要，整个日本领域作为潜在的基地，给予美国以无限制行使防卫权力的自由。此外，承认日本虽然在宪法中规定放弃战争，但在“受到侵略攻击时”拥有自卫权。在签订和约的同时，缔结日美安全协定，日本给美国以驻军及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2] 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像一座桥梁，最终将政府各部门联结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和平条约。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是保证了美国在日本保持军队和拥有基地的权利，有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前提，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反对尽早达成对日和约的气氛很快就消失了。[3]

此外，日本的态度对于东京谈判的结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吉田茂政府担心美国的内部争论延误媾和进程，反复表示在和约签订后日本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并警告说，苏联有可能赶在美国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动的和约条件——放弃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日本政府6月1日发表白皮书，宣布愿意同任何承认其独立的国家签订和约。[4]

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5] 这种状况表明，东亚冷战的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

二、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就在约翰逊和布雷德利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人民军大

---

①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74 – 276。

② *FRUS*, 1950, Vol. 6, pp. 1227 – 1228.

③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86页。

④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57 – 259。

⑤ 麦克·沙勒的研究认为，约翰逊和布雷德利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他们在离开东京时仍反对和约。（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74、278。）笔者很难接受这个结论。从东京谈判的结果看，军方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他们没有理由固执己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恐怕也只是对日媾和的具体程序和时机了。

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

战争犹如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①]在东亚，关于韩国问题，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开始陆续参战。关于台湾问题，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显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麦克阿瑟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远东盟军总司令部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美制武器。[②]杜勒斯回国不久就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③]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约翰逊，目前的环境使得缔结对日和约有了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诺重建武装，军方不再反对批准对日和约。随后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随即签署了联合备忘录，并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④]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

---

① CCS 381, Formosa (11－8－48), sec. 3, JCS Records, RG 218, in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83－284。

②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93页。

③ *FRUS*, 1950, Vol. 6, pp. 1243、1247－1248。

④ *FRUS*, 1950, Vol. 6, pp. 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和的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串联和准备，10 月 26 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①] 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依据和约，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还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②]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派兵参战。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 10 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是为了与中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③] 例如，1950 年 3 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苏联在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 5 月 12 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④] 又如同年 9 月 1 日，中国人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

---

①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Япония, с.43。另见《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26 日的报道。

② FRUS, 1950, Vol.6, pp.1332 – 1336;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108; 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76—77 页。

③ М. С.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 Москва, 1996, с.123 – 124.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 – 00022 – 01，第 1—8 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13 页。

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1] 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而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备忘录最后提出，"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2] 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3]

11月20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让译员照本宣科地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后，马立克也只是重复地提出问题，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主动的精神。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4] 苏联并不是不了解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自己的主张。按照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5] 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摊牌，在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毛泽东此时对战争的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

---

①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 - октябрь 19 гг.), с. 49 - 50.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1—10页。

③ 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④ *FRUS*, 1950, Vol. 6, pp. 1352 - 13543。

⑤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с. 124.

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1] 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 月 4 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2] 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3] 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

中国当然也考虑到利用朝鲜战争促进台湾和对日和约问题的解决。就在国际社会要求停战的一片呼吁声中，12 月 7 日北京时间 3 时，周恩来召见罗申并告知：近来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等国不断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提出以下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苏联政府的看法。在当天的回电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又不让中国马上就宣布这些条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汉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4]

看来，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之后，才肯认真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因此，对于 12 月 27 日美国国务院针对 11 月 20 日苏联备忘录给予的答复，莫斯科只是转抄了一份给北京，[5] 而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反应。

---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 135 页。

②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 年 7 月，第 635 – 636 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第 354—357 页。

④ 《朝鲜战争文件》，第 639、641 页。

⑤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 – 00086 – 02，第 13—20 页。

1950 年 11—12 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战役把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沉浸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甚至讨论了全面撤退的问题。[①] 随后志愿军便打过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此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 1 月 13 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 1 月 17 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已是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不得不败退三八线以北。[②] 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如 3 月 12 日苏联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雅尔塔协定，“日本应当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让给苏联”。华盛顿的回答是：“美国认为准确地界定千岛群岛的边界应当是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的议题或者应当由国际法庭来作出法律裁定”。[③] 在 3 月 30 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④] 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曾努力促使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利益。[⑤] 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还在递交照会之前，杜勒斯在 3 月 21 日国务院

---

①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第 333 页；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 7，*Korea*，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 1324 - 1328。

②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342—368 页。

③ Кошкин，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с. 58.

④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 6*，*Asia and the Pacific*，Washington：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 908；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4。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 80—86 页。

⑤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9.

讨论和约时就指出："如果苏联拒绝条约的规定，我们考虑从和约中完全删除有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条款"。对此，4 月 24 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谈话时说得更加透彻：条约草案中关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套用了雅尔塔协定的字句"，是因为美国"知道苏联不会参加对日媾和条约，所以不想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原文，给苏联以拒绝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借口"。[①] 由此看出，美国实际上知道苏联不愿就范，并且希望如此。

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朝鲜战局的变化使斯大林颇为失望，随即对美国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不过，他此时能指望的只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坚决抵制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和驻军政策，并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线。1951 年 4 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国的德田秋一和野板参三等日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帮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检讨了过去的看法，承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并制定了新的革命纲领。[②] 6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日共的新计划提供 1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委托苏联情报委员会转交日本共产党。[③]

同时，苏联开始与中国磋商如何抵制美国的媾和方案。1951 年 5 月 6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并建议在 7—8 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表示完全赞同。[④] 5 月 7 日，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柯克。5 月 22 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苏意见"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完

---

① FRUS，1951，Vol. 6，pp. 942-94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 199 页。

② 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p. 12。关于斯大林与日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有关的回忆录，Н. Адырхаев，Встреча Сталина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0，№2，с. 140－144。

③ 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 89，оп. 50，д. 3，л. 1。

④ 《朝鲜战争文件》，第 755—756、757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第 274 页。

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①] 5月24日苏联全文发表了这个措辞强硬的文件。[②] 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③] 6月25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场"。[④]

就在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媾和方案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⑤] 6月5日，凯南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⑥] 美国人猜测的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军事上占有优势者，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军事优势，美国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⑦] 7月3日美英制定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但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

---

①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58、360、361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86—87页。

②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英文全文见 XG0187，MF2527245－0990，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③ 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95、100、107页；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7。

④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02，оп. 7，п. 25，д. 2，л. 26－31。

⑤ 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朝鲜战争文件》，第777—786、804—11、835—840页。

⑥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页。

⑦ 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78－81页；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第32－35页。

难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①] 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国仍然不断制造事端，如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8月19日停战谈判中朝方军警遭到武装袭击，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来凤庄中朝代表团驻地等等。[②] 开城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而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1951年7月6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及美英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更使苏联感到气愤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还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知，苏联政府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柯克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定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美英8月13日的草案。[③]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

① 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

② 参见《朝鲜战争文件》，第941—100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页。

③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9 – 91.

交上的孤立境地。面对这个难题，苏联政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 月 21 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出席旧金山会议，显然因遭到拒绝，他在 8 月 1 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但几天以后，苏联的想法又变了。8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外交部准备的决议草案。与 1947 年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方针如出一辙，苏联的立场是：出席旧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随后，苏联于 8 月 12 日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并解释说，“苏联很难拒绝参加上述会议，因为这种拒绝可能会使社会舆论认为苏联不愿意与日本恢复正常关系。”苏联保证将在会议上提出必须邀请中国代表的问题，并强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缔结对日和约”。① 不久，苏联又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关于日本赔偿及限制武器规模的建议。② 对于苏联出席会议的做法，中国显然是理解的。8 月 15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能始终坚持原来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③

旧金山会议的过程十分简单，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先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建议的演说，提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遭到拒绝后，苏联代表又提出了关于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波兰、捷克等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④ 中国人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并事先准备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9 月 3 日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宣称，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会议。⑤ 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北京时间 9 月 7 日晚，中国外交部就把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

①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91 - 93、95.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 - 00086 - 02，第 6—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第 171 页；《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62—364、366—367 页。印度和缅甸最后因不赞成美英条约文本而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 9。

④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68—386 页；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 98；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 9。

⑤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178 页。

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①]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5个小时后，艾奇逊和吉田茂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美国直接掌握了日本国防和国内安全的控制权，同时与日本结成紧密的反共同盟。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签订了“日华和约”。[②] 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构筑了介入东亚国际事务的阵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的对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首先面临的就是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还在和约生效前，苏联外交部已经估计到这方面可能出现麻烦，但没有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只能等待。1952年5月21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报告说：鉴于对日和约已经在各国相继获得批准，美国将公开发表声明，以“停止对日本的占领”为借口，宣布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现在都已经无所事事”，而那时就只剩下苏联代表了。为此，苏联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建议，不要等美国采取行动，“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撤销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同时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但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样一个正式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撤销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因此，苏联只能在美国采取行动后，发表一个谴责性声明。维辛斯基还提出，由于“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应“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维辛斯基又建议，应事先向中国通报此事，说明这并不改变苏联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立场。[③] 但即使在建立贸易代表团的

---

①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 с. 130.

②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105—110页。

③ 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2月21日，SD11420。笔者自存俄国档案复印件（下同）。

问题上，从策略考虑，苏联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动。[①]

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活动。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②] 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为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③] 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倡议，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非正式探测。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基斯连科不应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④] 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⑤] 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⑥]

更令莫斯科头疼的是日本为美军生产武器的问题。随着对日和约生效，盟军总司令部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⑦] 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

---

①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2月23日，SD11430。

②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吴世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页；《人民日报》，1952年4月30日。

③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SD11598。

④ 详见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日，SD11599。

⑤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5月20日，SD11600。

⑥ 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6—487页。

⑦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0页。

一块心病，但苏联对此却无能为力。1952 年 3 月 20 日苏联外交部报告，盟军司令部 3 月 12 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产武器弹药及军舰和飞机。为此，基斯连科认为应通过远东委员会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但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议。第一，苏联曾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针对美国人提出的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被利用攻击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① 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见批准了给基斯连科的指示。②

在对日媾和及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苏联和中国决定奋起反击，但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主要限于朝鲜战场。对于日本问题，莫斯科手里只剩下一张牌：1952 年 9 月 8 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十票对一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马立克使用了否决权。③ 对于台湾问题，中苏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长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④ 而在朝鲜战场，中国和美国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斯大林唯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谈，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 年 10 月 5 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维辛斯基，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⑤ 10 月 25 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⑥ 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 年 3 月 20 日，SD11597。

②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1952 年 3 月 22 日，SD12433。

③ 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 年）》，第 487 页。

④ 尽管在 9 月 15 日公开的照会中周恩来只谈到了日本的威胁，但斯大林在双方代表团会谈时则明确指出，“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同时强调，只要日蒋和约存在，“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朝鲜战争文件》，第 1222、1227—1232 页。

⑤ 《朝鲜战争文件》，第 1058—1061 页。

⑥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 181 页。

所施其技了。[①]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②] 1952 年 1 月 14 日和 15 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③] 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并提议李奇微与南日和彭德怀进行高层会谈。[④] 而中方的态度却是更加强硬。2 月 24 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⑤] 此时，中国的谈判基调已经非常牢固地确立下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上坚决不让步。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苏联的鼓励和支持。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⑥] 斯大林颇为赞赏，他 2 月 3 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⑦]

4 月 28 日，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当天，谈判双方举行了“秘密”会议。美方在会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张和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为条件，美方放弃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中朝方

---

①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0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265—266 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第 49、54—55 页。

④ JCS 91600, From JCS to Ridgway, Jan. 1952, 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Harry S. Truman Library；沃尔特·赫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181—182 页。邓峰为笔者提供了杜鲁门图书馆所藏有关档案，谨此致谢。

⑤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20 页。

⑥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8, п. 35, д. 10, л. 158, из А.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 – 1953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г., №2, с. 104。

⑦ 《朝鲜战争文件》，第 1151 页。

面应同意撤回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面对应地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以美方放弃在遣返战俘和修建机场问题上干涉朝鲜内政为条件，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为中立国。至此，使第三项议程的谈判拖延不决的最后两点分歧实际上已得到解决。由于在此之前进行第五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已经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第四项议程，即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和谈就可以结束了。① 然而，就在双方起初认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问题上，停战谈判却进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美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试图通过狂轰滥炸及核讹诈逼迫中朝方面让步。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日成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条件，因为在朝鲜看来，通过谈判争回的战俘人数，远远不及美国空军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为此，金日成指示南日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② 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战争也将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使其不断蒙受损失，这保证了苏联的建设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③ 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表达了斯大林的心声，在对日和约问题失利以后，鼓动和支持中国人在朝鲜战场坚持下去，是苏联在远东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手段。1952年8月20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满口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支持中国的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认为"可以向美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230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203页。

②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7 – 158。из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г.，№2，с.104；《朝鲜战争文件》，第1152—1153页。

③ 《朝鲜战争文件》，第1187—1189页

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而且，他非常赞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他极力主张，“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①] 在9月4日与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不要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也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②] 在此期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③] 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④] 克拉克以及参联会和国防部都无法忍受中国僵硬的态度，决定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⑤] 10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⑥] 东西方在朝鲜的僵持对立将长期延续下去。

中苏结成同盟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于莫斯科而言，拉拢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加盟，其东方战线便有了可靠的屏障，而在北京看来，依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不仅漫长的海岸线可以受到保护，新生的政权也能得以巩固。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其结果无疑是把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远东地区的态势骤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显出来，由此导致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

---

① 《朝鲜战争文件》，第1200—1204页。

② 《朝鲜战争文件》，第1216页。

③ C 51562, From Clark to JCS, July 1952; CX 55003, From Clark to JCS, Sep. 1952, 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Harry S. Truman Library;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④ 参见《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48－249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89－290页。

⑤ CX 55003, From Clark to JCS, Sep. 1952; JCS 919368, From JCS to Clark, Spe. 1952, 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Harry S. Truman Library;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⑥ 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开始解冻。详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

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美国在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迅速确定了对日和约的新方针——日本是反共同盟国要及早实现单独媾和。朝鲜战局的变化决定着对日媾和的进程，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又反过来影响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面对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停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亚洲的冷战对峙局面源于美国的对苏全面遏制政策。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展，美国加紧扶植日本对抗苏中。从中苏同盟条约开始，中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地区的共同防御体系，苏联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的冷战对峙格局从此定型。

第十一章　冷战初期的印度外交政策与印美苏中之间的互动关系

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冷战特性的判断所决定的。尼赫鲁希望在美苏冷战中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并寻求在国际政治中组成以印度为首的“第三支力量”，以此争取西方国家和苏东阵营对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持。因此，冷战时期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服务于印度外交的两个战略目的：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印度的国家安全。如果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有悖于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印度的外交政策就会有所选择。印度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诸如经济发展问题、饥荒的影响、印度共产党对印度政局的威胁等等，对印度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冷战的发展，特别是美苏对立的加剧要求印度在必要时有所倾向。从冷战初期印度外交政策看，虽然考虑到中国对印度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但发展良好的中印关系成为一个时期内尼赫鲁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随着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加剧，中印关系最后完全走向敌对，这一结果极大地影响了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态势。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包括尼赫鲁对大国关系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以及不结盟运动对印度国家安全的意义等，都决定了冷战时期印度“不结盟”外交的实质。冷战时期的印度外交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和苏联同中国的敌对关系，尽管尼赫鲁公开宣称“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但毫无疑问印度较为成功地同时发展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在获得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印度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当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之后，印度外交开始公开明确地倒向苏联。1971 年的印巴战争不仅表明印度冷战时期外交的实质和一个外交政策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显示大国外交在冷战的非核心地区之影响力的程度。

一、“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冷战、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和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实质

有关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的实质及其评价，一般研究认为，由于尼赫鲁对西方的深深的怀疑，同时也由于美国和苏联对亚洲民族主义反应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尼赫鲁而言，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①] 从战后的一段时间看，尼赫鲁确实希望推行这种政策。1947 年 1 月，尼赫鲁在给他的外交事务的主要助手 K. P. S. 梅农（K. P. S. Menon）的指示中强调了印度外交的基本原则。尼赫鲁说：“我们的基本政策就是要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当今世界上两大领导集团是俄国集团和美国集团，我们必须同两者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美苏两国除了彼此极端猜疑外，还怀疑其他国家，这就给我们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它们会怀疑我们倾向其中一方，这对印度毫无益处。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这一政策决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然而它却明确反对印度共产党。然而在印度，不仅存在一股极其强大并日益增强的赞成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某种模糊的情感，同时还有对美国的深厚友谊，并期待美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帮助印度。苏联作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注定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与俄国敌对，当然我们也不能同美国敌对。”1947 年 12 月 4 日，尼赫鲁在向印度人民院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明确了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不结盟”的基本原则。尼赫鲁声称：“我们在过去几年内一直表明，我们将不使自己参与任何特定的集团。这同中立、消极或其他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通过不参加一个集团或其他的集团，我们一直寻求避免陷于国际上的纷争。”而按照印度官方的解释，“不结盟不是中立，因为中立只能在战争的状态中存在。当保卫至关重要的原则或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时，不结盟政策并不排除诉诸武力。”不结盟政策的基础在于，“每个国家可以自由地和独立地判断每个问题的是非曲直，而不是以同其他国家的结盟而形成的先人之

---

① H. W. Brands, The Spectre of Neutralism: The U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World, 1947 -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H. W. Brands, "India and Pakistan in American Strategic Planning, 1947 - 1954: Commonwealth as Collaborator",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14 (Fall 1986), pp. 41 - 54; Kenton J. Clymer, "Jawaharlal Nehru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independence Year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2 (Spring 1990), pp. 143 - 161.

见的态度来决定”。[1]

从实践上看，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主要服务于战后印度的两个战略目标：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尼赫鲁在1946年3月对此做了较为明确的表述，他指出：世界的中心舞台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东西方之间不同思想和力量的汇合点。同时尼赫鲁还强调，“有些国家可能会垂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遭侵略的最好保证。”[2]

然而，印度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冷战的发展，对印度外交的取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战后初期印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和经济困难，迫使印度不得不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请求美国援助时所提出的理由。1947年2月26日，印度驻美国大使阿萨夫·阿里（Asaf Ali）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要求美国向印度提供经济和粮食援助。阿里明确表示，“如果印度强大起来，就会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堡垒，以反对那个已经把其阴影笼罩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北方邻国……由于印度左右两翼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印度可以成为这些弱国的强有力的中心。”[3]

印度为了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深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质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尽管尼赫鲁在第一次访美时曾公开声称“最密切的关系就是那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但尼赫鲁在1948年3月18日就印度外交政策发表的演说中特别强调：由于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到时候我们也许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对此我毫不讳言。只要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个相比不那么罪恶昭彰。”在此之前，尼赫鲁指示外交部致函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Henry Grady），其中强调：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对印度而言，加入苏联一方是不

---

①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Ann Arbo, M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93）, pp. 36 - 37.

② P. S. Jayarama,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New Delhi: ABC Publishing House, 1987）, pp. 12 - 15.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Ⅲ: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Europe*（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 147 - 149.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可想象的。3 月 20 日，印度驻苏联大使潘迪特夫人（Vijay Laxmi Pandit）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强调了尼赫鲁政府对苏联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极端不满。潘迪特夫人表示，“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潘迪特夫人还强调，如果美国能够援助印度解决国内困难，印度将会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1948 年 4 月，印度外交秘书长巴杰帕伊（Girja Shankar Bajpai）访问美国时对美国官员反复表示了印度对苏联的不满，并呼吁美国支持印度。巴杰帕伊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特别解释了印度之所以不能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说，美国把印度看作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是错误的，一旦爆发战争，“印度只能同那些信奉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国家并肩作战”，而且美国是能够援助印度的唯一国家。巴杰帕伊还向格拉迪大使明确表示：印度的中立更倾向美国。①

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尼赫鲁在 1948 年极力主张同美国签署商业和航空条约。为推动谈判进程，尼赫鲁在 1948 年 8 月明确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因此有能力给予印度极大的帮助，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去获得这种帮助以及消除我们之间存在摩擦的根源。”他还在 1949 年 1 月对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高级助手、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纳·梅农（Krishna Menon）说：“我们为什么不或多或少地与美国结盟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呢?”② 尼赫鲁无疑认为，“命运和形势已将巨大的责任赋予美国，同样，命运和形势也已将印度置于亚洲的一个特殊的地位。”③ 为了进一步发展印美关系，尼赫鲁决定 1949 年 10 月访问美国，并对美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尼赫鲁在 1949 年 4 月任命他的妹妹、驻苏前大使潘迪特夫人为驻美大使，同时还放松了美英等国对印度的投资限制。4 月 22 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公开表明印度将更加倾向美国。

---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V: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488, 498 - 500, 501 - 508.

②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 1947 - 1956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9.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VI: *The Near East, South Asia, and Afric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1686 - 1692.

尼赫鲁指出："当我说我们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的时候，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亲疏完全一致。目前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事实上同西方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就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亲密得多，它部分源于历史原因，部分出于其他因素，这种亲密关系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将会全力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①

冷战初期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尼赫鲁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希望独立后的印度同苏联发展关系，他在1946年称苏联是"我们在亚洲的邻邦"，应该"从事共同的事业，彼此进行更多的合作"。② 但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因此以意识形态来指导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③《真理报》1949年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④ 冷战初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具体实践。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也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⑤这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基本定向。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尼赫鲁推行上述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尼赫鲁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他曾明确指出：他厌恶共产主义，"尽管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它的死板，特别是由于它忽视人性的某些基本的要求，它还是要遭到失败的。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谈得很多，他们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本身的呆板框架内部的矛盾正在日益增长。它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引起强烈的反弹。共产党人鄙弃那些可以称之为生活

---

① P. S. Jayarama,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71; Jawaharlal Nehru, *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 - 1949* (New York: Ayer Co Publisher, 1950), p. 245.

② Jawaharlal Nehru, *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 - 1949*, p. 341.

③ Robert H. Donaldson, *Soviet Policy toward India: Ideology and Strate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Surendra K. Gupta, *Stalin's Policy toward India, 1946 - 1953* (Columbia, MO.: South Asia Books, 1988); 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 - 1998* (New Delhi: Dev Publication, 1999), pp. 1 - 6; 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1947 - 1971: From Ambivalence to Steadfastness*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 16 - 26.

④ 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 - 1998, p. 4; 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1947 - 1971: *From Ambivalence to Steadfastness*, 16 - 23.

⑤ 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Nehru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 196.

的道德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不仅忽视人的基本东西，而且破坏人的行为准则，贬低人的价值。共产主义和暴力的不幸联系助长了人的某种有害倾向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在尼赫鲁的默许下，印度各省宣布印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封闭其出版物，逮捕其领袖和大批党员。在匈牙利事件中，尼赫鲁谴责了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认为匈牙利人民的尊严和自由遭到了践踏；同时由于使用武力来镇压人民和实现政治目的，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也遭到了破坏。[①] 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更是公开宣称：“布达佩斯的起义敲响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丧钟。”[②]

更为重要的是，在尼赫鲁的外交思想中，他把反对殖民主义同“抵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联系起来。尼赫鲁对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是对付共产主义的良策，“如果印度不能在消除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残余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苏联就会这样做，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③] 1948年尼赫鲁同马歇尔在巴黎会晤时，反复强调印度可以成为亚洲稳定的重要力量。尼赫鲁指出：“印度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亚洲工作，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事态的灾难性发展后更是如此。”尼赫鲁强调印度同缅甸、锡兰和印尼的密切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强大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坚决反对殖民主义，苏联的影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48年12月17日，印度驻美大使拉玛·劳（Lama Rau）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和商品时向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印度“已经严重关切共产主义的扩张问题”，印度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阻止这种扩张的趋势。巴杰帕伊在12月22日会见美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Wesley Henderson）时强调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政府的崩溃”使得印度成为亚洲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度应在国际事务中占有“合理的地位”，他还重申印度希望在亚洲同美国合作。[④]

同时，不结盟政策对尼赫鲁来说，也具有实质不同的含义。在南斯拉夫总统

---

① *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Nehru Era*, pp. 88 – 89.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 – 1957, vol. VIII: *South Asi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pp. 331 – 340.

③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 1947 – 1956, pp. 54 – 55.

④ *FRUS*, 1948, vol. V, pp. 516 – 521.

铁托 1954 年底到 1955 年初访问印度同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声明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强调这一政策不是“中立”或“中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政策，它寻求集体和平，只有它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对于不结盟的基本含义，尼赫鲁则认为是不参加大国集团，如果赋予积极的意义，则是旨在反对为了战争目的的同盟。① 在印度独立后，经过长期的考虑以及同英国的谈判，1949 年 4 月印度最终决定留在英联邦。对此尼赫鲁表示：“如果我们完全同联邦脱离关系，那么，我们一时就要完全孤立了。我们不可能长期完全孤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为环境所迫而倾向于某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那种向某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倾倒就必须以互惠为基础……换言之，这就可能要求我们承担比目前更多的义务。”② 对美国和西方而言，鉴于印度此前长期的反英立场、中立主义和反殖政策，印度留在英联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尼赫鲁公开倒向西方集团一边。《纽约时报》称赞印度的决定是“历史性的一步……它不仅促使英联邦前进，而且限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开辟了比大西洋更广阔的防务前景。”而苏联则将印度加入英联邦视为尼赫鲁投靠西方的又一证据，认为尼赫鲁“已经与英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做交易来打击印度人民”。③

美国决策者一开始就从冷战战略出发考虑南亚地区的问题。对美国的战略而言，“遏制共产主义对亚洲的扩张”是美国发展同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之一。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在 1947 年 10 月强调：“对美国政府而言，尽可能在各个方面支持尼赫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垮台了，印度就极有可能分裂。我确信，我们不希望印度成为另外一个希腊。在我看来，俄国宁愿控制印度，也不愿意去控制好几个希腊。”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当时也表示，美国“已充分认识到在保持印度完整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我们的观点倾向于，继续保持印度的完整，最符合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④ 1947 年 12 月 26 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探讨美国对南亚地区的政策。在如何对待印度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美国驻缅甸大使赫德尔（Jerome Huddle）和驻巴基斯坦大使阿林（Paul Alling）对印度

---

①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1960—1969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8—71 页。

② Jawaharlal Nehru, *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 - 1949*, p. 279.

③ William J. Barnds, *India, Pakistan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Praeger, 1972), p. 65.

④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 18.

在冷战中的外交政策持怀疑态度。赫德尔认为，在印度领导下的区域集团将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更为困难，印度还有可能形成一个“对付我们的大国集团”。阿林则相信，同那些以宗教为理由反对共产主义的南亚国家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相比，印度更乐于同苏联进行合作。格拉迪的观点虽没有这样极端，但他也坚信，南亚是一个极易受到“意识形态渗透”的地区，美国必须意识到印度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印度“必须站在民主阵营的一边”。格拉迪首先希望通过经济援助增加美国在印度的影响，认为这是“使印度站在我们这一边并处于我们影响之下的最有效的途径”。美国国防部1949年3月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在抵抗苏联对南亚地区影响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议美英两国制定协调一致的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同时期的报告中强调，共产主义对南亚地区的最大威胁不是外部的进攻，而在于内部的颠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还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着政治上分裂的可能性，这将产生更大的危险，因此，美国的政策应重点放在提升印巴两国内部安全之上。[①] 但杜鲁门政府当时倾向于让英国暂时负责南亚地区的安全。

中国大陆的革命对美国南亚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的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不断取得胜利，印度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性更为突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底制定的第148号文件明确指出，“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大陆可能会没有立足点”；一个中立的印度将成为“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美国应探讨使英联邦所有成员国在同美国的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保证南亚地区的安全。[②] 1949年12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题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第48/2（NSC48/2）号文件，文件强调，“既然南亚的非共产党国家已经形成了在亚洲阻挡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美国就应利用一切机会加强这一地区目前亲西方的倾向，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的政府尽量满足其人民的最低需求，保证其国内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1年5月17日制定的题为《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方针》的第48/5号文件号文件指出，“支持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共产主义进行抵制的愿望，支持其发展抵抗共产主义的能力，这将有利于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在这

①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21 –23, 26 –27.

②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39 –40.

一政策中，美国决策者清楚地意识到尼赫鲁的重要性。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尼赫鲁“对印度是如此重要，印度的生存对我们也是如此重要，如果他不存在了，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冷战初期美国的舆论也集中反映了美国对印度在遏制战略中所起作用的期望。《新共和》宣称，印度的未来“就是全人类的未来”。《新闻周刊》说：“如果印度的经验失败了……那么整个亚洲将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或陷入混乱。”《时代》杂志说，印度是“亚洲防线中的新的重要阵地”。《民族》杂志指出，“印度为击退正在通过南亚席卷亚洲的共产主义的浪潮提供了最好的希望”。美国国会对尼赫鲁也是一片赞誉。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甚至赞扬尼赫鲁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在受到另一个残暴集权的独裁制度威胁的世界里，他是自由的希望之一”。①

杜勒斯的一句话可以明确表明冷战初期美国对印度政策的实质。杜勒斯指出：“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自治国家。它同共产党中国约有 2000 英里的共同疆界。现在这两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是自由方法还是警察国家方法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步。这种竞争直接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八亿人民，它的结果最后也会影响整个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适当地继续给予印度某种技术援助和物资，使它能完成它的五年计划，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② 1957 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大规模援助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701 号文件。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这一文件时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目标是向非共产党的政府提供援助，以避免它们陷入苏联的统治之中。假如我们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那样做。”③ 肯尼迪政府更加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肯尼迪在 1958 年发表文章就指出：在所有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印度已成功选择了在民主制度下发展的道路，“如果印度崩溃了，整个亚洲都会失去”。肯尼迪还强调，假如印度内部发生分裂或与中国一起加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自由世界将不再是自由世界了。”④ 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 3 月 22 日就对外援助问题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着重指出：

---

①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35, 28 – 30.

② 1953 年 6 月 1 日杜勒斯的广播讲话，参见《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8 页。

③ *FRUS*, 1955 – 1957, vol. VIII, pp. 29 – 43.

④ Robert McMahon, "Choosing Sides in South Asia", in Thomas Paterson, ed.,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 – 19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00.

“我们在60年代对外援助计划的根本任务不是消极地同共产主义斗争，其任务就是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展示，表明20世纪如同19世纪一样，南半球同北半球一样，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可以携手共进。”咨文要求在1962年财政年度拨款47.5亿美元，并要求在5年内拨款88亿美元。[①] 肯尼迪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制定在第三世界同苏联的经济攻势作斗争的长期规划。肯尼迪在1963年进一步强调说，“今天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他还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不能允许那些自称奉行中立主义的国家投入共产主义集团”。因此，“我们不能看到四五个国家突然投向共产主义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提供相当的援助……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对外援助的问题，把援助视为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我们利益的基础”。而在所有的中立国家中，“肯尼迪最感兴趣的就是印度，他认为印度是亚洲的关键地区”。[②] 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相信，“印度和中国的斗争，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争夺东方的领导权、争取全亚洲的尊敬以及寻找机会证明谁的生活方式更美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整个亚洲的前途，影响共产党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必然影响我国的安全和地位。”肯尼迪强调：“我们希望印度在这场与共产党中国的竞赛中获胜，我们希望印度成为自由繁荣的亚洲的一个自由繁荣的领袖。”[③] 肯尼迪表示，他看不出“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④]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和肯尼迪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印度也以此寻求美国更大的经济援助，并取得显著的效果。尼赫鲁更加倾向于西方和美国“中立”外交为印度在冷战时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①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g,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p. 205.

② Dennis Merrill, Bread and the Ballo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1947－1963*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p. 169－170.

③ John F. 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60), pp. 141－143.

④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 XIX: South Asi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561－565.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二、对遏制战略与亚洲冷战的反应：尼赫鲁时期印度和美国关系的演进

由于尼赫鲁在冷战初期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希望在美苏之外形成国际政治中的第三支力量，对遏制战略和亚洲的冷战的反应与美国决策者的期望相差甚远，印度由此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同美国产生了重要的矛盾和分歧。

尼赫鲁时期印度同美国在冷战中的第一个重大分歧是有关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 年 11 月 7 日，后来担任印度驻华大使的潘尼迦在同美国驻印度使馆官员会谈时，说明印度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态度。潘尼迦首先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喜欢共产主义，不想推动印度立即承认中国，但必须面对事实。潘尼迦解释说，印度与中国有上千英里的边界，这种境地比起同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要更为紧迫。对于美方有关“看不到在中国新政府做出其有意遵守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过于匆忙地承认对印度有何好处”的询问，潘尼迦回答说，他并未期望通过承认从中共政府那里获取友谊。但如果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些建交的国家便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可能对中共政府产生某种缓和性的影响，如果没有外交关系，则什么事都不能做。潘尼迦还解释说，承认后的印中关系将建立在“明智的冷漠”的基础上，类似于现在英国和俄国的关系。

1949 年 10 月尼赫鲁在访问美国时同杜鲁门和艾奇逊的会谈，更充分暴露了印度和美国在遏制战略和其他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在 10 月 12 日同艾奇逊的会谈中，尼赫鲁不仅批评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而且认为法国支持的越南保大政权“毫无希望，注定要失败”。尼赫鲁强调，在印度、印尼和缅甸，共产党人破坏民族主义运动的企图都失败了。至于中国的事态发展，尼赫鲁表示，他对北京的新政权并不关心，但印度不久会承认这一政权。针对艾奇逊的反对意见，尼赫鲁说，承认是不可避免的，拖延承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关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说，克什米尔已不仅仅是领土争端了，而是最为清楚地表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尼赫鲁说，巴基斯坦人希望在南亚制造一个宗教国家，因此以这个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穆斯林为由而宣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尼赫鲁强烈反对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①]

---

① FRUS，1949，vol. VI，pp. 124 – 125.

在10月13日和19日同杜鲁门的会谈时，尼赫鲁特别说明了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他说，中国的基本局势是，国民党错误地对待了一场在多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但在1911年以后加剧的农民革命，它的无所作为导致权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尼赫鲁强调，共产党在中国并非为人们所向往，共产主义与中国人的思想是不相符的，外国的统治将会受到深深的怨恨。因此事态的发展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会重新成为统治的力量，并将削弱对莫斯科的依附。至于承认问题，尼赫鲁强调了印度与中国的相邻使得印度处于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境地，因此印度倾向于尽早承认。尼赫鲁还特别指出，在毛泽东的支持者和周恩来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分裂”，前者完全执行莫斯科的路线，而后者则寻求扩大中国对外联系的途径，因此西方外交的目标应当是鼓励后者。尼赫鲁还预测，中国不久就会形成“比铁托主义更强大”的力量，西方国家应尽其所能鼓舞这种势头。从这点来看，不承认北京政权和继续支持国民党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当共产党人面临着西方的敌视时，它们就能够把自己未能实现的革命的许诺，归咎于“外国恶魔”。如果它们没有外部的敌人，“其自身的问题就会增多，内部分裂的趋向也会上升”。[①] 尼赫鲁在会谈中还解释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尼赫鲁说，共产主义对印度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似乎也需要急剧的变革，共产主义模式在俄国是行之有效的。说到印度共产党，尼赫鲁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印度共产党发展了许多党员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种局面在1947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印度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的指令发动了旨在破坏政府的暴力活动，由此疏远了人民。尼赫鲁认为，尽管中共的胜利可能会激发印度的左翼力量重新制造麻烦，但目前不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尼赫鲁建议美国对苏政策应采取“智力柔道”（mental jiujitsu）的方法，做出每一个姿态表明同苏联进行公开合作，并且不要公开承认不相信妥协的可能；同俄国军队产生的威胁相比，共产党宣传的威胁要大得多，因此美国应在意识形态领域下更大的功夫。[②]

对印美双方而言，尼赫鲁的这次访问极不成功。尼赫鲁认为杜鲁门是一个“庸才，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才被置于其能力远远不能胜任的位置上”，艾奇逊也是一个“十足的庸才”。美国国务院“捉摸不定、混乱、肤浅，太过倾向于即兴

① FRUS, 1949, vol. VI, pp. 127 - 128.

②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35 - 39.

发挥，同时还自命不凡，傲慢自大”。而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是“不成熟的和功利的”，没有“文化上的动力”，仅仅希望“起居饮食更加舒适”。而负责制定美国对印度政策的那些人“从根本上说就是想取代大英帝国在19世纪在印度所处的地位”。因此，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都“充满了傲慢”。①

朝鲜战争是导致印度和美国产生尖锐分歧的另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尼赫鲁认为是一场内战，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防止冲突升级。针对美国提交联合国的议案，巴杰帕伊告诉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印度政府认为美国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很过激”，极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巴杰帕伊说，尼赫鲁担心美国的行动“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在亚洲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美国把抵制北朝鲜的侵略同援助台湾和印度支那的反共力量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有损于美国人的事业，因为包括印度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亚洲人都认为这些反共力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或者是反动的”。② 1950年6月29日，尼赫鲁同亨德森会谈时表示，虽然他基本上支持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所作出的反应，但他反对美国把印度支那问题和台湾问题同朝鲜局势搅在一起。尼赫鲁说，印度根本不同情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至于台湾，印度已经在6个月之前承认了北京，现在只是希望同新政府发展友好关系，把印度同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定连在一起将会严重损害印中关系。尼赫鲁还强调，同美国建立公开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削弱国大党在印度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数，而现在已有人开始攻击他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不能无视这样的批评。因此，在朝鲜问题上，印度能够给予联合国的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不是军队或金钱。③

印度还希望通过苏联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1950年7月13日，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拜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向他转交一封尼赫鲁致斯大林的信函。尼赫鲁在信中表示：“印度的目标在于使冲突区域化，并通过摆脱安理会目前的僵局，让中国人民政府的代表恢复自己在安理会的席位，使苏联能够返回安理会，在安理会范围内或在安理会外通过非正式接

---

①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 35.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I: *Kore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204 - 206, 218 - 220.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③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42 - 43.

触，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帮助和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并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拉达克里希南在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谈话中重申了尼赫鲁的建议，并强调如果安理会讨论有关朝鲜的问题，最好是将解决这些问题委托给那些与朝鲜离得近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印度，这样做可能将带来好处。拉达克里希南还说，利用一切办法改善朝鲜的局势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就是这种办法之一，如果有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解决朝鲜问题的协定的话。[1] 尼赫鲁同时也向美国发出了呼吁。7月17日，尼赫鲁致函艾奇逊，建议美国和苏联一起采取行动解决朝鲜冲突。尼赫鲁在信中说，他深信“莫斯科正在寻找摆脱不丧失其声誉而从当前纠纷中脱身的途径，因此存在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正机会”。如果莫斯科和北平拒绝和平倡议，世界舆论将会让它们对产生的后果负责；事实上，共产党人可能不会拒绝这样的和平倡议。美国及其盟国对印度的这一举动非常反感。1950年7月28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Robert Menzies）在同艾奇逊会谈时提请注意尼赫鲁的和平倡议所造成的“危害之严重性”，艾奇逊显然同意孟席斯的判断，他指出，虽然还不能判定印度的倡议所产生的全部后果，但危害确实是严重的。[2]

印度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还试图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者，美国也试图通过印度向中国传递信息，让中国不要卷入朝鲜战争。1950年7月22日，国务院电告亨德森，让他告诉印度方面，委托印度向中国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尽一切努力说服北平相信，不介入朝鲜的事态或者不进攻福摩萨是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美军仁川登陆后，副国务卿韦伯（James Webb）指示亨德森，希望印度政府转告中国：朝鲜局势“对侵略者而言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中国置身度外是“至关重要的”。11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表明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立场：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中国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决策者并不信任印度传递的信息，更不信任潘尼迦本人在其中的作用。杜鲁门总统指责潘尼迦“经常按中共的游戏规则行事”，韦伯也说潘尼迦不可靠，不负责，他指示亨德森请求巴杰帕伊安排在新德里的美方和中方的外

---

① 1950年7月13日葛罗米柯与印度大使拉达克里希南的谈话备忘录，参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446－448页。

② *FRUS*，1950，vol. VII，p. 490.

交人员进行直接的接触。[①]

印度方面同意安排这样的接触，但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中国参战后，尼赫鲁再一次呼吁美国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以便实现停火并在朝鲜半岛划定非军事区。尽管尼赫鲁希望访问华盛顿，同杜鲁门和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商讨这样的安排，但美国决策者婉言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②] 美国主要反对印度把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同朝鲜冲突的解决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将给世界舆论造成“美国同苏联做交易来贿赂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的印象。而尼赫鲁则坚持认为，承认中共完全不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印度承认中共是因为它已经控制了中国，而不是因为印度赞同共产主义或中共的政策；而且中共进入联合国，对保持联合国的声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中共不加入，联合国就不能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代表，而在朝鲜的战斗也不会终止。[③]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中，美国反对印度参与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安排的会谈，尼赫鲁为此曾抨击美国的大国行径。[④] 朝鲜战争结束后，鉴于印度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美国开始考虑重审对南亚的政策。在 1953 年 12 月 23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建议美国应把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巴基斯坦，他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他愿意为之做任何事情的国家，它的人民要比印度人更为单纯，巴基斯坦人非常坦率，哪怕是它受到伤害的时候”。1954 初，杜勒斯也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美国应向诸如巴基斯坦这样的关键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抵抗苏联在南亚地区的扩张。[⑤] 1954 年 2 月 25 日，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5 月 2 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巴基斯坦还是第一个签订巴格达条约的国家，按照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的说法，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为可靠的盟国”。[⑥] 为了打消尼

---

① *FRUS*, 1950, vol. VII, pp. 875 – 876.

② *FRUS*, 1950, vol. VII, pp. 1358 – 1359; Brands, pp. 47 – 48.

③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 45.

④ Benjamin Zachariah, *Nehru*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202.

⑤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pp. 48 – 49.

⑥ Mohammed Ayub Khan, Friends Not Masters: *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0.

赫鲁对美国政策的顾虑，2月21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巴基斯坦同意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进攻印度。我本人也将公开宣布，假如我们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援助被滥用的话，并在侵略中针对任何国家，我将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并在联合国内外采取适当的行动消弭此种侵略。"巴基斯坦也向美国保证，其所受军援只用于自卫。① 然而，美巴关系的这一发展仍成为印美关系的转折点。尼赫鲁在1953年初就告诫印度驻美大使：美国同巴基斯坦结盟对印美关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② 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一个像印度那样拥有3.6亿人口的国家会害怕一个人口仅有7600万的国家的侵略，那简直是荒谬之至"。不过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美国同巴基斯坦的结盟，"尼赫鲁在亚洲以及在非洲某些地区所享有的领导地位将受到挑战。首先尼赫鲁并不想失去这种领导地位"。从冷战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导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逐渐走向亲苏的不结盟政策"。③

总体而言，美国这一时期对南亚地区的政策本质是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并希望以支持印度的经济发展使之成为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依托，并以此打消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恐惧"。1954年2月19日出台的题为《美国对南亚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NSC5409），标志着美国决策者重新审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印度的政策，也是上述战略思路的具体体现。文件首先承认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并突出了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在地理上是"连接南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广袤陆地通道"的中心，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运线。从物产上看，印度拥有对美国防务"最为有用"的矿藏。从人口上看，印度巨大的人口资源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援过英帝国，这样的人口资源即便是在核时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文件认为，印度最为显著的重要性还在于国际政治领域，"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相信，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既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结盟，也不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与此同时，尼赫鲁还渴望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尼赫鲁和印度人在那些还没有加入东西方阵营的国家中所产

① P. K. Jain, ed., *U. 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 - 1982*, vol. II: Pakistan, 1947 - 1965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 94.

②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 p. 185.

③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pp. 51 - 53.

生的影响对美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报告承认，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常常会导致印美之间的冲突，但尼赫鲁继续当政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对印度民主的未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的民主反过来将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的影响。文件特别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截然不同的道路正在寻求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的答案，即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印度已经选择了民主的、基本上是西方类型的途径，而中国正在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证明印度没有能力实现比中国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西方世界将会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把发展中国家拱手送给共产党。因此，印度的发展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印度的经济发展失败了，经济上的麻烦将极有可能导致政治危机。这样，在发展问题上的斗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印度是在“民主的框架内继续发展”，还是“沦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美国应“重审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政策，以便通过援助和投资行动对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前途产生最大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印度为了发展以及为了增加在亚洲的影响，正在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竞争，因此美国已经在印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的重要性就在于，美国决策者明确认识到亚洲的经济发展同美国安全之间的关系。杜勒斯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54年8月的时候表示：“我个人开始相信，如果我们不能用一些方法在提高生产水平方面超出共产党的那种大规模努力的好几倍，要阻止世界上许多地区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将是非常困难的。”杜勒斯承认共产党国家已经在生产增长上超过了美国，“这就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地区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那些地区，‘解放’、‘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口号几乎毫无吸引力”。艾森豪威尔也强调，苏联开始意识到“经济武器”的重要性。如果美国“不能组织起来保护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不能保护和推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的利益”，那么思考“共和制衰落”的时代就会开始。[②] 不过对于美国期望通过经济援助所达到的遏制战略的目标，尼赫鲁早在1950年12月就明确表示过，美国的粮食援助并不能影响印度独立的外交

①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105 - 106.

②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108 - 109.

政策。[①]

虽然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在南亚地区实施遏制战略的重要阵地，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的冷战事件中的政策和反应却令美国决策者大失所望。对1954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立即就地停火，承认印度支那的独立，大国保证不干涉印度支那的事务。1954年4月，尼赫鲁和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在同美国驻印度大使艾伦（George Allen）会谈时表示，印度宁愿希望法国人继续控制印度支那，也不希望中国人控制这一地区。梅农也在会谈中告诉艾伦，印度的建议同美国所主张的东南亚集体安全的思路并不矛盾。梅农强调，印度不希望大国完全撤出这一地区，印度政府只是请求除法国之外的大国保证不在军事上进行干预。印度希望看到印度支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这样就可以成为抵抗中国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②] 但美国决策者认为印度的建议不仅对法国公众是危险的，更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西方的立场。1954年5月梅农在同美国代表团的史密斯会谈时依然主张停火和撤军。当问及由谁来监督撤军时，梅农表示，印度和挪威可以担当此任；如果与会的五大国就此达成一致，他的政府可能考虑接受。然而，印度的建议不仅遭到美国的反对，同时还遭到印度支那国家的反对。柬埔寨的代表说，梅农对柬埔寨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不能信任印度的监督。老挝代表也反对印度的建议。南越政府的代表说，印度的提议对共产党有利，印度虽然想证明自己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并非中立。[③] 被视为是尼赫鲁外交事业“顶点”的万隆会议（梅农说过，“万隆精神就是尼赫鲁”），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却是一场“大败仗”，因为尼赫鲁的两个目标：获得对其中立哲学的支持以及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都没有实现，而尼赫鲁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建立第三支力量的计划也遭到了失败。因此，会议对印度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失败”。[④] 尼赫鲁虽然在万隆会议后告诉美国大使，他的政府对美国并无敌意。但美国决策者认为，

---

①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p. 40.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ol. XIII: *Indochin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p. 1406 - 1408.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ol. XVI: *The Geneva Conference, Korea and Indochin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pp. 1045.

④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115 - 116.

万隆会议期间，巴基斯坦“在加强自由世界的立场方面起到了特别有益的作用”。[1]

美国决策者对印度外交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乃至厌恶。杜勒斯认为梅农是“一个极为娴熟和寡廉鲜耻的操纵者，喜欢在每一个派上都摸一摸”。在杜勒斯看来，梅农“强烈反美”，尽管他同美国人会谈时“都会颇为有效地掩盖这一点”。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梅农是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习惯于“把交流的渠道搞得一团糟”。艾森豪威尔则在自己的日记中把梅农说成是“一种威胁和粗野的人”，梅农的威胁就在于“他是一个歪曲别人言语和意思的高手，同时，他还为证明自己是操纵国际关系的高手的野心以及为证明自己是当代政治家的野心所控制”。1955 年 2 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篇文章中称梅农是尼赫鲁的“主要的麻烦制造者”，虽然梅农认为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执行的却是“党的路线”。[2] 梅农对美国决策者也抱有同样的厌恶。他说艾森豪威尔“无足轻重”，杜勒斯尽管是个“极为诚实的人”，但“诚实却可以导致所有奇怪的后果”；在梅农看来，尽管杜勒斯也很直率，“但这种直率或许来自傲慢自大，或许还来自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事实上的美国总统”。[3] 在印度决策者眼中，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而杜勒斯则是好战分子。

印度和苏联在这一时期关系的发展也使得美国极为不满，对 1955 年尼赫鲁访问苏联，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尼赫鲁正在带领印度直接投入苏联阵营。随后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同印度签订武器协定，苏联同意以印度准备向英国购买飞机的价格的一半向印度出售战斗机。1955 年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一份咨文，要求批准建立 20 亿美元的亚洲发展基金，以期影响印度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宣称：“其他自由国家需要美国，而我们也需要它们，如果大家都希望得到安全的话。”对此参议员杰纳（William Jenner）表示：“当印度在人类尊严和人类奴役之间进行无可规避的斗争中无可否认地保持中立时，我们为什么要给它 5000 万美元?”[4] 杜勒斯 1956 年 3 月同尼赫鲁的会谈时表达了美国对印度购买苏联军火的强烈不满。杜勒斯说：“您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飞机，也可以从我们这里买，我就不

---

①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 p. 243.

②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100 - 101, 118 - 119.

③ Michael Brecher, *Indian and World Policis: Krishna Menon's View of the World* (New York: Praeger, 1968), p. 190.

④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 110.

明白，您为什么要从俄国人那里买，而您也知道这样做将会使美国在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规模援助您的努力几乎成为不可能了。”通过这次会谈，杜勒斯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担忧，特别是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以及印度对美巴结盟和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的强烈不满。[①]

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不仅是对尼赫鲁“中立主义”政策的考验，更是对印美关系的考验。尼赫鲁认为，造成中东动荡不安的首要原因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②]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不久，尼赫鲁1956年8月8日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表示，因为运河本身就在埃及，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埃及拥有主权是毋庸置疑的”。他谴责英法的入侵是“赤裸裸的侵略，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帝国主义幽灵的复活”。8月25日，尼赫鲁致函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帮助和平解决危机。艾森豪威尔回函说，美国提议在伦敦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他希望尼赫鲁说服纳赛尔接受伦敦会议的决议，以有助于确保“这一国际通道不成为任何国家之国家政策的工具”。[③] 当杜勒斯在伦敦会议上建议以1888年条约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梅农则指责这一条约是企图“否定国有化的行动”。梅农后来认为杜勒斯“毁掉了伦敦会议”，他指责杜勒斯玩弄两面手法，对世界舆论公开说得是一套，私下对英国人说得又是另一套。杜勒斯也认为梅农非常狡猾，似乎希望同苏联人协调行动。[④] 但印度和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期合作密切，尼赫鲁支持艾森豪威尔有关在埃及部署联合国快速反应部队的主张，并派印度军队参加了这一部队。

艾森豪威尔希望利用匈牙利事件，使尼赫鲁“非常明智地开始加强他同西方的联系，并使他自己更为明显地疏远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还多次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支持联合国的行动，“以减少那里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尼赫鲁不仅在科伦坡会议上赞同会议做出有关抨击苏联的决议，并在1956年11月12日至14日在新德里召开的由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三国总理召开的会议上，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尼赫鲁在1956年12月16日还公开声称，如果匈牙利的领导人能谨

---

① *FRUS*, 1955 - 1957, vol. VIII, pp. 306 - 308.

②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I, p. 42.

③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pp. 65 - 66.

④ Michael Brecher, *Indian and World Policis: Krishna Menon's View of the World*, p. 64.

慎地处理，匈牙利的民主进程就可能向波兰那样和平地产生。但尼赫鲁也暗示，如果没有英法两国入侵埃及，那就不会发生苏联的干涉；因为英法的入侵看来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先兆，从而使苏联领导人关注不要在匈牙利产生混乱。尼赫鲁强调苏联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如果它不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其他国家可能会同样单方面退出华约组织。如果华约解体而北约依然存在的话，那对共产主义世界将是一场灾难。另一方面尼赫鲁也指出，由于苏联的干涉，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遭到践踏，他还对美国驻印度大使库柏表示：匈牙利的起义是全国性的，苏联的行为绝对是野蛮的，毫无合法性。这一事件不仅震撼了苏联人，而且也在东欧国家产生了震撼，它表明共产主义不能从外部强加。[①]

而在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看来，在匈牙利事件期间，“美国和英国最恬不知耻地把联合国作为冷战的工具”。梅农强调，在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之前，所有外国占领军都应该从匈牙利撤走，包括西方大国和苏联从柏林撤走。[②] 因此当安理会就调查匈牙利事件的决议，以及在匈牙利举行选举的决议进行表决时，梅农都投了弃权票。实际上，梅农做出这样的决定并没有同尼赫鲁或国大党的其他成员商量过；因为在梅农看来，如果印度支持这样的决议，那么印度就无法拒绝允许在克什米尔进行选举的要求。[③]

鉴于印度在上述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美国决策者在如何看待印度在美国国家冷战战略中的地位产生了分歧。1956 年 6 月 8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强调，“尼赫鲁先生在中立主义的标签下，在亚洲公开追随共产主义的路线”。[④] 但 1956 年 12 月 7 日通过的题为《美国对南亚地区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617 号文件（NSC 5617）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文件首先强调“南亚已经成为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主要地区，特别是印度，它已经成为亚非地区或万隆地区最重要的代表，是亚洲在政治上抵抗共产党中国的领袖”。文件承认，印度的中立将继续会给美国的外交带来麻烦，而一个逐步强大的印度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不过从长远来看，一个软弱和易受攻击的印度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一

①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pp. 74 – 76.

② Michael Brecher, *Indian and World Policis: Krishna Menon's View of the World*, p. 85.

③ Michael Brecher, *Indian and World Policis: Krishna Menon's View of the World*, p. 93.

④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 132.

个稳定和具有影响的印度所带来危害要大得多。一个软弱的印度可能会导致南亚和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中”。因此，“一个强大的印度将在亚洲成为不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成功榜样，它还提供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途径，增进其外部安全利益，以抵抗共产党中国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同时，“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在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发展经济的抱负上进行竞争的结果，将对整个亚洲和非洲产生深远的影响”。文件强调美国必须大力支持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假如印度在下一个关键的五年内明显缺乏预期的发展，失去在尼赫鲁的领导下业已存在的发展势头，它就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所发展。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衰落时期注定将会来临，公众将不再支持国大党，国大党党内党外的分歧将会产生，混乱将会持续”。文件的结论之一是，“印度取得五年计划之宏伟目标的重大进展，将符合我们的利益”。①

而尼赫鲁在1956年12月对美国的访问也有助于澄清印度在冷战中的立场，并对美国决策者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和美国舆论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在19日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承认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源起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他高度评价纳赛尔，称“纳赛尔是埃及军官中最好的一位……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纳赛尔被推翻，那么掌权的人将可能更加敌视西方，其行为可能更不理智。”艾森豪威尔则希望尼赫鲁利用自己对纳赛尔的影响力，使中东恢复和平，并重新开放运河。至于匈牙利事件，艾森豪威尔表示，当尼赫鲁终于谴责苏联的行为时，其声誉便在美国得以提升；如果尼赫鲁能够在此次访问时在一项公开演讲中或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谴责苏联，那将有助于美印两国的关系。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建议印度能够接收一定数量的匈牙利难民。尼赫鲁说，成千上万的人民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屈服于这种腐败的意识形态。匈牙利的起义对苏联领导人是一个震撼。因为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功的成就，共产党正在失去支持。民主已经获得机会去增强人民的信念和希望，而这些追求独立的人民“曾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误导”。尼赫鲁特别解释了印度外交政策，他指出，中立并非意味着对以专制为基础的政府和基于尊重人类基本尊严的政府之间无原则的漠不关心，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印度之所以与苏联和中国友好并非自己兴趣所致，而是印度国家安全

①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p. 132 – 133.

的需要。尼赫鲁强调说，印度和中国有1800英里的边界，守卫如此之长的国界线将耗尽国家的资源，这样就肯定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阻止共产党从内部夺取政权上台。另外，同西方结盟将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因为印度无力防卫自己，负担将落到盟国身上。尼赫鲁还希望在印巴关系上获得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尼赫鲁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印度已经选择了世俗的政府形式，而巴基斯坦则是以宗教为基础，这种差别使得两国的分歧特别激烈，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上，也使得印度公众害怕来自巴基斯坦的进攻，而这种恐惧由于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而在印度产生了对美国的极大怨恨。艾森豪威尔再次做出了将反对巴基斯坦把美国的武器用于对付印度的保证。①

美国舆论对尼赫鲁1956年12月访美的反应空前热烈。《纽约时报》称，"在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已经成为对抗共产主义成功的重要力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评论是："同尼赫鲁先生对苏联采取友好的中立立场相比，印度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员，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更为重要"。《华盛顿邮报》则指出，大多数美国人不再认为尼赫鲁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分子了"。②

在这一背景下，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1月4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重新检讨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他说，我们以前决定让巴基斯坦成为一个军事盟友，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代价太高。艾森豪威尔强调，"这可能是我们做出的最糟糕的计划和决策。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们现在看来是无可救药地卷入其中了"。在讨论对印度进行援助时，财政部长汉弗莱（George Humphrey）强烈反对，其原因是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差别微乎其微"。艾森豪威尔不同意汉弗莱的评判，他甚至说"在美国也有不少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果美国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做的"。1957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美国之所以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考虑到我们几个朋友的意见，当然也包括您"。对此，尼赫鲁表示遗憾，并回信说，苏联过多地卷入东欧事务，因此并不存在苏联侵略西亚的危险。③

---

① *FRUS*, 1955 - 1957, vol. VIII, pp. 331 - 340.

②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p. 110.

③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I, p. 42.

1957 年 1 月 10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第 5701 号文件（NSC5701）。文件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在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发展经济的抱负上进行竞争的结果，将对整个亚洲和非洲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软弱的印度将可能导致南亚和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中。[①] 艾森豪威尔在 1957 年 5 月 21 日同参议员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会谈时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布里奇斯认为，美国根本不要去援助南斯拉夫、印度以及印尼这样的国家，因为他们不可能对共同安全有所贡献。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说，印度有 3.5 亿人口，如果美国去防卫印度，那就需要守卫同中国接壤的 1800 英里长的边界，耗费高昂。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印度应该是世界上一两个可以保持"中立"的国家之一。尽管美国没有义务防卫印度，但也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征服印度，"如果这个国家走向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将走向哪里呢？"[②]

1957 年夏，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进展的极不顺利，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决策的失误、恶劣的天气、价格上涨、外汇短缺。尼赫鲁告诉美国记者，他的政府需要大约 5 亿美元才能渡过危机。为此，美国给予印度大量贷款和赠款，1958 年是 9000 万美元，1959 年 1.37 亿美元，1960 年达到 1.94 亿美元。[③] 印度政府计划在博卡洛建设年产 400 万钢材的钢铁厂。1961 年初，印度试图寻求美国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希望美国在 10 年内提供 15 亿美元。1961 年 6 月，世界银行决定向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 55 亿美元贷款，在计划的头两年提供 20 亿美元。其中美国保证提供 10 亿美元，世界银行的其他成员国西德、法国、英国和加拿大提供 7.8 亿美元，世界银行保证提供 4 亿美元。

美国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印度的战略考虑不仅希望通过印度"遏制共产主义对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同时还希望以此缓和紧张的印巴关系。1959 年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时，试图以共同对付中国来说服尼赫鲁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尼赫鲁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明确表示，印度不需要巴基斯坦这样的帮助，他唯一需要的保证就是，当印度同中国打交道时，巴基斯坦不要从背后暗害他。艾森豪威尔表示

---

① *FRUS*, 1955 - 1957, vol. VIII, pp. 29 - 43.

② Paula Banerjee, *Neither Antagonist Nor Ally: Indo-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54 and 1966*, pp. 118 - 119.

③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p. 135.

美国将采取强硬行动来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①] 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政府内主张大力扶植印度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国务院官员强调，印度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一笔财富，如果处理得当，美国将同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适当的情况下甚至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盟国；这样，印度大约100万军队将会有助于减轻中共对东南亚的压力。[②]

在这种战略背景下，印度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在冷战时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从1951年至1967年印度的3个五年计划中，美国提供了印度全部外援的54.3%，在1961年至1966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印度60%的外援来自美国。为了通过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来实现美国的南亚战略，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赠款和贷款。从1947年印度独立开始至1959年，美国向印度提供5.18亿美元的赠款，贷款11亿美元；1960年至1969年，美国提供的赠款为12亿美元，贷款45亿美元。同时，美国还不断加大对印度投资的力度。在印度头两个五年计划的213亿美元的全部投资中，美国及其盟国投资52亿美元，美国本身投资33亿美元，而苏东集团的投资仅为9.438亿美元。在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全部218亿美元的投资中，美国及其盟国为50亿美元，其中美国20亿美元，苏东集团为9亿美元。在1971年财年，美国向印度提供了5.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基金，占该财年美国全部对外发展援助基金的2/3。[③] 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经济冷战"的意义在印美关系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三、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尼赫鲁与冷战背景下的印苏关系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7年6月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独立后的内外政策。

---

①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I, pp. 103 – 105.

② *FRUS*, 1961 – 1963, vol. XIX, pp. 583 – 588；有关美国的政策，参见王琛：《美国外交政策与南亚均势，1947—1963》，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1999年。

③ Shri Ram Sharma, *Indo-US Relations, 1947 – 71: Fractured Friendship*, Part I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 74 – 75.

与会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国帝国主义交易和妥协的产物，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投靠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①] 1947 年 12 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E. 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但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真正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苏联对独立后印度的性质的判断，还体现在对甘地（Mahatma Gandhi）和“甘地主义”的评价。《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印度驻苏大使梅农提请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K. V. Novikov）注意上述问题时，诺维科夫回答说，如果在苏联的书中找到一句贬低甘地的话，那么就会在印度出版的书中找到一百句贬低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诺维科夫还说，在苏联，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从事研究，并得出诸如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结论。[②]

共产党情报局 1950 年对印度共产党的批评和直接干预，同样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必然结果。1950 年 1 月 27 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的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号召印度共产党“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③] 而当时印度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应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

---

① John H. Kautsky, *Moscow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A Study in the Postwar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Strateg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82), pp. 24 – 28.

② 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1947 – 71: From Ambivalence to Steadfastness*, pp. 22 – 23.

③ 参见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8—319 页。

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共产党的猛烈批评，造成了印共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改组。新成立的党中央与政治局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的道路。而本来就反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丹吉（Shripad Amrit Dange）、高士（Ajoy Kumar Ghosh）等人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这条新路线，致使印共公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情报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产党的斗争陷入更为严重的困难，从而也成为印共党内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产生严重分歧的一个重要起因。

导致苏联对印度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重新评价印度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印度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斯大林开始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① 1952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在同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会谈时，对印度的进步表示了“友善的兴趣”，并严重关注西方正对印度施加压力以便把印度拉入西方阵营。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强调印度对加强世界和平的重要性。②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明显调整对印度的政策。1953 年 8 月，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称赞印度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会更加密切。布尔加宁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③ 尼赫鲁 1955 年 6 月访问苏联时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欢迎，就是这种调整的体现。尼赫鲁在离开苏联时甚至说，他自己的心留了一些在苏联。当时印度驻苏大使 K. P. S. 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赫鲁晓夫 1955 年 7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公开宣称，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④

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苏联领导人对尼赫鲁的认识上。1955 年 11 月至 12 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进行访问。布尔加宁说：“印度

---

① 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Nehru Era*, p. 37.

② S. P. Singh,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India – USSR Relations* (New York: Asia Book Corporation of America, 1987), pp. 42, 46.

③ 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 – 1998*, p. 7.

④ K. P. S. Menon, "India and Soviet Union", pp. 229 – 232.

和苏联作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巩固和平，并且主张用和平方法，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这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结果。”布尔加宁还强调说：“我们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为世界和平而进行崇高的伟大的斗争的同盟国。”[①] 赫鲁晓夫也赞扬印度和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他反复强调，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执行着独立的政策，“同苏联建立了最良好的亲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为争取巩固世界和平这样的卓越崇高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苏联“对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事业中所做的重大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②] 赫鲁晓夫强调，尼赫鲁是一位“宝贵的朋友”，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并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不采纳马克思主义，他确已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做出暗示和姿态。”赫鲁晓夫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同尼赫鲁的关系会越来越牢固，而他本人同尼赫鲁的关系则是“再友好不过的了”。赫鲁晓夫还认为，“如果我们有耐心，尼赫鲁会自愿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自然，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认为尼赫鲁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对殖民主义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主张加强同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友谊。[③] 苏共二十一大对印度和尼赫鲁的评价更高。苏联领导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在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保障社会和经济进步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由于杰出的东方政治家尼赫鲁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富有远见的政策，以及所有进步力量的活动，印度在短短的历史时期里，在发展工业、农业和整个经济方面，在取得国内团结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④] 1960 年 2 月 11 日至 16 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多次强调，苏联支持印度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援助的话，苏联将予以提供，甚至可能会包括军事援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是

---

① 《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8 页。

② 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四集（1955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29—379 页。

③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1—463 页；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2 页。

④ 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 - 1998*, p. 20.

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础之上。"[①]

其次，苏联和印度虽然在匈牙利事件上存在分歧，但两国在其他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及各自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仍然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鲁晓夫在1958年考虑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伊拉克政变时，建议举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印度五国会谈。这种排斥中国的做法的意义是明显的。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对此印度方面认为，"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在印度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了印度的立场"。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这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决定了"。布尔加宁在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苏联的这一立场。[②] 1962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1961年9月尼赫鲁访问苏联，在9月11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尼赫鲁承认："目前两个德国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任何试图改变边界的企图都将产生危险的后果。"[③]

另外，苏联还明确表示不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并保证说服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鲁的内外政策。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对尼赫鲁表示："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权，自然同情和理解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但绝没有领导这些共产党的意图。苏联共产党通过撤销共产党情报局，事实上已经解散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苏共和印度共产党没有联系。"赫鲁晓夫1957年再次向尼赫鲁保证，"苏联不会干涉印度的国内事务"。[④] 1961年4月7日至16日印度共产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苏共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率领代表团参加，从而加强了印共党内右派的力量。高士在报告中强调，必须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卫印度政府外交政策的积极现象，同时要同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的不一致性作斗争。"[⑤]苏共对印共的政策表示支持。

---

① Bimal Prasad,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 – 1972: A Documentary Study*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3), p. 203.

② 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 – 1998*, p. 10.

③ Bimal Prasad,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 – 1972: A Documentary Study*, p. 222.

④ R. C. Hingorani, *Nehru's Foreign Policy* (Columbia, MO.: South Asia Books, 1989), p. 43.

⑤ 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 – 1998*, p. 23.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赫鲁晓夫时期苏印关系发展迅速，苏联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关系日益密切。1959年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加上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火，印度急需添加先进武器。在向英国和法国购买武器无望的情况下，转而向苏联购买。1960年10月，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经过谈判苏联同意向印度出售运输机和直升机。1961年2月25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V. Krishna Menon）宣布，苏联已经向印度提供了可以在北部边境修筑公路的设备。3月，印度宣布已经从苏联购买了8架安-12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印度此前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为此，苏联还向印度派遣了40名飞行员来指导对这些飞机的操作和维修。1962年初，当印度再次向英美提出购买超音速战斗机的要求遭到拒绝后，1962年10月，印度同苏联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印度出售两个中队的米格-12型战斗机，并为这些战斗机提供了空对空导弹和雷达设施。1963年2月以后，12架米格战斗机陆续运达印度。[①]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印度在这一时期还加强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从1961年2月开始，两国就苏联援助印度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在1962年10月签订正式协议。为了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1963年8月，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964年5月双方宣布，苏联向印度提供50枚地对空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在1964年9月印度总统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之前，苏联再次向印度出售了38架米格战斗机。随后苏印两国还达成协议，在印度建立生产米格飞机及其零部件的工厂。从1962年10月至1964年5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1.3亿美元的军火，并在1964年9月保证在其后5年内向印度提供1.4亿美元的军火。[②]

尼赫鲁1964年5月27日去世后，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依然不断发展。1964年10月，印度总理甘地夫人访问苏联。1964年1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正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富有成果”。[③] 对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印度强调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

① Rajesh Rajagopalan,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 of 1962*, pp. 54 - 55.

② Sucha Singh Gil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 - 1980* (Columbia, MO.: South Asia Books, 1984), p. 207.

③ S. P. Singh,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India-USSR Relations*, p. 112.

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但对8月22日安理会7个成员国提出的谴责苏联及其盟国的决议，印度予以否决。甘地夫人8月23日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使用“谴责”这样挑衅性的语言将一无所获。[①]

印度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在冷战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苏联出于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战略需要，大力加强对印度的经济外交。从1953年至1980年，印度和苏联共签订了6个贸易协定；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给与印度28亿卢比的第四笔贷款；9月28日，苏联又宣布给予印度1.87亿卢比的第五笔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1959年至1962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增加了4倍，对苏联的出口增加了10倍。印度对苏联的出口从1955年的32.6亿卢比，上升到1970年1736.7亿卢比；而印度1955年从苏联的进口为62.1亿卢比，1970年则为1713.3亿卢比。苏联还为印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到1977年，苏联为印度培养了8570名工程师和技师，48720名熟练工人。[②] 在争取苏联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印度在冷战中的选择是成功的。

四、印度对华政策与中印边界冲突：进程和影响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认为，中印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③] 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④]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

---

① 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1947 –71: *From Ambivalence to Steadfastness*, pp. 50 – 51.

② Bimal Prasad,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 – 1972: *A Documentary Study*, p. 143; *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1947 –71: *From Ambivalence to Steadfastness*, p. 69.

③ K. P. S. Menon, "India and Soviet Union", pp. 234 – 245.

④ P. S. Jayarama,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24.

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①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已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② 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对待周恩来就像对待一个小兄弟一样。周恩来后来同锡兰的一位外交官会谈时说：“我见过蒋介石，也见过美国的将军，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向尼赫鲁那样傲慢自大的人了。”尼赫鲁的傲慢态度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极大的敌对情绪”。③ 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④ 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⑤ 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

---

① 1954年10月毛泽东同尼赫鲁的谈话，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76页。

② 1952年12月3日毛泽东在《外交部一份外交工作汇报上的批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24—625页。

③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 p. 239.

④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1962年10月27日。

⑤ 1962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泽登巴尔的会谈，俄国档案，SD10291，此为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收藏的俄国档案原件复印件的自定编号。

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①]

导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由于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1954 年《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后不久，尼赫鲁即指示有关部门：印度对待北部边境的态度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是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应该将边界哨所制度推广到整个北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那些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也设立哨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1 年 11 月 2 日印度决策层最终形成了有关"前进政策"的指令。随后，印度加紧进行军事部署以实施这一政策。从 1959 年到 1962 年，印度方面共在中印边界地区建立了 43 个哨所。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早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1961 年 3 月，尼赫鲁对来访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明确表示，"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莫斯科"。他还强调，中国的侵略意图正处于高峰时期，形势是危险的。1962 年 3 月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 Bowles）访问印度时，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的考尔将军（B. M. Kaul）会谈。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提供援助。10 月 12 日，考尔同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谈时进一步表示，印度打算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10 月 18 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后在同加尔布雷斯的会谈中，强调印度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不管是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尼赫鲁指出，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使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这一措施也会扩展到中印边界西段。加尔布雷斯表示，美国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政策。[②]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希望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

---

① 1959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9 页。

② *FRUS*，1961 - 1963，vol. XIX，pp. 346 - 347.

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对于印度这类国家的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① 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的实践。

1959 年的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②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 年 1 月 23 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 月 22 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要求中国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边界线，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③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4 页。

②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1－12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1—202 页。

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由此确立相应的方针政策，并直接影响到对印度的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角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地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陈毅 1962 年 9 月 14 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 年 9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认为“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另外，苏联在西藏问题以及 1959 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加剧了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对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起到了相当的鼓舞作用。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总体上反映了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苏中关系和苏印关系的影响。而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反应，则突出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

对 1959 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的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 1959 年 9 月 9 日的声明。10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2 月 22 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 1959 年 9 月 13 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在

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而在苏联看来，中共中央的立场不仅反映出中共中央不愿正确评价自己对印度政策的错误，同样也不愿正确评价苏共中央为处理中印冲突所采取的措施。①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并对两党和两国关系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从1959年年底开始，中印边界问题就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同一时期，在苏联政策的影响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也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认为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和塔斯社的声明是“正确的、英明的和及时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反应，使中共中央更加坚信，必须坚决反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体现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领土和边界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10月26日，尼赫鲁致函肯尼迪声称：“在此危急关头，我自信将得到您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印度拒绝中国方面的停火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1月18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尼赫鲁在没有同内阁商量的情况下，在11月20日连续给肯尼迪发出两封急信，呼吁美国同印度结成同盟，干预中印边界冲突，

① "New East-Bloc Documents on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 and 196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并希望美国直接参加战斗。[1]

另一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美国和英国立即做出反应支持印度。美国不仅向印度提供了紧急军援，而且还提供有关中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与此同时，12 架 C－130 大型运输机赶赴印度，帮助把克什米尔前线的印度士兵运往东部。为进一步表明对印度的支持，肯尼迪指示加尔布雷斯大使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约定俗成的国际边界线。11 月 14 日，印度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军事援助印度的协议。英国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也是强硬和明确的。1962 年 10 月 22 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一向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并且当然继续这样做”。英国还向印度提供了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军火物资。

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决策。边界冲突爆发后几小时，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印使馆致函尼赫鲁，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感到遗憾，并呼吁两国在停火后进行谈判。在中国提出停火建议后，苏联希望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进行谈判，《真理报》10 月 25 日的社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尼赫鲁一开始非常不满苏联的政策，特别是对《真理报》的社论。为此印度在边界冲突期间反复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力图使苏联支持印度。1962 年 11 月 9 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 N. 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再次明确表示了苏联的中立立场。在 11 月 24 日同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时，考尔发现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表示，在上次会谈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必须进行“战备”。赫鲁晓夫保证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2]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中国方面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并进行了相应的外交努力。1962 年 11 月 21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 11 月 22 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 12 月 1 日起，中国军

---

① *FRUS*, 1961－1963, vol. XIX, p. 397.

② T. N. Kaul, *A Diplomat's Diary, 1947－1999: China, India and USA, The Tantalising Triangle* (New Delhi: Macmillan India Limited, 2000), p. 77－78.

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

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因素，除了美国、英国等国的强硬反应外，中苏关系、古巴导弹危机、亚非国家的态度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分裂等，都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刘晓大使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赫鲁晓夫还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苏联毫无疑问希望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苏联当时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予大力的支持，并通过相关的外交渠道向中国做工作。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外交官多次向中国官员强调：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合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严重的敌对和潜在的战争的时候。在苏联上述政策的指导下，1962年10月25日《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社论，谴责导致中印边界冲突的麦克马洪线是声名狼藉的和无效的，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经成为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还批评印度共产党滑向了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就古巴导弹危机发表声明，其中表明"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中国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热爱国家和平的国家一道。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战争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对古巴问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支持，但对赫鲁晓夫的要求未作反应。因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种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而告结束。苏联的决定直接导致中国对苏联政策的猛烈抨击。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章，通过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批评苏联的政策立场。11月5日，《真理报》发表声明再次表示，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对此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起初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因此短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反华浪潮"，中共中央相信，其原因"不但因为这时加勒比海危机已经过去，他不

再需要中国支持，而且因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丢面子，羞恼非常，迁怒于中国”。[①]

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中中国外交决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亚非国家做出的不同的反应。在冲突中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只有越南、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为数不多的国家。但反对中国的行动，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共有 75 个国家。1961 年 2 月，印共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印中边界争端》的决议，公开表明印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宣布印共“支持西段的传统边界线，支持麦克马洪线是东段的事实上的边界线。”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印共的上述立场更加明确。对于印共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中共中央的反应是强硬和明确的。1963 年 3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丹吉集团是又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反映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怎样踏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滑下去，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仆从和尾巴。”印度共产党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在实践中证实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理论，那就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冲突的结果则对印度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以及冲突过程中的外交表明，所谓的“中立”国家在冷战中所面临的政策选择的不确定性和实用性。尼赫鲁希望同时保持同美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来实现其既定的目标。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毫不迟疑地请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而冲突期间印度和苏联的外交往来也表明，印度清楚地意识到中苏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和分歧，并加以利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尼赫鲁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以及对不结盟运动的理解，印度的外交同样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中印边界冲突以后，印度的外交更加倒向西方。对此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已经进一步复杂化了，中印边界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印度对待核武器的政策的变化，是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所产生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影响。印度独立以来，尼赫鲁奉行的是和平的核政策，但这一政策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1962 年以后，印度越来越多

---

①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4 页。

的各种力量要求保留核选择权。尼赫鲁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同意“为防卫目的制造”核武器。1965 年印度批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计划，正式走上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毛泽东后来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政策。中共中央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①

同时，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印度自称是所谓的中立国家，但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

而苏联的有关政策立场，在 1963 年 5 月 17 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中表现地极为明确和充分。契尔沃年科在这一政治信函强调：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② 因此，苏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国人进攻的是不结盟运动，而不是印度。中国人想让赫鲁晓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所

---

①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1962 年 10 月 27 日。

② 苏联驻华大使馆 1963 年第一季度的政治信件，题目是《关于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963 年 2 月 21 日和 3 月 20 日信件的反应。苏中两党代表准备举行双边会谈前夕的中国国内情况》。

倡导的不结盟的思想是虚伪的和毫无价值的。中国人相信，只要在这个时候推印度一下，整个不结盟的大厦就会坍塌，尼赫鲁就会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寻求保护。他们还明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进攻，是中共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巨大争论的突出表现，即对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的不同认识。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导致南亚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使尼赫鲁愿意谈判，来划一条比较永久的和平的边界线，使我们安静一方，安静西南边界，集中力量对付东边，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为主。"但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相当严重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巴基斯坦明确表示支持中国。1963 年 3 月 2 日，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由此中国改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多次表示，如果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不会置之不理。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同时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

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与大国在南亚地区的争夺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分治后的关系基本上是在敌对中发展的。尼赫鲁不仅认为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殖民地，而且还曾当面指责巴基斯坦总理默哈迈德·阿里（Muhammad Ali）是美国的傀儡。而阿里也回敬说，尼赫鲁是俄国人的傀儡。尼赫鲁为此愤怒地说，他要把阿里"撕成碎片"，但随后更正说他指的是阿里的言词，而非他的肉体。[①] 印巴两国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特别体现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

① Benjamin Zachariah, *Nehru*, pp. 216 – 217.

冷战时期大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矛盾和合作，主要反映了在中印关系恶化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后，印美关系、印苏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巴关系的接近并密切，而1965年的印巴战争大致体现了中印边界冲突后南亚国际关系的新的局势。中国坚决支持巴基斯坦，苏联进行调停，美国的反应比较复杂，制约美国政策因素主要有两点：中印边界冲突后巴基斯坦同中国关系的发展引起美国的不满，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南亚地区不是其战略关注的主要问题。美国的政策不可避免导致了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同时趋向冷淡，而苏联通过密切同印度的关系以及成功地调停印巴关系，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得以进一步的扩大。

对于克什米尔问题，美国一开始并不准备介入，而是视之为英联邦的内部事务。出于对美国南亚战略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曾试图调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艾森豪威尔甚至愿意邀请印巴两国总理到华盛顿来谈判。对此尼赫鲁表示，第三方不能介入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必须由印巴两国自己解决。同时，如果巴基斯坦不改变它敌视印度的政策，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①]而苏联则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部分。1957年2月17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投票否决了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古巴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将整个克什米尔地区非军事化，并派联合国部队驻守。

肯尼迪政府希望同时发展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使之成为在这一地区"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美国采取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持印度的政策，美印关系得以较快地发展。约翰逊上台时，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由于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美国在处理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基本考虑中，中国因素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约翰逊看来，美国"同印度建立新的关系，就是使之工业和军事潜力得以发展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②]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目的同样抱着上述希望。约翰逊在担任总统之前，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关系密切，约翰逊曾认为阿尤布·汗是一个"给他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人"。对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科默（Robert

---

①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I, p. 85.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vol. XXV: *South Asi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ce, 2000), pp. 13 - 14.

Komer）认为，这些个人和情感方面的因素将会使约翰逊比肯尼迪采取更加亲巴基斯坦的政策。[①]

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一个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冲突后迅速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激怒了美国决策者，因为在约翰逊看来，巴基斯坦的行为已经损害了美国外交的根本目标。针对1964年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即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约翰逊在1963年12月2日警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周恩来的访问将在美国产生极其严重的“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国会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反应，从而影响国会在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约翰逊甚至还宣称，他过去和将来都会是巴基斯坦的朋友，当然“只有巴基斯坦人让他成为他们的朋友”才行。对约翰逊的这种态度，巴基斯坦方面感到不安，布托试图向约翰逊解释说巴中关系的发展不过是对美印关系的加强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应。据副国务卿鲍尔回忆说，布托在会谈后愤怒地向他抱怨受到的粗鲁待遇。

约翰逊同布托会谈后又于12月9日致函阿尤布·汗，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对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担忧。他指出，巴基斯坦的这些行为“损害了我们在面对一个侵略国家时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努力，而这个侵略国家已经明确地和最直截了当地宣布它对自由世界的毫不动摇的敌意”。约翰逊明白无误地告诉阿尤布·汗：“维护巴基斯坦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尽一切所能加强同自由世界的联系，而不是削弱这种联系。”[②]

对如何处理这一时期地南亚次大陆的国际关系，此时美国决策层也存在着意见分歧。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马康卫（Walter P. McConaughy）认为，巴基斯坦加强同中国的关系，表明它正在从西方联盟中脱离出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加强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对印度为期5年的数额庞大的军援计划。马康卫在1963年12月9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由于巴基斯坦对印度几近“神经质的恐惧”，美国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将导致美国在南亚次大陆地位的严重倒退，“迫使巴基斯

---

①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in Warren I. Cohen, Nancy Bernkopf Tuch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 - 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6 - 137.

②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pp. 138 - 140.

坦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并做出重大的调整”。因此，在这个时候对印度进行军援无疑是对次大陆的局势火上浇油。

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Chester Bowles）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鲍尔斯指出，中印边界战争给美国一个把印度拉入西方阵营的机会，这样在同中国的扩张进行的斗争中就能够得到一个主要的盟国，如果迟疑不决将留下有可能被苏联填补的真空。鲍尔斯甚至建议在5年内每一财年度向印度提供6000万至7500万美元的军援。为进一步评估和确定美国对南亚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在1963年12月下旬分别访问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泰勒在同阿尤布·汗会谈时试图说服巴基斯坦领导人相信，是中国对南亚次大陆的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而不是印度；泰勒还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向印度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巴基斯坦如果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尽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义务。在随后同阿尤布·汗进行的一次开诚布公的私人谈话中，泰勒一方面对近年来美巴关系趋向冷淡表示深深的遗憾，另一方面也强调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阿尤布·汗对此解释说，他“热爱约翰逊总统甚于热爱自己的一个兄弟”，希望泰勒转告约翰逊：即将到来的周恩来的访问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只不过是巴基斯坦希望同一个潜在的敌人关系正常化罢了。泰勒依然坚持认为，周的访问会给美国带来“国内问题”，并影响国会将来对巴基斯坦的支持。①

泰勒回国后立即向约翰逊做了汇报，他建议由于印巴两国不同程度地满足了美国的条件，美国应在以后的5年内分别向印巴两国各提供5000万至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1964年2月8日，约翰逊批准了泰勒报告中的部分要求，但他坚持“我们应向两国明确表示，在给予它们长期军事援助的同时，我们可以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取什么”。国务院在2月21日给马康卫的电报中指出，白宫希望利用军事援助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诱饵，以展现继续保持盟国关系的价值，而且还可以作为一个工具，“以获取巴基斯坦必要的保证，保证它限制同北平的关系，并基本上不推行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②

但阿尤布·汗不顾美国的利诱和一再反对，坚持周恩来按计划访问巴基斯坦。

---

①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pp. 141 – 142.

②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36 – 38.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巴基斯坦。在同阿尤布·汗会谈时周恩来强调，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我们这种友谊不只是通常时候的友谊，也是患难时候的友谊。就是说，当一方遭到外来侵略和威胁的时候，这种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在双方的联合公报中，中国还接受了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问题提法。[①]

阿尤布·汗的行为使美国决策者大为恼火。约翰逊认为阿尤布·汗在利用中国作为威逼印度和美国的手段，他随即决定派负责近东和南亚事物的助理国务卿塔尔伯特（Phillips Talbot）前往巴基斯坦，准备向阿尤布·汗表明：美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他想获得美国的援助，就不能越过美国可以容忍的限度；同时要使巴基斯坦相信，美国对印度的帮助是出于全球反共战略的需要。而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巴基斯坦除了在嘴上大谈联盟关系之外，实际上已经采取了同美国的整个亚洲反共战略背道而驰的战术。美国有责任保护自由亚洲的安全，使之免受中共的侵略，直到有关国家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而当我们试图阻止中共对南亚进行渗透的时候，巴基斯坦事实上似乎鼓励它们这样做”。鉴于此，美国决策者决定，不再主动同巴基斯坦讨论有关军事援助计划了。[②] 塔尔伯特在1964年3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反复强调了美国在亚洲的反共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中国，“美国政策是遏制中共的威胁，并做一切必需的事情防止中共的扩张”。塔尔伯特在会谈中向巴方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三点要求：保持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义务；保证巴中关系的发展不会对美巴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或破坏美国支持亚洲国家抵抗中共侵略的努力；不对印度使用武力，等等。

阿尤布·汗在会谈中反复说明，巴基斯坦不仅视美国是自己的“天然朋友”，而且还是亚洲所有小国的“天然朋友”，亚洲所有的麻烦都来自强大的邻国——苏联、共产党中国和印度。阿尤布·汗在重申巴基斯坦对条约的义务的同时，特别抱怨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他认为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待印度的态度以及如何判断印度的意图。至于美国耿耿于怀的周恩来访巴一事，阿尤布·汗解释说，那是由于中方的一再要求他才同意的，而且在同周的会谈中，他还反复劝说中国要同美国解决问题，不要做恶化亚洲局势的任何事情。阿尤

①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②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52 – 54.

布·汗强调同中国的关系仅仅是"极其有限的关系"，声称不约束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并指出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非常愚蠢的"。[①] 阿尤布·汗毫无疑问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审查对印度的政策，特别是对印度的军援计划。

塔尔伯特在同阿尤布·汗会谈后汇报说，美国在南亚次大陆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一方面同巴基斯坦的合作可以对付苏联人，同印度的合作可以对付中共，由此可以保护并可能扩展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保持和加强这一地区的自由和独立同样是重要的，如果这一地区被共产党所控制，其影响可以同1949年中共的胜利相提并论。因此塔尔伯特明确建议，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应当同等对待。[②] 塔尔伯特的建议遭到科默的强烈反对。科默首先从美苏冷战的角度看待南亚局势，他指出，随着中苏分裂的扩大，苏联正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而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也许是最为强大的非共产党国家，"实际上是亚洲的一个主要的极有价值的资源"，"如果印度落后了，我们就是失败者；如果印度走向共产主义，那就是可以同失去中国相提并论的悲剧；如果印度倒向亲苏的中立主义，我们的亚洲政策就会受到损害"。因此，科默向约翰逊建议，美国不能允许由于同巴基斯坦的结盟而"妨碍推行一个理性的对印度的政策"。[③]

此时国务院的意见也倾向于加强同印度的关系，暂缓同巴基斯坦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副国务卿鲍尔在给马康卫的一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在美国看来，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就"政治框架"问题的讨论没有产生完全令人满意的反应，巴方的表现缺乏合作的积极性，而美国关注的中心则是巴方和中国之间可能达成了秘密的谅解。鲍尔强调说："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不能判断对我们在次大陆的整个地位所产生的可能的影响，我们则希望在长期军援问题上保持现有的立场。"[④] 当1964年4月底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要求美国提供为期5年的军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明确表示，巴基斯坦的政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国会对军事援助计划的态度"。[⑤]

至于对印度的军事援助，鲍尔斯则强调，这一计划的目的，不仅要使印度成

---

①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56 – 62, 62 – 64.

②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67 – 70.

③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p. 145.

④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83 – 84.

⑤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93 – 95.

为一个“具有足够军事防御能力的盾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可以完全抵御中共秘密渗透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①] 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美国邀请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 B. Chavan）在1964年5月底访问美国。腊斯克在5月21日同查万的会谈中指出，当时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因此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现在印度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也将获得美国的军援。查万在第二天同美国军方的会谈中，美国同意在1965年财年向印度提供5000万美元的军援，以后如何援助逐年再议。6月6日，美国正式宣布了对印军援计划。

美国的决定使阿尤布·汗异常愤怒，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责美国的做法“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朋友”，是“机会主义”、“毫无道德水准”。巴基斯坦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集会。另外，阿尤布·汗在7月1日给约翰逊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怒气冲天地说：现在每个人都清楚，中国没有侵略印度的计划，中印之间也没有重新爆发有限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对印度的军援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利益，导致印巴之间的军备竞赛，增加了它们的经济负担，为共产主义扩展到南亚次大陆打开了方便的通道。美国大力增加印度军力的结果，将会大大增加印度的弱小邻国业已深存的对印度的不信任，使他们转而寻求中国的保护。美国在南亚地区推行的政策是违背美国自己利益的。阿尤布·汗在信的末尾甚至声称，巴基斯坦将被迫重新考虑作为盟国的义务。[②] 随后，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艾哈麦德在7月7日拜会约翰逊，递交了阿尤布·汗的信函。约翰逊在会谈中毫不理会巴方的陈述。约翰逊说，对印度的军援可以遏制共产主义在南亚次大陆的威胁，这符合印巴两国的利益。他指责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的做法，认为巴方是个不忠诚的盟国，特别是当中国目前对南亚次大陆的非共产党国家构成巨大威胁的时候。针对阿尤布·汗威胁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约翰逊表示，退出联盟并不符合巴基斯坦的利益，但退出与否取决于巴方自己。约翰逊最后警告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要重新考虑同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除重新评估同巴方的关系外别无选择。[③]

---

①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85 - 88.

②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129 - 130.

③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132 - 134.

约翰逊余怒未消，他随后打电报告诉马康卫，不邀请阿尤布·汗访美，并再次强调，美国关注的是中共对南亚次大陆的侵略威胁，对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表示强烈不满。因为阿尤布·汗“应该知道美国人民强烈地反对中共，我们现在在东南亚的所有麻烦都是中共搞的”。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目前同中共进行对抗的关键时刻”，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扬言退出西方联盟的做法，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将影响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巴基斯坦的做法无疑是“杀掉一只下金蛋的鹅”。[①]

毫无疑问，美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政策完全服务于遏制战略以及在亚洲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决策者判定，导致南亚次大陆日益的动荡不安和印巴关系日益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所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②] 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自然要受到惩罚。1964 年 9 月 24 日，邦迪同巴基斯坦财政部长沙阿比（Mohammed Shoaib）会谈时强调，美国南亚政策目标是帮助印度抵抗中国的侵略，美国和巴基斯坦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是美巴两国发展关系的最为严重的障碍。[③]

1965 年 3 月阿尤布·汗访华，对美国的南亚政策再次造成了冲击。马康卫打电报给国务院认为，阿尤布·汗的此次访问对巴基斯坦最为关键的就是通过强调中巴关系的牢固，从而对印度构成新的压力。因此他建议尽快邀请阿尤布·汗到华盛顿，以便澄清美巴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本来约翰逊在 1965 年初也已经同意国务院有关邀请阿尤布·汗访问美国的建议，但科默强调，美国应该让巴基斯坦明白，它不能一方面接受美国巨大的援助，而另一方面又“奉承中共并在几乎一切重要问题上推行反美路线”。邦迪在科默的这份备忘录上写道，“我们应该惩罚”阿尤布·汗。[④] 虽然阿尤布·汗事后向美国解释了访华的目的，重申巴中发展关系仅仅是为了睦邻友好，但美国依然取消了阿尤布·汗访美的安排，以惩罚巴基斯坦。4 月 14 日，约翰逊正式决定取消阿尤布·汗的访问。

在此时刻，印巴军队 4 月份在库奇兰恩发生武装冲突，成为第二次印巴战争的

---

①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pp. 148 – 149.

②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173 – 175.

③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160 – 163.

④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202 – 203.

前奏。巴基斯坦军队使用美国武器装备产生了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马康卫大使打电报给国务院，认为库奇兰恩冲突将成为美国同印巴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冲突本身以及巴基斯坦在冲突中使用美国武器装备。但无论印巴双方的理由如何，就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根本利益而言，“目前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马康卫也承认美国的政策面临着“最为严峻的两难境地”，如果由于巴基斯坦在冲突中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取消对巴方的军事援助计划，那将在南亚打开“中立主义的潘多拉盒子”；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巴方在冲突中使用美国武器装备，那又将面临来自国会和印度方面的压力。马康卫指出，短期内看不到有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但目前应要求印巴双方遵守1960年有关库奇兰恩安排的协议，否则将危及计划对双方的执行。[①] 鲍尔斯也从新德里打电报说，印度也提请华盛顿注意，美国曾保证不允许巴基斯坦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进攻印度。鲍尔斯强调，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将对美印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美国决策者认为，在美国对印巴两国的影响处于低谷时期，冲突迫使美国再次卷入南亚次大陆争吵的中心，巴基斯坦还希望在冲突中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从而在美印之间打入一个楔子。[②]

因此，在库奇兰恩冲突中，美国一方面警告巴基斯坦不得在冲突中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同时对于印度要求美国提供F－5A战斗机一事也加以拒绝。库奇兰恩事件在美国同印巴两国的关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的政策导致印巴两国对美国的信誉和在南亚地区的作用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开始迅速消退。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对印巴两国在库奇兰恩冲突中的表现也极为不满，开始重新考虑制定新的南亚政策。美国首先考虑对印巴两国施加经济压力。

1965年6月8日，约翰逊告诉邦迪，他现在不会同意向印度或巴基斯坦“拨款1美元”，“除非我已经同意或签过字的，如果是我同意过或签过字的，也要拿给我看看”。在第二天同国务院、国防部和国际开发署的负责人讨论对印巴两国援助问题的会议上，约翰逊又明确表示，没有他的批准，不再向印巴两国提供任何新的贷款，推迟批准1966年财年的对外援助拨款。约翰逊还要求国务院和国际开

① *FRUS*, 1964－1968, vol. XXV. pp. 236－237.

② *FRUS*, 1964－1968, vol. XXV. pp. 227－231.

发署共同研究对印巴的援助方针，以便决定美国是否有必要在两国花费如此庞大的款项，同时“按照政治目标的标准”，如何利用经济援助以获得“更大的影响”。[①] 由于对印度援助的年度审议已经完成，美国决定推迟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审议（推迟两个月），并于6月30日将美国的决定通知巴方。美国的决定激起巴基斯坦的极大愤怒，7月14日，阿尤布·汗公开宣称，巴基斯坦寻求的是新朋友而不是新主人；他抨击美国人陶醉于权力，不会倾听小国的意见。美巴两国的关系降到一个新低点。

1965年印巴战争的爆发，对美国的南亚政策而言是一场“灾难”。9月6日，印度军队4个师的兵力越过实际控制线，进入旁遮普地区，并向拉合尔逼近，冲突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同一天，阿尤布·汗和外长布托同马康卫会谈，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美国履行1959年同巴基斯坦达成的协议，希望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击退和粉碎印度的侵略”。值得注意的是，阿尤布·汗向马康卫所阐述的苏联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他告诉美国大使：“苏联人怎么会援助我们？他们怎么能援助我们？中共只会做和苏联人协调一致的事情。如果中共帮助我们，印度就不能把北部边界的部队调过来进攻我们。我们和苏联没有契约，苏联人和我们也没有。我们没有同中国人接触。我们不需要他们，因为俄国人和美国的力量将会介入。我们不需要中国人的介入。”[②]

此时美国决策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考虑到库奇兰恩事件的处理结果，同时还考虑到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印巴战争的可能，此时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秘密谅解”，这可能是巴方在目前的冲突中手中掌握的“一张王牌”；从最坏的角度讲，这可能会使得巴基斯坦做出“最为鲁莽的举动”。[③] 9月8日，约翰逊同麦克纳马拉通电话，商讨对策。麦克纳马拉说，他所关心的是可能出现一系列美国尚未可以充分应对的紧急情况，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中国可能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麦克纳马拉建议美国开始准备，以应对中国和苏联的介入。与此同时，国务院认为，目前印巴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变为“自由世界同共产党集团之间的对抗”，因此“印巴战争将对美

①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 274.
②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360 - 364.
③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359 - 360.

国的利益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如果由于战争而导致南亚地区的“普遍混乱”，那将肯定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对抗共产党中国的切实可行的砝码的努力产生消极的影响”。为此腊斯克建议，美国应全力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印巴冲突，因为美国的介入不仅可以使印巴两国明智地同西方保持关系，而且可以使印巴两国“坚定地抵抗中共对南亚次大陆的蚕食”。[①] 因此约翰逊决定，首先依靠联合国敦促两国停火，并在9月8日公开宣布，立即停止美国对印巴两国所有的援助。

1965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严厉谴责印军在中印边界和中国—锡金边界的入侵挑衅活动，要求印度政府在3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照会还强调说，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不等于不问是非，也绝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遭到剥夺，也绝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②]

中国的照会及相应的军事调动，在美国决策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介入印巴战争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利益和美国信誉构成了挑战。为此，约翰逊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准备，首先，约翰逊命令国防部和国务院制定军事应急计划，其重点放在一旦中国进攻印度，美国所采取的军事选择；其次，约翰逊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停火斡旋；第三，约翰逊指示美国将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③] 随后美国立即警告阿尤布·汗：如果由于他的鼓励，甚至由于他不同意停火而造成中国介入的局面，巴基斯坦将使自己疏远西方，“这不是威胁，而是事实”。一旦实现停火，美国将恢复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因为美国的援助是给予巴基斯坦人民，而不是支持军事冒险，同时美巴两国还可以恢复和保持亲密和互助的双边关系。但是，对于“支持或鼓励红色中国的侵略压力”的任何国家，美国总统不会批准给予哪怕是一角钱的援助。[④] 另一方面，对印度方面一再提出的希望美国公开承诺，一旦中国进

①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375 - 377.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③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p. 162.

④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409 - 411.

攻印度，美国将帮助印度的请求，美国始终没有同意。

在美国的压力下，印巴两国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阿尤布·汗表示希望尽快结束印巴战争，他批评美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和无所事事，中共在危机中所表示的同情并不是由于巴基斯坦的要求，“如果美国早先就警告任何越过国际边境线进入对方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那么目前会出现为中共提供的危险的机会”。至于中国的“最后通牒”，阿尤布·汗表示他没有同中国串通过，没有进行过磋商，也不知道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并声称他曾劝告中国人不要介入。[①] 9月17日，印度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9月22日，巴基斯坦也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同意停火。1966年1月10日，印巴在苏联的斡旋下签订塔什干协议。甘地夫人表示，尽管存在着巴基斯坦的挑衅，印度将履行塔什干协议。在1966年7月12日至17日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甘地夫人再次声称，塔什干协议是“和平共处的证明”。[②] 1965年战争的结果使得印度的外交战略进一步倾向苏联。

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决策者开始反思南亚政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美国的南亚战略虽然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悲剧”，但任何对美国南亚战略的重新评价都必须承认，“这一战略迄今为止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因为南亚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同红色中国日益增长的对抗中”。因此，美国要坚持“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继续向印巴两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③] 但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南亚局势中所存在“真正危险”，那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将“误读”美国的政策：“巴基斯坦人可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选择就是向我们施加赤裸裸的压力，或者同红色中国进行赤裸裸的讨价还价。这是他们正在谈论和正在采取的方法。印度人也可能错误地感到，我们正利用粮食作为直接的工具，按照印度的政治条件，他们感到自己唯一安全的解决办法就是公开而坚定地脱离西方。印度人还错误地认为，我们试图利用我们的援助换取他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投降’。”鉴于此，邦迪和科默提出了美国未来南亚政策的四项原则：印度的重要性超过巴基斯坦，如果印度能“明智地”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美国可以继续向印度提供粮食和其他经济援助；“在上述优先考虑下，假如我们可以向巴基斯坦

①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415 - 418.

② S. P. Singh,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India-USSR Relations*, p. 138.

③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531 - 533.

展示中国道路是无用的和毫无意义的，并向他们展示西方继续提供经济支持的现实，那么我们没有必要丢失巴基斯坦”；不要期望克什米尔问题的早日解决，美国可以做到的最大努力就是向印巴双方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美国对印巴的经济援助除了同政治解决印巴之间的问题之外，还可以同以下主要问题联系起来：使巴基斯坦脱离中国，“阻止印度无理性地倒向苏联”，不让印度人获得核武器，迫使印巴两国推行更好的经济和农业政策，等等。[①]

因此，在上述政策设想下，印巴两国必须采取的让美国“满意的”的具体措施，就巴基斯坦而言，“展示巴基斯坦优先发展同美国和自由世界关系的行为”包括：“巴基斯坦必须抛弃这样的念头，即威胁倒向中共将会使美国不断地做出迁就，这不会起任何作用，巴基斯坦越早停止使用这种手段，我们就越能达成更好的谅解。我们所需要得是对美国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并不排除巴基斯坦同中国发展‘正确’的关系，但这确实需要排除拼命巴结中国”。同时，巴基斯坦必须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理性的政策，修正对印度的要求，这样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才会有助于印巴分歧的解决。[②]

这样，1965 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主要包括三个主要目标：限制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关系，继续使用设在白沙瓦情报设施，使巴基斯坦继续履行作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的义务。1965 年 12 月 15 日，约翰逊同阿尤布·汗会谈。美国同巴基斯坦过去的那种联盟关系已经结束，正在形成的新的关系同过去是不同的；解决美巴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关系，约翰逊说，如果巴基斯坦希望发展同美国的关系，那么就不能同中国发展关系。[③] 1966 年初，约翰逊授权恢复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但前提必须是巴基斯坦缓和同印度的紧张关系，并限制同中国的关系。同时，政府决策者并不同意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援。1966 年 3 月科默告诉约翰逊，阿尤布·汗显然不准备放弃中共作为后备之用，起码直到他知道自己下一轮的军事物资来源于何处。

到 1965 年底，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战略重点明确倾向印度。1965 年 11 月 8

---

①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444 - 447.

②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459 - 460.

③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511 - 513.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题为《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战略》的文件，全面阐述了美国对南亚大陆的政策及其目标。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共产主义并没有对南亚次大陆构成直接的和迫在眉睫的威胁，对印度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喜马拉雅的另一边，而是至今依然脆弱的印度社会可能出现的分裂和解体。如果由于国内政策的失败而导致印度的分裂和解体，那么如同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中国的事件一样，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政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政权的出现不仅会破坏亚洲的力量均衡，而且还会在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引发“多米诺效应”。文件强调，在目前看来，这些可怕的可能性似乎很遥远，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可能性是否足够真实，以证明采取同所冒风险相称的预防措施是正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相信上述可能性，为此建议约翰逊政府继续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防止印度走向共产主义。① 在1966年初同印度总理的会谈中，约翰逊同样表示，必须按照美国的条件发展美印两国的新关系。

美国的基本条件就是，印度必须采取“铸剑为犁”的政策，因为目前南亚地区不战不和的局面威胁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美国利用印度1965年至1966年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迫使印度政府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并推迟对印度的军援。而在同一时期，甘地夫人不仅在越南问题上不断批评美国的政策，而且还加大同苏联的军事合作。

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停止向印度提供军火，印度再次寻求苏联的支持。经过谈判，苏联同意向印度提供坦克、苏-7型轰炸机以及移动雷达等。到1967年，印度购得500辆苏制和捷克产的坦克、100架战斗机；1969年至1970年，苏联共向印度提供了450辆中型和重型坦克、150辆轻型坦克、140门口径为100毫米的火炮、2艘潜艇、1艘驱逐舰、120架米格-21型歼击机、32架安型运输机、140架苏-7型战斗机、109架直升机以及50副地对空导弹发射架。② 同时，印度和苏联还大力加强在海军建设领域的合作。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1968年初访问印度，同意向印度提供“基辅”级潜艇。1968年春，第一批“基辅”级潜艇运抵印度。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同意印度可以自行生产苏联设计的武器装备，以适应印度发展军火工业的需要，从而使得印度可以在

---

①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pp. 166－167.

② Bimal Prasad,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1972: A Documentary Study*, p. 332.

国内生产所需的2/3的武器装备。[①] 印度同苏联在军事领域进行密切合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双方达成的武器协议对印度而言是公平的；其次，印度为了抗衡美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先进武器，特别是超音速战斗机；最后，印度希望获得对抗中国的象征性的支持。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 B. Chavan）在1964年9月明确表示，苏联的武器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用来对付中国。[②] 另外，苏联武器的价格相对便宜，比同性能的西方武器的价格通常低40%到50%，可以用印度向苏联的出口物资结算，从而节省印度大量外汇。苏联在1964年同意向印度提供为期10年的军事贷款，利率仅为2%。[③]

美印之间的政治关系由于印苏关系的密切而日趋冷淡和紧张。当1967年1月甘地夫人向胡志明发去热情洋溢的生日贺电时，美国对印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腊斯克打电报给鲍尔斯说："如果她感到她必须倾向于不结盟取悦于共产党世界，以便明白地向莫斯科表明自己的诚实可靠，那她就不能表明对美国的诚实可靠。这个国家的基本氛围不允许我们像一头老母牛那样不停的产奶，但还经常被人从旁边踢它。"腊斯克让鲍尔斯警告甘地夫人，她同约翰逊总统的个人关系"也许是印度未来安全和独立发展的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④]

1967年4月12日，约翰逊政府经过近一年多的考虑后，宣布同时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供新的军援政策。这一政策规定印巴两国可以用现金购买先前美国供应的军事装备的零部件，但必须个案处理。这一妥协的方案并未使印巴双方满意。巴基斯坦在1965年战争后也积极寻求武器供应的来源。1966年从中国获得价值1.2亿美元的军火。1967年9月，阿尤布·汗访问苏联，希望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1968年4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巴基斯坦，意在以军事援助让巴基斯坦中止美国使用白沙瓦的通讯基地，因为这个基地距苏联边界仅150英里。1968年6月，叶海亚汗（A. M. Yahya Khan）率领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谈判苏联同意向巴出售武器，而巴基斯坦则中止美国在白沙瓦基地的使用权。巴基斯坦决定在1968年终止美国使用白沙瓦的设施，充分体现了巴基斯坦对美国政策的

---

① S. P. Singh,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India-USSR Relations*, p. 109.

② Sucha Singh Gil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 - 1980*, pp. 172 - 173.

③ 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Nehru Era*, pp. 208 - 209.

④ *FRUS*, 1964 - 1968, vol. XXV. pp. 859 - 860.

不满，同时也标志着“曾经存在于美巴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仅存的残留物的消失”。[①]

冷战时期印度外交政策和南亚国际关系的重大分水岭是1971年的印巴战争。[②] 1971年印巴战争的起因于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部的政治斗争。在1970年的巴基斯坦大选，长期要求自治的东巴孟加拉人在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ehman）为首的孟加拉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同盟的领导下，提出了要求给予广泛自治权的《六点纲领》。1970年12月的大选结束后，人民同盟在300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获得160席，穆吉布将成为全巴基斯坦的新总理。人民同盟要求叶海亚汗总统按照宪法的规定由它组阁，实现《六点纲领》，并为此同巴基斯坦中央政府进行了2个月的谈判，但未达成任何协议。谈判失败后，穆吉布下令开始接管东巴全部行政权力，并于3月23日升起“孟加拉国国旗”，东巴事实上已经独立。在这种背景下，3月25日，叶海亚汗以叛国罪逮捕了穆吉布，决定对东巴人民实行军事统治，由此引发了危机。巴基斯坦军队还对东巴孟加拉人进行军事镇压，大批难民流入印度，为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直接巴基斯坦提供了借口。

1971年3月26日，印度官员公开宣称，印度并没有把东巴局势看作仅仅是巴基斯坦的内政；3月31日，甘地夫人向印度议会提交了《保证印度人民支持东孟加拉的自由斗争》的议案并获得通过。5月18日，甘地夫人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警告巴基斯坦说，印度“完全准备战斗，如果有人把这种形势强加给我们的话”。印度大使L.K.杰哈也提醒英国和法国说，鉴于难民大量涌入印度，印度“可能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国家利益”。此时甘地夫人下令制定计划，要通过一次“以色列式”的闪电战接管东巴；但印度军方认为甘地夫人的计划过于冒险，他们主要担心中国方面的干预，担心其他国家特别是伊朗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同时苏联的武器供应也并不可靠，结束战争可能需要占领巴基斯坦全境。印度的司令官坚持至少要等到11月喜马拉雅山脉的气候使中国更难于进行干涉的时候。

印度在这一阶段加紧进行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的各种准备，1971年8月9日印度和苏联签署的为期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苏联和印度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苏联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火。苏联的支持

① Robert McMahon, “Toward Disillusionment and Disengagement in South Asia”, pp. 170 – 171.

② 由于档案文献的限制，对围绕这一战争的大国决策过程尚不能系统阐述，但战争的影响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为印度发动战争提供了关键的保证。同时，印度还试图获得美国的支持，1971 年甘地夫人访问美国。尼克松政府在南亚地区的目标非常简单，同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东巴危机爆发后，基辛格在 3 月 26 日举行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明确表示，这场危机将引起内战，而且相当快就会导致东巴独立。① 不过美国决策者在危机中还是倾向于采取支持巴基斯坦的政策，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叶海亚总统在 1970 至 1971 年是中美两国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同时，尼克松还认为印度是苏联的代言人，甘地夫人想摧毁西部巴基斯坦，以报复这个促成中美关系的国家。②

1971 年 11 月 4 日，尼克松在白宫接见来访的甘地夫人时表达了美国对南亚局势的立场，他强调，分裂巴基斯坦绝对没有什么好处，“由印度发动战争，这是几乎不可理解的……一旦印度发动战争，那就很难确切估算其他大国会采取什么步骤”。③ 甘地夫人说：“印度从来没有希望巴基斯坦崩溃或者永久性的削弱。最重要的是，印度寻求重建稳定。我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消除混乱。”在基辛格看来，甘地夫人对尼克松的态度既表现出发展中国家颇为时髦的对资本主义象征的鄙视，又暗示她过去从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里听到的有关总统的那些丑事不可能全是假的。④

尼克松显然认为那个被他称之为“母狗”和“淫妇”的甘地夫人在说谎。11 月 19 日，印度国防部长宣布，巴基斯坦正在计划先发制人，轰炸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空军基地。11 月 22 日，印度未经宣战向东巴发起全面进攻，印巴战争爆发。12 月 3 日，巴基斯坦向印度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从而使得战争扩大到了西巴。美国采取了全面支持巴基斯坦的政策。首先取消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 8700 万美元的贷款，31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 7200 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并派“企业号”航空母舰群前往孟加拉湾，作为支持巴基斯坦的姿态。同时，美国还向苏联施加压力，警告苏联“对印度侵略行为的支持危及了苏联和美国的关系”。⑤ 最后，印度同意接受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西巴领土现状。12 月 16 日，东巴的巴基

---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8 页。

② 威廉·伯尔：《基辛格秘录》，庞伟译，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 页。

③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205 页。

④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第 151—152 页。

⑤ 威廉·伯尔：《基辛格秘录》，第 25 页。

斯坦军队的司令官宣布投降；17 日，印度宣布接受在西巴实行无条件停火。

1971 年的印巴战争是在巴基斯坦陷入孤立、苏联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中国国内局势紧张、美国国内意见分歧等因素的鼓励下，早在 1971 年春天或夏天就决定肢解巴基斯坦，以确立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就冷战时期大国在南亚地区的关系而言，1971 年的印巴战争“最具重要性的结果就是，苏联抵消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灵活性，并且以牺牲共产党中国为代价，极大地提高了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印度未来在这一地区进一步扩张的贪欲大大增强了”。[①] 中美接近和印苏关系密切不仅是 1971 年印巴战争爆发的国际背景之一，同时也是战争的重要后果。印度所谓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的纱幔随着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和 1971 年印巴战争的爆发而彻底扯下，印度外交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由此开始。

六、结论

从冷战初期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大国关系的演进来看，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质是实用主义，印度外交战略的选择，不仅是尼赫鲁外交思想的实践，也是对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回应。

冷战时期主要大国同印度的关系，体现了各大国在处理冷战非核心国家的关系时的不同特点。这种特点清楚地显示，在不同的时期大国对南亚地区的战略具有不同的优先考虑，这些不同的考虑包括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同盟战略关系等等。美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变动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印度外交取向的关键。印苏关系和印美关系的发展，同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美关系的敌对和危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印度外交决策者利用这些变动，同时发展了同美国、苏联的关系，先后争取到美苏对其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力支持。而这种支持也成为印度在处理同中国边界问题时采取强硬政策的决定性的动因，其后果的严重性显而易见。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美国拉印反华，苏联也借助印度遏制中国。美苏在南亚的争对加剧。1971 年印巴战争后，印度因华盛顿不支持它肢解巴基斯坦而疏远美国，倒向苏联。美国对此感到不安。这不仅促使美中在南亚的矛盾走

---

① 理查德·里夫斯：《孤独的白宫岁月》，蒋影译，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3 页。

向缓解，而且推动了美苏中三国之间关系的调整。

总之，冷战时期大国关系在南亚地区的互动和影响是明显而微妙的。印度的外交并未造成冷战格局的重大变化，但南亚局势还是促成了美苏中三角关系的形成。

结 束 语

冷战前期的美苏大国关系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在世界走向全球化、大国利害关系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出现的。对峙的双方一方面要“战”，另一方面又要“冷”。两者的关系构成冷战初期美苏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冷战前期美苏大国关系的第一个特点是，“战”与“冷”这相互矛盾的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从内容上看，是全面的、激烈的。两个超级大国率领两大阵营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相互进行攻击和较量。双方的冷战对抗既是现实利益的争夺，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美苏在全球各地对抗争斗，地区性冲突连绵不断。同时，两国疯狂进行核军备竞赛，经常进行核威胁核讹诈，还一度在核大战的边缘进行最危险的较量。从地域上看，美苏对抗最初集中在欧洲和西亚地区，进而扩展到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遍及全世界。从时间上看，延续了40多年。可以说，美苏在冷战时期彼此之间的“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另一方面，“冷”的因素，防止世界大战的机制与措施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美苏虽将对方视为死敌，但并没有制定出消灭对方、独霸全球的具体计划和安排。美苏的行动是有某种克制的。彼此一直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并同在联合国内，同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始终保持着某种联系和沟通。两国举行首脑会议，建立热线联系，签订各种协议。美苏采取这些行动，意在使“战”保有“冷”的色彩，控制住对抗冲突的进程，不让其随意扩大升级，更不允许核战争爆发。双方在对峙冲突中注意相互沟通了解，避免伤害对方的基本战略利益，遵守维护共同利益的游戏规则，增进彼此间的信任，寻求妥协。即使在发生像柏林危机、加勒比海危机这样严重时刻，在出现军事对抗、濒临战争边缘的紧急关头，美苏也

积极开展对话谈判，在一些问题上作出友好表示和妥协让步，避免任何可能引向公开武装冲突的行动，全力维持“冷”的局面。美苏对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冲突也加以限制，防止发展为美苏两国间的直接碰撞。美苏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前所未有的。它们在全面激烈对抗的同时，发展和完善了自我控制机制，使两国得以安全度过数次严重危机，避免局势不可收拾。应当说，美苏关系中“冷”的因素始终占有一定地位，并有突出的展示。

冷战前期美苏大国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战”与“冷”彼此制约，“战”是基本的，但“冷”也是不可或缺的，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美国和苏联虽未直接交战，但相互势不两立。美国认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自由世界的死敌，只有击垮苏联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苏联则坚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消灭美帝国主义、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双方并都把自己的得视为对方的失，而把自己的失视为对方的得，彼此的信仰和理念完全对立，毫无共同之处。美苏都把“确保摧毁”对手定为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冷战时期的“战”不仅是美苏两国前途的决战，而且是关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命运的生死搏斗。可以说，“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构成冷战的基本内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明确指出，“冷战事实上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约翰·米勒更把美苏冷战直截了当地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①]

但美苏对核热战的严重后果也感到担忧和害怕。它们在激烈对峙的同时，建立各自的自我控制机制，使“战”得到“冷”来与之相互配套。美苏大国关系中的这一相互矛盾的两方面并非简单地你消我长。当大国关系走向紧张的时候，既孕育着爆发危机的因素，也包含促使缓和机制发展的机遇。同样，当缓和不断发展的时候，可能引出前所未有的危机。矛盾两方面有多种组合，它使大国关系十分复杂与特殊，历史发展也非常曲折与艰难。

“冷”虽然在美苏关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但仍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特点，值得认真关注。它防止了美苏核大战的发生，至今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和平。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国家间的冲突作战一直连绵不断，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发

---

① 约翰·米勒：《静悄悄的灾变：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美）《外交史》杂志，1992年春季刊。

展成为世界性大厮杀。20 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两次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间的矛盾对抗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不断加剧。但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核武器的毁灭性破坏能力以及全球化发展不能不使人们认真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大国开始控制自己的行动，转而采取冷战政策，在敌视对抗和霸权争夺的同时，努力将无法消除的矛盾斗争从不断扩大限定到某一范围之内的，防止了核大战的爆发。就此而言，冷战时期也是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它给人们带来某种希望。冷战可能成为使战争从不断扩大逐渐转向缩小的起点。它与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发展结合一起，可能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从这一点看，美苏关系中出现“冷”的因素，有着重大历史意义。

冷战前期美苏大国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美苏两极以及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的实力是不对称的，美苏关系基本是在不对等基础上展开的，从而使美苏在使用“战”和“冷”的手段时各有自己的特点。

美国和它的伙伴国的经济实力要比苏联集团强大。1950 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 3 倍，北约盟国加上日本的财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 4－5 倍。[①] 苏联力图通过提高军事实力来消除同美国的不对称。它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陆军，进而要在核武器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的时间比美国落后 4 年；试爆氢弹仅落后 1 年。发射洲际导弹则先于美国 1 年。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都有能力摧毁美国的西欧盟国。但是莫斯科的战略核力量仍长期处于劣势。1955 年美国拥有 3037 枚核弹头，苏联为 200 枚；1956 年的相应数字是 4618 和 426；1957 年是 6444 和 660；1958 年是 9822 和 869；1959 年是 15468 和 1060；1960 年是 20434 和 1605。[②] 运载工具方面，苏美更是相差悬殊。据美国史学家加迪斯的资料，苏联在 60 年代初只有 4 枚能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而美国有 3000 多枚能打击苏联领土的核弹和核导弹。[③] 谢·赫鲁晓夫认为，算上供试验用的导弹，苏联在 1961 年也只有 6 枚洲际导弹。[④] 直到 1970 年代初，苏联的核力量才达到与美国大体相等的水平。苏联用极大的代价克服了军事力量上的不对称，但是并没有消除经济

---

① 〔美〕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1996 年第 5 版）（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年，第 92 页。

② *Под ред. Минаева А. В. : Советсквя военная мощь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М. 1999 С. 167.

③ *Gaddis J.* : We Know Now, *New York*, 1997, *p.* 240.

④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 428 页。

和国家实力方面的落后，还常常因为经济的落后而难以维持军事上的对等，无法对付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单凭军事力量的强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苏之间实力的不对称性始终是存在的。

美国拥有强大的国力，在国际舞台上处于强势地位，它在“战”的方面比较积极，经常采取进攻态势。它大力推进遏制苏联的政策，率先组织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进一步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和《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从欧亚两洲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政治军事包围。华盛顿一直拒绝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大力扩展核武器，对苏进行核威慑。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代之以“灵活反应战略”，对苏联采取咄咄逼人的架势。美国还介入或发动一次又一次局部战争，出动大批兵力参加朝鲜和越南战争，同苏联中国进行武装较量。美国在“冷”的方面则相对比较消极。1954 年，美国拒绝在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上签字。初期，很少主动提出缓和局势、谈判解决争端的建议。后来，特别是在古巴危机爆发后，情况有所改变。

处于劣势的苏联则从“战”与“冷”两方面积极寻求对策抗拒美国。苏联大力发展核军事力量，同美国进行核竞赛；另一方面又积极倡导核军控与核裁军，并于 1958 年首先单方面停止核试验。苏联积极争取同盟军，支持亚非人民反对美英新老殖民主义，同时在西方认为最易受伤害却又最为关键的地区——柏林和古巴制造危机以期争取战略主动地位；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政策，率先建议并积极参与美苏首脑会谈，采取措施缓和苏美关系，并在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中主动退让，自我控制。苏联在处理“战”与“冷”的关系上既有灵活多变的特点，又有被动失当之处。

美苏冷战对峙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美苏关系的演变虽然基本是两国自身决定的，但亚洲大国也影响着美苏关系，影响着冷战的格局，在某些时候甚至起到关键性影响。

美苏是超级大国，双方之间的对峙和争夺构成这一时期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的态势与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尽管在战时实施了有巨大成果的合作，又协商制定了继续合作的雅尔塔体系，但两国的大战略不同，再加上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碰撞，美苏关系日益脱离合作的轨道，走向冷战。美国首先提出杜鲁门主义，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

对抗的冷战信号。进而提出马歇尔计划，使冷战发展成为美苏两极全面对抗。这以后，冷战对峙持续激化，从共产党情报局的组建到柏林危机、两个德国的成立，北约和华约的建立，两极对抗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大阵营的对抗。冷战对峙的不断升级给美苏两国都带来沉重负担和巨大危险。50 年代中期起，美苏开始对话，寻求妥协缓和。两国重开首脑会议，解决奥地利等一些次要问题。但起伏很大。1958—1961 年发生柏林危机，美苏坦克对峙；1962 年爆发古巴危机，美苏更陷人核大战的危险边缘。美苏开始意识到调整相互关系、防止核战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缓和趋势由此加强。美苏承认相互军事实力均等，尊重彼此利益。两国开始在停止核试验和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达成某些协议。此后，苏联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向全球扩张，美国陷于越南战争泥沼难以自拔。尼克松总统及时调整战略，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加强美国的地位。美苏关系继续朝着缓和方向发展，但两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发展曲线由苏升美降转为美升苏降。

美苏关系在冷战前期的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亚洲大国政治外交取向的影响。亚洲大国主要是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取向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印度则奉行“不结盟”政策。亚洲国家的力量同美苏不能相比。它们所采取的不同外交取向以及随后的发展变化，并不是冷战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对亚洲的冷战格局，进而对美苏在全世界的对峙格局，对美苏关系产生巨大的甚至是不容忽视的影响。这其中，中国所起的作用最为突出。

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是全面的。冷战扩及到亚洲是美国全球冷战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反对中国革命、敌视中苏同盟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洲一直处心积虑地打压苏联。它在中国扶蒋反共，同时扶植前敌人——日本，以遏制苏联，对苏冷战。受挫后，转而推行离间中苏关系的“楔子政策”，但再次遭到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建立同盟互助关系。日本政府则迎合美国的需要，投靠美国，联合对抗苏联和中国。1950 年，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在朝鲜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美国则进一步扶植日本，搞片面对日媾和，与日本签订安全条约，同日本正式结成同盟，最终造成美日与苏中在东亚的冷战对峙格局。印度是南亚的大国。但南亚不是冷战的核心地区，印度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周旋，推行实用主义的中立政策，

同时与美苏发展关系。因此印度在初期未对冷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苏冷战由于中日两国的政治取向，美日和苏中两大同盟在亚洲的建立，再加上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在欧洲的对立，最终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对峙。

50 年代中期以后，美苏一面搞缓和，一面加剧在全球的争夺。两极冷战对峙依旧，但局势动荡多变。亚洲大国崛起使大国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实力增强。1960 年，日美签订《共同合作与安全条约》，两国的特殊关系不断强化。与此同时，两国贸易摩擦丛生，日本出现对美的离心倾向。印度同中国关系日趋紧张恶化，1962 年发生边界冲突。美苏竞相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拉拢印度对抗中国。1965 年印巴战争后，苏联更向印度提供武器装备，扩大军事合作。美苏在南亚的争夺加剧。新中国不惧美国的遏制和孤立，奋发图强，发展壮大，于 1964 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为核国家。美国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存在，从 60 年代初开始探寻缓和中美对抗之策，并对蒋介石政府的行动进行了某些约束，但因企图绕过台湾问题而无建树。苏联以核力量和空间力量为代表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也随之加强，力图全面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朝鲜战争、波匈事件以及越南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但没有得到苏联足够的尊重，更遭到美国的敌视和反对。1958 年，中国炮轰金门马祖，爆发台海危机。这既是对美国的挑战，也是对苏联的示威，是中国力图突破美苏两极格局的初次尝试，显示出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某种独立地位。进入 60 年代，中苏因反美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差别而产生分歧争执，再加上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原因，使两国同盟破裂。1969 年中苏之间发生严重的珍宝岛流血事件，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美国低估中苏矛盾的深刻性，没有及时调整对苏对华政策，争取主动，反而扩大对越南的战争。美中对抗激烈。中国站到了冷战的风口浪尖，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的力量、地位和作用都无法与美苏相比，难以构成三角之势，也不足以改变冷战的战略格局。但中国以及日本、印度的兴起以及它们的政治外交取向，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苏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化，对美苏两极格局造成冲击。当然，美苏对峙依然是最基本的，国际冷战局势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还在美苏两国手里。

70 年代初，美苏之间出现某种战略均势，但相互间的争夺继续加剧。除了核军备竞赛外，两国在越南战争和印巴战争中激烈较量。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

实力相对减弱。美国虽有盟友日本，且日本已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但后者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有限，美日同盟没能解救美国的困境。苏联推行全面进攻战略，在全球范围与美国争霸。勃列日涅夫将对越南的政策由脱身改为插手，拉拢越南对抗美国，遏制中国。在南亚，苏联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积极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帮助印度确立它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印度因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而疏远美国，倒向苏联。苏联乘机与印度签订为期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排挤美国势力，抬高自己在南亚的影响力。中国面对美苏两家的敌视和威胁，处境孤立险恶。美苏中三大国为应对这一局势变化，都积极寻找对策，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动作最大，主动推进同美国的和解，逐步退出冷战第一线，退出两大阵营的直接争斗，进而与美国联合对抗苏联。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大国地位被确认，对国际冷战局势的影响不断加大。苏联因越南等问题加剧了同中国对抗，它的咄咄逼人言行更把中国推向美国，由此潜伏下巨大危机。美国利用中苏矛盾，寻机退出越南战争，在其战略有限收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身的全球利益。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改变过去的僵硬对华政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迈出了中美缓和并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中苏同盟破裂和中美关系缓解使美苏中三国的战略关系达到某种均势，并形成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后者逐步代替美苏两极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冷战也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等亚洲国家对国际冷战局势、对美苏大国关系的影响不断增强，日益超出亚洲，波及世界。

上述两方面的分析，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冷战前期大国关系的丰富内容。它既是传统大国关系的继承和加强，也包含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颖因素。“冷”与“战”的交织，以及美苏与中日印间的互动，使美苏关系在曲折复杂的冷战进程中不断调整演变。

1972年以后，冷战进入新阶段，美苏关系、美苏中欧日印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美苏在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的情况下，加强相互沟通联系，对他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采取较前更为宽容的态度，维护游戏规则、推动裁军谈判以防止核战爆发。另一方面，削弱苏联力量、瓦解美苏两极格局的因素在增长，美苏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个结构朝着新的方向演变。

本书写作的具体分工如下：

序　言：徐天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第一章：徐　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二章：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第三章：徐天新

第四章：牛　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第五章：沈志华

第六章：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第七章：沈志华

第八章：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九章：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十章：沈志华

第十一章：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结束语：徐天新、沈志华